

企业治理与社会责任

Corporate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 Social Responsibility



赵京 Jing Zhao

 中日美 比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Publisher/出版印刷社：Lulu Press, Inc., www.lulu.com 627

Davis Drive, Suite 300, Morrisville, NC 27560, USA

Distribution/发行：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

<http://cpri.tripod.com>

zhao.cpri@gmail.com

1745 Copperleaf Ct. Concord, CA 94519 USA

字数：约 27 万字

2020 年 4 月 29 日第 4 版

ISBN/国际书号：978-0-557-05663-7

ISBN 978-0-557-05663-7



9 780557 056637

前言

当 Ralph Nader 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时,人们对于“商业伦理”这个“矛盾”嗤之以鼻¹,美国人没有想到 General Motors(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公司真会容纳妇女或少数人种进入董事会。在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化的今天,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已经超越伦理范围,关系到地球和人类文明本身的命运。特别对于中国而言,公司治理又是民主化与人权/民权事业的主要战场,才刚刚起步。

自从 2004 年开始注意到公司治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来,我开始有意图地购入一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公司的股票,仔细阅读公司的财务报告等,受益不少。毕竟,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比一百年前有相当大的改进,我们今天不必像柏克曼那样,要用一把破枪(和被判 22 年监禁的代价)去教育公司的主管,要求对员工们公正/人道一些。确实,美国的热心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股东们在帮助结束南非的种族主义斗争中作出过贡献。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士和机构,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始注意和参与到这一行业中来了。²

国际经济学本不是我的专长研究,我涉入此领域,只是为了提供别人没有或不愿提及的背景条件。通过公司治理的实践,我也关注被国家权力和公司权力操纵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¹ 如 R.E. Freeman & D.R. Gilbert, *Corporate Strategy and the Search for Ethics*, p.20.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8.

² 如人权委员会 2005 年 4 月 20 日第 2005/69 号决议规定了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2008 年 6 月人权委员会决定再延长 3 年特别代表的任期。

本书 2009-2015 年原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企业治理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Corporate Governance》出版，由于篇幅越加越长，自 2016 年起删除关于国际政治系学论文，改为中文版为主的《企业治理与社会责任 Corporate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 Social Responsibility》<http://cpri.tripod.com/cpr2020/corporategovernance2020.pdf>。最后一文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Review 因为列入的公司越来越多，无法每年逐一检查，从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就不再更新。

2020 年 1 月 9 日，我出版了英文版 Shareholder Proposals: The Archimedes Lever of a Social Gadfly, ISBN: 978-1-79485-977-7. 收集了本书里记述的付诸表决的正式提案和部分英文媒体的报道。

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交流。

赵京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2020 年 4 月 29 日

目录

前言

- 1.1 从挑战 Yahoo 的案例看监督超级大公司的可行性
- 1.2 出席 Yahoo 雅虎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
- 1.3 从 2009 年股东大会看 Yahoo 雅虎的兴衰
- 1.4 2011 年 Yahoo 雅虎股东大会第 5 号人权提案
- 1.5 问责雅虎人权基金滥用的最后提案
- 2.1 令人意外的 Google 谷歌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
- 2.2 专横卑鄙的 Google 谷歌 2009 年股东大会
- 2.3 以股东提案推动 Google 谷歌的人权政策转换
- 3.1 激荡的 Chevron 雪佛龙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
- 3.2 出席 Chevron 雪佛龙公司 2009 年股东大会
- 3.3 推动 Chevron 雪佛龙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验
- 4 推动 Boeing 波音公司人权政策的尝试
- 5.1 乏味的 Oracle 甲骨文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
- 5.2 再次占领 Oracle 甲骨文股东大会
- 5.3 坚守 Oracle 甲骨文股东大会的战场
- 5.4 第四次出席 Oracle 甲骨文股东大会
- 5.5 第五次出席 Oracle/甲骨文股东大会
- 6 美国大选过后的 Sun 升阳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
- 7 死气沉沉的 JDS Uniphase 公 2008 年股东大会
- 8.1 在 Cisco 思科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上关注中国人权
- 8.2 中国民权运动的新战略尝试
- 8.3 推动 Cisco 思科人权政策转换的谈判纪实
- 8.4 网络空间的安那祺自由秩序
- 8.5 思科 2015 股东年会上的硝烟
- 8.6 思科 2018 年股东会议的两个提案
- 8.7 Cisco/思科公司 2019 年股东会议的提案

- 9.1 推动 News 新闻集团的人权政策
- 9.2 被我不幸而言中的新闻集团的企业病
- 10.1 惠普 H-P 公司面对人权提案的黔驴之计
- 10.2 推动惠普公司的人权政策改变的第一步
- 10.3 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
- 10.4 推动惠普人权政策改善的阿基米德杠杆
- 10.5 惠普 2013 年股东大会观感
- 11.1 首次参加 VISA 股东年会
- 11.2 再次关注 Visa 公司的高层报酬哲学
- 12.1 帮助 Intel 英特尔改进企业社会责任
- 12.2 推动英特尔、思科和清华的信息通讯技术与学术的自由
- 13 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误导人权提问
- 14 永新视博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上的人权提问
- 15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走向国际化的官僚资本主义
- 16 从 Juniper Networks（瞻博网络）股东年会联想到占领运动和“六·四”人道基金
- 17 从 Intel 到 Zynga：如何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 CSRI？
- 18 Best Buy 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 CSRI
- 19.1 参加硅谷人权会议后记
- 19.2 参与硅谷人权会议
- 20.1 与 Microsoft 微软的初次交锋
- 20.2 推动微软公司人权政策的进展
- 21.1 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之二：NetApp 的公司治理提案
- 21.2 继续占领 NetApp 股东大会
- 21.3 在 NetApp 股东年会宣读亚太和平政策
- 22.1 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之三：Symantec
- 22.2 世界最大网络安全公司的股东提案
- 23.1 改进 Goldman Sachs Group 高盛集团的社会政策的尝试

- 23.2 高盛股东大会人权提案揭开纪念“六四”的序幕
- 23.3 以股东大会推动东亚太平洋的新途径
- 23.4 与高盛集团董事会的首次面对面交锋
- 24.1 Apple, 难啃的苹果
- 24.2 问责荒诞的苹果高管厚禄问题的提案
- 25.1 美国公共事业公司的治理问题: 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联合股东大会观感
- 25.2 2018 年 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联合股东大会
- 25.3 2019 年 PG&E 联合股东大会: 场内提案和场外抗议
- 26 成功改进 MEMC/SunEdison 公司治理的战例
- 27.1 “G2 格局”与 facebook 股东大会
- 27.2 Facebook 脸书公司的国际公共政策提案
- 28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景展望
- 29.1 由搜狐公司治理的案例尝试驾驭资本阶级
- 29.2 以搜狐公司治理尝试改进中国的社会秩序与规范
- 29.3 改进搜狐公司治理的胜利
- 30 On Shareholder Proposals Rule Change
- 31.1 推动应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战例
- 31.2 继续挑战应用材料公司的治理
- 31.3 应用材料公司的 2018 年股东大会
- 32 寡头阶级对美国经济民主的致命袭击
- 33 改进博科 Brocade 公司治理的胜利
- 34 改进 Hospira 公司治理的尝试
- 35 前景渺茫的 Altera 公司
- 36.1 eBay 公司治理的问题
- 36.2 eBay 公司 2019 股东年会提案
- 37.1 Netflix 公司成功外表下的治理问题
- 37.2 Netflix 公司治理的老问题

- 38.1 以 IBM 的公司治理推动东亚的正义进程
- 38.2 在 IBM 股东大会上对安倍访美发出警告
- 39 在阿里巴巴第一次股东年会上的提问
- 40 埃克森美孚的高层报酬政策提案
- 41 改进摩根大通的高层报酬政策
- 42.1 新兴的制药公司 Gilead
- 42.2 制药公司 Gilead 的 2018 年股东大会
- 42.3 作为政治舞台的制药公司-Gilead2019 股东年会
- 43 住房贷款软件公司 Ellie Mae
- 44.1 热闹的特斯拉股东大会
- 44.2 特斯拉 2018 年股东大会提案
- 44.3 Tesla2019 年股东大会提案
- 45 改善沃尔玛公司的董事资格条例
- 46 帮助 Verizon 解决 Yahoo 雅虎的问题
- 47 平凡的 Clorox 股东大会
- 48 Nuance 的股东投票权利的提案
- 49 salesforce 年会的股东提案获得通过
- 50 改革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高管报酬的提案
- 51 2018 年 Twitter 股东大会的公共政策委员会提案
- 52.1 Equinix2018 年股东会议提案
- 52.2 Equinix2019 年股东会议提案
- 53 Guidewire Software/导线软件公司 2018 年股东会议提案
- 54 Intuitive Surgical/直觉外科公司 2019 年股东会议提案
- 55 Electronic Arts/电子艺术 2019 年股东会议提案
- 56 2020 年 AT&T 股东会议改善高层报酬指导原则的提案
- 57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Review

1.1 从挑战 Yahoo 的案例看监督超级大公司的可行性

当我九十年代初期任职于一家日本的中型上市公司时，曾被公司派去股东年会（日语称“总会”）帮忙。公司总务部长特意交代我们这些年青男职员听从他的指挥，万一有股东闹事就由“服务员”变成“警卫队”维持秩序。日本的股东年会是所有公司头头们最难过的关头，为了防范所谓的“总会屋”（即专靠在“总会”期间闹事为职业的股东），所有的日本公司都选在同一天上午召开股东年会，使绝大多数公司得以逃脱无法分身的“总会屋”的攻击。会后，我们可以从报道中得知，有些大公司为了封口，暗地里支付了“总会屋”多少钱。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害怕被描绘为黑社会的“总会屋”呢？因为他们都有什么把柄掌握在“总会屋”手中。按照资本的逻辑，股东就是投票日必须被讨好的选民。

美国的“总会屋”则完全合法，实际上是由职业律师干的。例如，前不久有一个律师代表一个股东以公司的某个行为违反了股东的利益为由控告 citi（花旗）集团的董事会，citi 无法公布相关的会议记录，只好请退休的纽约大法官私下调解，以支付两百万美元律师费了结，这实际上损害了绝大多数股东的利益。

日本的公司股份主要由公司之间相互控股，一般人很少直接购买股票。我在日本学习、工作十年，没有任何股票。日本的上市公司一年才公布一次业绩，公司对于股票市场的变化基本上无动于衷。但在美国，上市公司必须每季度公布一次业绩，实际上把公司的运营置于华尔街股票市场的操纵之下。美国复杂的税务制度又迫使婴儿也开始持有股票。特别是美国人的退休金，几乎都投入股票市场。象我这样的一般人因为持有的份额太小，对于股东大会、年度报告都置之不理，反正没有影响。不过，我因为近年侧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开始阅读自己持有（微不足道）股份的超级大公司的报告。我立即注意到有不少与自己同样的、只有数十百股的“超微小股东”（一般在纽约上市的大公司发行上亿甚至上千亿股）以良知在挑战超级大公司的 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几乎每个公司的股东年会都有人提案限制高级主管的薪水等等。虽然这些提案获通过的机会不大，但从公司董事会的反对声明中，可以感受到股东提案是除了法律之外对公司运营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正如普通市民很难挑战政府但必

须监督政府一样，微不足道的小股东也必须监督大公司的运营。实际上，象股东投票成功地影响过美国公司对南非种族制度制裁一样，细小的涓水也能汇成滔滔洪流。我的目标是改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运营。

我首先去参加 2003 年 Applied Materials 公司年会。此公司的 CEO 说起来还是我的校友（UW-Madison），我也认识不少中国人在此工作。有两个还爬上高级职位。更有趣的是，原美国驻日大使也坐在其董事会的位子里，我过去还想就美日关系向他请教呢！虽然它与别的半导体公司一样越来越多地与中国打交道，但毕竟没有太大的政策性影响，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2004 年，我去参加 eBay 的股东年会。一个黑人妇女代表其工会股东宣读提案，要求减少高层主管的报酬。公司的年青创始人很象一个普通软件工程师，不会应酬；但其 CEO 却是哈佛毕业的气派女性，很会控制会场，指点两个股东提了不痛不痒的问题就宣布散会把股东们打发掉了。eBay 在中国并不成功，与阿里巴巴的官司还没有解决。从政策层面上看，它收购的 Skype 网络电话系统不存储通话记录，还没有造成通讯自由方面的受害案例。2006 年 6 月 4 日，我们在圣荷西公共图书馆举办公开论坛，用 Skype 接通在中国的黄琦、赵昕、马步芳等维权人士，畅通无阻，还得感谢 eBay 呢！³

2006 年我出席 Sun Microsystems 的股东年会。会场气氛紧张，因为其股票下跌太厉害。几个老人在会场上发作，说对 Sun 公司及其热爱和坚信，把大部分退休金投入 Sun 舍不得抛售，现在落得如此下场。我原以为“投资者”都是精打细算的理性动物呢！其实大家都是摆不脱感情控制的人。那次股东年会后，Sun 的创始人也只好下台。这有点像去年美国期中选举后被迫下台的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2005 年我出席 Yahoo 的股东年会，在会上口头发言询问其人权政策。

³ 补注：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研究人员 Nart Villeneuve 于 2008 年 10 月 1 日发表在 Information Warfare Monitor 以及 OpenNet Initiative-Asia 上的报告称，他们掌握的证据显示中国一家 Skype 合资企业一直在监控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文字聊天纪录，并把那些包含了政治敏感内容的讯息储存在可以从公司外部进入的服务器上。这种监控和储存行为导致数百万条纪录被暴露，这些纪录包括 Skype 中国服务用户以及 Skype 语音通讯使用者的个人信息。此消息使人吃惊意外。

Yahoo 的 CEO 有点紧张，不流畅地花了近十分钟为其在中国的运营辩解，大意是必须服从当地法律等等。作为全球点击率第一、带有新闻性质的网站，Yahoo 实际上同时也在制定网络通讯的规则，所以很有必要监督其公司治理。2006 年 4 月 7 日，我与 Ann Lau 女士等伴随从欧洲飞来的“记者无疆界”记者们访问 Yahoo 总部，要求与其公共关系主管面谈其网络自由政策，被其警卫工人阻挡在外。我计划出席同年 5 月召开的股东年会，没想到在年会过后才接到相关的资料，看来 Yahoo 在提防我。这坚定我的决心，挑战 Yahoo 的公司运营。

Ann Lau 女士曾在 Cisco Systems 股东年会上提出人权提案，她介绍有经验的 Carl Olson 先生起草文稿，于 2006 年 12 月 7 日和 10 日向 Yahoo 提交我和 Andrew Zhao 的 Resolution on Freedom of the Internet Worldwide(世界范围内互联网自由提案，附录)。12 月 21 日我们接到 Yahoo 来信，⁴说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U.S. Securities &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 SEC) 第 14a-8 条款，我们提交的 TD Ameritrade 股票公司的复印不合格，要求我们 14 天内提交拥有 Yahoo 股份的新证明。这个要求并非刁难。我立即用电子邮件要求，并很快接到 TD Ameritrade 电子邮件回复，确认我们于 2004 年购买了 Yahoo 股票并保有至今。我同时又从网上打印出我们的账号证明，显示我们持有包括 Yahoo 公司在内的股票，于 12 月 27 日传真给 Yahoo。我打电话给 Yahoo 时，没人接听，就留言。2007 年 1 月 5 日，我接到 Yahoo 的传真确认收到了我的上述传真。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收到厚厚的一叠材料，打开一看，是 Yahoo 于 2 月 7 日写给 SEC 的复印件，原件要求 SEC 就 Yahoo 忽视我们提案的愿望不采取任何行动。我才意识到，Yahoo 在这一个月期间写出这么厚的材料，用 SEC 的条款 14a-8(b)，14a-8(f)，14a-8(i) (7)，14a-8(i) (10)，14a-8(i) (6)，14a-8(i) (11) 和 14a-9，14a-8(i) (3) 分 6 个理由把我们的提案从 2007 年 6 月 12 日将要举行的股东年会上排除。我对于 SEC 条款完全没有知识，只能指望 SEC 能够秉公判断，但经验丰富的 Olson 认为不能干等，必须反驳 Yahoo 的谬论。Yahoo 在 2 月 7 日致 SEC 材料的 6 大理由，实际上有两个要点：(1) 我们的股票证明虽然标明是从 2004 年拥有至今，

⁴ 本文中提及的相关原始文件，都可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网址 <http://cpri.tripod.com/yahoo.html> 上查到。

却没有 SEC 条款 14a-8 (b) 中要求的 continuously (连续) 一词。对此, 我们除了诉诸 SEC 官员的逻辑判断能力(2004 年购买了 Yahoo 股票至今没有卖掉, 不是“连续”拥有吗?), 又要求 TD Ameritrade 专门写一份“连续”拥有的证明; (2) Yahoo 用别的 SEC 条款攻击我们的提案内容不值得反驳, 因为那正是必须在股东大会上由股东投票才能决定的。所以, 在收到“连续”拥有的证明后, 我们又于 2 月 20 日、21 日致函 SEC 并转 Yahoo。

3 月 12 日, Yahoo 又致函 SEC (并转我们), 仍然坚持要排除我们的提案, 但口气变得缓和。从其转印的名单上, 可以知道 Yahoo 在雇用知名的 O' Melveny & Myers LLP 律师事务所 (该事务所有上千名专业律师, 在中国也有分所) 来处理我们的短短一页的卑微提案。另外, 从 Yahoo 在 2 月 7 日致 SEC 的一大叠材料里, 我们知道纽约市政府代表属下的行政、教育、警察、消防等广泛部门的退休基金股东也于 2006 年 12 月 5 日提交了类似的 Internet Censorship (互联网检阅制度) 提案, 而 Yahoo 同样阻挠将此提案提交股东年会。我于 3 月 15 日致函 SEC 并转 Yahoo, 建议 Yahoo、我与 Andrew Zhao 和纽约市政府三者妥协, 提出单一修正提案诉诸股东大会表决。与此同时, 我们都在不安地等待着 SEC 的表态。

3 月 30 日, Yahoo 直接致函我和 Andrew Zhao, 准备了两份类似的董事会反对我们提案的声明, 打算放到股东年会表决书中。我们的努力没有浪费, 起码 Yahoo 董事会在倾听我们的要求了, 在反对声明中也许下新的诺言。Yahoo 董事会的反对立场并不离谱, 我们完全放任所有股东的判断。但 Yahoo 的反对声明中罗列了一大堆公司、大学、非赢利机构, 包括“记者无疆界”的名册作为同盟, 真是又可气又好笑。我们分头联系其中的各机构, 获得“记者无疆界”的回复, 说他们与大赦国际准备联名就 Yahoo 滥用他们的名义阻挠我们的互联网自由提案表示抗议。我于 4 月 4 日再次致函 SEC 和 Yahoo, 要求 Yahoo 取消这一串机构的名称以免误导股东大会。



4月6日，我们接到等待已久的SEC的回复。这份来自 Special Counsel（特别律师）的传真只转印了一个叫 Derek B. Swanson 的律师顾问3月29日写给 SEC 下属的公司财务部总律师的简短意见。这位律师顾问认为 Yahoo 在2月7日的材料表明提案者（我们）似乎没有在14天内提出令人满意的材料证明我们拥有 Yahoo 股票，所以如果 Yahoo 忽视我们的提案，他们（公司财务部）将不向 SEC 推荐强制要求 Yahoo 加入我们的提案。至此，老练的 Olsen 结论到：让我们明年再挑战吧（插图为笔者与友人在2007年雅虎股东大会上）。

当然，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有足够强大的资源，可以直接游说 SEC 的主席（从加州选出的国会议员 Cox）。不过，我们的原则要求我们尽可能回避政治家，而这一次并没有同时也挑战 SEC 的准备。这次了解了整个过程，可以说达到了主要目的，没有必要与 SEC 计较。实际上，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么多大公司的股东年会表决中，除了一两项公司董事会提案（主要表决新的董事、决定会计公司），大多数的良知提案都来自像我这样的“微小股东”，美国的企业界和其代理利益团体正在设法改变 SEC 的较民主的条款，提高提案所需的股份额（目前只是两千美元），以消除这次 Yahoo 为排除我的提案所付的“麻烦”。对我们而言，趁 SEC 还没有完全被大企业集团控制之前，除了联系更多的“经济公民”（股东）继续挑战 Yahoo 外，还准备对跑到美国股市来上市的中国大公司（如百度等）教育一番。没有制约的超级大公司，与没有制约的政府一样，都会堕落成腐败的权力，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的途径监督、制约、改进他们。

[2007年4月17日]

[附录]2007年股东大会提案

RESOLUTION ON FREEDOM OF THE INTERNET WORLDWIDE

Supporting Statement:

Yahoo!'s good name depends on the trust it inspires in Internet users. Users desire to have unimpeded and unmonitored search engine results and e-mail service.

We applaud Yahoo!'s news release of February 2006 titled "Yahoo! Our Beliefs as a Global Internet Company." It stated in the "Our Commitment" section:

- Collective Action: We will work with industry,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NGO's to explore policies to guide industry practices in countries where content is treated more restrictively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promote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 Compliance Practices: We will continue to employ rigorous procedural protections under applicable laws in response to government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maintaining our commitment to user privacy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 Information Restrictions: Where a government requests we restrict search results, we will do so if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and only in a way that impacts the results as narrowly as possible. If we are required to restrict search results, we will strive to achieve maximum transparency to the user.
- Government Engagement: We will actively engage in ongoing policy dialogue with govern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nature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We stockholders believe that our company should provide the best products possible, including the widest search engine scope of websites and the least surveillance of user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hich ha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part of its mandate, has recommended U. S. companies be prohibited from disclosing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users or authors of online content. (www.uscc.gov)

Resolution:

Be it resolved by the stockholders to reques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implement the above “Global Internet” policy as follows:

For Collective Action, Yahoo! management shall produce reports to the stockholders in June and December of each year as to what Collective Action has been taken, on a country by country basis, to promote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of speech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all other countries in which Yahoo! operates, especially those in which content is treated more restrictively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China.

For Compliance Practices Yahoo! management shall notify each Yahoo! e-mail user as to what individual data about the user is available to any government agency and how Yahoo! provides such individual data; with such notice to appear on the user’s Yahoo! e-mail webpage.

For Information Restrictions, Yahoo! management, in countries which restrict search results, shall notify each user of the search engine of all such imposed restrictions, with such notice to appear at the top of all search results pages.

For Government Engagement, Yahoo! management shall produce reports to the stockholders in June and December to describe any changes, country by country, which have been made in Yahoo! internet services regarding search content restrictions and surveillance of user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including any specific procedural protections adopted.

1.2 出席 Yahoo 雅虎 2008 年股东大会

我去年 12 月向 Yahoo 公司提交了一份要求公司制订中国政策的提案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表决。⁵与去年的股东大会提案一样，Yahoo 又雇用知名的 O' Melveny & Myers LLP 律师公司拒绝我的短短一页的提案。其主要理由是我的提案“模糊”，公司无法具体执行。还是与去年一样，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SEC 对于 Yahoo 的拒绝不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默许了 Yahoo 的行为。正如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政策取向〉一文中也观察到的，SEC 已经放弃了“保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小股东”的主要职责，对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

纽约市政府代表属下的行政、教育、警察、消防等广泛部门的退休基金股东去年提交了类似的 Internet Censorship（互联网检阅制度）提案，加州 Harrington 投资管理公司去年提交了类似的人权委员会提案，在股东年会上付诸表决，未被通过。今年这两个提案又被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我和封从德、小高、张前进一家、伏虎于 8 月 1 日上午赶到圣何西的 Fairmont 旅馆，支持这两个提案。

Yahoo 过去的股东大会都在公司总部附近的 Santa Clara 会议中心举行，那里允许公众自由进出。这一次，Yahoo 为了躲避我们的抗议，改在离公司很远的旅馆，把没有股票的抗议人士阻挡在外。幸好旅馆正门对面是圣何西的中心公园，我们在旅馆对面拉出支持人权提案、释放政治犯的图片，接受媒体采访。⁶



我十点钟进入会场，看到大会厅只有一百人左右，非常安静，与这几个月来围绕是否同意被微软收买吵得扬

⁵ 本文中提及的相关原始文件，都可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网址 <http://cpri.tripod.com/cpr12.html> 上查到。

⁶ <http://cntv.us/zh/view/9510> 灣區華人支持雅虎股東互聯網審查和人權的提案，
http://www.worldjournal.com/wj-sf-news.php?nt_seq_id=1753778，
http://www.worldjournal.com/wj-sf-news.php?nt_seq_id=1753779。

扬拂拂的争闹完全相反（我连续接到过 5 份投票表和几封来信，要我投他们的票，但都反对人权提案）。原来，扬言要把所有现任董事选掉的亿万富翁 Carl Icahn 已经在幕后与现任董事会达成交易，今天不来挑战，两星期后将（以 5% 的股份）接受 3 个董事（占 27%）的席位（我第二天 8 月 2 日才收到公司 7 月 28 日署名的补充投票说明，知道交易内情）。这真是一个“金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每当面对那些“当今万户侯”时，我都想到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几十年前买一支旧枪去教育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代理。现在，我以自己的微小退休基金作为“股东大会”的入门票来教育当今的权贵们。

我很快把“会议规则”读完，知道一人只有一次两分钟的发言时间。我注意到除了认识的 Doherty（代表纽约市政府退休基金）、Harrington 和 Cruz（代表大赦国际）外，那个总是为公司辩护的白人也来了。在提案后的讨论时间里，那个白人急忙发言反对人权提案。但他的理由不在提案本身是否对错，而是因为提案人是“政客”。真感谢美国还有这样的“政客”关心中国的人权。我发言支持这两个提案，以自己出生于北京却十多年不能进入中国的亲身经历，说明 Yahoo 应该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时的政治社会责任。而且，在今天的世界上，忽视人权对公司盈利也是危险的。

我稍微留心观察了 Yahoo 的创始人兼执行长杨致远，感到他是一个不错的技术人才，但并不胜任领导世界上点击率第一的网站。例如，Yahoo 现在同时也兼具媒体的功能，但他对新闻自由并不理解多少。他后来在回答提问时重复过去的老调，说 Yahoo 等公司无法解决人权问题，要由美国政府出面等等。我本来可以再用自己在美国的经历说明美国政府也不可信，但由于只能发言一次，就退场了。当然，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商业头目们的通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让许多跨国公司的影响超越许多国家权力，而这些公司的头目或经理们却没有受过基本的民主选举等训练，“一股一票”的股份制度更容易把金钱与专制权力结合起来，出卖了世界民主化的理想。所以，我们更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为那些没有政治经济权利的人们斗争。

[2008 年 8 月 2 日]

[附录]2008 年股东大会提案

RESOLUTION ON ESTABLISHING A NEW POLICY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Resolution:

Be it resolved by the stockholders to reques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establish a new policy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with the help from China's democratic activists and human/civil rights movement.

Supporting Statement:

On November 7, 2007, many media (such 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t their front pages reported Yahoo's top executives offering apologies to American lawmakers and Chinese political victim families. Even the direct penalties for Yahoo to cooperat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oppress Internet freedom is not so significant, the international damage to Yahoo's reputation is tremendous. This should not happen, and this could be prevented, if Yahoo's board of directors had a different policy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As a Yahoo shareholder as well as a political refugee with high-tech background from China and Japan, I raised this vital issue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at Yahoo's 2005 annu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The CEO, Mr. Semel, spent quite long minutes to answer my question, but his excuses showed that he did not understand this issue. Unfortunately, the whole board of directors did not either. Thus in 2006, trying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Yahoo management, I accompanied friends of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from Europe to visit Yahoo's Headquarters. However, we were expelled by Yahoo's security guards. I then submitted a proposal to 2007 annu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to address this issue, but it was rejected with many irrelevant organization names.

Why Yahoo' s board of directors is so afraid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regarding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Why Yahoo' s board of directors cannot establish a sound policy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We all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talented Yahoo employees, including Yahoo' s co-founder and current CEO Mr. Yang, have deep and wide China background. Once and only whe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stablishes a new policy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Yahoo will expand tremendous business in China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under a free, open, and more democratic system. As President of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Secretary of Humanitarian China graduated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I know from my decades-long experience that with the help from our Chinese democratic activists and human/civil rights movement, Yahoo can become a business leader proudly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too.

1.3 从 2009 年股东大会看 Yahoo 雅虎的兴衰

我 2005 年第一次出席 Yahoo 股东大会时,以互联网为引擎的美国“新经济”高潮已过,但依然可感到 Yahoo “雄风犹在”。正如大会的主题所示, Yahoo 才刚满十岁呢!在随后的三次股东大会上,人权和被微软收购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今年 6 月 25 日的股东大会在生意和政治上都今非昔比,切实感受到硅谷和 Yahoo 的兴衰。

我过去与法国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大赦国际、纽约市政府属下的退休基金股东、加州 Harrington 投资管理公司等会在股东会上、会下就人权问题与 Yahoo 管理层几经交涉,最终导致 Yahoo 向劳改基金会等赔偿 3 千万美元。今年,除了一个要求限制高层薪水的提案外,没有别的来自独立股东的提案。不知道战斗性很强的纽约市退休基金为何没有提案,我和 Harrington 是因为所持股份太少, Yahoo 股价跌得过多,所持的股值曾经低于两千美元,失去提案资格。我甚至犹豫是否参加今年的股东大会,但大赦国际的 Tony Cruz 一定要我与他同时参加,我就带上刚到美国的方政也同往出席。

Yahoo 过去的股东大会都在公司总部附近的 Santa Clara 会议中心举行,那里允许公众自由进出。Yahoo 为了躲避我们的抗议,去年改在离公司很远的圣何西的旅馆,把没有股票的抗议人士阻挡在外。不过,圣何西的旅馆正门对面是中心公园,我们得以在旅馆对面拉出支持人权提案、释放政治犯的图片,接受媒体采访。今年的大会在 Santa Clara 的旅馆,会场前是旅馆的宽阔的停车场,阻碍了可能的抗议行为。

我们提前到达会场,会厅比过去小不少,只能容一百人左右,非常安静。我扫了一眼“会议规则”,知道每个股东可以在 5 个提案宣读后计票

时有一次两分钟的发言时间。这至少比霸道的谷歌股东大会（只能在记录结束后提问）好一些。这也是新的 CEO Bartz 女士、CFO 主持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她完全没有用屏幕，作出随意交谈的姿态。我不想让她为前两任管理层负责，就发言以自己出生于北京却十多年不能进入中国的背景，以及这几年 Yahoo 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失败（包括雅虎人道基金被一个人控制下的滥用），建议 Yahoo 开放与股东和公共社会的对话渠道。Bartz 回复还算客气，但没有实质内容。Cruz 则相当尖锐，针对中国政府要求所有 7 月 1 日以后在中国出售的电脑必须安装过滤软件，询问 Yahoo 采取什么有效措施？Bartz 很生硬地回答：“Yahoo 不是为了改正中国而成立的”（Yahoo was not incorporated to fix China）。Cruz 非常气恼，会后还要找记者批驳 Bartz。我表示愿意同大赦国际合作，明年再挑战。

我会后从网上查询，几乎所有的英文媒体（包括电视节目）在报道 Yahoo 股东大会时都提到我和 Cruz 的中国人权提问，有个报道称之为“不可回避的中国问题”（the inevitable China question）。可笑的是，新浪等中文媒体在报道详细的股东会议纪录翻译时，却单单漏掉了关于中国的提问！这正是我们在股东大会上强调的“互联网审阅制度”的危害性。不过，Yahoo 的影响和地位今非昔比，在其 2008 年度报告中，也提及美国和外国政府关于互联网、移动和 VOIP 的产品和服务的法规的制约。阵容强大的纽约市退休基金今年没有来挑战 Yahoo，可能也有这种考虑。我们有限的资源恐怕还得集中到思科、谷歌（软件）和英特尔、H-P（硬体）等更具全球性战略价值的跨国公司上。

[2009 年 6 月 28 日]

1.4 2011 年 Yahoo 雅虎股东大会第 5 号人权提案

自从我 2005 年我出席雅虎的股东年会发言关注其人权政策以来，我几乎每年都出席雅虎股东大会⁷。2006 年 4 月 7 日，我伴随从欧洲飞来的“记者无疆界”等访问雅虎总部，要求对话，被其警卫阻挡在外，迫使我另辟途径。2006 年 12 月我提交互联网自由提案要求到 2007 年股东大会表决，以后我几乎每年都提交人权提案。雅虎总是雇用 O’ Melveny & Myers LLP 大型律师行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排除我的提案的各种理由，要求 SEC 不要对雅虎排除我的提案采取行动，几乎总是得逞。

几年下来，我得到不少教训。“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有足够强大的资源，可以直接游说 SEC 的主席。... 不过，我们的原则要求我们尽可能回避政治家，而这一次并没有同时也挑战 SEC 的准备。这次了解了整个过程，可以说达到了主要目的，没有必要与 SEC 计较。”⁸ “与去年一样，SEC 对于雅虎的拒绝不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默许了雅虎的行为。正如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政策取向’一文中也观察到的，SEC 已经放弃了保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小股东的主要职责，对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 “我本来可以再用自己在美国的经历说明美国政府也不可信，但由于只能发言一次，就退场了。当然，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商业头目们的通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让许多跨国公司的影响超越许多国家权力，而这些公司的头目或经理们却没有受过基本的民主选举等训练，一股一票的股份制度更容易把金钱与专制权力结合起来，出卖了世界民主化的理想。所以，我们更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为那些没有政治经济权利的人们斗争”⁹。 “2010 年 4 月 2 日，我不得不向 SEC 报告，特别指出雅虎用来敷衍股东的雅虎人道基金早已被误用、滥用成某一个人的私人政治黑箱。” “虽然，SEC 同时说只有法庭的判决才有正式效力，但我这样的微小股东怎么可能为此提案与雅虎和其雇用的律师行到法庭上打官司？SEC 这样的

7 赵京：“从 2009 年股东大会看雅虎的兴衰”，2009 年 6 月 28 日。本文所引赵京文章，皆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址 <http://cpri.tripod.com> 为准。

8 赵京：“从挑战雅虎的案例看监督超级大公司的可行性”，2007 年 4 月 17 日。

9 赵京：“出席雅虎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2008 年 8 月 2 日。

偏袒大公司的行为正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往往读到：某某公司出事后才发现早有人向 SEC 报告过问题了，但 SEC 不作为。但我不可能同时在此追究 SEC。当然，SEC 把这样的决定放到网上，也算是一种补偿，让相关的人知道雅虎等公司用什么原因拒绝了多少提案。我查过一次，注意到各大公司每年都要拒绝几个股东提案。”“中国民主、人权、民权、人道事业几乎都因为资金短缺无法进展。唯一有充足资金的是前面指出的雅虎人道基金，却被误用、滥用”¹⁰。

2010 年 12 月 31 日，我再次向雅虎提交 2011 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 11。2011 年 2 月 10 日，雅虎再次雇用 O’ Melveny & Myers LLP 律师行向 SEC 提交排除我的提案的各种理由¹²。2 月 22 日，我致函 SEC，指出我的提案与去年相同，去年在雅虎罗列了几种排除我的提案的理由，SEC 在 2010 年 4 月 2 日的回复中，只就其中我的股份证明是否充分这一项表示雅虎“似乎有道理”，但这一次，雅虎没有就我的股份证明是否充分提出任何异议。我在信中结论道：“This is a challenge to the SEC. This abuse of SEC rules should not be allowed.（这是对 SEC 的挑战。这样滥用 SEC 法规决不能被容许）”¹³。几年来与 SEC 交涉的经验，使我对 SEC 能否秉公对待一个极小股东和极大公司的“官司”不抱太大期待；相反，SEC 几乎总是站在大公司一边。但 SEC 做得很“专业”，往往在“判决”中不与公司罗列的各种无理取闹的排除理由同调，只会举出一点“似乎有理”的理由，就对公司的排除行为 no-action “不作为”了。我无奈之下，只好想出这一次的“苦肉计”：在 2010 年的提案中，有意暴露易于改变的“股份证明是否充分”的“缺欠”（其实完全没有缺欠，但我没有财力让法庭来判决），使 SEC 在用这一个“缺欠”不作为的同时，间接否认了雅虎编造的“提案模糊”、“股东大会通过后，董事会无法实施提案”、“相当于两个提案”等对我的提案内容的攻击理由。在 2011 年提交相同的提

10 赵京：“中国民权运动的新战略尝试”，2010 年 7 月 26 日。

11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yahoo_resolution_2011.pdf.

1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yahoo_sec.pdf.

13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Zhao_SEC_Yahoo.pdf.

案时，经过与证券公司的强力交涉¹⁴，我提交了雅虎再也无法刁难的股份证明，这样，就把 SEC 推到一个明显的逻辑选择上：O’ Melveny & Myers LLP 律师行今年提交的排除我的提案的理由，都是去年被你们否定的，难道你们今年会反对自己去年的“判决”？不过，我毕竟担心 SEC 的律师是否会按逻辑行事。

4月初，我意外接到在2010年新闻集团股东大会上帮助宣读我的人权提案的 John Chevedden 的祝贺电邮，感到莫名其妙。他让我看网上4月5日 SEC 律师-顾问 Matt S. McNair 就我的雅虎股东提案的“判决”，逐条批驳了 O’ Melveny & Myers LLP 律师行罗列的排除我的提案的理由¹⁵。这是一个体现美国民主规范的案例，将得到我的老朋友 Chevedden 兄弟这样的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人士的引用，也多少打消了我对 SEC 的担心。如果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SEC 还不履行职责，我们还要它干什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些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股东的不断推动下，SEC 今年终于采取行动，要求所有股东大会都必须就公司高层报酬进行非强制的投票，遏制不断升高的公司高层报酬。自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经济还远远没有复苏（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复苏”），特别是失业率高居不下¹⁶，但公司高层的报酬已经超过2008年了。SEC 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体现美国的基本经济民主。例如，John Chevedden 今年在波音等几个大公司开始推动新的 Action by Written Consent 民主提案，提升股东的权利、限制董事会的权力。我希望中国的维权民众能够由此得到启发，推动证监会等机构的民主化改革，监督企业

14 那位 TD Ameritrade 的热心雇员后来告诉我：他的上司禁止他以后再为我开股份证明了。我后来只好直接与 TD Ameritrade 总部交涉，以要控告到 SEC 为威胁，才得到当天的股份证明，才能同一天发出提案而避免股份证明的“缺欠”刁难。

15 <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cf-noaction/14a-8/2011/jingzhao040511-14a8.pdf>。

16 美国政府统计为 10%，但连华尔街日报都不用美国劳工部的反科学统计手段，承认“无工作比率”为 17%、就业率是 58%（2009 年）。我的研究“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 January 12, 2010”表明，美国实际失业率在 30%左右（加减 12%）。

的社会责任。¹⁷

我4月6日立即收到雅虎 Director, Business & Human Rights Program “生意和人权项目”主管 Ebele Okobi-Harris 女士的电话, 她感谢我几年来坚持不懈地帮助改善雅虎在人权方面错误的努力, 承认雅虎被国会议员 dictate 命令必须把人权基金交给一个骗子去操作。我这么多年来挑战雅虎, 第一次得到雅虎官员的诚实对话, 本来想发泄对雅虎的愤怒, 但却一下子变得心软起来, 自己毕竟是一个诊断社会病理的社会学 Dr., 面对这样可怜的企业病人, 慈悲为怀。我答应正如帮助 Chevron 雪佛龙、Google 谷歌、Intel 英特尔、Cisco 思科那样, 要义务医治雅虎的问题。

SEC 的这次历史性“判决”也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 4月25日, CNN 以此为素材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司不想让你看到的股东提案”的报道¹⁸。说起来, 这是除了中文外, 主流媒体第一次对我的工作的直接正面报道(过去只是在报道股东大会是顺便提及), 达到了比我付出的成本更大的宣传效果(我2004年购入的雅虎股票是每股30多美元, 现在不到15美元)。

遗憾的是, Okobi-Harris 女士4月14日以后再也不敢与我联系。在股东大会的前两天, 我接到几年来与我书面联系的副总律师 Christina Lai 的电话, 但她只被授权联系我出席会议发表提案的程序安排, 不敢谈实质的人权政策。6月23日, 我提前赶到股东大会会场, 在走廊上端着饮料杯子, 若无其事地等待问候。仍然在当董事的创始人杨致远晃到我的面前, 但不主动问候我。我在2008年的思科股东大会(他也是思科的董事之一)、2009年的雅虎股东大会(那时他是CEO)上批判过他, 更瞧不起他在上海的财富论坛上巴结江泽民, 所以不会主动招呼他。他痒痒离去。

雅虎为了阻止抗议, 两年前开始把股东大会放在公众不便进入的高级旅馆, 这一次更提前在早上8点开会, 使一些股东也不便参加。我数了一

¹⁷ 2008-09 年间, 我委托广州的唐荆陵代表我出席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股东大会, 被禁止发言, 我被告知要有 3% 以上的股份才有权提案。赵京: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走向国际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2009 年 3 月 24 日。

¹⁸http://money.cnn.com/2011/04/25/technology/shareholder_proposals_you_dont_see/index.htm。

下，整个会场只有五、六十人，基本上是雅虎的官员和员工，比过去少了一半左右。会议由董事会主席 Bostock 主持，他强调董事会对 Bartz 继续担任 CEO 的支持，因为有传闻要替换她。除了公司必须提交的第 1 号董事选举、第 2、3 号关于高层报酬、第 4 号会计行选择提案外，我的第 5 号人权提案是唯一的股东提案。我基本上宣读了准备好的声明，大致内容如下：

“因为只有 3 分钟的发言限制，我就不读提案本身了。我只想指出：董事会对我的提案的反对声明违背事实、误导股东。董事会浪费资源收买与公司无关的学术界、人权团体、斯坦福大学等，但却拒绝与直接和公司业务相关的我这样的学者、股东、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人道中国、大赦国际等人权、人道机构对话，搞得我们这个伟大的公司只好接受外面政客的命令，听任救助中国互联网受害者的人道基金被滥用，直到被受害者告到法庭。为什么公司不调查一下这些指控？为什么瞒着我们股东？如果公司从 2005 年来肯听从我的建议，可以避免许多失败和损失。我呼吁大家采纳我的提案。”

我讲演完后，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一个人面对权贵群体的场合，总是回忆起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安那祺主义先驱战士伯克曼孤胆以身试法用一把破枪教训富豪卡内基代理的榜样（被判刑 22 年）。卡内基、洛克菲勒，以及今天的盖茨、巴菲特等富豪罪犯（当然，今天的法律无法制裁他们）等不得不还出一部分财富给社会，但我们从来没有指望他们的施舍，因为他们的“慈善”绝不会改变让他们一小撮人暴发的罪恶制度本身。正如我的马克思主义同志长毛用生命把社会主义的提案打入香港立法会一样，总有一天，我们也要把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提案提交到被国家资本主义控制的中国的立法机构！不一会儿，公司秘书长机械地宣布我的提案符合程序，开始投票。其实绝大多数投票都早已由电子投票完成，初步结果马上公布。头 4 号提案通过（Bartz 和 Bostock 只得到 80% 的赞成票），第 5 号提案没有通过。今天从网上得知：有 24,801,573 股份赞成，是我的股份的近百万倍，占投票总数的 2.65%；有 779,240,401 股份反对、133,039,421 股份弃权、158,967,884 代理股份不

能投票¹⁹。虽然我的经济“投资”损失大半，但我的政治事业投资（包括阅读了我的提案后投票反对的股东）却是百万倍的回报，远远高于几倍、几十倍回报的巴菲特神话。

Bartz 接下来开始讲演雅虎的业务。她特别强调把雅虎定义为 the premier digital media company(首要的数字媒体公司)²⁰，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实，我在 2007 年的股东大会上就对媒体指出：雅虎也是一个媒体公司，要遵守新闻自由的规范。现在 Bartz 这样讲，当然是由于雅虎在搜索技术上被谷歌击败、在 display 显示市场上也被 Facebook 夺走份额的原因，但在全球媒体由纸面向数字转化的时代，雅虎被 Bartz 导向媒体业务，虽然不一定成为 the（英文里意味着唯一、最）首要数字媒体公司，却会在媒体行业占重要的地位（例如在财经资讯方面的读者已经超过华尔街日报等正统商务媒体，还传闻要收购 Hulu 等），看来我不得不继续关注它的国际政治角色，帮助它履行社会责任。

然后，有三个股东提问，最后的问题是媒体引用最多的，即关于 Bartz 是否应该提前离开。提问的基金经理股东显然忍耐不住对雅虎股票的失望，甚至提出让中国阿里巴巴的老板 Jack Ma 来接管雅虎。我差点笑出声来：干脆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搬到美国来好了，那样，我连股东会也进不来了，中国永远是 Jack Ma 这样的专制资本积累的暴发户的天堂吗？（在阿里巴巴发迹的 1996 到 2009 年期间，我一直是无国籍难民）。从 2005 年以来，我已经与 4 个雅虎的 CEO 在股东大会上打过交道，早就指出他们都不合适领导具有媒体等多功能的雅虎公司。实际上，我曾经向董事会毛遂自荐为公司分忧，我表示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我会按照巴黎公社的精神，拒绝高于普通员工成百上千倍的报酬，只拿普通员工一、两倍的报酬，同时要无视华尔街、推行终生雇佣、鼓励员工成立工会组织维护自身的权益等²¹，激励起员工的士气，夺回公司十年前的 premier 地

¹⁹<http://seekingalpha.com/news-article/1329435-yahoo-inc-files-8-k-disclosing-submission-of-matters-to-a-vote-of-security-holders>。

²⁰ 这在公司的网站上也可见到：<http://investor.yahoo.net/>。

²¹ 我过去在 Adobe Systems 当员工时，试图组织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工会，被公司

位。当然，雅虎董事会里以及整个资本阶层没有一个伯乐，我也不会堕落成上述“校友”那样的权贵罪犯（当然，由他们制造的法律不会制裁他们自己）。

大会结束后，我在走廊上再次端着饮料，等待可能的采访，但没有人来问候（过去我都接受过媒体现场采访），我后来才知道雅虎这次不容许记者进入会场。我确实注意到有不少媒体的车辆设备在停车场上，但我知道媒体的性质，就没有主动去分发我的声明（前年股东大会上，大赦国际的 Tony Cruz 与 Bartz 赌气后要举行媒体会见，没有记者反应。这次连我邀请他出席，也不来了）。后来我发现华尔街日报等几乎所有报道雅虎股东大会的媒体都没有提及人权提案，大概它们觉得雅虎股东大会上的人权问题是正常现象，没有人权问题才是新闻。前述 CNN 的记者第二天采访过我，我还没有读到她的报道。只有一、两个网上的英文报道提到人权提案被否决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几乎千篇一律的中文报道里，我只读到有一处提及有一个股东要求雅虎不与中国等“非民主国家做生意”，虽然不准确也无法计较了。要改变媒体（包括雅虎这个“首要数字媒体公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雅虎股东大会结束的同一天，我收到 H-P 惠普公司副总裁兼副总律师 David Ritenour 的电邮，要求与我通话。去年，我第一次向惠普股东大会提交人权提案，他用小伎俩逃避我的几次联系，同时惠普雇用一家律师行向 SEC 要求对公司排除我的提案的行动“不作为”，得逞²²。现在，他看到我的提案在雅虎的股东大会上表决，又主动表示要对话。我回答说，会不计前嫌，除了还没有完结的雅虎、思科和英特尔外，又得开始医治惠普的企业治理问题了。

[2011年6月25日]

经理报复，第一轮裁员就裁掉。

22 赵京：“惠普 H-P 公司面对人权提案的黔驴之计”，2010年9月23日。

1.5 问责雅虎人权基金滥用的最后提案

今年1月15日，我向Yahoo雅虎提交要求公开所谓的“雅虎人权基金”运营的股东提案²³：1. 什么是雅虎人权基金对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股东和公众声称的目的？ 2. 为什么雅虎人权基金被交给Harry Wu一个人而没有任何问责？3. 雅虎人权基金有多少被用于声称的目的？有多少被滥用加害中国人权群体？4. 有多少针对雅虎人权基金和Harry Wu的申诉（包括法律诉讼）？ 5. 建议董事会采取必要的行动补偿公司和雅虎人权基金的受害者们以改善公司的人权政策和实践。

与此同时，2017年5月4日，我在收购雅虎的Verizon公司的股东大会的第6号“人权委员会”提案，第一次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揭露了雅虎十几年来打着人权旗号侵害人权的令人发指的恶行的冰山一角，得到6.05%的股份投票赞同²⁴。

7月28日，由雅虎改名为Altaba的董事会主席Brandt致函给我，宣称Altaba没有关于雅虎人权基金的资料，请我取消提案，去找Verizon交涉。我8月1日回复他，指出Verizon董事会已经在股东大会上声明了类似的没有雅虎人权基金资料的理由，拒绝了我的类似提案要求；我也表示可以提供我十几年来积累的相关资料²⁵帮助公司调查真相²⁶。8月11日，公司的（法规）遵守主管回复我，说公司将把我的提案提交股东年会表决²⁷，至少比雅虎多次蒙骗SEC和股东、排除我的提案的做法文明一些。

²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proposal_yahoo_2017.pdf

²⁴ 赵京，“Verizon 股东提案揭露了雅虎的恶行”，2017年5月6日。

²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csrgar6.pd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Review by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 Yahoo”列有2007年以来收入的几十份文件。

²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altaba.pdf>

²⁷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altaba-statement.pdf>

今天，我的老朋友 Chevedden 的朋友 Petsilas 或 Beatty 在 Altaba 的股东年会上宣读了 Chevedden 和我的提案²⁸，完成了在股东会议战线对雅虎人权基金问责的最后一战。正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2016 年 8 月报告对我的雅虎提案引用一样，雅虎人权基金的滥用将成为一项企业治理的“经典”恶行案例，列入 SEC、法庭、商学院、法学院、人权组织等的文献中。

[2017 年 10 月 24 日]

²⁸ 初步结果显示我们的提案没有通过：

http://files.shareholder.com/downloads/YHOO/5450122065x0x960830/A04126E6-E968-4092-A8C5-7A87FFCD0644/Announcement_re_Shareholder_Meeting_Results.pdf

2.1 令人意外的 Google 谷歌公司股东年会

自从我去年出席 Yahoo（雅虎）的股东年会以来，就陆续购入了一些超级跨国公司的股票，利用股东年会对这些影响全球民众生活的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直接进行公共教育。今天，Google 股东年会上有关于“互联网检阅制度”和“设立人权委员会”的股东提案，提案者是去年在 Yahoo 股东年会上提出相同提案的纽约市政府 Comptroller（财务控制）办公室（管理属下的雇员退休基金）与圣 Scholastica 修道院（提案 4）和 Harrington（哈灵顿）投资公司的主人哈灵顿（提案 5）。他们去年在 Google 和 Microsoft（微软）股东年会上也提出相同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今年继续挑战，可见其信念坚定、可贵。

会议两点刚过就开始，主持人很快通过前三个公司的提案，然后很客气地介绍纽约市和哈灵顿的提案。令我感到意外是主持人有些不自然地解释说：Google 创始人之一 Sergey Brin 对此两提案“弃权”，所以公司理事会虽然反对它们，却不是“一致”反对。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在股东年会的材料上没有象别的公司那样罗列出一大堆反对的理由，而只有简单的“公司理事会建议否决此提案”一行文字。一个年轻人 Tony Cruz 代表纽约市和大赦国际宣读关于“互联网审阅制度”的提案，其内容主要针对中国的审阅状况，要求公司保护网上自由。我随后发言，说明我虽然是微小的股东，但代表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国度（中国）中没有网上自由的普通民众，希望股东投票支持这个提案。会后我与 Cruz 交谈，才知道他与于 1995-1997 年同时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学习过！我那时是研究员，他是本科学生，没有交往。他说两年前来宣读同样的提案时，看到不少中国人面孔，却没有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感兴趣，这次看到

我站起来，很怕我会为中国政府辩护。

哈灵顿宣读完“设立人权委员会”提案后，我又一次发言，支持这个提案（会议指南中要求每人发言不得超过两次，每次发言不得超过两分钟），以自己出生于北京却十多年不能进入中国、同时又被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迫害的亲身经历，说明 Google 不能向 Yahoo 那样的恶劣样板学习，把责任推给不可能负责的任何政府，而应该自觉意识到和承担起全球性政治社会责任。在我的两次发言之后，有一个白人也两次发言，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也要与中国做生意，反对这两个提案。第一次他声称对纽约市政府财务控制办公室进行过调查，发现它是个政客机构，第二次他又声称发现哈灵顿也是个政客，引起会场一阵哄笑。

在随后的问答事项中，一个白人股东请 Brin 解释他为什么对此两提案弃权。年轻的 Brin 用了五、六分钟解释这个困难的问题，说他同意此两提案的精神但难以实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他意识到 Google 的影响，如对手百度就在社会责任方面也部分模仿 Google，以期达到真正的国际一流水平，所以他还是想坚持创立 Google 时“不作恶”的理念。有一个中国人模样的妇女和大赦国际的 Robert Roseff 律师再次提出互联网自由和中国的人权状况，另一个白人提出环境问题，Brin 都相对认真、诚实地作了回复。会议在 3 点 19 分结束，在 70 分钟的议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讨论中国与人权问题，对 Google 的股东和管理层是很难得的教育机会。²⁹会后有个白人妇女股东来向我问候。

²⁹ 今天股东大会的所有资料以及录音，可在 <http://investor.google.com/>和 <http://google.client.shareholder.com/Visitors/event/build2/MediaPresentation.cfm?MediaID=30103&Player=2> 下载收看。

我在会议前给媒体的朋友发出通知，会后与 Cruz, Robert 接受新唐人电视台两位记者的采访。这是一次成功的、特殊的公共教育活动，说明在美国最大型的尖端高科技公司最高层还有 Brin 这样的、不会因为贪婪而无视、害怕人权观念的有识之士（我本来还期待 Google 的高级顾问戈尔前副总统也会来开会的）。正因为有这样的高层公司人士的存在，使得几乎没有思维良知的超级跨国公司对人权等普世价值有一定的容忍和理解。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教育全世界的公司上层，让他们认识到，正如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一样，只有在一个新闻自由、多党竞争、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下，经济商业才能正常发展。这一点，对于新兴的中国资本集团，更为重要。实际上，我也购买了到纽约来上市的中国公司如百度、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票。目前，因为没有护照无法进入中国，我正在寻找北京的朋友代替我出席 5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东大会。

[2008 年 5 月 8 日]

2.2 专横卑鄙的 Google 谷歌 2009 年股东大会

我 5 月 7 日下午两点以前赶到 Google 总部，出席 2009 年股东大会。与去年一样，会议还是由公司“高级副总裁兼法务总管”Drummond 主持。去年会议时，我刚开始还以为他是公司专门雇用来应付股东会议的警卫呢！

我快速浏览 instructions on rule of conduct and procedure（规矩和程序），马上意识到：与去年的相对“民主的”（如果在股东大会上还讲“民主”的话）程序不同（见笔者“出席 Google（谷歌）2008 年股东大会”<http://cpri.tripod.com/cpr2008/google.html>），今年的程序排除了股东在投票表决前发言的可能。大会的核心是包括董事会选举在内的 6 个议程，却只被安排了 2:05-2:15 之间的 10 分钟！并非夸张地讲，Google 这样的公司决策对全球民众生活的影响，比许多大国政府还广泛深远，怎么能这样敷衍了事、独断专横？当 Drummond 念完会议规矩和程序时，我举手并走到麦克风前要求提问。Drummond 假装没看见我，宣布进入议程。我安静地回到座位上。

我在大赦国际的 Tony Cruz 宣读第 5 号 Internet Censorship（互联网审阅政策）提案时再次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等待，在宣读后举手要求发言。Drummond 继续装瞎。我干咳了一声，他终于按耐不住，指责我干扰会议。我回复到：“我要问一个关于程序的问题。”他答复道：“你可以在投票后再问。”我正要解释，股东席位上有人向我叫喊：“Sit Down（坐下）！”“Second（附议）！”更有人开始“表决”！我哭笑不得：关于我作为一个股东是否有权就程序提问，既不在大会议程之内，也不能靠在场的股东决定（绝大多数股东都没有出席会议）。面对这一突发场面，我不愿这一次

就把会议流产，来日方长，也相信 Google 还有原副总统戈尔这样的“高级顾问”和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样的董事就会会议规则作出常识性判断。我退回座位，从容地收拾材料，慢悠悠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步出会场。余目之下，我看到有人向我伸出大拇指。这是 Google 最黑暗、愚昧的一天。

第二天，Cruz 告诉我，投票表决公布后，Drummond 才容许股东发言，有一个股东为“那位退场的中国绅士”仗义执言，这可从 <http://investor.google.com/webcast.html> 听到。毕竟，还有人没有忘记基本的会议规则，Google 的股票不可能收买所有人的良知。我又发现还有一个出席会议的股东在网上

<http://seekingalpha.com/article/136461-google-s-annual-shareholder-meeting-where-were-sergey-and-larry> 评论到：“Google’s procedures do not allow ordinary shareholders to make comments on proposals prior to voting. ... Thus, Google acts as a partial censor at its annual meeting—at least with respect to comments that may impact how shareholders vote on stockholder proposals. ... Many shareholders vote their shares in person at the meeting and may be influenced by shareholder comments. Allowing ordinary shareholders to comment on proposals only *after* voting is closed is tantamount to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banning CNN from making political comments until after national election polls are closed.”（Google 的程序不让普通股东在投票前发言。...这样，Google 实际上在年会上扮演审查官的角色—至少，有些发言会对股东投票产生影响。...许多股东亲自出席会议，就会被发言影响。只让普通股东在投票结束后发言，正如美

国政府禁令 CNN 在大选结束后才能发表评论一样。)

Google 的两个创始人尚且年轻，没有被资本政治完全腐蚀。其中，Brin 对于互联网审阅提案，没有像所有别的董事一样反对提案，而坚持“不做恶”的弃权立场。但今年他们都没有在股东大会的舞台上露面。去年 Google 股东大会上，每一股东可以在投票前发言两分钟，今年只能在投票后讲一分钟，明年呢？别的公司呢？我不寒而栗，两夜不能入睡。5月9日，我赶紧向 The U. S. Securities & Exchange Committee (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诉，要求 SEC 调查这次 Google 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见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google.pdf>）。同时，也在网上向公众揭露事实真相（因为当时在场的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等没有报道这一事实）。

5月12日，我收到 SEC 名为 Salvador Neri 官员就我的这个编号为 File H01330076 的申诉的答复：股东大会和股东大会规则，不由 SEC 管辖，而是由注册州的法律规定。我们都知道，几乎所有的总部在硅谷的大公司都是在德拉瓦州注册的，因为那里几乎没有法律规范公司！即使有法律，我也没有经济能力从加州到几千里以外的德拉瓦州去讨取公正。

好在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我本来就对所谓法律不抱期待，更确认只能靠民众自身的直接行动才更有效。除了联系别的社会责任股东外，我也做好相应准备，制止 Google 或别的公司进一步倒退、专制、野蛮化。

[2009年5月12日]

2.3 以股东提案推动 Google 谷歌的人权政策转换

我 2009 年 5 月 7 日到谷歌总部出席股东大会时，与 2008 年股东大会气氛完全不一样。2008 年的股东会议“在七十分钟的议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讨论中国与人权问题，对 Google 的股东和管理层是很难得的教育机会。……这是一次成功的、特殊的公共教育活动，说明在美国最大型的尖端高科技公司最高层还有 Brin 这样的、不会因为贪婪而无视、害怕人权观念的有识之士（我本来还期待 Google 的高级顾问戈尔前副总统也会来开会的）。正因为有这样的高层公司人士的存在，使得几乎没有思维良知的超级跨国公司对人权等普世价值有一定的容忍和理解。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教育全世界的公司上层，让他们认识到，正如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一样，只有在一个新闻自由、多党竞争、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下，经济商业才能正常发展”³⁰。2009 年的股东大会，主席台上居然见不到一个董事，主持会议的高级副总裁兼法务总管 Drummond 竟然不允许我就会议程序提问。我“退回座位，从容地收拾材料，慢悠悠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步出会场。余目之下，我看到有人向我伸出大拇指。这是 Google 最黑暗、愚昧的一天。”³¹

2009 年 10 月 12 日，我向 Google 和雅虎同时提交 2010 年股东大会关于中国人权的提案³²。这个“谷歌在中国业务的人权影响”提案得到 Morton Sklar 律师（控告雅虎的代理）的帮助，要点为：鉴于中国政府监视电子

³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google.html>。

³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google-c.html>。

³² 相关文件在 <http://cpri.tripod.com/cpr14.html>。

通讯、限制互联网使用、逮捕和严厉惩罚行使自由表达和自由结社权利的互联网使用者，鉴于谷歌在中国的业务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对于人权的侵犯而负有的责任和义务，以及鉴于美国的禁止公司在外国侵犯人权的相关法规，为此，股东们决议：1. 不向有可能侵犯人权的中国执法当局提供信息技术和产品，特别不能提供用户的信息而导致用户因为在互联网上行使自由表达和自由结社的权利而受到迫害。2. 停止互联网审阅，帮助中国的用户突破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非法监控。3. 设立一个人权委员会[附录]。我一方面担心谷歌会象雅虎那样雇用法律事务所排除我的提案，一方面也希望谷歌董事会中斯坦福大学校长、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等董事能够坚持基本伦理价值。

2010年1月13日，谷歌突然宣布，鉴于谷歌中国业务数年来遭受了诸多攻击和监视，谷歌考虑退出中国市场。谷歌进一步表示，不再愿意继续对谷歌中国的搜索结果进行审查，这可能将不得不关闭 google.cn 网站和在中国的办公室。一时间，整个世界都议论纷纷：谷歌真敢挑战北京吗？我拭目以待。

2月10日，谷歌在华盛顿的公共政策主管（Public Policy Director）Bob Boorstin 通过电邮和电话与我联系，交换谷歌在中国业务的意见。Boorstin 介绍说他 80 年代初在北京工作过（那时我正在清华念书），知道中国。他同意我的提案中的第 1 点，特别保证谷歌不能重复雅虎那样的“犯罪行为”，不会“好马要吃回头草”（北京当局放出的诱饵）；他告诉我谷歌正在采取行动实施我的提案的第 2 点，特别指出已经在谷歌总部秘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组织各界帮助中国的用户突破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非法监控。这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极为重要，至少可以节省我们的大量人

力、财力资源而投入到更急需的人道救援等项目上。我鼓励谷歌要坚持“不做恶”，并表示可以到谷歌总部与他见面商谈、也可以放弃提案。最后，我要求他把我们通话的内容用书面的形式写给我，他同意了，但一直没有与我联系。过后，我接到谷歌的“高级公司律师”（Senior Corporate Counsel）Katherine Stephens 的 2 月 25 日快件，告知谷歌董事会反对我的提案。大意是：我们同意互联网自由的至关重要性和企业的保护人权的责任。我们正在审视此提案中强调的中国业务问题，这将会极大地改变局势。谷歌正在采取支持表达自由的步骤领导着互联网产业，例如，加入全球通讯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保护人权等（内容与后来谷歌的正式声明相同）。

我放下心来，知道谷歌没有像雅虎那样做恶排除我的提案。同时，我意识到，谷歌害怕我这样的安那祺主义者不会与他们合作，而更需要我这样的第三者立场向中国政府表态：是公司的来自北京的股东要求公司坚持人权原则。中国政府指责谷歌“输入美国价值观”，其实是中国当局（1989 年“六四”事件后北京驻日公使唐家璇勾结日本政府）向美国输入我这样的政治难民，我作为极小股东（只有 3 千 5 百万分之一股份）行使世界公民的义务要求谷歌“不做恶”而已。3 月 2 日，我回复 Stephens 和 Boorstin，感谢谷歌对于我这样的极小股东的诚意，同时再次希望他们采纳我的提案。因为太敏感，我也只能静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2010 年 3 月 23 日，谷歌正式宣布停止审查 google.cn 的搜索内容，并将网站链接转入香港服务器，为全球化经济和互联网时代不断倒退的人权状况留下了值得评价的记录。我四、五年前因为雅虎事件把所有退休基金转换为各公司股票以来，正好撞上金融危机，经济损失惨重。但我欣慰

自己的民主人权“投资”，在谷歌、雪佛龙等公司的人权政策转变中得到了回报。3月29日，谷歌向股东发出2009年度业务报告和2010年5月13日的股东大会资料³³，包括我的中国人权提案（第6号，p. 38-39）。

谷歌5月13日举行2010年股东大会之前，高级公司律师Stephens打电话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因为在去年的股东大会上，主持人不让我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言，我退席抗议，谷歌有点担心再发生类似的场合。我回答说，这一次，我只履行最后一道程序，把我的提案念完。

我有意避开谷歌提供的丰盛免费午餐，只在开会之前10分钟左右进入会场。那个在各种股东大会上总是为公司狭隘利益辩护的白人找上来搭讪，我拒绝到：“会议马上开始了，我还要准备提案。”会议由CEO Schmidt主持，还有几个别的负责人，包括一个创始人Page，却没有对人权问题比较同情的另一个创始人Brin和前两次主持会议的秘书长。我很高兴谷歌对国际政治有一定的常识，免得打起交道来浪费时间。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麦凯恩就在这里演说过，Schmidt又是奥巴马的竞选顾问。

这次大会，除了公司的3个提案外，还有我的中国人权提案和另外两个股东（法人）的提案³⁴。第5号提案是关于保护隐私的，但宣读者也不由得赞扬谷歌坚持原则退出中国的决定，因为这是今年的股东大会最重要的话题。我很不满只有3分钟的时间宣读提案，只能在介绍自己的身份（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和人道中国）后尽快念完提案。从公司的视屏

<http://investor.google.com/webcast.html>、

³³http://investor.google.com/documents/2010_google_proxy_statement.html。

³⁴http://investor.google.com/documents/2010_google_proxy_statement.html或
http://investor.google.com/pdf/2010_google_proxy_statement.pdf。

<http://www.youtube.com/googleleir>上看，效果还不错，谷歌的软件基本上正确地显示出我的语音内容。后来，又有一个股东提问关于中国的业务，Schmidt 说：我们把引擎移到香港，因为那个地方与中国大陆实行的是两个制度，我们喜欢那里的制度。他还说：谷歌不会改变，将来要看中国政府的改变。最后结果，有 9,798,645 票赞同、43,170,795 票不反对（弃权）我的提案³⁵，这使我的 9 股（不知是 9 票还是 90 票）的投资，达到了百万或十万多倍的公共教育效果。其实，这对于更多的投反对票的股东，读了我的提案，也是一种教育。更不用提，它推动了公司实际上采纳了我的提案精神。

会后，自由亚洲电台³⁶、新唐人电视台、Mercury News、CBS News、CNET News 等都报道了大会的中国人权议题。网上有一个股东说我的提案切中要点，而他从我的衣服认出我不只一次提出过这个问题。Finally the one calling for more protections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 by a guy who I think has asked pointed questions at at least one previous annual meeting (I recognize his T-shirt).³⁷

5 月 15-16 日的华尔街日报，用好几页篇幅、以中国的 Private Party（私党或私人餐会）专题、很羡慕地报道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世代之内（实际上是从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以来）如何从国家社会主义转换成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揭示出中国的政治专制、经济压榨的现代奴隶制本质。在这

³⁵ <http://investor.google.com/proxy/2010/results.html>。

³⁶ “谷歌 2010 年股东大会在旧金山总部召开”<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uge-05142010145446.html>。

³⁷ <http://androapps.co.cc/?p=3950>。

个全球化的转化过程中，包括华盛顿的白宫、国会在内的国际政治权力的衰退自然不提，连中南海的主人也逐渐堕落为资本控制下的中国 Private Party（私党）的代言人。这就是股东大会越来越变为自由、民主、人权主要战场的原因，让我们把人权提到所有的股东大会的议事日程上来！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司治理和人权运动，正在拉开序幕，让我们都来利用这个战场参与、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

[2010年4月22日初稿、5月18日修订]

[附录]

SHAREHOLDERS' RESOLUTION FOR GOOGLE 2010 SHAREHOLDERS' MEETING
Human Rights Impacts of Google Business in China

Whereas, mindful of the mis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monit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to restrict Internet access and use, and to arrest and severely punish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for expressing and exercising their free speech and free association rights, and

Whereas, recognizing the spe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that these major abuses of human rights place on Google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in ways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these abuses, and,

Wherea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U.S. laws prohibit the involvement and support of U.S. companies in major human rights abuses

taking place in foreign nations, and specifically prohibit actions by U.S. companies that contribute to major human rights abuses by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in China,

Therefore, be it resolved, that the following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should be formally adopted by Google to guide its actions relating to its operations affecting China:

N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or technologies will be sold, and no assistance will be provided to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in China,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at country. Specifically, no user information will be provided, and no technological assistance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hat would place individuals at risk of persecution based on their access or use of the Internet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for free speech and free association purposes.

Censorship of access or use of the Internet will not be used as a method of restricting assistance to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engaged in Internet or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that adversely affects the human rights of users. Every effort will be made to assist users to have access to encryption and other protective technologies and approaches, so that their access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will not be restricted, before resorting to censorship as a means for preventing unlawful surveillance and repression by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Google will provide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to efforts aimed at developing and making more accessible to users in China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allow them to evade unlawful

surveillance of their Internet use by Chinese authorities.

Google will establish a Human Rights Committee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view and approve all policies and actions taken by the Company that might affect human rights observance in countries where it does business, or where its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are being used. This Committee will include high-level officials of Google, and respected outside human rights experts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help Google understand the human rights impacts of their activities abroad, and frame approaches that will assure that Google does not contribute to human rights abuses by foreign governments.

3.1 激荡的 Chevron 雪佛龙公司股东大会

两年前，当我刚搬到旧金山海湾东部山峦美丽的 San Ramon 圣拉蒙市时，发现 Chevron 的总部竟然在这里。去年，我有意图地买下了 Chevron 的股票。今天早上不到 8 点，我开车到 Chevron 总部正门时，遇到我预想到的近百名抗议人士。这些以年青人为主体的戏剧性的衣着（白大褂）、美观的设计标语以及音乐般的口号，正是我熟悉的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的抗议方式。实际上，我 3 月 16 日（周日）去 Chevron 在 Richmond 港湾的炼油设施抗议时，就知道了这些以伯克利大学学生为主的人士。那一次有近三百人参加，象征性地把炼油厂的道路和港口都堵塞、封锁了起来，大家载歌载舞一派节日景象，把我带回到 1989 年春天在日本组织声援中国民主运动的情景。我当时与他们的组织者约定，要来参加今天的 Chevron 股东大会。比起我们都敬佩的美国无政府主义斗士柏克曼，今天我们不必持枪去惩罚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代理而坐牢了。另一方面，比起抗议那些躲藏在层层装甲警卫包围中的全世界统治阶级的代理人政客们，在股东大会上直接推动人权政策等，更有效果和价值。

除了公司正门外的警车，我注意到公司里也停了两辆警车，沿途有不少保安人员和公司职员，颇有“如临大敌”之感，我的手机和相机也被要求放回车内。当我在会场入口看到几个印第安装束的人士，一下子意识到这家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在全球争抢资源时，积怨不少。

近来油价不断高涨为 Chevron 带来丰厚利益，其 2007 年总产值达到 2141 亿美圆（与八千万人口的越南整个国家的总产值接近），股票也上升 27%。公司的管理层很自信，会议很快顺利地通过了董事会提出的选举新董事会、承认会计公司、增加股票发行的三个提案。

第4号提案要求CEO（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由不同的人担任。总部设在德州的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也是世界第一大公司）Exxon Mobil今天也同时召开股东大会，其原初公司的创始人洛克斐洛的家族等大股东提案也要求CEO和主席由不同的人担任。这两个相同的提案都被否决了。我今天观察Chevron的CEO兼主席D. J. O' Reilly主持会议的表现，发现他不擅长应对Chevron这样的超级跨国公司必须面对的政治性事务，确信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主席（例如十名董事之一的原联邦参议员S. Nunn）是必须的。近年来，相同的提案在别的公司股东大会也不断提出，可能会花上几年努力，形成一股强大趋势才行。

第5号提案是要求采纳全球性的人权政策。这个提案在2006年和2007年的股东大会上已经被提出，虽然没有被通过，但达到了相对的比例，故可以重新提交。一位旧金山大学的教师发言，说明这是旧金山大学提出的唯一提案，鉴于Chevron在那些内战、无法制、腐败蔓延、没有劳工和环境标准等国度操作，有必要采纳人权政策维护股东的价值和公司的形象。我站起来发言，首先感谢Chevron股东大会给我发言的机会，因为我虽然想出席在北京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4月15日的股东大会，我的清华校友胡锦涛、吴邦国等权贵十几年来非法剥夺我的公民权不让我进入中国。我以自己在中国、日本以及美国受到的人权侵害的亲身经历，说明公司不能把保护人权的责任推脱给国家权力，因此支持这个提案。此提案受到24%股东的支持，虽然这一次没有通过，明年还会被提出。去年在Yahoo股东大会上认识的纽约市政府的Dougherty，上月在Google股东大会上认识的大赦国际的Cruz，后来也发言支持此提案。

第6号提案要求公司报告在加拿大开采油砂时的环境影响；第7号提

案要求采纳温室天然气排放的目标值；第 8 号提案要求制定选择所在国家操作的纲要；第 9 条提案要求报告所在国家的法律状况。整个会议变得炽烈起来，要求发言的人很多，很多发言因时间限制被强制打断，不得放到表决后的问答时间里进行。最多的发言抗议围绕 Chevron 在厄瓜多尔的环境污染问题，那几位从厄瓜多尔来的讲西班牙语的原住民实际上正在与 Chevron 打官司。有一个来自缅甸的妇女要求 Chevron 向军政府施压以改善人权，O' Reilly 说 Chevron 已经要求 EU 和 UN 向军政府施压，并捐款救灾。最火爆的情形是 O' Reilly 与一个来自尼日尼亚的黑人的对骂：O' Reilly 声称黑人属于残暴的犯罪集团，绑架 Chevron 的雇员；黑人则指责 Chevron 雇佣警察直升机杀害当地居民，他们也正在起诉 Chevron。我座位边的一个妇女见状问我，是否大家都有发言权，我鼓励她讲。她是伊拉克难民，说 Chevron 去伊拉克采油，当地人没有工作了。所有其他的董事都保持沉默。董事之一的原联邦参议院武装事务委员会主席 Nunn 与基辛格等美国退休官僚今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废除核武器后，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很想就核能源问题请教他和 Chevron 公司。但 O' Reilly 见事态不妙，在十点钟打断发言，说有诉求的人可以留下来继续与公司的头脑们对话，宣布结束股东大会。³⁸

我们从会场出来时，公司不愿股东们在正门遇到抗议的人士，让我们开车绕道从旁门出来。我把车



³⁸ Chevron 关于今天股东大会结果的公报
<http://www.chevron.com/news/press/release/?id=2008-05-28>。

停在附近的商店停车场，到正门口与抗议人士交流，看到那几位印第安和尼日尼亚人士出来与大家联欢并接受记者采访。晚上我从网上读到各媒体的报道，多数都如实地介绍了会场内外的抗议情形。看来，跨国公司的股东大会正成为全球化动荡中越来越重要的战场。

[2008年5月28日]

3.2 出席 Chevron 雪佛龙公司 2009 年股东大会

今天早上八点过，我开车到 Chevron 总部正门时，与去年同样，遇到预想到的上百名抗议人士。我只好绕一大圈，进入广阔的公司建筑群。里面的警察、保安、职员等如临大敌。我因为穿着一贯的印有 Human Rights for China! Release Political Prisoners! 的运动衫，被认为是抗议人士，问路也被误导。我进入会议大厅时，投票已经结束，开始每人 3 分钟的提问程序。



与去年相同，大会的第 7 号提案要求采纳温室天然气排放的目标值（撤销）；第 8 号提案要求制定选择所在国家操作的纲要（赞同低于 26%）；第 9 号提案要求制定人权政策（赞同低于 28%）；第 10 条提案要求报告所在国家的法律状况（赞同低于 7%）³⁹。整个会议炽烈，要求发言的人很多，围绕厄瓜多尔、缅甸、尼日尼亚、伊拉克、亚马逊河流、气候变化、女性董事等各抒己见，很代表在世界 180 多个国家做生意的公司的全球化趋势，很多发言因时间限制被强制打断。我站起来发言，以自己在中国、日本以及美国受到的人权侵害的亲身经历，希望公司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处理日常问题，免得每次股东大会都面临这么多抗议。近几年在几个股东大会上都见面的纽约市政府的 Dougherty 也来了。另一位几年前在旧金山一个会

³⁹ 今天股东大会投票结果：

<http://www.chevron.com/news/press/release/?id=2009-05-27>

议上认识的华人女士向我招呼后也发言，提到在朝鲜/韩国的军备问题，被主持会议的 CEO O' Reilly 打断，在十点钟结束了会议。

当天晚上，我在网上检索 chevron shareholders meeting，出现许多抗议的记事。包括当地主流媒体在内的报道，都如实地介绍了会场内外的抗议情形。再次证实我去年的观察，跨国公司的股东大会正成为全球化动荡中越来越重要的战场。

[2009 年 5 月 27 日]

3.3 推动 Chevron 雪佛龙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验

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Chevron 雪佛龙 2008 年总产值达到 2649.58 亿美元（作为比较，1 亿 7 千万人口的巴基斯坦整个国家 2008 年的名目 GDP 总产值 1646 亿、平价 GDP 总产值 4224 亿美元）。它在尼日尼亚、缅甸、厄瓜多尔、伊拉克等国从事业务遇到的人权问题也很受关注。不用提，它在中国也有很大的业务，必然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所以，当我几年前搬到圣拉蒙发现它的总部在此地，就有意识地用我的退休基金买下了它的一些股票。我本无经济头脑，主要是“投资”中国的民主自由，如果再过 20 年中国还没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我的“退休”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2008 年我第一次出席它的股东大会，注意到第 5 号提案要求采纳全球性的人权政策。这个提案在 2006 年和 2007 年的股东大会上已经被提出，这一次得到 24% 股东的支持。我当场发言支持这个提案。我观察 Chevron 的 CEO 兼主席 D. J. O' Reilly 主持会议的表现，发现他不擅长应对 Chevron 这样的超级跨国公司必须面对的政治性事务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chevron.pdf>）。2009 年 5 月，我再次出席其股东大会，又发言支持同样的要求制定人权政策的第 9 号提案（赞同约为 28%），并希望公司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免得每次股东大会都面临这么多抗议。跨国公司的股东大会正成为全球化动荡中越来越重要的战场（见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chevron2009.pdf>）。

为此，2009 年 10 月 12 日，我向 Chevron 提交我的人权提案。“雪佛龙业务的人权委员会：鉴于中国政府严重践踏基本人权，处罚表达和实行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的人民（例如，我本人出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1996 年没有得到任何文件就被取消了中国公民权）；鉴于美国法律禁止美国公司在外国（包括中国）涉及侵犯人权的活动，所以，股东们在此决议：雪佛龙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在出售和使用公司的产品和技术的国家从事的所有与人权相关的政策和行动。这个委员会将遵循联合

国人权宣言、包括公司的高级官员和受尊敬的外部人权专家（特别有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知识）以帮助公司了解公司海外业务的人权影响。”（附1）

我10月19日很快收到Chevron的Assistant Secretary & Managing Counsel Christopher Butner先生的传真，说我的股东证明不太明确。我立即又开车去交易公司的办事处，重新拿到一份证明，于10月22日递交。

在年底的时候，Butner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我的提案与另一个提案相似，而公司只接受一个提案，让我与另一个提案的股东联系。我打通了在华盛顿的一个叫Bradley女士的电话，知道对方是the Society of Jesus耶稣会的代理，负责调整全美42个province（沿用古罗马的行省划分传统，在美国按州划分）的共同提案，是2009年第9号人权提案的机构股东。因为我的提案早（他们的提案12月2日送到），有优先权。我一方面很高兴几年来自己的提案终于可以首次被列入一家大公司的股东大会投票表，让全世界的上百万股东思考中国的人权问题；另一方面也很气愤Chevron把我放在耶稣会的对立面，我哪能与上帝作对？我告诉他们：“我们的事业都很重要，我不会放弃。但我们的提案不相似，你们应该与Chevron交涉，让两个提案都列入投票。”我还告诉他们一个战术：如果Chevron采用这种小伎俩的话，他们下一次每个行省各提一案，看Chevron怎么应对！

2010年1月26日，我和从华盛顿飞来的Bradley女士和本地的加利福尼亚行省的省长助理Mark Potter博士会见，读到Chevron1月8日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并转耶稣会的信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evron_SEC.pdf），利用我的提案排除他们的提案，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们也打通在佛罗里达行省的耶稣会法律顾问Newhauser先生。Newhauser律师向我说明，SEC很有可能会同意Chevron的意见，把耶稣会的提案排除掉。那样的话，他们经历几年的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必须3年以后重新开始。我也感谢他们对我为什么坚持自己的提案以及中国人权事业的理解。他们没有再恳求我，而是

祈祷上帝，因为这已经超越了人的意志。Potter 博士第二天给我的电子邮件回顾了我们会见的精神，令人感动（附1）。

经过两天的反复比较，我与“人道中国”的周锋锁等同事们商量后，正式回复耶稣会，主动放弃我的已经被公司接受列入表决的提案，让他们的提案复活。虽然失去了一次机会，但我们以此获得了耶稣会这样强大的联盟，共同为世界和中国的人权事业战斗。

2月1日下午，我和Potter 博士一同去Chevron 总部，与公司的Butner 先生和 Global Issue & Policy Manager Silvia Garrigo 女士举行三方会谈。我吃惊地意识到：当Chevron 知道了我1月28日的决定使耶稣会的提案死而复生后，实质上改变了政策，基本上同意接受耶稣会的提案要点！这是很大的胜利。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耶稣会将撤销它们的提案。我们的会见，主要由公司的两位官员解释如何在组织、制度上实行人权政策改善，并在全球、全公司范围内培训各个级别的员工。关于我的提案，我介绍了自己至今不能回国的经历和工作、中国的现状，特别强调在中国执行人权政策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他们解释说，公司在中国没有直接涉及到与中国政府合作侵犯人权的业务，公司也有外部的人权问题顾问（包括一位退休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公司也很乐意通过我们的渠道了解中国的人权问题等等，因此我的提案就没有必要了。他们又说：股东提案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我心里说：“我也到你们的Richmond 炼油厂去抗议过呀！不过，那要动员上千人，才抵得上我这半页纸的提案，让我今天坐进来。”我表示：我的提案不是我个人的坚持，面对没有合法性产生的政权，受迫害、受压制的中国民众对于在中国做生意的跨国公司，有权利要求和期待人权保护政策，公司同意把我的提案付诸广大股东表决，就是回避问题的负责的表示。他们接受了，说，公司的董事会将准备一个声明，大意是说，原则上同意我的提案精神但没有必要设立一个委员会只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对此表示理解。我的提案将会在今年5月在休斯敦举行的大会上投票。我同时也听说，现任CEO 兼主席 O’ Reilly 将不会再

任，验证了我最初参加股东大会时对他的判断。

3月15日，我收到Butner的快件，是Chevron公司2010年5月召开的股东大会的投票资料的两页内容。第83页是我的提案，第84页是公司的反对声明（附2）。这份公司声明，列举了我们2月1日会议中的要点，说明公司已经从制度上采取新的、足够的人权政策，没有必要再设立人权委员会。我基本同意。我把这个声明传给Potter博士，他回复说耶稣会也基本同意公司的声明，并同意将代表我出席在休斯敦的股东大会，宣读我的提案，完成最后一道程序。这样，我以几千万分之一的超微小股份，帮助耶稣会等达到了在2009年大会上近6亿股（28%）没有达成的目的，奇迹般地推动了Chevron人权政策的转变。而且，在第一次把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送到Chevron股东大会表决的同时，又建立起与耶稣会这样的历史悠久的全球组织的联盟（我2007年在Yahoo股东大会上试图与纽约市管理政府雇员退休基金的官员建立“联盟”，无果。今后，我可以先提交一个类似提案，把需要结盟的大股东请到谈判桌上来）。下一步，我马上就得转向已经无理拒绝了我的同样内容提案的Boeing波音公司和似乎已经接受了我的内容不同的提案的Google谷歌公司。

[2010年2月1日第一稿，3月31日定稿]

[补充：2010年5月26日股东大会结果：有**76,498,972股**（**6.9%**）投票赞成我的提案。见公司网站：

<http://www.chevron.com/documents/pdf/chevron2010proxyvotingresults.pdf>]

[附1]

Dear Jing Zhao, Ph.D. -

Thank you for taking time to meet with us yesterday and for sharing your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in China. We have been deeply

moved by the suffering you and your wife have experienced and know how significant your Chevr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is for so many people who are being persecuted in China today. We applaud your courage and invite you to consider joining in our larger movement to change Chevron's human rights practices and policies as a part of the coalition of concerned shareholders that we have built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I realize that we have made a difficult request of you to withdraw your resolution with Chevron to allow the Jesuit-led resolution to go forward. As you heard our legal counsel Paul Neuhauser explain, the SEC will likely agree with Chevron's request to exclude ours since your resolution was received first.

As you probably know, shareholder resolutions are not binding on a Company. Resolutions are used primarily a means to getting the Company to enter into constructive dialogue with shareholders. This is why having a large number of shareholders backing a resolution is important, and is something that grabs the attention of the Company as well as the shareholders who are voting on each resolution.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several third-party corporate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have recommended that shareholders vote in favor of this Jesuit-led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As you contemplate what to do and discuss this with you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please consider how much more effective you can b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by joining the Jesuit-led initiative for a comprehensive human rights policy at Chevron:

- You become an ally joining experienced shareholder advocates who are members of the 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CCR).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is coalition has grown each year, and now includes 42

co-filers on the resolution calling for a comprehensive, transparent, and verifiable human rights policy across all operations of the Chevron Corporation - in all countries where Chevron operates, including China. Also, each year the shareholder vote has increased, to nearly 30% approval last year. Our resolution has the support of 42 institutional co-filers, which is the largest ICCR resolution in the current year by a wide stretch (the second largest after our resolution has received 22 co-filers).

- If you choose not to withdraw your resolution and the SEC agrees with Chevron to exclude the Jesuit-led resolution, then your resolution will need to win at least 10% of the shareholder vote (201 million shares). As we discussed yesterday, resolutions with a single sponsor that focus on a single country rarely garner such response. As Paul Nehauser explained, if your resolution fails to win a 10% approval, then none of us will be able to file another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with Chevron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and we will lose all the momentum and progress that we have made with Chevron since we started engaging Chevron in 2004.
- For almost 40 years, ICCR has been the pioneer in shareholder engagement - we are respected and taken seriously by every company that we engage. You should know that in the last five years, the Jesuits have successfully engaged both Occidental Petroleum and Monsanto Company to adopt comprehensive human rights policies. Moreover, as Anna showed you yesterday, our ICCR colleagues have many other open dialogues that have China as a focal point and this will allow you to be a resource to them.

- You will be able to participate with us in our ongoing dialogue with Chevron corporate officers. You would be able to participate not only in the dialogue but also in the strategy session to plan the agenda. This will allow you to speak directly to Chevron decision makers who have the authority to change corporate practice and policy. Corporate dialogues have an entirely different tone than the annual meeting and they provide the time to discuss items much more in depth. We will incorporate your particular interest and concerns regarding Chevron's operations in China within our wider context of global, transparent, and verifiable human rights policy, and continue to hold Chevron to these standards throughout the implementation phase of such a policy. Jesuits have identified China as one of the key areas that we want to grow in our awareness and engagement, so your insight and experience will be extremely valuable.

Dr. Zhao, if you agree to withdraw your resolution, we will welcome you and your concerns for China wholeheartedly into our alliance of co-filers. Hopefully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will see that by joining the Jesuit-led resolution, your cause is actually made stronger - and alternatively, by not joining you would potentially be jeopardizing an advancement of human rights with Chevron and hurting your cause. Certainly, an alliance of united shareholder advocates will demand greater leverage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China. Together, we can utilize our shared experiences and passions on behalf of human rights everywhere.

Please call me or Anna direct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your decision by Friday.

In solidarity and peace,

Mark & Anna

Mark Potter, Ph.D.

Provincial Assistant, Social Ministries California Province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附 2]

Stockholder Proposals *(Continued)*

STOCKHOLDER PROPOSAL REGARDING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tem 9 on the proxy form)

Supporting Statement

Whereas, mindful of the severe abuses of basic human rights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punish its people for expressing and exercising the free speech and free association rights (for example, I myself, born in Beijing and graduated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was deprived of my Chinese citizenship in 1996 without any document), and

Wherea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U.S. laws prohibit the involvement of U.S. companies in major human rights abuses taking place in foreign nations, including China,

Proposal

Therefore, be it resolved, that shareholders request that Chevron establish a Human Rights Committee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view and approve all policies and actions taken by the Company that might affect human rights observance in countries where it does business, or where its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are being sold or used. This Committee will follow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will include high-level officials of Chevron, and respected outside human rights experts (especially with knowledge of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to help Chevron understand the human rights impacts of Chevron business abroad.

4 推动 Boeing 波音公司人权政策的尝试

波音公司 2009 年总产值达到 683 亿美元（作为比较，1 亿 6 千万人口的孟加拉国 2008 年的名目 GDP 总产值 842 亿），其中 43% 来自美国政府（国防部），⁴⁰ 大概是世界第一大军火商。在 2009 年的股东大会上，The Sisters of Charity 就提案（第 7 号）要求公司公布对外国（特别是哥伦比亚、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军售。⁴¹ 实际上，新加入波音理事会的 3 个成员中，一个是退休的海军上将 Edmund Giambastiani，另一个是原美国贸易谈判代表 Susan Schwab。与那些我直接打过交道的雅虎、谷歌、思科、雪佛龙等公司相比，波音更具有国家官方背景，与依靠国家“行政指导”发迹的几家日本大银行系列类似。

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我决定从自身的角度推动波音的人权政策。2009 年 10 月 12 日，在我向雪佛龙公司提交 2010 年股东大会人权提案的同一天，也向波音提交了同样内容的 2010 年股东提案。大意为：“鉴于中国政府严重践踏基本人权，处罚表达和实行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的人民（例如，我本人 1996 年没有得到任何文件就被取消了中国公民权）；鉴于美国法律禁止美国公司在外国涉及侵犯人权的活动，所以，股东们在此决议：波音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在出售和使用公司的产品和技术的国家从事的所有与人权相关的政策和行动。这个委员会将遵循联合国人权宣言、将包括公司的高级官员和受尊敬的外部人权专家以帮助公司了解海外业务的人权影响。”（附录 1: Shareholder Propos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10 月 28 日，我接到波音负责人事和行政的高级副总裁（Senior Vice President,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Rick Stephens 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解释说波音已经有人权政策了。我仔细阅读了他给我的波音“基本工作条件和人权政策”（Basic Working Conditions and Human Rights policy <http://www.boeing.com/aboutus/culture/code.html>），回复说，这是针对公司内部员工的，而我的提案是对外的。他 11 月 2 日

⁴⁰ The Boeing Company 2009 Annual Report.

⁴¹ Boeing: 2009 Annu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从 Abu Dhabi UAE 回复，还是坚持己见，实际上中止了与我的对话。第二天，我接到公司主管律师（Chief Counsel - Securities, Finance & Governance）Gregory Vogelsperger 的来信，要我（重新）提交股东证明等。我 11 月 6 日马上又去证券公司开出新的股份证明，用快件送去。

12 月 16 日，我接到 Vogelsperger 和公司秘书长 Michael Lohr 的电话和电子邮件。他们除了重复 Stephens 的说明外，还说公司有一个内部治理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l Governance, OIG）专门负责人权和其它事物。OIG 由高级副总裁 Wanda Denson-Low 负责，Denson-Low 是波音执行理事会成员，直接向波音主席、总裁兼执行长 Jim McNerney⁴²报告。Gregory Vogelsperger 和 Lohr 在电话中也不一致，虽然辩解说波音在不同的部门都有各种政策，也承认公司没有一个统一的人权政策。我坚持指出：波音作为世界领导型航空公司，必须制定人权政策迎接当今的全球化挑战，免得遭到雅虎那样的舆论和商业惩罚。12 月 21 日，我再次致函，坚持要求波音尊重股东权利，把我的提案付诸股东大会表决。第二天，Vogelsperger 和公司法律助理（Corporate Paralegal）Rebecca Bukolt 致函给我，说波音已经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SEC 提交 35 页的要求，排除我的提案（http://cpri.tripod.com/cpr2010/Boeing_SEC.pdf）。波音的第一个理由是我的提案“本质上模糊、不确定、误导”，第二个理由“波音实际上已经实施了”我的提案。用不着浪费时间去读公司律师的颠倒黑白的术语，从这两个理由的逻辑矛盾就可以知道类似的大公司的“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性质。我 2010 年 1 月 4 日致函 SEC 反驳波音（http://cpri.tripod.com/cpr2010/Zhao_SEC.pdf）。

2 月 3 日，美国耶稣会的社会责任投资顾问 Anna Bradley 为我介绍耶稣会威斯康辛行省的 Michael Crosby。Crosby 介绍说，威斯康辛行省从 1996 年开始就向波音提交关于在中国做生意的提案，并在两、三年前与波音达成关于中国和西藏人权问题的协议。他就是与波音的 Stevens 一同协议的。但这一次，Stevens 和别的波音官员完全没有提这回事。我知道，这一次，波音是不会理会没有提交股东提案的耶稣会的。

⁴²他的年收预计接近 1 千 8 百万美元(Boeing Notice of 2010 Annual Meeting and Proxy Statement, p.29)。

2月11日，Lohr 致函给我，说公司决定把我的提案列入第4号，董事会将在2月22日讨论反对声明（附录1）。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一回 SEC 没有成为大公司的附庸！我马上回复，表示不会再麻烦他们，尊重这一次股东表决的结果，不再提交提案。

在这之后，我收到了 SEC 注明2月5日的邮件（附录2）。这封回复波音并转送给我的信说，波音认为我的提案“模糊、不确定”，有一定道理，所以 SEC 对于波音排除我的提案的行为不会采取行动。这实际上违背逻辑：波音在第二个理由中声称已经实施了 my 提案，说明对我的提案很清楚，那会有模糊、不确定呢？而且，总产值为波音4倍的雪佛龙公司（2008年2649.58亿美元年）已经决定了列入我的同样内容的提案。如果我的提案“模糊、不确定”的话，雪佛龙公司怎么执行呢？⁴³这使我联想起金融危机后美国公众对 SEC 的批判。其实，SEC 接到过许多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投诉，都没有采取行动。同时，这段期间，美国政府宣布要对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政府威胁要对波音等出售武器给台湾的公司制裁，代表美国政府的 SEC 当然不可能为了一个微小股东的权利，给波音这个美国政府的第二大合同商难堪。

SEC 同时说明，这是关于股东提案的非正式程序，并附带了一份文件。这是我第一次得到这份 SEC “企业财务部门关于股东提案的非正式程序”文件（附录3），值得注意。它指出：SEC 的回复只反映非正式的意见，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公司立场正当化的裁决；只有法庭的判决才能决定公司是否必须列入股东的提案。不过，至今我还没有得到过一次 SEC 不偏袒公司的“非正式意见”，而一个微小股东根本不可能与大公司打官司。另外，所有财经媒体，以华尔街日报为首，对于企业的过错，都是事后诸葛亮，不能指望它们会得罪大公司。果然，我收到3月15日波音寄出的2010年4月26日股东大会文件，把我的提案排除掉了。当然，通过这一场交往，迫使波音公司就人权问题进行一番答辩，至少在 SEC 留下纪录（从波音排除我的要求中引用的例子，可以看出别的大公司也都受到股东的挑战），会多少帮助它少犯错误。

⁴³见本书“推动 Chevron 雪佛龙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验”。雪佛龙公司董事会的反对声明中，列举了公司已经采取的人权政策转变，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没有必要专门设立一个人权委员会。



有趣的是：我不断收到的卡内基财团的通讯中，对于企业治理，倒不乏明智的高论。左图就是其中的一个口号例子：“一个死掉的地球上，还谈什么经济！No Economy on a Dead Planet”。卡内基当年靠美国工人的血汗发财，他的公司代理人差点亡命于柏克曼的破枪下，才学会了从事“慈善”事业，对于世界和平等研究多少有所帮助。所有超过个人所需的财产，都是盗窃（对普鲁东名言的修正）。SEC（以及整个国家权力）当然需要改革，但这远远超出了目前的研究与实践的范围。那些连 SEC 机能（尽管或许有类似名称）都没有的国度（中国、墨西哥、巴西、俄罗斯等），更令人担忧。在今天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体制下冒出的官商公司、犯罪富豪们，你们要有多少柏克曼的教训，才能改善 corporate governance（企业治理）、尊重人权？

[2010 年 4 月 6 日]

5.1 乏味的 Oracle 甲骨文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

“甲骨文公司掌控着全球企业数据库技术和应用的黄金标准：甲骨文是世界领先的信息管理软件供应商和世界第二大独立软件公司。Oracle 的技术几乎遍及各个行业，财富 100 强企业中有 98 家企业的数据中心都在采用 Oracle 技术。甲骨文是第一家跨整个产品线（数据库、业务管理软件和管理软件开发与决策支持工具）开发和部署 100% 基于互联网的企业软件的公司。”⁴⁴与我的预期相同，Oracle 公司今天的股东大会比较短暂、



平静。除了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形式的董事选举（第 1 号提案）和独立会计行选择（第 3 号提案）外，唯一引起争议的是关于高层主管的报酬问题（第 2 号和 4 号提案）。纽约的 The

Marianist Province of the United States⁴⁵在第 4 号提案中，要求由股东在大会上批准高层主管的报酬。特别的是，在所有的高科技大公司中，Oracle 的创始人兼 CEO（执行长）Lawrence Ellison 的收入格外突出，一直是争论的话题。他今年的收入为 8 千 3 百万美元。

报酬委员会主席 Berg 董事为 Ellison 的报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辩解，说 Ellison 身兼数职，全公司都靠他。这些理由都不错，但为什么他一个人的收入是平均技术员工的一千倍？这当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制度

⁴⁴ 引自公司网站 <http://www.oracle.com/lang/cn/corporate/story.html>。

⁴⁵ 这是一个天主教组织。近年来，由于受金融行业摆布的美国政府放弃监管，让金融业把个人或团体的退休基金等都投入股票市场，引起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异议，常常可见它们的股东提案。

与道德信念问题：难道比普通员工高一百倍还不足以满足 Ellison 的欲望吗？难道比普通员工高十倍 Ellison 就不能工作吗？举例来说，日本的大公司主管，通常满足于普通员工十倍的工资报酬，而更在乎能否在退休时得到一枚天皇授予的奖章（成本几十美元），美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形成这样的奖励风气呢？

我利用大会规定的每个股东可以提一个问题的机会，用 Yahoo 在中国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失败的例子，并以自己的政治难民经历，询问 Oracle 的政策。Ellison 很自信地回答，说 Oracle 的商业性质与 Yahoo 或 Google 不同，不在中国提供电子邮件等信息服务，而只是把软件产品卖给中国政府等客户，由他们去控制管理信息。言下之意，至于客户怎么用 Oracle 的产品，与 Oracle 无关。Ellison 很幸运地回答：在关于是否遵守主权国家的压制性法律的道德问题上，Oracle 没有必要（向 Yahoo 那样）被迫作出选择。

不论今天 Ellison 是敷衍了事还是尚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我只能预先提示他和 Oracle 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时必须面对的道义责任和法律后果，今后将监视它在中国或世界上的政策，根据事态的发展再说。

仅在这六个工作日内，以道琼斯指数衡量的美国股市，已经下跌了近 1/3，见证了历史上罕见的金融灾难。例如，那些靠退休基金生活的高龄者们这一年来已经失去了一半的存款，不少还能工作的人又得回到劳务市场找工作。但股票已经下跌了一半的，包括 Oracle 在内的公司都冻结了招人的计划，明年一定会大量裁员，那有可能雇用高龄者？据我几年前对

美国 2003 年 5 月简单的研究，⁴⁶当美国劳工部公布失业率为 6.1%时，实际的失业率可能高达 37.7%，而现在劳工部公布的失业率为 7%了。为金融资本服务欺压劳工的劳工部已经“对推崇欧洲模式感到不安”。⁴⁷我顺便参观了两个在 Oracle 工作的两个朋友的工作，明显感受到办公大楼内冷清空荡，完全不同于几年前我在 Adobe System 工作时的热闹气氛（那时我还组织公司内乒乓球比赛呢！）。Oracle 的业务有一定的垄断性，占地颇宽的整个公司建筑群还会在硅谷耸立下去，但作为“全球化”震荡的科技发源地的硅谷已经不可能再现十年前的雄风了。主导硅谷的 Ellison 等人会不会因为贪婪过度什么时候也与操纵华尔街的那些“投资银行”的诈骗犯们为伍呢？

[2008 年 10 月 10 日]

⁴⁶ 见笔者 Unemployment Redefined, Comparative Policy Review, June 2003. <http://cpri.tripod.com/cpr2003/unemployment.pdf> 及本书文章 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

⁴⁷ 据美国之音 2008-10-05 报道，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即将卸任之前警告说，目前的经济动荡形势正在催生美国经济欧洲化的思潮；下届政府强化政府干预、加强监管力度的冲动有可能伤害到美国经济的基本优势——灵活和具有竞争力的劳工管理制度。这体现出美国劳工部压制劳工的本质，正如华尔街“投资银行”（实为投机诈骗行当）的龙头高盛集团的 CEO 直接掌控美国财务部一样，这位“第一个”华裔部长也来自一家公司的 CEO。

5.2 再次占领 Oracle 甲骨文股东大会

“与 1989 年天安门运动和目前的阿拉伯之春一样，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在决定我们生活的公共空间确保我们的发言权，其中之一就是占领决定全球化走向的各大公司的股东大会。”⁴⁸继今年 H-P、NetApp⁴⁹、Symantec⁵⁰的股东大会后，今天我再次实施对 Oracle 股东大会的占领、代理纽约的 Kenneth Steiner 宣读第 6 号公司治理提案。

因为四年前出席过 Oracle 股东大会⁵¹，我今天提前赶到公司总部会议厅，看到公司出动保安力量和不少员工，并没有感到意外，这实际上表现出公司对股东的惧怕。公司董事会主席 Henley 主持会议，我巡视会场，除了主席台上的十来个董事外，还有十几名公司员工、十几名保安人员，和七、八十名股东。我宣读要求建立独立董事会的提案⁵²，引用独立研究机构 The Corporate Library⁵³的报告，指出公司在治理和高层报酬方面“高度令人担忧”：CEO Ellison 得到薪水 7 千 7 百万美元、6 千 2 百万美元股票、1 千 3 百万美元现金激励和 2 亿 2 千 9 百万美元离职补偿，President Hurd 除了薪水外，还有 7 千 8 百万美元股票、7 百万美元现金激励和 1 亿美元离职补偿，有三个董事高龄 73-82 岁，Ellison 和 Lucas 已经在董事会坐了三十多年，四个董事是内部人员，等等。别的三个股东提案也围

⁴⁸“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2012 年 3 月 21-28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⁴⁹“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NetApp 的公司治理提案”，2012 年 8 月 31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netapp.pdf>

⁵⁰“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之三：Symantec”，2012 年 10 月 23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symantec.pdf>

⁵¹“出席 Oracle 甲骨文公司股东大会”，2008 年 10 月 10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oracle.html>

⁵²

<http://www.oracle.com/us/corporate/investor-relations/proxy/orcl-2012-proxy-1851554.pdf>

⁵³ 又是它！这提示我以后可以引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成果。

绕着高层报酬批判公司的现行政策，这实际上也是每一年公司股东提案的主要要求。我们占领股东大会，也是对统治资本社会的道德审判。虽然四个股东提案都没有通过，但我们对董事会的揭露批判，赢得了不少股东的赞同：第 6 号股东提案得到 41% 的赞同；第 1 号公司提案中的董事 Chizen（过去我在 Adobe 时是 CEO）遭到 39% 的反对，董事 Conrades 遭到 34% 的反对，董事 Seligman 遭到 34% 的反对（这些人要有普通的荣辱感觉，应该自动辞职）；更重要的是，第 2 号公司的高层报酬提案遭到 59% 的反对！下面要看 Ellison 会如何反应了。

正式议程结束后，Ellison 像一个君主接受提问，用三言两语打发股东。我抓住最后一个机会，以英特尔公司、云计算技术等为例，再次问公司是否有人权政策，Ellison 象四年前一样，以“公司不是国家”回复，并干脆宣布散会！

美国国家昨天确认了下一个四年的总统，他要求业主“提供工作机会”，怕人们会去占领白宫。因为，要改变国家、企业和社会，还得靠我们更广泛的占领行动，而不少人已经开始了各种鼓动⁵⁴。今天，Ellison 关闭了沟通的渠道，我开始准备明年的占领，以一个新的人权提案来实施。

[2012 年 11 月 7 日]

⁵⁴ 例如，Richard Wolff, *Occupy the Econom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2012. Ross Jackson, *Occupy World Street*. Vermon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12.

5.3 坚守 Oracle 甲骨文股东大会的战场

我去年在“再次占领 Oracle 甲骨文股东大会”⁵⁵中介绍道：“要改变国家、企业和社会，还得靠我们更广泛的占领行动，……今天，（CEO）Ellison 关闭了沟通的渠道，我开始准备明年的占领，以一个新的人权提案来实施。”

今天是我第三次出席甲骨文股东大会⁵⁶，一位女士告诉我前排为我保留了位子，我找到 RESERVED Jing Zhao Oracle 的座位。左边年轻的女士向我问候，她来代表西雅图的 Investor Voice 股东宣读第 7 号提案，主要要求公司改变把 abstain 不表态投票算入“反对”以排除股东提案的操作。

会议比预定晚了十分钟开始，公司董事会主席 Henley 主持会议，很快就点到我了。我站起来宣读我的要求建立人权委员会的第 5 号提案⁵⁷，与我今年在惠普、高盛公司的提案类似。我同时指出董事会的反对声明虽然列出公司的人权原则和获奖（这也是一个进步），但没有可验证的实施机制，希望公司能够象英特尔、微软、惠普等那样勇于与独立的相关人权专家交流。

接着我又代理纽约的 Kenneth Steiner 宣读要求建立独立董事会主席的第 6 号提案。与去年类似，此提案引用独立研究机构 MGI Rating 的报告，指出公司的治理“高度危险”、董事资格“高度令人担忧”、高层报酬“非常高度令人担忧”：例如，Ellison 得到 9 千 6 百万美元高薪、3 千 1 百多万美元股票盈利，报酬委员会的三个委员遭到 33%-38% 的最多反对票，七个董事的任期长达 11-36 年（独立性的担忧）。实际上，第 8 号股

⁵⁵赵京，2012 年 11 月 7 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racle.pdf>

⁵⁶第一次 2008 年 10 月 10 日。见赵京“出席 Oracle 甲骨文公司股东大会”，<http://cpri.tripod.com/cpr2008/oracle.html>

⁵⁷

<http://www.oracle.com/us/corporate/investor-relations/proxy/proxy-2013-statement-2021363.pdf>

东（纽约市雇员退休基金）提案、第9号股东（劳联-产联 AFL-CIO Equity Index 基金）提案也围绕着高层报酬批判公司的现行政策，这也是近来几乎每年股东提案的主要诉求。五十分钟左右的整个股东大会，变成了对统治资本社会的道德审判。

在正式会议结束后的提问期间，Ellison 回答了9个股东的11个问题，避重就轻（“两个 President 总裁比一个好”，其实是把两个总裁都变为他的助手便于控制），武断轻率（“把减少糖分列入企业社会责任吧！”），好像企业社会责任没有内容可写），也没有对股东提供公司业务的展望。

我遗憾地注意到近年来信仰团体、工会、环境保护组织等机构基金在股东大会的战场逐渐淡出对全球社会正义的关注，势单力薄的我在“螳臂挡车”之际，不由得回顾起企业社会责任的安那祺主义先驱伯克曼一个多世纪前只身教训卡内基等资本阶级的气概⁵⁸。正如我在“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⁵⁹和“继续占领 NetApp 股东大会”（2013年9月13日）指出的那样：“与1989年天安门运动和目前的阿拉伯之春一样，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在决定我们生活的公共空间确保我们的发言权，其中之一就是占领决定全球化走向的各大公司的股东大会。”“我们以不到百万分之一的微小股份，……坚守股东大会的战场，直到寡头阶级受到基本制约、美国社会变得平等一些为止。”

[2013年10月31日]

⁵⁸散会后，一位黑人股东向我致意。那个总是为公司辩护的白人老头对我说，他的父亲1910年出生在俄罗斯，后来从波兰边境逃出。

⁵⁹ 2012年3月21-28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5.4 第四次出席 Oracle 甲骨文股东大会

四年前，我第三次出席甲骨文股东大会⁶⁰，除了宣读我的要求建立人权委员会的第 5 号提案⁶¹，又代理纽约的 Kenneth Steiner 宣读要求建立独立董事会主席的第 6 号提案。今天，我匆匆赶到甲骨文公司，再一次为 Steiner 宣读要求减少股东参与限制的第 8 号提案。

我被迎接到第一排入座，与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秘书长和 12 位董事（都是白人）对面。其实我只留意两个董事：我原来在 Adobe Systems 工作时的老板 CEO Chizen，和原中央情报局长和国防部长 Panetta/夕丫ㄋ 飞去丫，后者使我不由得想起半年前在甲骨文（分出去的）头号竞争对手 salesforce.com 股东会议上见到的原国务卿、原联席会议主席 Powell/夕么又儿将军⁶²。我过去不太理解为什么似乎自身没有多少科技含金量的甲骨文能达到这么大的规模，今天更体会到它业务的主要顾客是政府部门。

我左边的女士 Smith 代表 New Hampshire 新厂丫口夕又丁儿州的 Pax World 共同基金，来宣读她们的男女报酬平等提案（第 7 号），她同时也代表纽约共同退休基金宣读要求发布政治活动支出报告的第 6 号提案。我向她介绍我的关于人权、高管报酬政策的提案，愿意以后合作、互相帮助。轮到我时，我念完提案的全文，指出现行的“20 个以上股东连续三年持有 3%以上股份”才能提名董事的限制太苛刻，这也造成现今的治理缺欠：7 个董事年过 70、6 个董事当了 15 年以上、2 个董事受到 40%以上的否定、4 个董事是公司内部人员，等。遗憾的是，当场宣布的初步统计表明，我们的三个股东提案（和一个公司提案）没有获得多数赞同。

在正式会议结束后的提问期间，创始者/主席/技术总管 Ellison 回答了 7 个股东（其中有三个印度人）的 11 个问题。除了云计算、网络安

⁶⁰ 赵京“坚守 Oracle 甲骨文股东大会的战场”，2013 年 10 月 31 日。

⁶¹ <http://www.oracle.com/us/corporate/investor-relations/proxy/proxy-2013-statement-2021363.pdf>

⁶² 赵京，“salesforce 年会的股东提案获得通过”，2017 年 6 月 6 日。

全、与 Amazon/丫口丫尸メ厶等竞争对手的关系，还有轻松的谈笑，大概是因为近来公司业绩（特别是云计算转型成功）、股票上涨、常年以来倍遭指责的高管报酬有所下降等令股东满意。我们的提案中表达出来的治理担忧暂时还没有显露出来。

[2017年11月15日]

5.5 第五次出席 Oracle/甲骨文股东大会

今天，我匆匆赶到甲骨文公司，第三次代表 Steiner 宣读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的第 5 号提案。会场大约有二十多人董事和高管、三十来人股东出席。

我进入会场第一排入座，与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秘书长和 13 位董事对面，注意到我原来在 Adobe Systems 工作时的老板 CEO Chizen，和原中央情报局长和国防部长 Panetta/々丫ろゝ去丫。我再次遇到在 Gilead 股东年会遇到的 Lee 女士⁶³，她今天代表 New Hampshire 新厂丫口々又丁 | 儿州的 Pax World 共同基金，来宣读她们的男女报酬平等的再一次提案(第 4 号)⁶⁴。

会议迟到了几分钟开始，前三个公司的必须有的提案很快通过，就轮到我们的股东提案。Oracle 实际上还是由创始者、现任董事会主席兼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的 Ellison 控制，他的下面安置了两个 CEO 当助手（其中一个上个月刚死去）。我站起来念完提案的大意：CEO 报酬 1 亿 8 百万美元，是普通员工的上千倍；去年的股东大会只有刚过半数的 53% 勉强同意公司的高层报酬提案，而一般是 95%；董事当中，报酬委员会主席遭到 39% 反对，别的董事也遭到 38%、31%（々丫ろゝ去丫）、23%、23%（Chizen）反对，远高出一般当选董事的反对率（10% 以下）；6 个董事已经当了 18 至 42 年；以前的股东大会的董事会主席独立的提案得到 44% 赞同，意味着去掉内部控股后多数股东赞同董事会主席独立。

当场宣布的初步统计表明，我们的两个股东提案还是没有获得多数赞同⁶⁵。在正式会议结束后的提问期间，只有一个女士颇为表演式地讲了一些尴尬笑话。全体会议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⁶³赵京：制药公司作为美国政治舞台-Gilead2019 股东年会，2019 年 5 月 8 日。

⁶⁴赵京：第四次出席 Oracle/甲骨文股东大会，2017 年 11 月 15 日。

⁶⁵ 第 5 号提案得到 35% 股东赞同。（补充）

美国失控的高层报酬已经成为社会公害，包括 Warren 在内的民主党候选人也把限制高层报酬作为竞选公约提上议程。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刊登超级富豪“股东活动家”（不提交政策提案而是直接要求加入甚至更换所有董事会）Carl Icahn 的意见文章，反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改变政策，加重对向股东投票提供意见等服务的机构的法律责任。我一直感到小股东的企业治理政策的提案权利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可能，更加珍惜这个美国货真价实的经济民主法规。我也已经向8家公司提交了减少高层报酬的提案，要求付诸明年的股东大会表决。有幸战斗在作为美国社会经济政治战场前沿的硅谷，任重道远。

【2019年11月19日】

6 美国大选刚过的 Sun 升阳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

美国 2008 年 11 月 4 日历史性的的大选刚结束后，股票市场第二天迅速反应，综合性的道琼斯指数 Dow 下降 5%，科技指数 Nasdaq



下降 5.5%，给得意洋洋的奥巴马一个下马威。从一年前的\$22.84 降到今天的\$4.62 股价的 Sun Microsystems（升阳）公司的股东大会今天召开，管理层（board of directors）面临三项股东的提案挑战。

第 5 号提案以 Sun 的 CEO Schwartz 私用公司直升飞机和由公司支付他的住宅警备系统为例，要求管理层设立程序，让股东在年会上就高级主管的报酬表达意见。他今年的报酬（在砍掉一半的红利后）是 7 千 7 百万美元。一个越南裔女士代表股东宣读此提案。类似提案在硅谷的各大公司逐渐提出，在今年 3 月的 Apple 苹果股东大会上得以通过，但在上个月的 Oracle 甲骨文公司股东大会上被否决了。⁶⁶今天，有 305,122,586 股赞同，146,782,938.50 股反对，5,015,777.50 股弃权，⁶⁷通过了这一提案！记得两年前，我第一次来 Sun 参加股东大会，在会议快结束时，几位高龄者站起来诉苦，说他们信任 Sun，没有抛售不断下跌的股票，现在面临退休生活的困境，颇为动情。此举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把 Sun 的创始人 McNealy 从 CEO 的位子上赶了下来。

⁶⁶ 见笔者“出席 Oracle 甲骨文公司股东大会”<http://cpri.tripod.com/cpr2008/oracle.html>。“除了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形式的董事选举（第 1 号提案）和独立会计行选择（第 3 号提案）外，唯一引起争议的是关于高层主管的报酬问题（第 2 号和 4 号提案）。”

⁶⁷ 数字引自 Sun 公司网站
<http://www.sun.com/aboutsun/investor/events/shareholder08.jsp>。

第 6 号提案要求就股东权利修改公司章程 Bylaw。可惜提案者没有赶到会场，算自动作废，放过管理层一马。

第 7 号提案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其中特别提及 Sun 提供关键技术给中国的“防火墙工程”帮助政府监控信息情报。宣读提案的年青白人还沉浸在昨晚的大选兴奋中，不时用“变化”一词来要求公司在人权议题方面也“变化变化”。我利用大会规定的每个股东可以发言一次的机会，代表我自己和拥有少量股份的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以十几年来自己遭受中国、日本和美国政府迫害和刁难的政治难民经历，提醒股东和公司管理层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的社会责任推给任何政府部门。此提案有 20,558,812 股赞成，393,525,200 股反对，42,837,390 股弃权，没有通过。主持会议的公司主管表示公司会注意人权问题等等。

虽然已经由“升阳”变为“落日”，以监控信息流通的技术和产品为主的 Sun 在 2008 年的产值依然有 12 亿 3 千 9 百万美元，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它在中国或世界上的人权政策和社会责任，不容忽视。

[2008 年 11 月 5 日]

7 死气沉沉的 JDS Uniphase 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

美国 2008 年 11 月 4 日历史性的的大选结束后，一周以来，股票市场连续下降。JDS Uniphase（纽约交易代号 JDSU）今天股价下跌 25%，只有 \$3.19。我上午 9 点按时赶到公司股东年会的会议室，共有 50 人左右出席。会场几乎全是白人面孔，只有两个中国人：除了我，还有一个年青中国人。JDSU 在 2000 年 2 月 28 日股价达到 \$1120，人手不足，雇用许多简单体力



劳动者赶制光通讯设备，成为泡沫经济高潮的象征之一。现在这样的状况，迫使 CEO Kevin Kennedy 主动辞职，公司正找不到后任。会场上死气沉沉，很快通过了三个公司提案。我不想此时打击管理层的士气，也没有发言。

正式议程结束后，只有三个股东举手发言。第一位确认了一个简单问题；第二位代表一个投资公司对 CEO 的报酬提问：为什么 CEO 本人要参与报酬委员会？主持会议的公司代表解释了一下，并表示会考虑修正。我最后发言，指出公司在北京、深圳设有工厂，2008 年 6 月在中国资产为 \$4280 万，仅次于美国的 \$11510 万，又为中国电讯、华为等提供设备，是否遇到和想到人权议题？Kennedy 态度诚实地解释，公司至今为止没有特别关注人权问题，但会遵守相应法律。会后，我与他交换名片，表示愿意帮助公司避免 Yahoo 那样的过失。公司的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Andrew Pollack 过来与我交谈，解释说公司没有专门就中国设立人权政策，但会遵守普通的人权世界原则。看来，我参加股东会议的目的达到了。

原定两个小时的会议，45 分钟就结束了。那个中国人过来谈话，说我的发言是“politics”。我告诉他，我们关注的 corporate governance 是 business 的核心。

JDSU 还算是个大型国际企业（2008 年产值 12 亿美元，员工 7 千人左右），而且，它在中国的业务比重越来越大，其人权政策和社会责任，值得关注。

[2008 年 11 月 12 日]

8.1 在 Cisco 思科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上关注中国人权

Cisco Systems 思科公司 2008 年产值约为 400 亿美元，其中除日本以外的亚太地区约占 11%。以今天的\$17.26 股价，Cisco 有 1015 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与硅谷的另一巨头 IBM（1131 亿美元市价）差不多，比硅谷的另三巨头 Google（981 亿市价）、Intel（802 亿市价）、H-P（777 亿美元市价）高。



我今天上午略微提前赶到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第一次参加 Cisco 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当我刚入大楼门口时，一位站在边上的男士盯着我用手机报告。我意识到是我每次出席股东会议穿的印有“中国需要人权！”“释放宗教政治犯！”和民主女神像的运动衫吸引了他。没有人阻碍我入场，我扫视了一下会场，约有一百人左右出席，几乎全是白人面孔。我注意到另一个中国人：Yahoo 雅虎的 CEO Jerry Yang 杨致远，他也是 Cisco 的董事 (board of directors) 之一。

主席台上坐了三个头头：CEO John Chambers、CFO Frank Calderoni 和 Senior Vice President Legal Services, General Counsel & Secretary Mark Chandler。我在第三排的一个过道位子坐下（以便发言），Chambers 过来与前边的头头们握手，顺便也向我伸过手来。

我迅速浏览会议规则，马上意识到主持者设立了许多限制不让股东发言，所以首先得建议修改会议规则。Calderoni 宣布会议开始后，我在纸上写下要求在第 3 提案（建立人权委员会）和第 4 提案（互联网状况报告）后发言，举手等待。一个女士过来，问明我的要求，就请我出去。一位男士过来，递上名片，他叫 Terry Alberstein，是 Senior Director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他讲他在中国为公司设立办事处，也去过清华等等，想

拖住我，不让我进入会场。我告诉他，我投完票后再与他交谈，就返回座位。台上是一个女士在宣读第4号提案，我已经错过了第3号提案宣读后发言的机会。

第4号提案专门引用Chandler在2006年2月15日与Yahoo、Google和Microsoft四网络巨头公司的头头们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说明Cisco公司为中国的全国性网络“防火墙”提供核心技术监视中国民众，出卖了公司的价值，因此要求公司每半年向股东报告情况。那位女士宣读完后，我再次举手并站立起来，把会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Alberstein再过来，试图说服我不要发言，我感到血气往上涌，大声告诉他：“我今天来开会的目的就是来讨论这些事关人权的议题。你可以把我赶走，也可以叫警备来逮捕我，但今天的股东大会就无效了！”Chandler在主席台上赶快插话：“请他讲一两分钟！”我介绍自己的身份：出身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所长和人道中国负责人，同时是十多年来没有国籍的政治难民。这是一个普通的例子说明北京当局没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在这样的国度做生意必须遵循联合国人权宣言等基本原则。同时，也不能指望美国政府去保护中国人的人权，因为美国政府几年来对身在美国的我也进行刁难迫害。象Cisco这样的大公司，其产品直接地影响到千万人的生活，应该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否则，5到8年以后，中国实现了民主化，Cisco将被赶出中国。

在Cisco的约59亿股份中，11位董事都得到近50亿股信任票，只有杨致远只得到28亿股信任票，有21亿股反对他。第3号提案有近3亿股赞成、30亿股反对，未能通过。第4号提案有11亿股赞成、23亿股反对，也没有通过。会议的正式议程（投票）结束后，Chambers做了较长的公司展望报告，在关于公司的中国业务和“社会责任”部分，Chambers两次走下主席台来到我的座位前，似乎在向我一个人解释，提到Cisco帮助中国的“中产阶级”和民主化等。我也有礼有节地回复说：“我来自四川，感

谢 Cisco 对四川地震的人道捐助”。后来有人提问，能不能不到海外去做生意？Chambers 说不可能，但会注意人权问题和相关法律。⁶⁸

会议结束后，Alberstein 等在门口，前来问候，说欢迎我随时访问 Cisco 公司。我有意多站了一会儿，似乎要拿饮料。果然，Chandler 过来，与我交换名片，并说他在匈牙利也遭到互联网自由的问题。我送给他刚出版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并以 Yahoo 拒绝讨论人权问题受到的可耻失败为例，希望 Cisco 公司应该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交换意见。他表达了对对话的愿望，我说会约好几名在硅谷的中国民主运动朋友，访问 Cisco，与高层主管们探讨公司在中国的人权政策。

Chambers 报告中提到有一家股东 Christian Brothers 提交了关于高层主管报酬的提案，但经过与公司管理层的交涉后，满足于公司的解释，就取消了提案。这至少表明 Cisco 愿意听取股东意见。我两次向 Yahoo 提交股东提案，被 Yahoo 雇用外面的大型律师公司刁难，拒绝付诸大会表决。在下次访问 Cisco 公司时，我也会准备一份关于中国人权的提案，看公司能否诚实地对应并提出满意的答案。如果 Cisco 确实比 Yahoo 有远见，我们会提出建设性的方案，也为公司的将来着想，鼓励其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2008 年 11 月 13 日]

⁶⁸ 今天会议的场录像可从公司网址 <http://investor.cisco.com/eventdetail.cfm?EventID=61488> 看到。

8.2 中国民权运动⁶⁹的新战略尝试

2009年12月22日，我再次向Yahoo雅虎提交付诸2010年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国人权提案，其内容与我向Google谷歌、Boeing波音、Chevron雪佛龙、H-P惠普、News Corp.新闻集团等大公司提交的提案类似，包括两点：公司的产品和技术不得违反用户的基本权利、设立一个人权委员会⁷⁰。

2010年1月4日，我接到雅虎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副总律师Christina Lai 回复，称我的提案有两点不符合美国Security & Exchange Committee (SEC, 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信件和股份证明日期是12月17日但公司12月22日才收到、提案有两份⁷¹。我1月8日回复到：一、我的股票交易公司17日发出股份证明，我也同日准备好提案，5天（其中包括周末两天）后我收到股份证明立即发出，雅虎公司也同天收到，符合常识；二、我的提案只有一个，就叫“雅虎在中国业务的人权影响”，只不过包括两要点而已，为了消除雅虎雇用的律师行的恶意误解（雅虎总是雇用同一个律师行O’ Melveny & Myers LLP对付我这个微小股东），我把两要点放到同一段落⁷²。

2月9日，我接到O’ Melveny & Myers发来的27页传真，是律师行传给SEC的附件，代表雅虎请SEC就雅虎排除我的提案行为“不采取行动”，其理由还是1月4日对我的回复提到的两点。我想，SEC也会读到我1月8日的回复，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虽然SEC已经让我失望过几次，我对SEC律师的公正和知识还保持着期待。

3月30日，在收到SEC的通知之前，我接到雅虎董事会的用于股东大

⁶⁹ 这里用“民权”包括民主、人权、公民权（维权）等多种含义，围绕“权利”rights（而不是政治性的权力power）展开。

⁷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Yahoo_Resolution.pdf

⁷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Yahoo_Zhao_100104.pdf

⁷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Zhao_Yahoo_100108.pdf

会的正式反对我的提案的声明⁷³，其中包括明显误导股东的内容。4月2日，我不得不向 SEC 报告，特别指出雅虎用来敷衍股东的“雅虎人道基金”早已被误用、滥用成某一个人的私人政治黑箱。没想到，这一次 SEC 反映神速，当天回复雅虎并转送我，附有 Attorney-Advisor 顾问律师 Alexandra Ledbetter 的 informal views 非正式意见，认为雅虎的意见 appears to be some basis 好像有一定基础，所以不建议就雅虎排除我的提案行为采取行动⁷⁴。虽然，SEC 同时说只有法庭的判决才有正式效力，但我这样的微小股东怎么可能为此提案与雅虎和其雇用的律师行到法庭上打官司？SEC 这样的偏袒大公司的行为正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往往读到：某某公司出事后才发现早有人报告过问题了。但我不可能同时在此追究 SEC。当然，SEC 把这样的决定放到网上，也算是一种补偿，让相关的人知道雅虎等公司用什么原因拒绝了多少提案。我查过一次，注意到各大公司每年都要拒绝几个股东提案。

与此同时，我时时在思考全球化格局下以自己仅有的微弱资源推动民主、人权、民权事业的新战略。

我以政治学访问学者的身份逃出日本来到美国，从威斯康星大学搬到硅谷后，又参加了许多进步政治组织和活动，学到许多从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受益匪浅，但总是遇到局限，特别无法贡献出自己的知识，没有独特的价值和主动性。有一次，我随反战人士们在圣塔克拉拉会议中心的大厅外抗议到硅谷来募款的小布什，与被临时动用的当地警察和马队对峙。我们不断向警察喊话，要他们保护人民、而不是保护大厅里的杀人犯（至少是嫌疑犯）。实际上，爱达华州的几个天主教徒就在警察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替天行道”按照州法律，要暂时逮捕来讲演的发动战争嫌疑犯卡尔·洛夫（小布什的“导师”）送交警察，结果反而被警察逮捕。因为正是世界上的那些国家“万户侯”粪土们握有权力和资本。我注意观察前面的警察，像个刚毕业的高中女孩子，一方面为把我们隔离的政治制度悲

⁷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Yahoo_Zhao_statement.pdf

⁷⁴ <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cf-noaction/14a-8/2010/jingzhao040210-14a8.pdf>

哀，一方面也感到自己的无力，更一定要避免与被国家制度雇用的下层警察、士兵等“阶级兄弟姐妹”冲突。硅谷作为全球化的发源地，也吸引着全美和全世界的政治和媒体，每当我读到“雅虎创办人与江泽民出席财富论坛”、“胡锦涛访问微软、波音”这样的垃圾新闻时，总在想：用什么方法以最小的资源把民主、人权、民权的 agenda 议程提到全球政治、媒体的 headline 头版头条呢？

在硅谷，政治家没有多少全球影响。我为圣塔克拉拉县/郡和圣何西市的官员们义务打工，还参加过六个星期的西班牙语培训（因为墨西哥后裔是硅谷的最大人口），2003 年获得过县“硅谷杰出移民”的表彰。我从他们那里也学会不少美国地方政治的知识，特别对于在县厅里开会利用地方政府反对（小布什）联邦政府的战争、移民等一系列政策感到新奇，很希望有一天能移植到中国。本选区的国会议员 Mike Honda 本田等人也不错，为我写信给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起码防止了他们把我也列入“恐怖嫌疑”的名单。但是，归根结底，美国政治家们要面临选举，我这样的流亡思想家没有资金和时间，不可能是他们的 diehard 铁杆支持者，他们也不可能对中国和全球事务有足够的知识、关心和支持。

但是，这里是硅谷，有的是全球瞩目的大公司，如果能够影响他们的政策导向，会达到比许多国家政策更深远的影响。如何能以最小的资源把民主、人权、民权提到 corporate governance 公司治理的议程上呢？我最后想到了股东大会。其实，Ralph Nader 这样的媒体宠儿从八十年代已经在关注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了。

自从我 5、6 年前把退休基金转换成公司股票并选择性地批判、帮助一些大公司改善他们的人权事务以来，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开始取得了一些效果，在此与大家分享，希望有识之士也向我这样，共同来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我发现的最大“秘密武器”是 SEC1934 年制定的 Rule 规定 14a-8 “Proposals of Security Holders” “证券持有者提案” 第 2 问“谁能提交提案”中，规定 must have continuously held at least \$2,000 in market value, or 1%, of the company's securities 必须连续持有至少两千美元市场价值或者 1% 的公司股票。这是美国经济民主的最重要的

法规，只要持有价值两千美元以上股票一年以后，任何小股东都有法律保障的权利提交提案要求公司付诸年度股东大会表决！回想过来，如果美国民众都知道这个法律知识，以此为武器参与股东大会和企业治理⁷⁵，美国的实体经济哪会被所有的大公司掏空？美国的金融哪会华尔街等大公司如此轻易地出卖？这实际上也是几乎所有公司律师以及被公司雇用的律师行最害怕的法规，我在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充分感受到他们为了回避这个法规所用的诡计和阴谋（有时候他们以为我不懂法规，也很愚蠢可笑）。本文开头雅虎的对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他们并不能总是得逞。

当我今年以千万分之一的股份成功地把中国人权提案摆到谷歌、雪佛龙的股东大会上，得到数以千万计的股东的赞成（对于不赞成者，也是一种宣传）时，这是多大的公共教育成果啊！⁷⁶比起“股神”巴菲特的区区百分之几的回报，我得到了千万倍的回报！

但我们不能以此满足，更大的目标是实质性地改变那些拒绝变革公司的政策。

另一方面，中国民主、人权、民权、人道事业几乎都因为资金短缺无法进展。唯一有充足资金的是前面指出的雅虎人道基金，却被误用、滥用。作为安那祺主义者，我本来对所谓“法律”很轻视（为此在日本连人身安全也不保），对公司法更是门外汉，哪里去找义务提供法律帮助的罗宾汉去与公司交涉呢？我只好向香港的战友长毛或世界上那些环境保护者学习，实践安那祺主义的“直接行动”，冒着被赶出会场或被逮捕⁷⁷的可能，在 Cisco 思科 2008 年股东大会上当场挑战公司的头头们（以及坐在我前

⁷⁵ 美国每年有 1 万 3 千多股东大会。SEC Votes to Seek Public Comment on U.S. Proxy System, #2010-122. www.sec.gov/news/press/2010/2010-122.htm

⁷⁶ 见 http://investor.google.com/documents/2010_google_proxy_statement.html 和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evron100201.pdf>。当然，迫使他们实行政策转换的因素，远远超出了我的力量，但这几年的经验教会了我做出正确的决策，帮助他们。

⁷⁷ 我 2006 年就师涛等事件伴随“记者无疆界”等访问雅虎总部时，被保安阻止，并声称要叫警察来逮捕我们。

排的雅虎创始人)⁷⁸，在谷歌 2009 年股东大会上抗议主持人专横而退场⁷⁹。我一点也不感到孤单，也不在乎任何人的反对，因为我知道自己所代表的事业和广大的没有权利直接面对公司头头们的民众。当然，我也在期待理解 and 帮助，我的信息已经成功地传送到全美国相关群体，罗宾汉会出现的。

成功地完成了雅虎人权案件的 Morton Sklar 律师开始逐渐与我联系，教会了我许多新的领域、弥补了我的短处。我们决定对思科立案，帮助思科改变特别是中国政策。3 月 2 日，我致函思科，提交 2010 年股东大会的提案，要求公司遵守美国相关法律（包括天安门法款），在中国执行尊重人权的政策⁸⁰。老练的 Sklar 同时向当天举行的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人权与法律分会举办的听证会提交书面材料，提请国会关注美国公司在互联网方面违反人权的状况，特别提出思科在中国的例子，以备后用。

3 月 10 日，我接到思科 Senior Corporate Counsel 高级公司律师 John Platz 的回复，说我的提案好像包括了 3 个提案，词数也超过 5 百。这个要求并不苛刻，我 3 月 12 日马上修改、回复思科。经过断断续续的通讯往来，最后确认由 Director of Global Investor Relations 全球投资者关系部门主管 Laura Graves 代表公司与我们交涉。以下是我 2010 年 6 月 29 日的电邮⁸¹。

Graves 女士：你好！

感谢你 6 月 22 日的电子邮件。为使我们之间的会谈对话顺利进行，我花了一些时间准备问题、列出提案未包括的其他关注事项，也再次查阅了和 O' Halloran 女士之间自去年来的通信，特别是她 2009 年 7 月 24 日电邮中对我提出的一些关于思科政策和做法对中国人权所具负面影响的问题的回应。

⁷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cisco.pdf>

⁷⁹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google-c.html>

⁸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isco.pdf>

⁸¹ 谢谢 Xuefang Huang 的翻译。

我关注的根本问题是，思科通过向中国政府提供技术使中国执法机构能够监控和追踪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电子通信从而支持和帮助了中国政府对运用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权利的中国民众的逮捕、刑事起诉和长期拘押。这些问题我和其他股东在股东会议上及股东提案中都提出过。美国国会在听证会上也表示过关注，比如，2008年5月18日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展示过有关思科向中国执法部门非法销售出口互联网监控产品及技术的一些书面证据，并成为公共档案的一部分。

思科违反美国出口法向中国执法部门推销、销售、出口产品和技术，使互联网相关的人权侵害在中国成为可能。这些产品和技术，比如电子通信路由器，是中国执法部门正在广泛使用并依赖之的互联网活动监控手段，以识别和找出在政治或宗教上虽然本质和平但为中国政府所不愿见的电子通信。有一次，我和我在中国的家人打电话，我提醒家人不要谈及敏感话题，正在监听我们通话的人突然跳出来打断我们：“你不高兴（我们监听）？小心点！”

对我、其他股东、美国国会提出的问题，思科作了回应，采取了一些一般性措施，比如采纳了《供应商行为准则》并在2008、2009年分别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于思科对华产品销售问题，思科回应说思科并未对销往中国的产品进行“定制”或为其产品增加特殊的监控性能、思科在“全世界销售同样的设备、思科的销售符合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 全球网络倡议关于人权问题制订的行为准则。然而，这些回应并未回答我所提的问题。举个例子，尽管思科主观上想按全球网络倡议的行为准则行事，但却在制订该准则的途中退出，而且从未正式提及思科对 Global Network Code of Conduct 全球网络行为准则的承诺。众议员 Durbin 也特别提到，在他与思科就最近于2010年3月10日举行的国会听证会进行联络时，思科不仅未能并且拒绝采纳全球网络行为准则。我的理解是，思科没有接受众议员 Durbin 关于参加听证会并提交证词的邀请，而且思科也没有对他要求思科提供对华销售特定信息一事做出回应。这些作为很难支持思科关于已按既定人权标准从事经营的说法。

类似地，对众议员 Durbin 在2010年3月2日听证会上发言表示思科

的产品将帮助中国执法部门监控及跟踪中国宗教和政治异议人士的电子通信这一事宜，思科回应道思科不应对其中国附属公司的行为负责。在证据显示思科和中国人权侵犯事件明确相关、思科违反美国出口法律有意支持中国的互联网监控活动的情况下，试图回避实质、向国会表示思科美国总部不应对其中国雇员代表的营销行为负责任，是不合适、不负责任的做法。

思科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未涉及以上任何一个关注点，也未涉及我在股东提案中就思科对华营销和出口导致的负面人权影响而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这些报告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与其他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相比，十分微不足道。而且，仅就报告里关于人权的简短陈述而言，也未涉及思科产品和技术是否相当可观地帮助了中国侵犯互联网相关人权这一核心问题。在 2008 年股东会议上，Chambers 先生对我和其他股东说思科对中国的人道救济贡献巨大。对此我尚未有机会回应他。事实上，在中国，即便人道主义活动也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思科帮助中国人道主义救济活动的良好愿望实际上更多地帮助了政府，而非民众。举个例子，2008 年，成都的黄琦帮助将我们人道中国的救济金和大米直接发给地震受害者，却遭到逮捕而后又被判入狱三年。我希望我们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并探讨思科如何能够更实质地、有意义地处理它们。

具体而言，我期待得到思科对以下问题的回应和信息：

1、确保我的股东提案能够包含在股东大会的投票里。董事会是否已经就我的提案开会讨论？董事会对此有何声明？

2、自 2007 年来思科对华营销、销售、出口的产品以及购买机构的清单；

3、思科采用何种方法评估上述产品的营销、销售和出口符合《美国出口管理法案》所设标准，尤其是刚颁布的《产业安全局规则遵从方针》对每一个销售和出口产品都要求进行最终用途和终端用户评估的规定？

4、思科已采取或计划采取何种机制和程序以处理企业社会责任（有关企业行为在中国及其他压制政府下对公民权和人权领域的影响）？请详

细说明。具体而言，思科是否制订有《行为准则》？能否提供一份使用中或考虑中的相关标准的复印本？哪些管理人员、什么程序负责监督这些标准的实施，以确保思科产品不会被滥用于支持对人权的侵犯？

5、为何思科还未采纳全球网络倡议制订的行业行为准则？

6、思科将采取何种控制措施，确保附属公司及雇员不会继续使用与2008年5月已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公开并显示思科产品帮助中国执法机构利用互联网打压政治和宗教异议人士的营销材料相类似的其他营销材料？

7、自2007年起，思科的代表和销售团队参加过什么市场营销会？在各个营销会上，都营销什么产品，售出什么产品？请提供营销材料的复印本。

8、思科有否与了解中国人权及商业并有联系的外部专家展开过对话？思科在中国与哪些非政府组织合作？

我期待能与你们当面谈。我在人道中国的一些同事将一起参加。

赵京

7月19日，我与人道中国的理事周锋锁、张前进，以及专程从华盛顿飞来的Sklar（他已经接受邀请成为人道中国的顾问）一起赶到思科，与Graves和另三位主管法律事务的官员会谈。这大概是我们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与美国大公司第一次就中国人权问题的直接交谈，感谢当代罗宾汉Sklar，我们取得一定的进展、受益匪浅。从我的7月23日电邮中⁸²可见会谈的重要意义。

Graves女士，你好：

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和你及其他思科官员在周一（2010年7月19日）

⁸²谢谢 Xuefang Huang 的翻译。

就股东关注问题，也即有关思科交易将导致帮助中国政府监控电子通信、造成许多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网民被逮捕和判刑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期待在你提议的8月份的跟进会议上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实质性地处理。

大约12年前，我刚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搬到硅谷时，为《人民日报》的一个代表团（代表团中的一位编辑是我朋友）与包括思科和雅虎的一些硅谷互联网技术公司会见时提供过翻译服务。自此，我总是热切盼望能够回到中国，欢迎这些公司并协助推广它们在我的祖国——中国的工作。不幸的是，受天安门广场事件和其他严重侵害人权事件的影响，我至今不能回到中国从事这些工作。因此，和你们碰面并与你们在解决电子通信监控压制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为我以及其他和我一样受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直接影响的同胞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替代机会。

更早以前，当我1985年参加研究生考试并从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获得唯一公派出国读社会学的奖学金时，我的目标是学成后回国“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天安门事件之后，我是唯一被取消奖学金（及公民身份）并被赶出日本大学的中国学生。那时驻东京的中国公使唐家璇协调日本政府出卖我们在日本举行的人权运动，后来竟因此被提拔为中国的外交部长（详见“出卖民主：天安门在日本的阴影”，网址：<http://www.isn.ethz.ch/is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ord588=grp2&ots591=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en&id=110634>）。这是为什么我总是提及当前中国统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并希望所有在中国的国际企业意识到这个政治现状的原因。我们人道中国和我们工作联系中大量的人都有独特的直接的在中国被侵害人权的经历。这些经历我们希望能和你及其他思科高层决策者分享。这也是为什么我向思科和其他公司提交股东提案的原因，我想协助确认美国技术企业不会无意参与或帮助发生在中国导致我流亡在外、导致许多人权/公民权运动参与者受难和被判刑的人权侵害行为。基于这些原因，我非常感谢你们将把我的股东提案纳入思科本年度股东会议中的决定。

按你的提议，我们八月份再会面时，我希望我们能够取得有意义的进

展，思科能够采纳人权标准和国际机制，确保公司行为和政策对人权的潜在影响能够被监督和评估，相关交易信息能够向股东和公众披露。我们相信这些措施不会对你在会谈时提及的公司保密性和竞争力造成伤害或导致削弱。我们期待与你一起合作。

首先，我们希望你能就我们在会谈时及会前在电邮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向我们提供更多具体的信息和明确的回答。按你提议，我们接下来将向你和其他思科高层决策者提供有关我们在中国的经验和联系网的背景信息，以帮助你理解我们所提议的并已在我的股东提案中说明的采纳信息披露机制、人权遵从标准、国际监督机制的重要性。这将包括一些政治和宗教压制的近期信息，中国怎么继续并扩大使用电子通信监控措施，以及一些中国的互联网和无线网用户因此被判刑入狱的例子。根据你的要求，我们也将向你提供一些包括信息披露和人权评估方法在内的行业“最佳实践”例子。美国商业部产业安全局最近发布的遵从手册中包含了其中几个例子。谷歌最近将“不作恶”作为其在中国互联网审查方面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个努力，虽然执行和结果还都不理想，是试图解决问题的另外一种负责任方式。供你参考，我已经将对谷歌的股东提案和谷歌在本年度股东大会上的声明放到了网上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google_proxy.pdf。雅虎采取措施设立人权顾问组和特别人道基金为中国电子通信相关的人权受害者提供帮助，也值得思科考虑。

当思科的有关高层官员准备好参加你提议的8月份的跟进会议后，请尽早通知我们。我们期待与你们交流更多信息，进行更多讨论。

赵京

当然，我们并不盲目乐观。要最终帮助思科实现人权政策的转换，面临比对雅虎更艰难的斗争，还需要别的股东、用户、公众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包括股东大会以外的交涉、抗议等）。我们希望，这样的经历会对别的人士有所启发，共同或各自展开新的案例，从企业社会责任这

一场战线，开辟民主、人权、民权运动的新天地。在这场全球性的中国民权运动中，我们要启发、唤起、动员所有资源，监督、帮助所有在中国从事生意的国际公司，至少要象谷歌那样“不作恶”；更进一步，还要监督、批判、帮助所有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改善政策、遵守人权等普世价值。只有这样，全球化才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2010年7月26日]

8.3 推动 Cisco 思科人权政策转换的谈判纪实⁸³

2010年9月3日思科公司的股票以21.04美元收盘，以它的1196.8亿美元的市场价值，我的193股约占思科三千万分之一的股份。我以几乎同样微小的股份在今年谷歌、雪佛龙的人权政策转换中扮演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功能，也迫使新闻集团不得不把我的人权提案放入今年10月15日的股东大会付诸表决⁸⁴，但我今年最大的目标是实质性地改变一直拒绝变革的思科的人权政策。

自从7月19日，我、周锋锁、张前进和 Sklar 与思科 Director of Global Investor Relations 全球投资者关系部门主管 Graves 和另三位负责法律事务的官员会谈以来，我和 Sklar 又致函 Graves，重申我们的关注要点。但原订定跟进会议的8月11日过去了，Graves 还没有回复我们，使我怀疑思科是否愿意继续与我们会谈。不久，我又接到 Senior Corporate Counsel 高级公司律师 Platz 署名8月23日的快件，是思科用于股东大会的反对我的提案的董事会声明。Sklar 紧急地联系 Boston Common 基金等别的股东，我开始准备在股东大会的前一个小时，在同一会场的斯塔克拉拉会议中心租用一个小间举行记者发布会。

8月25日，我意外的接到 Graves 的电话。她除了恭维我外，大肆攻击 Sklar，说 Sklar 别有用心，另有 agenda 议题。我心里好笑：“去年没有 Sklar 帮助，你们用一个普通公关员工就把我打发了！”我郑重声明：Sklar 是我的法务代表，我们两人都围绕着我的股东提案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帮助公司而已，并问她是不是要求我把 Sklar 排除在外？她急忙否认，说欢迎 Sklar 参加下一次会谈。其实，我已经预备好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名义买下了30股思科的股票，请 Sklar 担任研究所的律师就成为思科的股东。Graves 又说我们的会谈不是公共事务，

⁸³ 此文接续“中国民权运动的新战略尝试”http://cpri.tripod.com/cpr2010/rights_strategy.pdf。

⁸⁴ https://materials.proxyvote.com/Approved/65248E/20100816/NPS_65902/HTML2/default.htm 第4号提案。

我答应不再邀请不熟悉思科业务的人道中国的同事们赴会。她最后还请求我撤销提案，我说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约好9月3日举行下一轮会谈。

我和从华盛顿飞来的 Sklar 设想了几种可能，联系到思科已经拒绝了与 Boston Common（去年以5万股份提交一个非常卑微的提案，得到30%股东赞成）的第二次会谈，预感到这将是我们与思科在股东大会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谈，而且事态严峻。除了记者发布会等准备外，我们意识到最后的手段（耗时的法庭恶战）似乎不可避免了。我对此既无经验，又担心自己的软弱天性不忍心与思科对决。我回复朋友到：我可能要成为“思科之敌”了。

我们提前到达思科总部，在11点整由一男一女导引进入会议室。我马上意识到事态超出预想：除了提升为 Sr. Director of Global Investor Relations 高级主管的 Graves，还有 Executive VP of Worldwide Operation 全球运营执行副总裁 Robert Lloyd、Sr. VP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公司通讯高级副总裁 Blair Christie、Director of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 持续商务实践主管 Kathy Mulvany，还有大屏幕上的 Secretary 秘书长 Mark Chandler 和 Government Affairs of Washington DC Office 华盛顿办事处政府事务主任 Paul Redefer。我立即认出在思科2008年股东大会上“不打不相识”的 Chandler⁸⁵，这是思科实际决定、领导政治（人权）事务的最高官员阵营了。

Graves 首先请我介绍我的背景。我感谢思科给我这个机会，简述自己从重庆三中（现最好的南开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核物理与美、苏对抗；在大学期间受希腊、罗马、启蒙主义等影响，参与、策划学生会自由选举等，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发配兰州，幸好毕业时考取全国唯一的社会学专业留学研究生；在日本主办留学生杂志宣传民主人权，因为组织89民运成为唯一被停止奖学金、被中日两国政权赶出学术研究机构（虽然最先得到大阪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并最终不得不与家人逃亡美国过了十几年的无国籍流亡生活。我提及

⁸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cisco.pdf>

这些经历让思科的首脑们意识到在他们决策时要注意当前中国统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表示正是我这样的对政治自由的追求，才延续美国的建国理念，而作为世界最大通讯公司的思科必须尊重自由民主人权。Sklar 接着再次从最新的美国政府法规等角度说明思科的问题，提到诺基亚因为出售敏感设备给伊朗被起诉的消息，而我们完全是在帮助思科防止发生雅虎、诺基亚这样的大问题。我交给他们 4 页反驳思科董事会 8 月 23 日的反对声明的材料，引用雪佛龙公司在 5 月股东大会上对我的提案的令人满意的声明，指出我们提案的精髓是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人权和跨国公司问题的特别代表 John Ruggie 在人权理事会今年 4 月 9 日第 14 次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from “naming and shaming” to “knowing and showing” 人权尽职调查：从“外部点名批判和羞辱”到“内部检点和公开化”。

Chandler 显然有备而来，说他在秘书长的位子上已经工作 9 年，对于思科的扩展人类通讯的使命、在中国做生意的伦理、1991 年国会禁止销售通讯设备的天安门法案、原则与现实的矛盾、政府与企业的不同、思科 by choice 自动选择只出售标准设备而没有为用户个性化、最近印度也限制信息自由等，都讲得头头是道，令人耳目一新，明显比他在过去的国会听证、新闻发布会上的逃避实质、抵赖事实态度大为改观。他特别解释说我们对思科产品的技术特性理解不准确，而中国政府最近在 MLPS (Multi-Level Protection Supplier) 方面的特别要求已经使西方公司陷于不利地位，让华为等公司得利（可见上周的金融时报报道）。他也叫苦说，包括欧洲公司在内的一些西方公司明显比思科违反法规，你为什么只盯着我们？我声明我们会监督、帮助所有在中国的国际公司要象谷歌那样“不作恶”，也还要监督、批判所有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遵守人权等普世价值。Chandler 说他会提供一个公司名单给我们参考。我没有进一步说我们的资金和精力有限，只能选择思科、谷歌以及（下一步的）微软、福特、华为、百度这样的有国际战略影响的大公司。我自从几年前把“退休金”从共同基金转换成公司股票得以直接参加股东大会、提交提案参与企业治理，但因金融危机和“管理”不善，经济上损失惨重。连这次 Sklar 来开会的机票和旅馆费用，都不知如何开销呢！

Sklar 也颇为惊奇今天思科的态度改善,除了强调我们的一贯建议,包括设立一个人权顾问委员会加入外部专家、支持人道中国这样的组织等,又以合作的语气指出思科正在撰写的 2010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必须加强和改正人权部分的内容(过去只有两页,且回避实质),最后提议思科与我们联合举行包括所有关心人权议题的股东的会议。Graves 解释说,思科的股东太多、太复杂,她无法做到。在会议的最后几分钟,一直没有插话的“老板”Lloyd 总结我们的 5 项建议/要求,说思科将严肃认真地考虑、改进思科的政策和运营。我们大家都称赞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议,Graves 说我们将在 11 月 11 日的股东会议之前再举行一次会议,讨论落实具体的改进方案。能够免费得到我们的高昂的咨询指导,思科可真占了便宜,下一次 Sklar 就可以从思科的华盛顿办事处参加会议了。在走出会议室的电梯里,我向 Graves 道贺,称赞她负责这样艰难的国际政治经济道德法律课题,值得高升。她面露得意笑容,说她还是开着原来的车。

Sklar 和我会后在附近的餐馆商议下一步的计划,我们都判断一定有别的更大压力迫使思科要实行某种实质性的转变,思科选择我们作为突破口,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提案内容正中思科要害,解决了我们的要求,可以用来对付 Boston Common 这样的较大但没有太大威胁的股东,也可以应付国会或者别的政治力量(例如法轮功)的行动。我们能够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中国背景(使得思科无法象雅虎那样以“你们不懂中国的实情”来哄骗美国的政府和股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Sklar 的美国知识、经验和(战胜雅虎的)名声,也可能思科察觉到 Sklar 与别的股东的联系和可能到来的法庭上的持久战,会象拖倒雅虎那样对思科带来致命伤。当然,今天只是思科的态度转变,我们并不能高枕无忧。要最终帮助思科实现人权政策的实质转换,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不到最后不能收兵。

在送走 Sklar 的车站口,他与我互相祝贺:“What a wonderful day! 多么美妙的一天!”。

[2010 年 9 月 3 日]

[附录]就人权政策致思科公司的通讯

2010年9月9日

尊敬的 Graves 女士和 Chandler 先生：

感谢你们就股东关注的人权问题继续与我们对话，特别是安排公司多位高层官员出席9月3日的会议并以开放和负责的态度参与其中。我们很高兴能以建设性、合作的方式与你们分享我们的经历、观点和想法。

我们希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相信我们的主要主张已经被你们理解和接纳。我们的主张是思科需采取更实质更具体的步骤来实施、加强公司有效处理潜在影响人权事务的政策和行为的能力。公司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如 Chandler 先生所明示的——承诺遵守人权、建立评估人权风险和后果的内部程序、（不像许多别的竞争者，而）“自愿”采纳不输出能被用于监视人权和侵害人权的产品、技术和软件的政策——当然符合我们的期待，也和我们的担心一致。但问题是这些措施并未实现它们的目的，没有让思科免于公共批评，除非它们能更清楚、制定得更公开，并有特定机制确保它们常规持续有效地运作，而非仅适用于临时的个别的情况。我之前提到过雪佛龙公司对我今年的提案（第9号）的回复可作为你们的参考（<http://www.chevron.com/documents/pdf/Chevron2010ProxyStatement.pdf>）。比如，雪佛龙提到“意识到公司在尊重当地人权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采纳了更新的、综合性的并有实施方案支持的人权政策，包括明确的分工和责任、管理层的义务和指南……与东道国政府、社区和非政府组织一道建设性地合作。此外，公司还与客观的相关事物专家一起合作，帮助公司理解对其经营相关的人权事务。”

如 Robert Lloyd 先生在会议结束时所总结的，我们建议的实质性步骤涉及以下需求：

制订更具体的人权行为准则，对现在的仅仅是泛泛而谈的公司职业道德标准进行补充；

建立人权顾问小组，其成员包括一些客观的外部人权专家能协助公司分辨、处理和防止潜在人权问题并提出适当救济政策和标准的方案；

建立并公开公司的内部人权评估机制用于公司内部常规运作、评估公司政策和行动将对人权、终端使用、终端用户造成的潜在影响，从而使这些活动在实施前能被正确评估；

在公司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增加并加强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使这方面的关注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力度相当；

与股东，尤其是来自人权团体的股东和代表，更有意义地合作、交换信息及观点，促进信息透明以及股东们对公司政策和使命的理解。在这点上，我们建议，作为第一步，你们可为 11 月份前来参加公司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们组织单独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信息会议。你们指出年度股东大会的区域涵盖范围有限，而以全球的股东为对象又需要更广的努力，但股东大会毕竟是吸引广大股东关注的机会，我们邀请你们考虑我们的这种相对广泛参与的建议；

此外，鉴于现在离你们应发表 2010 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秋季日期越来越远，我们要求这一报告应增加人权问题关注度的建议对你们会很有帮助。我们将很高兴就此事与 Christie 女士分享想法并提供反馈。

我们相信这些实质性的体制上的改变将极大地改善公司监管核心任务和政策的人权影响的能力，并有效防止我们股东担忧的在这方面对人权、终端使用、终端用户带来的负面影响。鉴于这个机制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如 Chandler 先所说，那么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内部操作程序在细节上更加开放和透明。

我们的理解是：就上述事项和我们以前通信中索要的相关信息和建议，你们已经承诺将向我们提供更多的详细信息和回复，并且将尽快安排一个后续会议对此进行讨论。Graves 女士说由于公司财务报告须在 9 月份处理，后续会议可能会安排到 10 月份。

我们期待下次会议能尽快召开继续和你们讨论前述事项和建议。为满足前述提及需求，我们随时准备协助你们进行制度性改革或公开既有的相关信息。

真诚的，

赵京

抄送：Robert Lloyd, Blair Christie, Kathy Mulvany

[translated by Xuefang Huang]

8.4 网络空间的安那祺自由秩序

我今年向高盛、搜狐、NetApp 和思科等公司提交的股东提案都围绕亚太和平展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高盛排除我的提案 no action（不作为），所以我的提案没能诉诸投票，但 SEC 驳斥了搜狐和 NetApp 排除我的提案的企图，使我的提案在 6 月 20 日北京⁸⁶和 9 月 5 日硅谷的股东大会上⁸⁷得以表决。而自从我 2008 年参加思科的股东大会以来⁸⁸，已经与包括 CEO Chambers、总裁 Lloyd、秘书长 Chandler 在内的十几名官员/员工进行了多次会谈、交流，包括 2010 年的股东提案，思科今年也没有阻扰我的提案。

我今天很早出发赶往公司总部参加股东年会，除了宣读我的提案⁸⁹外，还受委托宣读另外两个股东提案。刚进会场报上名字，一个高出我一头的白人绅士立即前来，自我介绍是投资关系部门的 Chief Intelligence Analyst，负责接待我。我们在会议开始之前简单交谈，包括雅虎的企业治理失败到阿里巴巴商务成功背后的政治隐患。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思科的股东大会，与 2008 年在外部会议中心不同，这一次在总部举行，公司更容易动员员工掌控会场⁹⁰。与会者除了十来名董事、十来名公司官员/职员，还有一百多名股东。Chambers 和 Chandler 都过来问候。

会议 9 点开始，主持人念完头 4 个公司提案，马上就轮到我了。我基本上照本宣科，发表了以下演说，建议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

⁸⁶ 赵京，“以搜狐公司治理尝试改进中国的社会秩序与规范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ohu-result.pdf>

⁸⁷ 赵京，“在 NetApp 股东年会宣读亚太和平政策”，2014 年 9 月 5 日。

⁸⁸ 赵京，“Cisco 思科公司股东大会关注中国人权”，2008 年 11 月 13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cisco.pdf>

⁸⁹ 股东提案第 5 号：设立公共政策委员会。NetApp, Inc. Notice of Annu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November 20, 2014.

⁹⁰ 会议规则八条主要是强调主席有权决定会议程序，包括可以叫保安人员把不服规则者带出会场。

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Cisco establish a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to assis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overseeing the Company's policies and practice that relate to public policy including human righ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vendor chain management, charitable giv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xpenditures, government relations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public issues that may affect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performance or reputation, and shareholders' value.

并列举以下事实：The Company has five standing committees, but the Company has no committee to deal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the dynamic Pacific Asia region where the Company has heavy busines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utilized the Tiananmen Tragedy of China in 1989 to abandon its own peace constitution, which is the cornerstone of Asia's peace after WWII, towards rearmament, militarization and fascism to mislead the U.S. under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ies to crash with the rising power of a nationalistic China. Althoug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igned the G-7 Summit declaration in 1989 to protect Chinese students, I,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Osaka University organizing Chinese democratic and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in Japan, was persecuted because I refus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betray my fellow Chinese students. Without a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ompany to legitimately and ethically deal with today's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ffecting our business. For this reason, and partly to respond to my proposals, Microsoft established such a committee in 2012. 在公司具有繁多业务的亚太地区，日本政府利用 1989 年天安门悲剧，抛弃作为战后亚太和平基石的宪

法，一步步向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倒退，在美日安保条约下把美国也误导入与崛起中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冲突。《朝日新闻》1990年2月10日、1992年10月20日和2009年6月8日对我的采访和我2004年发表在西班牙历史协会刊物 *Historia Actual* 的长文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 指出日本政府如何践踏自己的国际诺言和国会答辩，欺骗、出卖和迫害我们在日留学生。微软公司2012年部分因为我的提案就建立了公共政策委员会。

接着，我又宣读 James McRitchie 提交的第6号提案，要求持有3年以上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推荐最多4名候选人参选董事；宣读 Investor Voice 制成的第7号提案，要求公司公开政治开销的数额和捐助名单。

Chambers 发表了准备得相当充分的公司业绩讲演，令人印象深刻。例如，思科仍然在13个领域排名第一、在4个领域排名第二，等等。然后，他又回答了十个股东的提问，包括减少在中国、俄罗斯的雇员，他的继承人问题，使人感到相当自信，思科的股价也达到一年来最高\$26.80。Chambers 大概是美国科技巨头公司唯一的元老型 CEO 了。当场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我们的三个股东提案都没有通过⁹¹，这在预料之中，但今天的股东大会基本上完成了让美国公众以股东投票的形式参与对亚太和平事务的政策改进的战略目标。

Chandler 在2010年10月29日给我们的信函中解释公司的互联网政策，拒绝为了审阅制度而改装设备、反对政府通过各自国家的法规把互联网“巴尔干化(混乱无序)”：“We believe that our policy of providing standards-based Internet equipment, refusing to customize equipment in a manner than might facilitate censorship, and actively opposing efforts of government to “balkanize” the Internet through national regulatory regimes, are the best way to ensure

⁹¹ 分别为2%、4%、29%左右。

glob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using the Internet.”最后感谢我们的建设性参与：“Once again, thank you again for engaging with us in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implication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We have found your counsel to be valuable, and we appreciate your support.”⁹²今天晚上，他在回复我的老朋友 John Chevedden 的电邮中说：“Jing Zhao is a good man who is passionate about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While we do not share his view of some of the paths that will lead to change he desires, I share his goals and it's a pleasure to welcome him to the meeting.”赵京热情追求自由和人类尊严。虽然我们不同意采取某些他希望的变化途径，我赞同他的目标，很高兴欢迎他的与会。虽然不免客套，也反映出思科公司治理的自信和成熟。

另一方面，2014年11月19日，由中国政府主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开幕式，虽然宣传道：“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深化国际合作，…维护网络安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同时，又提“网络主权”、害怕“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⁹³华尔街日报忧虑不安地指出：“专家们称，美国与中国相互指责对方大搞网络间谍活动，这已损害了国际商业机器(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等企业在中国的业务，并加大了中国监管部门审批各种外资互联网申请的难度。高通、微软(Microsoft Corp.)在华业务也面临正式调查。谷歌(Google Inc.)、推特(Twitter Inc.)

⁹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fromchandler.pdf>

⁹³ 习近平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贺词，2014年11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19/c_127228771.htm

以及 Facebook Inc. 在中国仍处于被封锁的状态。”⁹⁴ 很象 Chandler 上述信中表露出担忧的那种政府通过各自国家的法规把互联网“巴尔干化”的状态。

正如 1997 年刚就任一个尚不知名的小公司 CEO 的 Eric Schmidt⁹⁵ 描述道：“互联网是人类制造的人类不懂的事物，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大安那祺试验。the largest experiment in anarchy that we have ever had.”⁹⁶ 下一步，已经展开的明年的股东战场（已经提交提案的苹果、IBM、高盛、摩根大通、Symantec 和将要提交提案的搜狐）的战略目标就是提倡网络空间的 anarchist freedom order 安那祺自由秩序⁹⁷。

[2014 年 11 月 20 日]

⁹⁴ 中文版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中国对在华互联网外企态度转暖”，<http://cn.wsj.com/gb/20141121/bch084419.asp?source=whatnews>

⁹⁵ 我后来三次在谷歌的股东大会与他相遇，他退出 CEO 职位后，更专注社会、政治活动，在新书 *The New Digital Age: Transforming nations, Business, and Our Lives* (Vintage Books, 2014) 中大讲国家、革命、冲突、战斗、干涉等国际政治。

⁹⁶ P.W. Singer and Allan Friedman, *Cybersecurity and Cyber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6.

⁹⁷ Robert Knake, *Internet Governance in an Age of Cyber Insecurit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pecial report No. 56, September 2010.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比较详细地介绍发源于美国政府/军方的网络其实也采取安那祺的自由政策，导致了中俄等国家或非国家组织/个人在网络方面的犯罪活动，建议放弃原来的消极/怀疑态度，转换为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协议。

8.5 思科 2015 股东年会上的硝烟

我在“惠普 2013 年股东大会观感”一文中介绍到：“虽然股东大会基本上走形式（绝大多数提案的投票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但也是整个战斗的最后关键阶段，…除了记者外，还看到三个人权活动人士在举牌抗议，我过去与她们交谈，知道她们不是我之前联系过的总部在华盛顿的工会组织 Chang to Win，而属于 The Coalition to Stop HP (www.stophp.org)，抗议惠普帮助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她们了解到我的人权提案后，才意识到还可以合法进入股东大会抗议，说要购买惠普股票明年再来！如果巴勒斯坦的美国支持者们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利用股东大会这个一直被犹太金融控制的领域，这里将变成斯文扫地的战场。”“接着我下一个提案的律师和牧师的发言显得啰里啰唆，听不出要点，超过了 5 分钟，被主持人提醒。发言中提到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时，有人在后面高叫干扰，使人体体会到美国政治的紧张气氛。”⁹⁸

今天，我提前两个多小时出发从旧金山湾区东北开往南湾的思科总部，在会前几分钟赶到公司，与思科的秘书长、老相识 Mark Chandler 等打过招呼，被引入会场第一排入座。会议开始，我巡视会场，有两百来人。除了公司的三个提案，第四号提案由华盛顿首都的 Holy Land Principle（神圣土地原则）公司⁹⁹提交，由一个白人老太太宣读他们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持久和平的八项原则。本来主持会议的 Chandler 宣布过只能在正式会议结束后的问答时间才讨论提案，但却容许一个白人男士发言反对此提案、为以色列政府辩护，说以色列政府没有歧视巴勒斯坦人、已经采取了许多政策帮助阿拉伯人学习、就业、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比别的地区的阿拉伯人受到更高的教育，等等。

⁹⁸ 赵京，2013 年 3 月 20 日。

⁹⁹ 从这个作为公司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它的性质。我已经读到它在别的公司的类似提案。

接着由我宣读老朋友 McRitchie 的 Proxy Access for Shareholders 提案，要求改变公司章程，容许持有 3% 以上的股东三年以后可以提名不超过 1/4 的董事。类似的提案今年已经得到 52 个大公司的股东年会的多数股东的支持。

股东年会的上述五个正式提案结束后，新上任的 CEO 做公司业绩报告后，时间较长，正好让我进一步熟悉这个互联网龙头的公司业务和行业趋势。例如，世界上现在有 5 千亿设备连接起来，四年后会增加三倍，其中 40% 的通讯将在机器之间进行。公司业务在中国经过两年半的停滞，通过与中国的公司 Inspur 等合作，这个季度开始增长。然后他接受了 13 个股东的提问，多数集中在公司的低股价、大量现金、如何分红和收买业务上。我因为和 Chandler 等公司高层打过几年交道，也可以私下交流，就没有提问。刚退休的 CEO 前不久去西雅图见过习近平，如果他还是 CEO 的话，我倒想问问他有关中国的政策变化，因为我正在交涉的 Apple、facebook、Goldman Sachs 等公司的 CEO 同样也去见了习近平。

会议已经超过一个小时，正要结束之际，一个白人女士站起来发言，违反会议规则 Rules of the Meeting：股东在提问期间有机会可以写出问题得到回答 Shareholders will be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submit written questions to the Chair to be addressed in the Q&A session。她讲了三条理由反对第四号提案，说公司的现有政策已经很不错了。随着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加剧，中东冲突的硝烟已经蔓延到惠普、思科等大公司的股东年会，还会进一步扩散开来。

会场初步统计表明，我们的提案得到 65% 的股东支持，估计今天的股东年会后随即召开的董事会要决定如何修改公司章程。今天驱车两个多小时前往赴会，不虚此行。

[2015 年 11 月 19 日]

8.6 思科 2018 年股东会议的两个提案

从 2008 年以来，我与思科公司打过十几次交道，包括付诸表决的股东提案（2014 年）¹⁰⁰。三年前，我在股东大会上宣读同是社会学者的老朋友 McRitchie 的 Proxy Access for Shareholders 提案，要求改变公司章程，容许持有 3% 以上的股东三年以后可以提名不超过 1/4 的董事¹⁰¹。今天，继上周刚出席 Guidewire Software/导线软件公司的股东年会，我又赶到熟悉的思科总部建筑群。

因为旧金山湾区交通日益拥挤，我特意提前近一个小时到达，见到以前接待我的 Chief Intelligence Analyst/CIA/首席情报分析家。我介绍 Yahoo/雅虎人权基金欺诈案的内幕，幸好思科没有落入雅虎那样的地步。CIA 说“思科警告员工不去中国”的流传不实，现在思科在中国的业绩不到公司年收的 5%，人员更少于 5%（公司总共有 7 万多人）。公司的新任秘书长和投资部门负责人（女士）过来问候。CIA 把我领进会场，与董事们入座第一排。三年前就任的 CEO 也走过来，但我觉得没有合适的话题，就埋头没有理会他。

主持人的 CEO 和秘书长很快念完前四个公司的提案，邀请我也上台。我先代表纽约的 Steiner 宣读股东提案第 5 号，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不能由 CEO 兼任，特别是目前的 Lead/领导董事 Bartz 已经当了 21 年，是“财富 500”大公司中最久的领导董事之一。她被雅虎董事会戏剧性地解除 CEO 职位（实际上解救了她）的记忆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这一次，她终于退出了董事会。与她同时退出董事会选举的还有原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十年来，我认识的十几名官员都离开了思科，一个时代过去了。

我接着又代表 McRitchie 宣读第 6 号提案，要求减少高管报酬回购股份的风险。这个提案实际上是与公司的高管报酬提案（第 3 号）相关。

¹⁰⁰赵京：“网络空间的安那祺自由秩序”，2014 年 11 月 20 日。

¹⁰¹赵京：“思科 2015 股东年会上的硝烟”，2015 年 11 月 19 日。

当场宣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两个股东提案都没有获得通过，但第3号提案也只获得略多于半数的赞同。在CEO后来的讲演和答问中，也有意识地列举回购股份减少的数据，说明股东提案的压力效果。我最近几年来也关注高管报酬问题，提交了几个提案¹⁰²，但似乎没有找到更有力、有效的论据和方法说服广大股东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官员们如何限制毫无节制攀涨的高管收入。

会场有一百人左右，股东约占一半。有5个股东提问，其中一个问题关于中美贸易战，CEO回复说希望90天内能得到缓解。股东大会上过去常见的社会/政治敏感议题似乎消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战场被国会听证接续过去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时髦科技从思科曾经骄傲主宰的路由通讯技术转到不由思科主导的云计算、5G、大数据等。CEO更强调老牌思科的文化传统：公司标志就来自金门大桥。但有很多未知的不安等待着思科，思科的桥梁通向何方？

[2018年12月12日]

¹⁰² 如提交给eBay公司2019年“改革高管报酬”提案：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ebay_proposal_2019.pdf

8.7 Cisco/思科公司 2019 年股东会议的提案

从 2008 年以来，我与思科公司打过十几次交道，包括去年宣读 Steiner 的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的股东提案¹⁰³。今天，我又赶到熟悉的思科总部建筑群，见到秘书长 Sloves、身高两米的 Chief Intelligence Analyst 首席战略分析家等人熟悉的面孔。一个从英国来的女士陪伴我入座第一排。

除了二十几个公司的董事、高管和雇员，另有三十几个股东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 Sloves 很快念完前三个公司的提案，邀请我也上台。我再次代表纽约的 Steiner 宣读股东提案第 4 号，与去年一样，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不能由 CEO 兼任。今年，除了 Caterpillar、Wells Fargo/富国银行，最近 Boeing/波音公司也改变主意，任命了独立的董事会主席。

当场宣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这次的股东提案仍然没有获得通过。

CEO 讲演之后接受股东提问。我先问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情况，CEO 回复说，确实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直接的产品销售、当地的代理商以及美中贸易战。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也广泛报道了中国政府三年内政府在相关部门淘汰美国制品的指示，但思科在中国的业务已经不多（去年就不到全公司的 5%，今年比去年下降 16%），最近媒体也报道思科在中国的大量裁员，似乎已经做好了撤离在中国的直接业务的准备。今天是国际人权日，第二个提问关于人权政策，特别是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西岸问题（这是 2015 年的一个股东提案¹⁰⁴）；第三个问题关于最近的股价下跌；第四个提问关于企业社会责任。

会后，一个带着头巾的女股东过来问候，说她支持我宣读的提案，因为权力不能集中。我谢谢她的支持，希望明年还会再见。我与 Sloves

¹⁰³赵京：“Cisco/思科公司 2018 年股东会议的两个提案”，2018 年 12 月 12 日。此提案得到 37%赞同。

¹⁰⁴赵京：“思科 2015 年股东年会上的硝烟”，2015 年 11 月 19 日。

等告别时，说我仍然是股东，但因为彼此熟悉，有机会可以直接就公司的政策交流，就不必提交提案。他们连说欢迎。我考虑以后如何就高层报酬（今年 CEO 报酬\$25,829,833,与中间收入员工的报酬比率是 181:1）这个我近来最关注的企业治理和社会问题与他们沟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9.1 推动新闻集团的人权政策

2007年12月，经过一番全球瞩目的喧哗，News Corp新闻集团终于如愿以偿收购了Dow Jones集团，控制了华尔街日报，实现了Murdoch默多克家族（包括老默多克的年轻中国太太）的世界媒体帝国计划。拥有370万读者（2007年）的华尔街日报是世界上最值钱的报纸，集中了全世界“商业、政治、思想行业的领袖和投资家”，在15家全美大报纸中，只有华尔街日报增大了发行量¹⁰⁵。华尔街日报也是我一生中唯一订阅过的日报，经过一年的研究，我写下了“华尔街日报的政策取向”¹⁰⁶，特别对华尔街日报“意见版”的政客、“思想家”等的推销、表白印象深刻。我也试过几次，只被作为“读者来信”发表过一小段废除核武器的见解。集中在华尔街日报的世界“商业、政治、思想行业的领袖和投资家”对于资本、权力、知识和信息的垄断、误导，令我非常担忧。例如，默多克本人就在华尔街日报上对他无知的哥伦比亚事务发表过“高论”。我查过新闻集团的网站<http://www.newscorp.com/>，其中竟然没有human rights人权一词！

如何有效地教育这个世界媒体帝国，把人权摆到他们的议程上呢？

只有股东大会了。

我读到新闻集团的2009年10月16日的股东大会上只有公司提交的董事会和会计行两项提案，估计股东提案被抹杀了¹⁰⁷。2010年4月16日，我向公司邮寄出设立人权委员会的提案。在提案中，我学习犹太人的经验，援引我自身在1989年组织日本的民主运动后因为拒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反省”而被取消护照的经历¹⁰⁸，让公司和别的股东们知道人权问题是我这个股东的切肤之痛。

4月22日，我收到来自Hogan & Hartson LLP律师行的很不礼貌的电邮和快件。我判断这是出自一个新手律师之笔，以为我没有经验。经过深

¹⁰⁵ News Corp Annual Report 2008, p.23.

¹⁰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wsipolicy.html>

¹⁰⁷ <http://www.newscorp.com/Report2009/2009Proxy.pdf>

¹⁰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news2010.pdf>

思，我决定不理睬她，说明我与她的律师行没有关系，而要求直接与公司对话。几天之后，我收到公司 Secretary 秘书长 Laura O' Leary 署名 4 月 26 日的来函，重复律师行同样的要求，说我的股份证明没有明确是公司发行的 A 股还是 B 股，只有 B 股才有资格投票和提交提案。我一方面对 O' Leary 回复说我去年接到过投票，当然是 B 股；同时又急忙请股票公司 TD Ameritrade 再开一份注明代号 NWS（B 股）的证明。这一次，TD Ameritrade 的雇员终于知道了我的意图（不在于“炒股”），再也不耐烦我这个“顾客”了，拒绝提供服务。我一方面打电话给 O' Leary，希望用我在 TD Ameritrade 的网上账号打印出代号 NWS 的交易记录，作为证明（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对 TD Ameritrade 软硬兼施，声称要告到美国 Security & Exchange Committee（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去。

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天 5 月 7 日上午，TD Ameritrade 突然通知我说新的股份证明开好了。我立即驱车到 TD Ameritrade 办公室取到证明，又赶回来写好信件，在下午加州时间 2 点（新闻集团总部所在地纽约时间 5 点）之前发出电邮和传真。

经过两个月断断续续的交往，O' Leary 搬出了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兼 Chairman of Nominat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 提名和公司治理委员会主席 Viet Dinh 与我 7 月 8 日对话。我从网上看到 Dinh 是南越难民、哈佛法学博士、Georgetown 大学法学教授、在最高法院和参议院“弹劾克林顿委员会”干过事，还为犹太大屠杀受难者和德国政府调解过，很有来头。不过，我在这两个月与 O' Leary 的交往中，已经把大量的文件（包括我与谷歌、雪佛龙、思科、雅虎等公司打交道的信息）转送给她，如果她打算把我的提案排除掉，必须让 SEC 知道我们之间的所有通讯内容才能表态。这基本上不可能，所以我知道 Dinh 没有权力排除我的提案。我对 O' Leary 说，我会很宽大灵活地妥协提案的修改。

不过，与 Dinh 的对话还是让我大失所望。他既没有准备、也没有责任，只是用甜言蜜语来传达公司的旨意，请我撤销提案，让我知道他不过是公司的一个高级雇佣、点缀而已。这是那种靠出卖自身的背景来源爬上权贵的人（象爬上国务卿位子的莱斯）。我耐心地教育他：你和我一样也

是难民出身，但比我幸运，成为“法学精英”，怎么连人权的意义都不清楚？他最后语无伦次地说他还有会议，就逃离了对话。

7月23日，我收到了O' Leary的快件，正式通知我公司8月份会向SEC提交股东会议的材料，把我的提案列为第3号。因为第1、2号提案是公司的提案，我的提案可能是唯一的股东提案。这是我今年的第4个成果（另3个是对谷歌、雪佛龙和思科的提案），以3、4千美元的“投资”把人权议题提到年产值3百多亿美元的新闻帝国的核心，同时也对千百万股东宣传了人权在新闻事务中的重要意义¹⁰⁹。从O' Leary的快件中的公司的反对声明中看出，为了说服股东，通过提案被迫学习了人权议程的董事会不得不作出good corporate citizen好企业公民的姿态，许诺要在每天的业务中让管理层和员工尊重人权。我今天回复O' Leary，感谢公司尊重我的言论自由权利，表示将继续作为股东帮助公司的人权事务。

让我们大家都来参与公司治理、推动人权议题成为每一个企业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和政策。

[2010年7月28日]

¹⁰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News_statement.pdf

9.2 被我不幸而言中的新闻集团的企业病

2011年7月8日,英国警方逮捕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前新闻主管科尔森,调查科尔森任过编辑的《世界新闻报》的大规模电话窃听事件。对《世界新闻报》的调查扩大到偷听被谋杀女孩、恐怖活动遇难者和阵亡将士手机留言的指控,以及向警察行贿来获取信息等。窃听丑闻的曝光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导致已有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在7月10日被母公司新闻集团停刊。7月17日,新闻集团的前英国女总管、国际新闻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布鲁克斯被伦敦警方逮捕。当天伦敦警察局长斯蒂芬森,第二天伦敦警察局助理局长耶茨因被指责与上述两家机构不正当交往而被迫辞职。7月19日,新闻集团的老板、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及其儿子、新闻集团副首席运营官詹姆斯·默多克被迫参加英国议会下院的听证会接受质询。事后,詹姆斯·默多克被指责证言不诚实,事态还在发展中……

新闻集团走到今天,是被我不幸言中的典型企业疾病。

正好在一年前的7月8日,新闻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兼“提名和企业治理委员会”主席 Viet Dinh 就我的2010年股东大会人权提案与我对话。Dinh 很有来头,曾经在美国最高法院和参议院克林顿总统的委员会干过,为犹太大屠杀受难者和德国政府调解过,前不久还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副检察长。但 Dinh 让我大失所望。他既没有准备、也没有责任,只是用甜言蜜语来传达公司的旨意,叫我白白撤销提案,显示出他只不过是公司的一个高价点缀而已。这是那种靠出卖自身的(南越难民)背景来源爬上权贵的人,没有一点独立性。我耐着性子开导他:“你和我一样也是难民出身,爬上高位,怎么连人权的意义都不懂?新闻集团的业务对全球的事务影响这么大,你作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兼企业治理委员会主席,不能辜负了我们股东的期待,要敢对默多克家族说不。否则的话,就不是我们新闻集团报道世界,而是世界聚焦我们公司了!”他语无伦次地说他还有更重要的会议,竟溜之大吉。¹¹⁰

¹¹⁰ 赵京:“推动新闻集团的人权政策”2010年7月28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news.html>

新闻集团其实已经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媒体，而是媒体化的资本帝国，它追逐的不是新闻自由，而是对世界媒体的控制和政治的影响。除了以12%股份支配40%投票权的默多克家族，董事会里陪衬着Dinh、原西班牙总统等权贵，甚至还有一个清华的教授¹¹¹。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要把人权提案打入它的股东大会的决心¹¹²。通过与Dinh等公司的董事、官员的交往，我知道新闻集团的公司治理的疾病，比外界所知道的“默多克家族帝国”等指责更为严重，迟早会爆发丑闻。

这次丑闻爆发后，我连续从新闻集团拥有的《华尔街日报》观察相关报道，注意到《华尔街日报》对于表面事态报道得相对客观，还特意介绍《华尔街日报》自己的伦理委员会向其2千名员工调查，确认他们的职业独立性没有受到干扰。另一方面，它的对手《纽约时报》则进一步追究体制原因，采访了一些股东的意见，特别提醒美国读者们在丑闻事件之后的背景和政治含义。我7月19日致函《华尔街日报》，介绍我的人权提案，指出新闻集团的企业治理疾病所在，并愿意从外部帮助提高《华尔街日报》的独立性。

7月27日，我正式向新闻集团的董事会和Dinh指出：“Unfortunately, not onl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jected my proposal, but you also showed that you were not acting as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You betrayed our shareholders. 不幸的事，你不仅拒绝了我的提案，还丧失了独立性。你（们）出卖了我们股东。”我同时表明：为了更建设性地对话，我今年没有提交新的提案到股东大会。但这次事件后，董事会应该邀请关注的股东和外部专家，会诊如何改进公司治理方面的疾病。我会像帮助雪佛龙、思科、英特尔等公司改进企业治理、code of conduct 员工规范等一样，提供我的知识和经验。¹¹³但愿我们大家从外部和内部努力，帮助新闻集团摆脱“家族帝国”等阴影，让它的企业治理至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今天，我收到伦敦的Evening

¹¹¹ 可悲。清华再也不是我1980-85年就读时的水木清平校园，而成为世界权贵、跨国公司和各级骗子们虎去狼来的跳蚤市场。

¹¹² 股东大会于10月15日召开，我的提案是第4号。
<http://www.newscorp.com/Report2010/2010Proxy.pdf>

¹¹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News_letter.pdf

Standard（有 180 年历史的报纸）的 Josh Neicho 的采访，问我对当天詹姆斯·默多克成为BSkyB 董事会主席的意见。我回复说，虽然我不是BSkyB 的股东，但这反映了BSkyB 以及新闻集团董事会没有独立性的结构性疾病，令人担忧。

正如我一年前所说：“让我们大家都来参与公司治理、推动人权议题成为每一个企业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和政策。”¹¹⁴

[2011 年 7 月 29 日]

¹¹⁴ 赵京：“推动新闻集团的人权政策”2010 年 7 月 28 日。

10.1 惠普 H-P 公司面对人权提案的黔驴之计

2010年6月1日，我把目光转向硅谷的另一家传统的超级公司 Hewlett-Packard 惠普，提交内容类似的关于中国的人权提案到2011年的股东大会。¹¹⁵作为道琼指数成员公司之一，惠普有30万以上的雇员，比只有1万多雇员的雅虎、2万雇员的谷歌、3万多雇员的苹果、7-8万雇员的思科、8万雇员的英特尔和9万雇员的微软这些翻云覆雨的超级跨国公司加起来还人多。惠普代表着“从车库里创业”的硅谷传奇（我自从2001年被 Adobe 裁员，也在车库里“创业”，至今还在车库里），但我记得十多年前在计算机产业高峰期，有一个从美国内陆来硅谷打工的普通女工，被惠普的打印机车间油墨感染，损害了健康，花光了工钱，还得靠亲戚来接回内陆。

我仔细研究了惠普的关于公司治理的文件，注意到惠普有专门的公共政策委员会，也提到尊重人权的政策

（<http://www.hp.com/hpinfo/globalcitizenship/society/humanrights.html>），似乎比绝大多数公司成熟。但是，对于一个64%的纯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销售额、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商务越来越增大的公司，鉴于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下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帮助惠普设立新的人权政策。

不久，我收到惠普来自 Vice President and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副总裁兼副总律师）David Ritenour 的署名6月11日的快件。他声称我的证券公司 TD Ameritrade 为我开出的股份证明有 defect 缺欠，不符合 SEC 14a-8 条款，因为股份证明署名是5月28日，而我的提案署名是6月1日。这是公司律师惯用的借口，不足为奇。我6月17日回信并电邮给 Ritenour，说明我5月28日访问 TD Ameritrade 的旧金山支店，但支店不肯/不能开出证明，而是由总部当天发出的。5月29、30日是周

¹¹⁵ 包括这一提案在内的所有文件，都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网址 <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cf-noaction/14a-8/2010/jingzhao072810-14a8.pdf> 上读到。

末，股份证明于6月1日到达我手中，我当天就发出提案（附带股份证明）。按照人的常识，这是符合SEC 14a-8条款中“在提案的同时拥有一年以上价值两千万美元以上股份”要求的。同时，我也附上从电脑上打印出6月17日的股份纪录，证明我不仅在6月1日，而且到6月17日还持有相同的股份。

我进一步与Ritenour联系，希望直接与他沟通，看能否对SEC 14a-8条款的解释达成同样的理解。他电话和电子邮件都回复说他两个周内不在办公室，让我与Linda Leung联系。我按照他的线索，给(650)857-2866打了几次电话，都是公司法务部门Linda Leung的录音。我每次都留言，请他们给我联系，却都没有回音。

过了不久，我收到华盛顿律师行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 律师Amy Goodman署名6月28日的快件。原来，惠普已经雇用了这家律师行来对付我这个微小股东，用Ritenour的理由，说我两个周内没有弥补我的股份证明的缺欠，按照SEC 14a-8条款，要把我的提案从2011年的股东大会上排除掉，请求SEC不要采取行动。这时我才意识到惠普在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采用的黔驴之计，不禁大笑起来：你躲得过初一，躲得了十五？我明年会再挑战，直到我的提案在股东大会上得到表决为止！

一个月以后，7月28日，SEC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回复惠普、Gibson, Dunn & Crutcher和我，决定对于惠普排斥我的提案的行为，不采取行动。SEC同时心虚地声明：它的立场不据法律效应，不认可公司决定的股东可以诉诸法庭来最终判决。这实际上把我这样的根本请不起律师的穷小股东的权力剥夺了。本来，按照SEC 14a-8条款的法律精神，SEC不采取行动的话，应该自动地让股东的提案付诸表决；要排除股东提案，才必须得到SEC的“行动”。当然，面对我这样的只有三千万分之一股份的渺小股东和有30万多人的大公司，怎么可能期待SEC会为我主持公道呢？下一步，我应该与诸如Sustainable Investments Institute¹¹⁶这样的监督SEC的

¹¹⁶ 此机构在Maureen O'Brien, "Briefing Paper: Human Rights," March 11, 2010报告中引用了我的工作：

<http://monitor.siinstitute.org/docs/t/6/2010%20Si2%20Briefing%20Paper%20-%20Hu>

机构合作，除了检查、帮助大公司外，还必须帮助 SEC 真正负起职责来，共同参与公司治理、推动人权成为每一个企业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和政策。

[2010 年 9 月 23 日]

10.2 推动惠普公司的人权政策改变的第一步

2010年9月23日，我在“惠普H-P公司面对人权提案的黔驴之计”¹¹⁷一文里，介绍到一方面老牌的惠普有专门的公共政策委员会，其人权政策似乎比绝大多数公司成熟；另一方面惠普王国采用黔驴小计，排除了我向2011年股东大会提交的人权提案。鉴于惠普有32万多名员工、1260亿美元销售额（其中65%来自美国以外，特别是中国），我三年前就战略性地选定惠普，要帮助它改善人权政策。我下定决心：“你躲得过初一，躲得了十五？我明年会再挑战，直到我的提案在股东大会上得到表决为止！”

2011年3月23日的股东大会被惠普故意安排在远离公司总部的东海岸的一家旅馆举行，我没有钱亲自出席大会，就于3月21日致函惠普，建议按照我与英特尔公司直接谈判的良性互动模式，不必在股东大会上对决¹¹⁸。在6月23日我出席雅虎股东大会宣读我的人权提案的当天，我收到惠普副总裁兼副总律师 David Ritenour 的电邮，表示愿意对话。7月7日，我们两人通过电话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对话，主要介绍了我为什么花费这么大代价关注惠普以及美国大企业的人权政策。他解释说 he 主要负责公司的法律程序，排除我的提案并不是因为对我个人有成见，相反，惠普知道了我的难民背景，非常愿意倾听我的意见。他不直接负责人权政策，所以同意安排我与惠普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在公司总部直接会谈。

惠普投资关系主管 Catriona Fallon 安排了我们9月7日的会谈，我也介绍我的老伙计 Morton Sklar，让他从惠普在华盛顿的视频会议室加入。我们反复研究惠普的资料，按照与英特尔、思科打交道的经验，制定好会谈项目。但是，在9月5日晚上，Ritenour 突然发给我们一个电邮，要求我和 Sklar 填写一份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NDA, 不泄密保证书)，其内容不仅禁止我们对外部介绍惠普的人权事项，实际上同时把我将来作为股东的提案权也被取消了（又是黔驴小计）。我们解释说，我们对惠普的

¹¹⁷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hp.pdf>

¹¹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Zhao_HP_20110321.pdf

商业秘密不感兴趣、也没有收取惠普一文钱，而且，从来也没有任何公司要求我们签署类似的保证书。我至今为止，即使为此丧失国籍、社会地位和自由，也把研究工作为人类公开，特别有义务把我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人权政策和实际向中国民众报告，我这个人的性格也保不住什么企业秘密。结果，原定的9月7日的会谈，改为我、Sklar和Ritenour三人就是否签署这个NDA谈判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指出：惠普这样老牌的大公司，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股东、公众对人权政策的关注；做得好，需要我们义务宣传；做的不够，需要我们诊断（还是义务）。Ritenour解释说，因为我的特殊背景，公司才安排几位高层主管与我分享不能让第三者知道的信息。我坚持说，我没有权利、也不想知道那样的秘密，我只要求公司能够、也应该向公众、特别是没有足够人权的中国民众公开它的中国人权政策和实施状况。Ritenour说，那样的话，惠普要安排别的官员会谈。Fallon把会议改到10月10日，我留心到10月4日是提交2012年股东大会提案的截止日（又是黔驴小计）。为了增加互信，让他们对董事会上司有所交代，我特意声明放弃2012年的提案。

今天，我早上提前赶到惠普的总部，由Fallon女士引入会场。除了Ritenour，还有Ashley Watson女士（VP and Chief Ethics & Compliance Officer 副总裁兼伦理与遵守事务主管）、Zoe McMahon女士（Director of Social &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Compliance）、Kelli Schlegel女士（Human Rights & Global Citizenship Program Manager）和从电话上加入的负责隐私权政策的Scott Taylor，再加上也从电话上加入的Sklar。

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背景、经历，送给他们人道中国的手册和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企业社会责任》，特意指出我这些年来在硅谷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帮助美国的企业理解中国人权的事业并建立起与中国民众、民权运动沟通的渠道。老对手Ritenour今天与我第一次见面，一言不发。负责人权与全球公民项目的Schlegel女士大概级别最低，也一言不发。负责社会与环境持续性与遵守

事务的 McMahan 女士只简单地说惠普不限于慈善，而致力于更广泛的社会创新。Watson 女士主导今天惠普的对话，颇有“开恩”接见我“上访”的态度。好在我对此已经麻木，学会了掩饰自己对权势人物的鄙视，知道要教育惠普这样的老牌王国，需要更大的耐心。我在感谢她们百忙中会见我们的同时，提醒说惠普不可能找到第二个有我这样知识和背景的股东来帮助公司，我付出自己的“退休”基金买到提案权，花上至少两、三年时间，战略性地选择雅虎、思科、谷歌、英特尔、惠普等公司，不达到帮助它们改善人权政策的目的，不会放弃的。

Taylor 向我们介绍惠普的隐私权政策。我们刚与英特尔会谈过这个越来越重要的人权课题，对于民主与科技关系、网络自由，以及技术规范细节等，都比较熟悉，但我特别学到惠普在把欧盟的这方面比较民主的制度搬到不民主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EC。作为惠普的股东（虽然只有千万分之一左右的股份），可能只有我对于“数据在亚太地区跨国界移动”等隐私权的性质有一种本能的敏感。APEC 成立于天安门悲剧发生的 1989 年，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对抗那年在中国、东欧、苏联发生的民众自发抗议的安那祺主义运动。我因为在日本组织民主人权运动，经历着当代中日关系最黑暗的一页，看到 APEC 的头头脑脑们登台表演、招摇撞骗，对于他们背地里制定的各种“自由贸易”条文、政策非常警惕，但不知道如何制止。如果能够帮助惠普参与制定 APEC 的隐私权政策，对于我不能直接服务的中国、日本等民众，也尽了一丝义务。因为时间制约，我们约好会后再谈。

话题转到供应链的人权政策。这是惠普作为世界上最大电脑制造商的特色。它在中国的 1 万名雇员在 689 城市、2 千县经营 1 万个生意伙伴、7 千个商店、1 千 3 百个服务中心。我们读到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的悲剧现象，其源头就在惠普、苹果公司等供应链的顶端。与其到重庆、深圳等电脑制造厂去诉诸改善工人的人权，在硅谷的这些公司的总部来谈判更有成效。每当我有幸置身于、并有一点点力量主导与公司的谈判时，我

总是记起我的那些为了理想和现实所迫奋不顾身占领天安门广场（1989年）、占领各权力机构（包括接待访民机构）外门、占领东京机场走廊（2009年）、占领雪佛龙炼油港（去年）和今年占领埃及解放广场、占领被出卖的雅典国会广场、占领华尔街等控制、压迫广大民众生活的公共或私有空间的安那祺主义同胞们。我要传达的信息也很简单：你们可以很容易向中国的外交部（唐家璇本人）、教育部、日本的文部省、大阪大学、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东京警视厅等权势机构那样把我排除掉，但你们摆脱不了世界各地追求自由平等的安那祺主义精灵。

我指出惠普没有中文版的人权、社会责任等政策，Watson 女士武断地说惠普不需要专门关于在中国做生意的人权政策，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惠普在中国的上万直接员工、上百万供应链企业的员工和上千万用户不可能用英文理解惠普的看起来比较完善的社会政策。会议快结束时，Sklar 总结说我们愿意在公司的“员工规范”、“人权风险的机制性防范”和“公共沟通”三个方面与惠普合作。不太懂外交礼节的 Watson 女士摆出架势，把我们当成她的部下似的，说惠普有权利选择与谁合作或不合作，几乎把今天的会议成果葬送掉。我提醒道：惠普是公开上市的公司，没有权利选择（排除）股东；惠普三分之二的销售额来自美国以外，没有挑剔的余地不在中国等处做生意；惠普在网站上列出的丹麦什么研究所、北京大学什么管理学院对惠普的讨好，与惠普在中国的人权表现毫无关系；惠普的中文网址 www.hp.com/cn 完全是一个产品销售网，丝毫没有我们今天用英文讨论的人权、社会责任和社会创新等议题。如果惠普能够找到比我们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更有（义务）意愿帮助改善其人权政策的机构或个人，我们就会像告别基本上采纳我的人权提案要旨的雪佛龙、谷歌那样，迅速转向别的战略目标（微软、苹果、甲骨文等公司）。与我们已经打过交道的 Ritenour 和 Fallon 女士调解到：惠普欢迎我们的继续关注。Watson 女士也给自己找个台阶，说她并不反对继续沟通，只是不能保证会再次参与会谈（我们也没有兴趣非要见她）。最后大家同意在隐私权和中国的人权改善等方面继续合作。

推动惠普王国的人权政策改变虽然艰辛，今天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2011年10月10日]

10.3 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

高中时读伏尼契的革命浪漫小说《牛虻》，没有完全理解，但打开了我心灵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以外的窗口。其实，牛虻这个词的英文 **gadfly** 被广泛理解为“对现存体制不断发起挑战、批判的个人”，来源于苏格拉底的人格典型。

占领华尔街运动从去年 9 月自发兴起，虽然在意料之中，也引起我们的关注，期待朝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发展。与 1989 年天安门运动和目前的阿拉伯之春一样，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在决定我们生活的公共空间确保我们的发言权，其中之一就是占领决定全球化走向的各大公司的股东大会。我因为无法亲自赴会，赶快与占领洛杉矶的人士联系，让他们去占领 10 月 15 日在洛杉矶举行的新闻集团股东大会。可惜，尽管有数百人（包括从英国飞来的议员）在会场外抗议，也可以用我的股东证明代表我“合法”入场，却没有一个“牛虻”直捣会场。看来，占领运动还需要技巧和艺术。

我那时（10 月 10 日）刚完成与 HP 惠普公司的第一轮对话，以后催促进一步深入¹¹⁹，没有得到回复。今年 3 月 6 日在英特尔的外部人权专家会议上意外遇到对话时的惠普人权项目经理，就再次发电邮给惠普，收到惠普的投资关系主管的敷衍回答，说没有时间在人权问题上 **entertain**（招待）我了。这样，唯一剩下的机会是在股东大会上与董事会的对话了。

3 月 21 日举行的惠普股东大会除了法定的 3 项公司提案外，只有一项来自股东的提案，提案者正是在 2010 年新闻集团股东大会上宣读我的人权提案的老朋友 **John Chevedden**。他只有 80 股，几乎不够价值 2000 美元的提案标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牛虻”股东活动家。与我一样，**Chevedden** 也没有钱专门为了宣读提案飞来出席股东大会，就请在硅谷本地的我代读。我很早赶到会场，向“老相识”副总裁兼副总律师 **Ritenour**

¹¹⁹赵京：“推动惠普公司的人权政策改变的第一步”<http://cpri.tripod.com/cpr2011/hp111010.pdf>

“报道”¹²⁰。他很客气地解释说惠普并不拒绝和我交流，并把我引到会场的前排入座。

我迅速浏览 Rules of conduct 会议行为规则，好笑不已，一看就知道是针对 Chevedden 和我设计的：“A proponent of the proposal will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 proposal. There will be no questions and answers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tockholder proposal. 本会要表决一个股东提案，一个提案的支持者将有机会宣读提案，在提案宣读期间将不允许问答。”（这是因为我 2009 年占领谷歌股东大会的插曲¹²¹。）“There is a time of two minutes per stockholder during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In addition, there will be a limit of six minutes per general topic. 问答期间一个股东只有两分钟时间，而且，每一个总题只有六分钟时间。”“Inappropriate conduct: Conduct which is not in compliance with these rules or which is not appropriate, including derogatory reference to individuals or comments that are otherwise in bad taste, will not be permitted and may be a basis for removal from the meeting. 不适当行为：不符合以上规则或不适当的行为、包括对个人的贬损或坏品味的评论，将不被容许并可以被驱逐出会场。”（这可能与我 2008 年在思科股东大会上的争执有关¹²²）

Chevedden 的提案内容本身已经火力十足，我只需读完提案就严厉谴责以 Whitman 为首的董事们了；否则，拥有 30 多万员工的惠普不至于在股东大会上这样如临大敌。我走到麦克风前，宣读要求公司高层保持一定量股票的第 4 号提案，包括以下内容：“The Corporate Library,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firm, rated our company "D," with "Very High

¹²⁰赵京：“惠普 HP 公司面对人权提案的黔驴之计”<http://cpri.tripod.com/cpr2010/hp.pdf>

¹²¹ 赵京：“专横卑鄙的 Google（谷歌）2009 年股东大会”<http://cpri.tripod.com/cpr2009/google-c.html>

¹²² 赵京：“Cisco 思科公司股东大会关注中国人权”<http://cpri.tripod.com/cpr2008/cisco.pdf>

Concern" in executive pay" and "High" in Governance Risk Assessment. 把我们公司评为‘D’、高层报酬‘非常令人担忧’、公司治理风险‘高’。”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cers were given discretionary bonuses of \$1.6 million. 高层官员一律拿走 1 百 60 万美元奖金。”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7, 2011 article titled, "The Doofus Factor" said the directors of HP, a stumbling Silicon Valley giant, were accused of serial ineptitude spanning the appointment and dismissal of Carly Fiorina, the firing of Mark Hurd, and the selection of Léo Apotheker. 董事会一系列无能的任命和解雇执行长的行为（其中 Fiorina 和 Whitman 一样，转换跑道用个人资产竞选代表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失败）” “Apparently HP hired Apotheker without his ever meeting the full board.（显然，惠普在所有董事并没有面谈前就任命了 Apotheker）” “Our new CEO Margaret Whitman made a fortune by taking eBay public. But Ms. Whitman flagged badly as eBay grew into a mature business—as it became more like HP is now. She also failed when she tried to translate her corporate celebrity into a political career. She lost miserably despite spending \$100 million of her own money.（新执行长 Whitman 靠 eBay 发财，但 eBay 与惠普一样，成为大企业后就停滞了。Whitman 也没法把她的企业成名转换成政治家，花掉了 1 亿美元个人资产还是失掉了州长选举。）”（这比以往的总统选举花费还多。读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打量主席台上的 Whitman。） “The corporate Library reported that Director Lawrence Babbio received 38% in negative votes. And directors Kennedy Thompson and Sari Baldauf each received 22% in negative votes.（董事 Babbio 得到 38%、Thompson 和 Baldauf 各得到 22% 的否决票。）” 当我读这些事实时，会场鸦雀无声。我想到将来有一天，中国的民众也可以占领人民大会堂等公共空间宣读类似的痛斥李鹏、江泽民、唐家璇等权贵的提案。

在问答期间，那个我很熟悉的总是为公司辩解的白人老头第一个走到麦克风前责骂 Chevedden 是个要搞垮美国公司、特别是要搞臭甲骨文公司执行长 Ellison 这样的富豪的活动分子。这真是难得的殊荣！美国要是

再有几个这样的 gadfly，这个世界就好过多了。虽然我不是富豪的敌人，但为这样的战友感到欣慰和自豪。我引用另外一个 gadfly 的著作¹²³，提出惠普的人权实践问题，指出虽然公司已经有不错的纸面人权政策，但关键在于如何有独立的机构确认其执行。Whitman 果然老练，以“惠普不能撤离中国”把议题转移开（我过去在 eBay 的股东大会上第一次见识过她的手法）。我指出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知道下一步只能向 Chevedden 那样，诉诸股东提案了。

令人欣慰的是，Chevedden 的提案竟然得到 24.4% 的股东赞成。当代美国的股东毕竟比古代雅典公民更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的“gadfly 式企业治理”事业毕竟比被雅典法庭毒害的苏格拉底和被美国法庭判处 22 年监禁的伯克曼有较光明的前途。

[2012 年 3 月 21-28 日]

¹²³ John Harrington, *The Challenge to Power: Money, Investing, and Democracy*.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10.4 推动惠普人权政策改善的阿基米德杠杆

2013年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惠普限制中国学生用工”的联合报道：“全球最大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生产商之一惠普(Hewlett-Packard)正对中国各地工厂雇佣学生及临时工人数做出新限制。……惠普此举反映了电子公司对中国有问题的用工行为看法的极大改变。”“由于工厂劳动力越来越匮乏，中国许多工厂一直依赖高中生、技校生和临时工应对间歇性订单增多状况。学生抱怨道，学校领导会临时让他们从事与学业无关的劳动，工作时间也过长。当地政府有时也会命令学校提供劳动力，而工厂会付给校方酬金。”“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许多全球电子业巨头都基本忽视了这一问题，仅在一些情况下对关于损害劳工权益的报道进行追查。”“周五早上，惠普通知中国供货商这一规则，规定，所有的工作必须是自愿的，学生和临时工‘在合理地预先告知之后，应可以随时离厂，各方不得刁难。而且劳工须有可靠的、不会招致打击报复的申诉机制。’”“惠普发言人霍华德·克拉沃(Howard Clabo)说，从3月开始，惠普将对供应商展开培训，并且和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及学者进行座谈。”“一直以来，富士康(Foxconn)尤其受到劳工权利人士的批评。……在重庆，富士康和惠普合作，生产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电脑。”¹²⁴

与此同时，惠普发布2013年3月20日举行的股东大会资料，其中包括我作为股东要求成立人权委员会的第6号提案和公司董事会为了反对此提案的声明中列举的惠普人权政策（包括供应商政策）¹²⁵。我几年来推动惠普人权政策改善，终于结出了初步成果。

2010年6月1日，我向惠普提交2011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被惠普用小计谋拒绝，“我才意识到惠普在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采用的黔

¹²⁴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 (中文)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en/> (English).

¹²⁵

http://media.corporate-ir.net/media_files/irol/71/71087/proxy2013/HTML2/default.htm

驴之计，不禁大笑起来：你躲得过初一，躲得了十五？我明年会再挑战，直到我的提案在股东大会上得到表决为止！”¹²⁶

2011年3月，“知道要教育惠普这样的老牌王国，需要更大的耐心”，我再次联系惠普，经历了半年的会谈，有一点进展，包括：“话题转到供应链的人权政策。这是惠普作为世界上最大电脑制造商的特色。它在中国的1万名雇员在689城市、2千县经营1万个生意伙伴、7千个商店、1千3百个服务中心。我们读到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的悲剧现象，其源头就在惠普、苹果公司等供应链的顶端。”结果，“推动惠普王国的人权政策改变虽然艰辛，今天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¹²⁷，但放弃（错过）了提交2012年股东大会提案的机会。其间，惠普写好了守密条款要我和Morton Sklar律师签字，被我们断然拒绝。我们关注公共政策，对公司的秘密不感兴趣，更不会被收买利用为公司宣传，失掉独立性。

2012年3月21日，我出席惠普的股东大会，代理宣读老朋友的谴责董事会（特别是CEO）贪婪无能的提案，同时“提出惠普的人权实践问题，指出虽然公司已经有不错的纸面人权政策，但关键在于如何有独立的机构确认其执行。Whitman果然老练，以‘惠普不能撤离中国’把议题转移开。……我指出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知道下一步只能……诉诸股东提案了。”¹²⁸

2012年5月17日，我正式提交2013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以伟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最近的阿拉伯之春，说明惠普这样的超级国际公司建立人权委员会的必要。9月12日，一年前会谈过的副总裁兼伦理与遵守事务主管Watson女士回复我，要求我主动撤销提案，却没

¹²⁶ 赵京：“惠普 H-P 公司面对人权提案的黔驴之计”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hp.pdf>

¹²⁷ 赵京：“推动惠普公司的人权政策改变的第一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hp111010.pdf>

¹²⁸ 赵京：“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有同意我的举行英特尔公司那样的邀请外部专家“会诊”的建议¹²⁹。我没有回复这样的傲慢。不久，我收到老对手副总裁兼副总律师 Ritenour 要求通话的礼貌电邮。我再次指出自己来自被无法无天的土皇帝统治了几年、又是惠普在中国乃至全球制造业务中心的重庆，有责任就惠普的人权政策为不懂中国事务的普通股东和没有言论自由的普通中国民众代言。他知道除非我的提案得到大会表决我不会停止战斗，就同意这次不排除我的提案。我也礼尚往来，当即表示只要付诸股东大会表决，我不会再次提案。

2013 年 1 月 2 日，我收到惠普董事会把我的提案付诸表决的正式决定，和反对我的提案的声明¹³⁰。与雪佛龙或谷歌 2010 年股东大会上反对我的人权提案的董事会声明一样，惠普为了得到广大股东的支持，证明我的提案虽然精神上不错但“没有必要、不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周详地列举或承诺了公司为改善人权政策已经和正在实施的步骤，也算正式陈述和改善了公司的人权政策，达到了我几年来帮助惠普的基本战略目标。

有趣的是，紧接着我的提案，由全美长老会基金、德州的天主教 Beneditine 姊妹会、神圣上帝会众、联合美以美教会的全球牧师和慈善投资服务共同提出的第 7 号提案（见注 2），也要求公司改善人权政策，连理由（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担忧）也与我的提案类似（但更温和、间接），怪不得董事会的反对声明也屡次提到我的提案！与我 2010 年与（比我股份、组织、影响强大百万倍的）耶稣会合作推动雪佛龙人权政策的经历类似¹³¹。反过来看，正是这样的两个完全不同背景、实力的股东的相同提案，迫使公司在人权政策上迈出了别的公司不肯、不愿、不能迈出的步伐，值得庆贺。

惠普的股票在 2010 年曾达到 53.9 美元，今天只有 16.9 美元。作为股东，我必须以我的“退休基金”持股直到完成“人权提案得到表决”

¹²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hp120912.pdf>

¹³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hp130102.pdf>

¹³¹ 赵京：“推动 Chevron 雪佛龙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验”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evron100201.pdf>

的基本战略目的，才考虑战略撤退，买进新的战略目标的股票。虽然经济上损失在所难免，但以千万分之一的股份利用股东提案这个阿基米德“社会运动杠杆”，广交了关注人权事务的耶稣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工会、社会责任基金、大赦国际、联合国全球契约等组织和个人，推动了影响全球生活的国际大公司的人权政策的改善，特别是对于我不能亲自回国服务的中国民众尽到微薄之力¹³²，社会回报无可估量，值得付出这样的牺牲。

[2013年2月13日]

¹³² 1985年大学毕业时，我放弃加速器专业考取了国家教委唯一的社会学留学资格（当年的名额是去日本），但我1992年拿到大阪大学第一名社会学博士学位时，被日本当局伙同中国驻日公使唐家璇等赶出日本教育机构。唐因为与日本当局合伙迫害在日中国留学生被江泽民赏识提拔到外交部长的位子（现在知道他的前任钱其琛就是因为腐败/出卖机密被抓），而我1995年则被迫逃出日本，连中国国籍也被拿掉了。

10.5 惠普 2013 年股东大会观感

虽然股东大会基本上是走形式（绝大多数提案的投票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但也是整个战斗的最后关键阶段，况且，今天的惠普 2013 年股东大会的三个股东提案，都与我有关。我提前一个小时达到会场 Computer History Museum（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除了记者外，还看到三个人权活动人士在举牌抗议，我过去与她们交谈，知道她们不是我之前联系过的总部在华盛顿的工会组织 Chang to Win，而属于 The Coalition to Stop HP（www.stophp.org），抗议惠普帮助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她们了解到我的人权提案后，才意识到还可以合法进入股东大会抗议，说要购买惠普股票明年再来！如果巴勒斯坦的美国支持者们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利用股东大会这个一直被犹太金融控制的领域，这里将变成斯文扫地的战场。

惠普的 Epstein 女士带我进入会场时，同行的还有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我向他们问候，知道他们是第 7 号提案者（全美长老会基金、德州的天主教姊妹会、神圣上帝会众、联合美以美教会的全球牧师和慈善投资服务等）的代表律师和牧师¹³³。他们的提案紧接着我的第 6 号提案（前 5 个提案都是公司董事会的提案），也要求公司改善人权政策，连理由也与我的提案类似，但更温和、模糊，董事会反对他们的提案的声明也屡次提到我的提案。

整个会场座无虚席，约有两、三百人出席会议。我默念准备提案时，一直犹豫是否也提及巴勒斯坦的人权问题。前不久，哈格尔因为说过“外交部（美国国务院）成为以色列的后院”被在美犹太人纠住不放、差点当不成国防部长。我并不在乎犹太人会找我麻烦，但考虑到自己势单力薄（千万分之一股份），不便分散火力，只好按下为巴勒斯坦民众打抱不平的念头。轮到我发言时，我指出我的人权提案的要点是公司在非民主国家做生意的 legitimacy 正统性/合法性问题，而董事会的反对声明虽然包括公司的

¹³³赵京，推动惠普人权政策改善的阿基米德杠杆，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hp-policy.pdf>

一些政策进步，但缺乏独立的验证机制¹³⁴，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就很快结束了我的发言。

接着我下一个提案的律师和牧师的发言显得啰里啰唆，听不出要点，超过了5分钟，被主持人提醒。发言中提到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时，有人在后面高叫干扰，使人体会到美国政治的紧张气氛。

之后，我又站起来代替老朋友 Chevedden 宣读他的与去年类似的火力十足的谴责以 Whitman 为首的董事们贪婪与无能的提案¹³⁵。在会议之前，有一些机构大股东也放风要选掉几个董事，成为这个提案的同盟军。结果，这个提案得到 27.6% 的赞同（当场初步统计），远远高于对我的提案的赞同率（初步结果 3.39%）。这提示我：虽然得到了高达几十万倍的“投资回报”，我以后也可以把人权这个崇高的政策理想与实际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争取更多的股东同盟。

在提问期间，股东们踊跃发言，大大超过了原定的一个小时会议时限，被 Whitman 限制为 12 人。有一个惠普退休员工说他支持以色列，但希望公司的人权政策更透明一些，多少附和了我的要求。那一个总是来股东大会支持董事会的白人老头攻击第 7 号提案者（教会）对以色列的批判。有几个忠诚的老股东（其中一人还拿出公司创始人当董事时的图片）抱怨股价下跌太厉害，恳求现董事会负起责任来。加州公务员基金（美国最大的机构基金股东）提出董事会主席的独立性问题，被 Whitman 圆滑地化解。令我感到意外的是：SEIU 工会（有二百五十万会员）的代表不提人权问题，而是追问惠普董事会在收购英国软件公司 **Autonomy** 失败上的责任。我本来希望与他们合作，改进高盛集团、苹果公司等的人权政策，看来不能指望美国工会的律师和脱产专职人员了¹³⁶。

¹³⁴ 董事会列出了几个相关的“外部机构”，如 BSR，但我从微软那里知道它们多是“企业俱乐部”，由企业付会费“外包”，为企业提供咨询。

¹³⁵ 赵京：“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¹³⁶ 因为被克林顿-戈尔出卖而成立劳动党的全国组织人 Mark 是个很好的工会负责人，可惜弱小的劳动党在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法案通过后，“大功告成”解散了。

总的看来，今年的股东大会毕竟比去年有所进步，我把惠普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 CSRI 也从 C+提高一级到 B-。会议结束后，自由亚洲电台的朋友来采访，我总结到：利用股东提案这个阿基米德杠杆推动惠普的人权政策改变的基本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下一步目标是与惠普业务类似、但像“动物农庄”那样对待产业链下端的富士康那样的公司的劳工的苹果公司。¹³⁷

[2013 年 3 月 20 日]

¹³⁷ 赵京，“Apple，难啃的苹果”，<http://cpri.tripod.com/cpr2013/apple-policy.pdf>

11.1 首次参加 VISA 股东年会

几年来，我参加了一些硅谷的高科技公司的股东年会，但今天第一次到美国西海岸的金融中心旧金山市内参加 VISA 的股东年会。VISA 在 2010 年发行 18 亿张信用卡，处理金额总量达 5 万亿美元，比中国的 2009 年 GDP 略高一点。

会议在金融区的旅馆 Le Meridian 召开，因为还需要事先报名，总共只有五十来人参加。在 WikiLeaks 维基泄密事件中，没有国际政治经验的 VISA 简单地停止了 WikiLeaks 的信用卡支付，遭到 WikiLeaks 支持者的网上群起攻击。我本来还期待可以遇到来抗议的 WikiLeaks 支持者，也通知了大赦国际等人士来出席会议，但看来他们果然是华尔街日报责骂的“网上安那祺主义者”，不会面对面地“扰乱”金融秩序。我进入会场后迅速浏览会议规则，也不想这样的小规模人数的会议上“冲击”金融秩序。

十个董事中，除了一个来自香港外，别的都是白人，与硅谷的高科技公司的气氛略微不同。今天投票的七个提案，除了选举董事和会计行，主要是关于高层的报酬。每当我读到股东年会资料花费主要篇幅讨论公司高层报酬的天文数字（例如，VISA 的董事会主席兼执行长 Saunders 2010 年报酬是 12,914,881 美元，比 2008 年 17,974,496 美元有所减低），尽量麻木不仁，因为我完全没有力量挑战这个资本主义的原罪。我更强的动机是对这些金融大亨们进行基本的国际政治教育。会上只有一个女士股东问到医疗保健的问题，被公司秘书长一句话就打发掉了。我等到正式会议结束后，最后提问，用 WikiLeaks 事件中 VISA 的对应，指出 VISA 没有一个人权政策来对应全球化的业务。Saunders 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泛泛地回复说“按法律办事”，与几年前雅虎的执行长对我的同样提问的答复相同。我没有让他难堪，只要求会后继续讨论，他同意了。会议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会后，Saunders 介绍我与 Ellen Richey 女士交换意见。她是公司的 Chief Enterprise Risk Officer 企业危机主管。她说 VISA 还没有在中国运营，但承认在俄罗斯、中东等处 VISA 面临人权方面的困难选择，而公司确实没有准备好全球性的人权等问题。我介绍了自己推动硅谷高科技公

司人权政策的例子，双方同意继续交流。像 VISA 这样的对人类生活有着如此切身影响的公司，董事们居然没有人权意识，很让我不安。晚上我回到家中，立即给 Richey 发去电子邮件，确认今天的会议、会见内容，表示会帮助 VISA 采纳人权政策。

[2011 年 1 月 27 日]

[附：至 Ellen Richey 信]

Dear Ms. Richey:

It i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at today' s shareholders meeting. Thank you for the frank communication that Visa is not prepared and needs prepare for the very complicated human rights issues (such as the WikiLeaks Incident and the Israel vs. Palestine conflict) that every global company has to face to.

As I expressed at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I am very concerned of Visa' s global business without a human rights policy. This concern is based on my experience with Yahoo, Google, Cisco, Chevron and other companies for many years. You can refer to my proposal to Google' s shareholders meeting last year which nonetheless helped Google to change its human rights policy:

http://investor.google.com/documents/2010_google_proxy_statement.html.

I especially want to point to Chevron' s response to my proposal last year for your reference on how Chevron improved its human rights policy:

<http://www.chevron.com/documents/pdf/Chevron2010ProxyStatement.pdf> page 83. You can also find my ongoing communications with Cisco and other companies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4.html> .

It is not late to act now for Visa to adopt and implement a human rights policy. I suggest you start with Visa' s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placing human rights policy as one core issue in it. As shareholders for myself and for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 am happy to help.

Sincerely,

Jing Zhao

11.2 再次关注 Visa 公司的高层报酬哲学

2011年，我第一次参加 Visa 公司的股东年会¹³⁸，但没有深入关注它的企业治理。2019年7月23日，我正式向 Visa 提交付诸 2020 年股东会表决的提案，要求改进 Executive Compensation Philosophy/高层报酬哲学¹³⁹。我注意到有不少大公司都付费给 FW Cook 咨询行，提供高层报酬的建议。其实，设计一个参数模型算出一个数目并不难，这也正是我的研究生专长（社会学方法论），不过我不能在提案中引用自己的研究结论，所以希望别人从事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可惜，所有的商学院、法学院都以受雇为目标，不可能做出独立的研究，结果，只好由受公司雇佣的 FW Cook 这样的咨询行给出公司董事会想听的建议¹⁴⁰。我的提案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形，从 CEO pay ratio/与雇员报酬中值的比值开始。多年来，高层报酬的高升“气球”成为社会问题，引起公众和政府重视，从去年开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公布 CEO 与雇员报酬中值的比值，正好为社会活动人士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客观数值。Visa 2018 年 CEO 与雇员报酬中值的比值是 147，作为超级国际公司，如果与日本大公司的不到 20 的比值相比，所要做的改进，一目了然。我的提案也引用《华尔街日报》2019 年 3 月 17 日的报道：S&P/标准普尔 500 强公司中 132 家公司 2018 年 CEO 的中值是 12.4 百万美元，而 2017 年是 11.7 百万美元。这样的趋势不仅是个人贪婪的社会不公问题，更是无法持续的美国经济和金融的系统问题。

8 月 12 日，我与 Visa 的 Senior Counsel and Assistant Secretary/高级律师兼助理秘书长 Katcher 女士以及另外两位公司管理人员通话讨论

¹³⁸ 赵京：“首次参加 VISA 股东会”，2011 年 1 月 27 日。

¹³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9/visa_proposal_2020.pdf

¹⁴⁰ 它实际上也做过一些客观的调查，如 2018 Global Top 250 Compensation Survey https://www.fwcook.com/content/documents/publications/12-17-18_FWC_2018_Global_Top_250_Final.pdf，只是它不会提供公司不想听的信息，如日欧企业高管的报酬远远低于美加的企业高管。

我的提案，时间不够，约定再谈。五年前，Katcher 女士在 Symantec 公司任职时邀请我就我的人权提案去公司会谈¹⁴¹，给我留下很好的专业印象，这一次，她也很尽职地力图在我（股东）和董事会之间传递、沟通，令人感谢。其间，我又于 8 月 19 日向苹果公司提交了类似提案¹⁴²。8 月 22 日，我再与 Katcher 和另外一个公司管理人员通话，充分表达了我的提案的背景、意图、立场和理由，达到了交流的目的。我又引用今天的 The Economists 封面文章 “What companies are for” 提及的特别是美国大公司的危机和 CBS 新闻 8 月 14 日的报道：“40 年间，CEO 的收入增长 940%，但普通员工只增加 12%”¹⁴³。他们两次会议都强调 Visa 在旧金山湾区，比别的公司的报酬哲学好多了，如在硅谷并不算大的电子艺术公司，2018 年 CEO 报酬是 35,728,764 美元，2019 年 CEO 报酬与雇员报酬中值的比值为 200, Chief Design Officer/设计总管是 48,385,837 美元¹⁴⁴。当然，我和董事会之间在高层报酬哲学方面分歧巨大，不能两次会议就互相达成妥协。Katcher 最后问我，还有什么意见要转告给董事会吗？我举出日本的例子，据说丰田等大公司的高管最高的奋斗目标是退休时希望得到一枚天皇颁发的勋章，难道美国的 CEO 们除了金钱就没有更高的荣誉追求吗？

我尊重 Katcher 他们作为公司律师/官员的功能，同意如果这次提案得以在明年的股东会议付诸表决，以后可以非正式地与他们交流，不必/不再正式提案付诸表决（也迫使董事会必须发布反对声明）。我也相信她不会排除这次提案，因为那样的话，双方就只好诉诸 SEC 的裁决，如果这一次没有得到表决，我一定会每年略加修改不断提案，直到得以表决为止。

与每次都雇佣律师行排除我的提案的苹果公司相比，Visa 是相当友

¹⁴¹ 赵京：“世界最大网络安全公司的股东提案”，2015 年 11 月 3 日。

¹⁴²¹⁴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9/apple_proposal_2020.pdf

¹⁴³

<https://www.cbsnews.com/news/ceo-pay-in-940-more-than-40-years-ago-workers-make-12-more/?ftag=CNM-00-10aac3a>

¹⁴⁴ 赵京：“Electronic Arts/电子艺术 2019 年股东会议提案”，2019 年 8 月 8 日。

善的。我向其他公司提交明年股东会议的提案都会专注高层报酬，因为这是美国企业治理几十年来没有得到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和挑战，任重道远。

[2019年8月22日]

12.1 帮助 Intel 英特尔改进企业社会责任

2010年10月6日，我致函英特尔公司秘书长 Cary Klafter，提交公司2011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英特尔是超级跨国公司（正式员工82,500人，市场价值1,198亿美元），我不想浪费不必要的精力，就单刀直入地介绍自己的背景和工作，特别是去年在谷歌、雪佛龙、新闻集团和思科的股东大会上付诸表决的类似提案，指出英特尔的“公司治理、政策和指南”中，薄薄的两页“人权原则”一项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与我向别的公司一样，我的提案要求设立“人权委员会”，审视和处理公司的全球人权事务。

12月21日，我接到公司 Assistant Secretary & Senior Attorney 助理秘书长和高级律师 Irving Gomez 的电话，我们商定12月28日举行电话会议，除了我们外，公司的代表实际上是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Office Director 企业责任办公室主任 Michael Jacobson。

12月28日的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互相介绍情况。他们比较老练，知道我不可能简单地撤回提案，同意用书面交流继续对话。

没想到，新年过后，我接到律师事务所 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 的快件。我马上记起正是这家律师行去年受雇于 HP 惠普拒绝了我的提案，它对我被别的公司（波音、雅虎等）拒绝的历史也“了如指掌”，要求 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如法炮制”，就英特尔排除我的提案的行为“不采取行动”。Gomez 同时打电话给我，解释说，英特尔是个超大公司，各个部门对我的提案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答复，但公司必须在股东大会的80天之前报告 SEC，所以法律部门先雇用律师行汇报上去再说。他请求我不要再向 SEC 反诉，保证公司会与我就人权问题继续沟通。

2月2日，我赶到英特尔总部，与 Jacobson、Gomez、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Office Operation Manager 企业责任办公室运行经理 Gary Niekerk、人事部门 Mary Doyle、还有在电话上的人事部门的另一位女士和“隐私与安全”部门的 John Miller 共6位公司各部门代表对话。我介绍了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工作，并赠送《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企业社会责任》给英特尔，他们也回送《2009-2010 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以技术创新推动社会创新》手册。我还专门带去人到中国的两年纪录，说明在一个非民主选举的国度，任何国际企业都必须倾听民众的意愿，看看两周前的突尼斯革命和正在进行的埃及反叛吧！而只有我们可以为美国的企业与中国的民众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会议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可惜他们没有 12 月 28 日的书面整理（他们解释说，怕我诉诸法庭，留下证据对英特尔不利），再加上另有 4 人新加入，我们重复了上次的一些内容。基本的关注在于：一、英特尔的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政治责任，只讲服从美国政治规范，没有谈到应对国际政治的原则和政策。二、英特尔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讲了许多气候、水资源、节能等问题，没有涉及在非民主国家做生意时的人权原则，没有一个制度性的机制防止雅虎那样的丑闻/犯罪发生；英特尔既然承诺“保持最高的商业道德规范”、“在发生冲突时遵从更高的原则”，又是“联合国全球契约”成员，就应该在除美国之外资源投入最大、机构设置最全、最大销售市场和战略核心的中国等国家特别注意人权问题。三、英特尔的教育、社区服务等非赢利贡献，只局限于政府认可的 NGO 组织，并没有直接帮助真正最需要帮助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英特尔与清华大学合作较多，但“出土”大批国家官僚的清华，本来也应该倡导民主。我以自己 1980 年参加中国唯一的一次自由学生会选举、83 年力图再次举办自由学生会选举而被发配兰州为例，解释清华大学早已堕落为政治专制的帮凶，在合作时要注意政治效果。例如，英特尔捐助了四川地震救灾，但为人道中国直接向民众发放救灾大米等物资的黄琦却被判了 3 年半，英特尔在成都的生产线这么大，不应该回避政治责任。影响远大于许多国家的英特尔应该着眼于长期的发展，而在这一点上，只有我们能够帮助英特尔。四、英特尔的业务，包括收购互联网安全公司 McAfee 后，已经不是单纯的硬体制造商，而深入涉及用户信息等生活层次，现在就开始规划，可以吸取雅虎和思科、谷歌等公司的教训。英特尔本身不便向这些对手取经，这正是我同时作为英特尔股东的方便之处。为此，同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过的“隐私与安全”部门的 John Miller 表示要进一步与我交流。五、英特尔表示欢迎包括股东在内的公司外部人士的任何建议，我指出英特尔过去的类似交流，社交和宣传的成分居多，而我们可以提供实质性的贡献。例如，它的社会责任报告，可以事先邀请我们义务咨询一下，比其“自圆其说”更科学一些。

在会议开始，负责法务的 Gomez 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像对 VISA 公司那样先礼后兵，而是“突然袭击”英特尔，一下子就提交提案？我表面上答复说，VISA 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中国，英特尔 1985 年就进入中国了，英特尔更重要。但心里好笑不已：如果不这样，你们会重视我的关注吗？会议最后，Gomez 又盯着我问：你能不能撤销提案？我胸有成竹地答复说，提案放到股东大会让全世界所有股东来投票，对你们是一个难堪，但并不是我的目的，只要能达到推动人权政策、改善企业社会责任的目的，我同意撤回提案。其实，我知道，即使我撤回提案，SEC 已经备案并将公布于网上，再加上今天的会谈，我的最基本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同意会后用书面做成一个备忘录，继续人权和企业社会责任对话，撤回提案。

公司的人权政策和社会责任原则，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全球性挑战，对于特别关注言论、新闻、结社等自由的人士，一百多年前的安那其主义战士伯克曼正是我们的先驱。面对卡内基的代理毫无人性地解雇、赶走几百户走投无路的工人家族，伯克曼、艾玛等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几乎要出卖肉体），买一只破枪不远万里跑去教训美国的资本阶级代理，虽然被判刑 22 年，也迫使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大亨们稍微改善了一点人性。人类社会毕竟在进步，我们今天应该比伯克曼们做得更多、更好。

[2010 年 2 月 3 日]

12.2 推动英特尔、思科和清华的信息通讯技术与学术的自由

2011年2月2日我在英特尔总部与 Jacobson(企业责任办公室主任)、Miller(全球公共政策高级法律顾问)等6位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就人权和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后¹⁴⁵, Jacobson 2月22日做成一个书面备忘录,并承诺在此基础上继续对话¹⁴⁶。我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撤回我的人权提案。3月2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被英特尔收购的软件公司 McAfee 为中东的集权政权提供压制民众的通讯自由的业务,我立即致函英特尔表达担忧, Jacobson 马上回复,欢迎再开对话。为此,虽然我很想参加4月4日的股东大会,特别想就英特尔在中国的业务询问董事候选人 Charlene Barshefsky¹⁴⁷、就信息自由询问董事候选人 Susan Decker¹⁴⁸,但为了安抚英特尔就没有出席大会。我同意在股东大会后,介绍我的老伙计 Morton Sklar 来共同帮助英特尔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巨头在介入信息服务业务时面临的人权挑战。

4月14日,我赶到英特尔与 Jacobson 和从中国回到美国总部开会的首席企业责任官杨钟仁会谈。杨介绍了英特尔在中国帮助建设公民社会的“社会创新”活动,比别的跨国公司先进。我指出英特尔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局限(例如,只能资助官方的“民间”机构、不能接触敏感社会问题、人士等),介绍人道中国对中国维权运动的支持, Jacobson 让我起草一个方案。我第二天立即致函他们一份人道中国与英特尔的联合“社会创新”项目:“对中国底层少年儿童的人道援助”,还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

¹⁴⁵赵京:“帮助 Intel 英特尔改进企业社会责任”,2010年2月3日。

¹⁴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Intel_Zhao_letter.pdf。

¹⁴⁷ 她 1997-2001 年期间作为美国贸易代表,主导了与朱镕基政府就中国加入/回归 WTO 的谈判。股东大会资料介绍说她“提供在中国做生意的丰富专长,英特尔在那里有重大业务”。英特尔知道,我至少比她更有“在中国做生意的丰富专长”。

¹⁴⁸ 我在 2008 年雅虎的股东大会上宣读师涛母亲致股东大会信后,亲手把信交给她。

5月6日,我再次赶到英特尔与 Jacobson 和 Miller 会谈, Sklar 在东海岸从电话加入。Miller 具体负责英特尔吸收 McAfee 的法律政策,我们在这次会议中特别讨论英特尔加入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 (GNI, 全球网络倡议)的可能。GNI 由微软、谷歌和雅虎三家互联网巨头创始,其简单的中文介绍为:“全世界各地 - 从美洲到欧洲、中东、非洲和亚洲 -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业的公司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来自于当地政府的压力,要遵从可能会与国际公认的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相冲突的其国内法律和政策。”“对此,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公司集团、民间社会组织(包括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团体)、投资者和学者花了两年时间协商,建立了一个合作方式,以保护和促进信息与通讯技术业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并形成了推动这项工作的倡议。”“这些原则旨在获得全球性的应用,其根据是国际人权法律和准则,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¹⁴⁹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力劝 GNI 成员之一的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也共同与会,未果。我感到不解,但 Miller 告诉我们,伯克曼中心实际上在与英特尔合作。哈佛只是不愿意由我们来主导而已。其实,保护和促进信息与通讯技术业的言论自由和隐私,需要全球各种领域的全方位参与,我们资源有限,很高兴为大家作垫脚石。将来,我还计划邀请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机构的参与呢!

这次会议只计划一个小时,再加上 Sklar 从电话加入,完全没法展开我们准备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人权原则、员工守则等一些列重大课题。Miller 给我一份他和同事制定的“英特尔全球数字基础建筑政策”建议¹⁵⁰,邀请我们参加夏天举行的公司整合会议。后来,英特尔解释说我们不适宜参加他们的内部会议,而改为会后 8 月 23 日,由 Jacobson、Miller 和 Suzanne Fallender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通讯部门主管)与我们开会。我的观点英特尔已经基本上了解,专程从东海岸赶来与会的 Sklar 主导这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议。针对面临信息内容服务的 McAfee 业务,我们介绍了帮助谷歌、雅虎、思科等软件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提

¹⁴⁹ <http://www.globalnetworkinitiative.org/international/chinese.php>。

¹⁵⁰ John Miller & David Hoffman, Sponsoring Trust in Tomorrow's Technology: Towards a Glob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olicy, 2010, Intel.

出如何在组织机制上防止出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政策，同时建议结合企业社会责任，预先设立救济基金等。我以自己的中国工程专业和政治难民背景，指出在制定国际信息与通讯技术业的政策方面的特点和政治困难。我特意把8月19日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同学张林的电子通讯译给英特尔。以下是部分摘要：“贾春旺跟我还都是工物系出来的，也见过面，但是他当安全部长时照样打击过我。LYZ……后来担任全国学联主席时还专程到我家乡蚌埠调查我的背景，也参与过对我的打压。……清华现在的两个副书记SZK、CJP，前者跟我在一个宿舍住过一年（不过我在参加校庆时才突然意识到他那时就奉命监视我），后者也算同学加老乡，这次在北京还一起喝过酒……。张朝阳是我同班同学，但是根本不愿单独见我，连个名片都不愿给。/我参加完校庆之后，最大的感叹就是，这帮人惟利是图，如此堕落！”

英特尔和波音¹⁵¹等大公司都在清华设有研发据点，但它们不愿、不敢、不能向清华提出人权、自由等议题，而清华更严重的问题还涉及到学术自由的担忧。2011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清华百年校庆，我懒得去管那些闲事（包括硅谷的校友会活动）。我倒记得30年前校庆时，自己作为一年级新生，被分派接待上海来的老校友，其中有一个叫“黄菊”的男士。1985年毕业时，我考上当年国家教委唯一的社会学专业公派留学生，计划学成后回到清华。我后来也写过几篇关于清华的文章，但在常年的无国籍难民岁月里，“我已经抛弃回到清华‘创建中国社会学’的梦想……，认为必须解散、摧毁清华、北大这些已经堕落为当代奴隶制（所谓‘中国模式’）的精神帮凶机器。”“不会象别的权贵……那样也跑到清华、北大这些摧残自由的交易处去凑热闹”¹⁵²

去年我开车去见老校友万润南，他笑我是清华的异端。其实我在校期间，已经选定做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视金钱、权势为罪恶，现在能享受人身自由，已经比苏格拉底等幸运；倒是他作为校学生会主席和国家主席

¹⁵¹ 我2010年提交的人权提案被排除了。赵京：“推动Boeing波音公司人权政策的尝试”，2010年4月6日。

¹⁵²“乔姆斯基教授的限制性”，2010年9月8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omsky.pdf>

的“驸马”，与我同享自由的流亡生活，连现任岳父（李昌）去世，也无法回国告别。

说起来，李昌与别的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加入中共的清华学生如姚依林、胡乔木、蒋南翔等在当时也是异端，后来都成为权倾一时人物，为绝大多数清华学生所向往。不同的是，李昌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保持了年青时的异端精神。据清华的另一个“异端”介绍：“1989年4月22日和5月3日，受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委托，杜润生邀请了李锐、李昌、于光远等老人在科学会堂开了两次会。在会上大家对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情，建议政府采取坦率、公开、真诚的态度和学生对话，按法制渠道解决问题；提出了‘防止矛盾激化，不宜压制，绝对不能流血’的希望。他们还建议趁此机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推进民主，制订新闻出版法，以及取消干部特殊供应，压缩特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解决高干子弟以父兄的权力谋私的问题。……5月13日发生绝食以后，李昌坐立不安，他连续不断地给几位老同志打电话，商讨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平息学潮的办法。5月25日，他给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秘书打电话，提出他想约几位原来在大学里做过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劝说学生返回学校，部队不进城，尽快恢复秩序。”“进入暮年，李昌冲破了几十年的思想禁锢，反思自己曾经为之而奋斗所建立的体制。2006年12月10日，李昌92岁寿辰与老友小聚时，有过一番痛切的表述：中国有一个封建附庸的等级体系，这个体系最上面是帝王，下面都是奴才。解放后封建附庸思想影响还很深。……这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¹⁵³可惜李昌没有留下自己作“奴才”的回忆录。我想，他主要顾忌那些更高级的奴才校友如姚依林、胡乔木、蒋南翔等。

有趣的是，另一个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加入中共的清华学生倒留下了书名为《思痛录》的回忆。官至人民文学社长、总编辑的韦君宜在这里很诚实，羡慕那些二流的清华学生到美国留学当上教授等。在书的最后一章特别写老上司：“周扬这位从延安起一直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导干部

¹⁵³杨继绳：为国为民心坦荡——读《李昌传》。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847.html>

的人物，做过无数次报告。那时真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同志的一生事业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¹⁵⁴。她也说这本书“还不可能完全说透”（主要指对毛泽东的批判），并准备到海外出版。韦君宜特别对她的丈夫杨述（又一个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加入中共的清华学生）悲哀。我在为韦君宜这些校友的命运惋惜的同时，不由得对比起俄罗斯革命事业中的贵族女性（例如，因为参加1881年3月1日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在狱中度过22年时光的俄国革命团体民意社的成员妃格念尔¹⁵⁵）所从事的高尚事业和动人的人道精神。除了当大官、赚大钱、捞大名，清华就没有干大事业的校友吗？归根结底，中国的知识阶层在政治生活中丧失了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不可能指望他们担负起精神引导的功能和使命。

话说回来，知识阶层丧失了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倒不是毛泽东治下才有的特殊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统治中国的清华校友们既不象帝王，也不是奴才，而是国家官僚资本利益集团/阶级的看门人和代理、演员，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在他们眼里值多少钱？前几年，我见到来美国的前后两个校党委书记贺美英和陈希，当他们知道我在1989年被驻日公使唐家璇勾结日本政府迫害被赶出日本的大学，逃到美国后一直没有国籍时，赶忙把“除了4/9政治局常委”的话题转换，声称“清华与外交部没有关系”。其实，陈希在校短跑队时，我在长跑队，他后来官至教育部常务副部长（部长是另一个清华校友），而我1990年后被教育部贪污的公派留学奖学金至今都没有一个书面说明。前不久，美国能源部代表团访问清华，一个成员对我提到接待他们的清华的现任头号副校长KKJ，我才想起此君在1980年中国唯一的学生会选举时跑到我们宿舍来污蔑电机系的独立候选人赵国杰“偷吃同学奶粉”。KKJ因为学业不佳没法留学（中等以上的清华同学毕业后都可以考上留学），只好留校。在1989年的民族悲剧中，江泽民跑到清华来找打手，教师同学们毕竟还有起码的良心，多不耻于此

¹⁵⁴ 韦君宜《思痛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90页。周扬的忏悔，得罪了新的权贵，被新的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收拾了。

¹⁵⁵ 薇拉·妃格念尔《狱中二十年》，巴金译，三联书店1989年。

行当，但 KKJ 却由此发迹。看到我们多少还有点自豪的清华大学如此堕落¹⁵⁶，就不用提整个中国的学术自由的悲哀了。

不过，话说回来，西方的学术界也是半斤八两。日本的以国立大学（来源于帝国大学）为主流的知识阶层，在 1989 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中，伙同国家政权（文部省、来源于“特高科”的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出入国管理局、东京警视厅、中国驻日使领馆等）出卖、迫害我们中国留学生，早把所谓的“学术自由”拍卖得一钱不值。我 1995 年逃到美国来以后，刚开始还卖劲地突击英文，编辑、写作以日本政治为主的论文，但我很快发现美国的日本政治研究主流，其实掌握在日本财团的手中，哪肯容忍我这样的异端批判？例如，我用心血完成的论文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 最后只能拿到西班牙去发表。

前不久，我所属的中国政治研究会 ACPS（应该下属于美国政治学研究会）为了与国际关系学院在北京于 10 月 22-23 日为召开纪念中国进入 WTO 十周年学会征集论文，我根据几年来在美国推动企业人权政策的经历写了一篇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Human Rights Policy and China*（国际企业的人权政策与中国）论文提交。没想到在美国的 ACPS 的政审功夫也很到家，害怕我的论文会得罪东道主，特别声明“不是因为内容”、而是“位子不够”拒绝了我的论文。本来，由于很少会员投稿，ACPS 连续几次发出通知，请求会员投稿，虽然优先考虑完整论文，连论文概要也接受。我为了得到签证¹⁵⁷，提前一周提交全文，并加以说明。这大概引起了 ACPS 审查官的政治警觉，他们竟在 8 月 19 日投稿截止日还没有过去（即还没有收到所有可能的投稿之前）就匆忙以“位子不够”的荒唐借口打发了我。我不由得联想起几年前，中国国内爆发抗议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游行，中日关系引人注目时，我正好在 ACPS 的年会宣读中日关系论文。在中日关系的分科会上，除了我以外，别的所有学者都以英文为母语且不懂日语，年会的赞助商《星岛日报》的记者在采访我们时，我又同时用中文简述了我的

¹⁵⁶ 我与校长顾秉林见过一次面，感觉他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典型。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我的父母，与中国的民众一样，都有良知，但也很容易受国家权力摆布。

¹⁵⁷ 去年我无法从旧金山领馆得到签证，只好先到东京大使馆才得到签证。

论文的概要，特意指出1989年天安门悲剧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后来，我吃惊地注意到，在配有醒目照片的报道我们的中日关系分科会论文的整个半版新闻中，完全遮掉了我的头像、名字和论文。本来，在美国靠吃“中国政治学”饭，属于爱玛·古尔德曼所同情的“知识无产阶级”，并不容易，但ACPS的头头们这样为了讨好主人，把学术自由出卖得如此廉价，还有什么必要打着“研究会”的招牌？

比较起学术界来，英特尔对于自由倒更货真价实。在我们推动人权进步的艰难进程中，英特尔愿意与我们进一步合作，共同解决包括社会创新的难题，使我们感到一丝欣慰，坚定了继续工作的信心。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老对手思科。因为全球网络倡议本来以“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产业为主，就希望思科的加入，但思科却以“我们不从事信息的业务”为由逃避开了。

2010年9月3日我们与六位思科高层主管的会谈标志着思科人权政策的进展¹⁵⁸，我在9月9日至思科的信中也透露出乐观：“感谢你们就股东关注的人权问题继续与我们对话，特别是安排公司多位高层官员出席9月3日的会议并以开放和负责的态度参与其中。我们很高兴能以建设性、合作的方式与你们分享我们的经历、观点和想法。/我们希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相信我们的主要主张已经被你们理解和接纳。我们的主张是思科需采取更实质更具体的步骤来实施、加强公司有效处理潜在影响人权事务的政策和行为的能力。公司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如Chandler先生所明示的——承诺遵守人权、建立评估人权风险和后果的内部程序、（不像许多别的竞争者，而）“自愿”采纳不输出能被用于监视人权和侵害人权的产品、技术和软件的政策——当然符合我们的期待，也和我们的担心一致。”我们进一步提出下一次会议的行动计划，如建立人权顾问小组、建立并公开公司的内部人权评估机制、在公司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增加并加强对人权问题的关注，等等。¹⁵⁹

¹⁵⁸ 赵京：“推动Cisco思科人权政策转换的谈判纪实”，2010年9月3日。

¹⁵⁹ 赵京：“就人权政策致思科公司的通讯（3）”，http://cpri.tripod.com/cpr2010/zhao_graves20100909c.pdf。

没想到思科用一些技术性的理由拖延对我们的回复,直到10月29日,公司秘书长 Chandler 才正式答复我们,语气却从9月3日的会议倒退了一大步:“我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提供标准配置的互联网设备、拒绝为客户定制可能促进互联网审查的设备、积极反对政府图谋通过监管体制“分割”互联网的努力——是确保全球享有互联网言论自由的最好方式。”“尽管我们理解让一个像思科这样大的跨国企业注意到言论自由问题有潜在好处,但基于上述理由,我们相信向我们提这些问题并不适当,贵方也达不到预期目标。我们相信我们支持的政策以及我们的实践做法代表着我们在确保开放和自由的全球网络以最大限度促进言论自由方面已竭尽所能做到最好。”他同时提供一份包括惠普、诺基亚、IBM、McAfee、华为等通讯公司的名单,让我们也去追究这些对手¹⁶⁰。我11月9日不得不致函 Chandler 从五个方面再次确认我们在以前的通信中已经提过的主要关注和看法,并要求思科承诺过的原计划在10月召开的行动会议¹⁶¹。11月18日,在我回到阔别23年之久的重庆的当天,我的人权提案在思科的股东大会上付诸表决。

我最初介入企业的人权政策,目标只是股东提案,面对思科这样的巨轮的政策性倒退,一筹莫展。Sklar 不愧为良师益友,鼓励我“愚公移山”,坚持不懈:“除了坚持,直到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我12月9日、2011年1月13日、1月26日不断发出 Sklar 起草的长篇信函,终于在半年后的3月14日,在以突尼斯、埃及革命为主导的阿拉伯之春重新激发了全世界对信息和通讯自由的关注的背景下,我们重新与 Chandler 和投资部门高级主管 Graves 再次会谈。我们提出了准备已久的行动计划¹⁶²,却遭到思科的违背承诺的拒绝(部分理由是思科业绩、股价的大幅下跌)。我觉得会谈已经破裂,无法挽回,幸亏 Sklar 无愧于耶鲁训练和几十年法官生涯,在最后关头迫使思科至少同意继续交涉。我3月16日、5月20日又不断致函思科,意外地得到 Chandler 正面回复,不仅同意继续会谈,他

¹⁶⁰ 原文在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fromchandler.pdf>。中文译文在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fromchandler_chinese.pdf。

¹⁶¹ 原文在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tochandler.pdf>。中文译文: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tochandler_chinese.pdf。

¹⁶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isco_action_plan.pdf。

本人还要亲自主导，与我们一同改善公司的 code of conduct 员工规范等具体事项。

我们终于确定在 8 月 25 日再次举行会议。在此之前，我接到《华尔街日报》驻北京和旧金山的记者来电询问思科在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为了维持继续与思科交涉的机会，没有提供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以外的情况。7 月 5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这两个记者的长文，批判思科帮助重庆政府建立防范系统监视市民¹⁶³。Chandler 在 7 月 6 日发给我的电邮里委屈地解释道：“思科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在中国出售摄像监视设备和管理软件。实际上，重庆向思科提供了出售这些产品的机会，但思科拒绝了。”在 8 月 25 日的会议中，Chandler 再次提出这一点，说思科的中国部门抱怨为什么别的跨国 ICT 公司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中国做生意而思科却受到这么多限制。他几次不耐烦地挥舞惠普的电脑包，抱怨道：“你们怎么不去找惠普呀？”¹⁶⁴“别提谷歌了！它不做恶的话，干吗要收购诺基亚？”我可以感觉出他对我的愤怒：“你的人权提案帮助了思科的对手，使我们失去了这么多生意。作为股东，你的投资损失也活该！”我回答说：我希望公司在中国、特别是在我的家乡重庆开展业务，为此，我们先要改善公司的人权政策。

Chandler 一个小时后先离开在华盛顿的会场。说起来，他是最先直接交涉的最高企业官员，他的不客套的态度倒也是平等待人的作风。在接下来的与出席会议的 Kathy Mulvany（她参加了我们去年 9 月 3 日的会谈，现升为企业事务部门的高级主管）和 Penny Bruce（她代表投资部门，接替已经离开思科的 Graves，但没有给我们名片，所以不知其职称）会谈中，她们感谢我们的努力，确认思科继续听取我们建议的意愿，同时希望我们要耐性，配合她们共同说服惯于“进一步、退两步”的上司 Chandler，推动思科这条大船向已经沿着正确方向启动的路线前行。在感受到她们推却责任的失望中（思科因为业绩大幅下滑，最近裁员 10%），我也注意到思科的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例如，他们确实采纳了我最先的提议，向去年

¹⁶³ Loretta Chao and Don Clark, “Cisco Poised to Help China Keep an Eye on Its Citize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5, 2011.

¹⁶⁴我告诉他，我们 9 月 7 日将与惠普首次面对面会谈。

相对积极对待我的人权提案的雪佛龙公司取经¹⁶⁵；思科修改了“人权原则”，考虑向雪佛龙那样，加入联合国原商务·人权事务特别代表 John Ruggie¹⁶⁶ 提倡的 UN Global Compact（联合国全球协定，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市民协议）；思科不再坚持通讯技术与信息技术在人权、隐私、获取信息的自由等方面的差异，而愿意接受信息技术产业在这些方面的较为成熟的政策。我期待着思科最终会加入全球网络倡议。

有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提倡、坚持看似那么遥远、渺茫的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理想，我回答说：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唯一自由平等的形态。我以千万分之一股份的平民与被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难民身份推动英特尔、思科和清华这样的泰坦尼克巨轮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政策转变，虽然也经历过奇迹，在耶稣会的共同合作下帮助了雪佛龙公司的人权政策改变，但在绝大多数时候，都遭遇到数不清的挫折。在感动我们为之服务的上帝（普通民众）之前，除了坚持，直到胜利，没有别的选择。

[2010年8月30日]

¹⁶⁵ 赵京：“推动 Chevron 雪佛龙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验”，2010年2月1日。

¹⁶⁶ 现在哈佛任教：

<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john-ruggie>。

13 中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股东大会误导人权提问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www.petrochina.com.cn,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上海 A 股代号 601857, 香港 H 股代号 0857, 纽约 ADS 代号 PTR, 在 2007 年 11 月 2 日纽约股市达到每股 255.06 美元, 其市场资本达 4 千多亿美元, 超过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纽约 ADS 代号 XOM) 成为世界第一大公司。2008 年 10 月 21 日, 其股价下降到 82 美元, 市场资本为 1 千 5 百多亿美元。这一天, 它在中国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8 号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召开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美国股东去年呼吁投资大师巴菲特利用其大股东身分就人权问题向公司提议, 老谋深算的巴菲特在公司股价快接近巅峰时全部抛售, 既从专制操作的中国最大国有企业盗取高达 600% 多的利润回报, 又躲开了国际舆论的谴责。我们只好自己购入公司的股份, 利用股东大会监督其人权等政策, 也以此保护被剥夺了权利的普通中国民众的经济利益。我由于十多年来被北京当局剥夺了回国的基本公民权利没法回国去北京参加股东大会, 只好委托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曾女士代表股东 Andrew Zhao 出席。以下是曾女士的纪录:

[我准时到了开会地点, 经过登记、提交证明并按照要求存放了随身的背包, 进入会场时已经开始, 有人在读文件。到场的约有 50-60 人, 我坐了差不多十几分钟就有人把我叫出去, 说是没有找到股东 Andrew Zhao

的名字，看到他们反复查找这个名字，出来了五个 Andrew，可是都不是 Andrew Zhao，他们问是多少股，我说不知道，我是接受委托来的，旁边有个人说：“因为没有这个名字，主要是怕会是媒体人员”。之后来了个可能是领导的，他说可以让我进去听，但是没有发言和投票的权利。

戏剧性的是：会议进行到问答的最后，主持人说：现在是最后一个提问，请曾女士发言。好不奇怪！这时那个“领导”和一个小姐走来，递给我话筒。我说：“大家好，我的委托人股东希望你们对人权问题的政策”。此时会场有至少 5 秒时间没有声音，这时我听见我前排的男士小声的给他旁边的人说：“哦，人权”。突然，我后面的那个小姐夺过我的话筒，说：“她说想知道人员安全的问题”。这时有人就回答“安全”问题回答，会议又继续进行了。]

我们对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头头们在股东大会上将“人权”提问误导、偷换为“人员安全”问题，表示极大的遗憾和不满。股票市场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保护众多的小股民利益。既然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跑到美国来上市，就应该遵守相关规则，允许每一个股东在每一次股东大会上起码有一次发言机会，允许持有价值 2 千美元以上、时间 1 年以上的股东有权提案付诸股东大会表决。我们希望在下一次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上，不要发生类似的不愉快事态。否则，我们会诉诸一切合法手段讨回公道和正义。

[2008 年 10 月 21 日]

14 永新视博公司股东大会上的人权提问

China Digital TV
Holding Co., Ltd.

(<http://ir.chinadtv.cn>)

中文名为永新视博 (<http://www.novel-tongfang.com/>)，属于清华同方系统，2007 年到美国上市（纽约 ADS 代号 STV），2007 年 10 月 8 日股价达到最高峰 49.13 美元。2008 年 11 月 20 日以 4.84 美元收价。同一天，它在北京召开股东大会。



我请北京的沈婷婷女士代表我出席股东大会并提出人权问题，希望以此为楔机，帮助和教育中国企业的国际社会责任。既然永新视博公司在纽约上市，公司是否有关于人权的政策？例如，是否参考过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作为业务指导？

据沈女士介绍，她去参加了 11 月 20 日的股东大会，是参加这个会议的唯一股东，另外参加会议的人为公司的 CEO 和财务总监。整个会议进行了不到 20 分钟，在他们完成正规的会议程序之后（投票选举 CEO 等），沈女士提出了公司是否有关于人权政策的问题。公司负责人说公司遵守美国及中国的各项法律法规，也有专门的人负责劳动法的执行情况，但对人权事务很不熟悉。在我们的提问之后，公司以后会关注人权问题。

据我们了解，这是在中国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上，第二次提出人权问题。¹⁶⁷我们对于永新视博公司的态度表示理解和赞许，并愿意今后以我们在人权事务方面的 corporate governance 专长帮助永新视博公司在国际业务上的发展。我们同时也提请所有涉及国际业务的中国公司开始关注人权问题，越早越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2008 年 11 月 20 日]

¹⁶⁷ 第一次是在 2008 年 10 月 21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见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petro.pdf>。

15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

2008年11月29日，我接到 proxyvote.com 的 Important Notice Regar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Proxy Materials for the Shareholder Meeting 电子邮件，要我作为股东就12月29日召开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特别股东会议投票。不用说，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是中国国内运输飞机最多、航线网络最密集、年客运量最大的航空公司。



我立即在网上阅读相关文件，选择“出席会议”而不是仅从网上投票。不久，我收到了打印出来的投票证书。我马上与广州的维权人士唐荆陵联系，请他代理我出席会议，并送传真到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表达我的意愿。我们的基本目的是：1）了解走向国际化的原中国国营大公司¹⁶⁸的股东会议程序（希望比其上司北京政权尊重基本法制）；2）利用机会表达对人权问题的关注；3）帮助中国的海外上市公司在国际上做生意时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等原则。

12月3日纽约Mellon银行(BNYM)发传真给我，说BNYM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在美国的depository(存款者)，我的股份ADR只能通过Broadridge投票，再由BNYM代理投票。其中，这句In practice, ADR shareholders can not present themselves in person and vote their ADRs at the meeting（现实上，股东不能本人出席股东会议投票）隐含“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性质，把绝大多数的小股东民众排除在经济决策过程之外，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把人民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同出一辙。¹⁶⁹这正是我们要改变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既然跑到美国来上市，还能如法炮制，欺凌小股东吗？

我立即与BNYM联系，指出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拒绝我出席股东会议，

¹⁶⁸ 据公司2008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总资产为878.37亿元。见 http://www.cs-air.com/cn/investor/other/c_01055ann-20081029.pdf。

¹⁶⁹ 正如背着中国民众向华盛顿当局出卖中国民众利益的北京当局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谩骂广州市民是“刁民”一样。

侵犯了股东的基本权利。因为美国证券法规正是基于大萧条的教训而设立保护绝大多数小股东的，特别在今天，所有美国人的退休基金等都以各种途径流向股票市场，更需要保护小股东的权利，我保留向 Securities & Exchange Committee (SEC, 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申诉的权利。BNYM 马上理解了我的意向，说他们只管报告股东投票的结果，而没有权利过问股东是否能出席会议，并把我的出席会议的意向同时转送给我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我为了不把事态弄复杂，用信件送出了投票（而没有等到开会时才在会场投票）。

直到会议前夕，我没有收到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任何答复，就判断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不会违背常识阻碍股东出席股东会议。以下是唐荆陵的“南方航空股份 2008 年 12 月 29 日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情况汇报”：

[我于早上 9:20 到达位于新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的南航明珠大酒店。上到四楼的会议厅，门口正进行入场登记。

接待人员问我是否办理过股东出席登记，我答复说我是作为代理人出席会议，股东本人已经向公司进行了必要的登记。我看到桌上的股东签到表只有寥寥几个大机构股东。我报出我代表的股东名字并出示我的委托书、身份证等文书，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称不能确认我所代表的股东身份。我让接待人员再给予核实。后出来一位徐小姐，称赵京为 ADR（存托凭证）持有人，不属于 A 股、H 股股东，不具有会议出席资格。并称 ADR 持有人应向其经纪人表明投票意见。

我指出我来是要代表股东发表对公司经营相关的意见，如果公司在我方的出席资格上出现错误可能导致严重法律问题，且赵京先生已经就此事与南航公司取得了一致意见时，徐小姐声称已经就此问题咨询过中国和美国方面的律师，公司方面还曾向美国投行查询以便确认赵先生是否为 ADR 持有人，但对方声称因为隐私保护的理理由不能提供有关资料，故他们不能确认赵先生或者其代理人的出席资格。

经过交涉后，徐小姐声称愿意接纳我在会议旁听区参与，但不能作为股东代表发言。我进入会场。会场前方是排成正方形的会议区，围着就坐的为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见证律师、董事会秘书等成员。后方为旁听区，新闻党委办等在旁听区。会场左后方是董秘办的区域。出席会

议的董事长（代）为李文新。会议通过书面投票方式通过了拟订的议题。投票前，出席会议的两个大股东博时基金和国泰基金分别就具体经营上的一些问题提问并得到解答。在投票等待计算票数和休息的间隙，董事长到靠近旁听区的股东席上和上述两家基金的代表谈话。我趁机会直接和李文新先生打招呼，并表明我是代表美国的 ADR 持有人赵京先生来表达对公司经营战略问题的关切：一是公司方面是否注意到了在跨国经营中人权问题对公司发展战略的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案例？比如雅虎以及一些石油公司；二是公司方面是否对自己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可能产生的人权问题作过评估或将采取什么对策？李先生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请我和董事会秘书谢兵（该人列席会议）联系。我正和李先生谈的时候，董秘办的一个女孩子赶紧过来，很紧张地看着我们，似乎想阻止我们交谈，但因为整个谈话不长，她最终没成功。

投票结束后，会议于 10:15 分左右宣布结束，我找到谢兵先生，他给了我他的卡片，声称他知道我们的情况，因为他始终都得到过有关这个事情（我方准备出席会议和交涉的经过）的报告。他介绍董秘办的徐小姐（前面出来交涉的女士）给我，请我们将有关意见发给他们。

徐阳 证券事务代表 xuyang@csair.com

谢兵 董事会秘书 xieb@csair.com]

原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这些天默不做声，正是为了这样对付我们这样的小股东！我马上致信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附件 1），请其回答 1）：为什么不在会议之前答复我的出席会议意向的通知？2）拒绝我的代理出席会议的依据是什么？

2009 年 1 月 11 日，我接到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徐阳以 Company Secretary Office（公司秘书处）名义于 1 月 7 日发出的第一次对我的答复（附件 2）。这个答复表现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傲慢与偏见。它没有回答我的提问，也没有出示任何法规拒绝股东出席会议发言，还声称唐荆陵没有出示 effective shareholder's identification（有效证明）。如果股东投票证书不是“有效证明”，什么算“有效证明”？我（以及所有的美国股东）凭这个证书出席股东大会，从来没有被拒绝过，为什么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有权自行要求“有效证明”？

我 2009 年 1 月 13 日再次致函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附件 3），希望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诚实地对应。

1 月 21 日，我接到徐阳的电子邮件，问能否在北京时间 1 月 22 日上午 9 时与我通话。我立即答复可以。遗憾的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没有来电，让我空等许久。我只好于 1 月 26 日向 SEC（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申诉。

2 月 2 日，我意外收到来自北京的电话。原来是一家英国律师事务所 DLA Piper UK LLP 北京办事处的 Partner（合伙人）Liu 先生和徐阳女士打来的。我请他们把谈话的内容用书面表示，不久即受到 Liu 的电子邮件（附件 4）。我回函要求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确认 DLA Piper UK LLP 有权代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与我交涉，并再次声明向下一次股东大会提交书面提案的意向。

2 月 11 日，我收到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秘书谢兵的电子邮件，附带题为“谢总”的文件（附件 5）。这实际上是经历了这么多回合，代表公司的秘书给我的第一份正式回复，其中包含足以说明目前中国的一党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官僚资本（所谓“国营企业”）的国际化特征的信息。

首先，按照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章程第 76 章第 16 节，只有持有 3% 以上股份的股东才有权向股东大会提案。除了持有大多数股份的国家官僚，持有 3% 以上的股东几乎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唐荆陵“看到桌上的股东签到表只有寥寥几个大机构股东”。这“寥寥几个大机构股东”即使有个别股东持有超过 3% 的股份，也绝不敢挑战持有大多数股份的国家官僚，其结果使得整个公司被置于国家官僚的幕后黑箱操作之中。

更重要的是，像美国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置于股票市场支配之下，面对动荡复杂的股票市场，必然要求对普通小股东有更多的权利保障，而参与股东大会就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所以，不能由各个公司自行制定股东的权利，而必须由证券管理委员会来统一决定。例如，参照美国 SEC Rule 14a-8，持两千美元以上股票价值的股东就有权提案到股东大会表决，在中国，可以让持一万元股票价值以上的股东有权提案到股东大会表决，这样才初步体现基本的经济民主原则。要达到这一点，除

了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股民的参与外，¹⁷⁰更需要中国的民主化。¹⁷¹另一方面，黑洞操作下与国际帝国主义资本豪赌的中国“主权基金”也日益需要接受中国民众的监督管理。¹⁷²

其次，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有意划分出 **shareholder**（股东）和 **holder of ADRs**（**ADRs** 持股人），以我通过 **BNYM** 购入公司股票的路径为由把我定为 **ADRs** 持股人，进一步否认我出席（或指定代理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基本权利，是对“股份公司”制度的粗暴侵犯。无论通过任何第三途径（公司为了扩大吸资渠道，总要通过各种渠道发行股票，就如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通过 **BNYM** 在美国出售股份才吸引到我这样的小股东），只要能够证明持有公司的股份（正如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承认我持有其股份一样），就有权参加股东大会。按照美国设立 SEC 的基本精神和 SEC 保护小股东的基本原则，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这样的粗暴违反股份制度的股份公司应该被赶出股份交易市场。我于 2 月 20 日再次向 SEC 申诉，要求 SEC 履行职责，维护美国股份市场的公平和安定。

3 月 21 日，我终于收到 SEC 发出的日期为 3 月 11 日的信函回复我 1

¹⁷⁰ 这一次唐荆陵的参与就是一个先例。

¹⁷¹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金融资本的代理得意地炫耀他如何利用机会，促使江泽民下定决心实施股份制。这也由江氏的所谓“三个代表理论”（首先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体现出来。

¹⁷² 广州的巩胜利在《北京之春》2009 年 3 月号“谁能监管中国主权基金？”一文中问道：“中国外汇交易买卖，中国‘主权基金’进出海外，从来没有给中国纳税人、‘国家主人’——公民们任何交待”。“中国‘主权基金’没有透明度及中共党的政治意图，国家外管局很少发表公开声明，从未透露过投资标准及已经投资的产业，像‘黑道’一样格外掩饰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券，在中国国内从未公告过，就是号称最高权力——全国‘人大’也从来没有数字公布”。“中国拥有美国大量的国债和债券，这个决策是怎样出笼的？执行操作又是怎样做出的？由谁决定拍板，由谁批准执行的？操作过后为什么不向全国纳税人及全国人大报告？最关键的是没有‘阳光化’规则，有地下‘黑幕’交易”。“这相当于近两个 29 届北京奥运会投入的中国国家债券交易所佣金，又流向何方？有没有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难道不该公告、给中国公民一个交代吗？”“目前之中国，不管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是国家监察部，或是新成立的国家反贪局，以及中国银监会、国家证监会等所有中国监管机构，都无法对中国国家外汇管局及子公司操作外汇、运行进行有效的监控，没有形成任何监管机制能审查中投公司在中国之外及美国注册地的外汇账户。”

月 26 日的申诉（附件 6）。看来，SEC 把我的申诉编号为 H01312999 正在进行调查，但是告诉我，除非 SEC 通过调查，发现问题，决定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向司法机关提出起诉，否则不能通告我调查的状况和结果。我除了等待以外，别无他法。至于 SEC 是否会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出起诉，不容乐观。除了 SEC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忙于应付更大的案件无法调查我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这件“小官司事件”外，通过我与 SEC 打交道的经历，我更担忧 SEC 一贯的偏袒大公司的做法。因为 SEC 拒绝我这样的微小股民，没有什么代价，但要起诉大公司，会遇到大公司雇用的律师的抵抗，代价高昂。何况，在目前美国政府需要中国政府“帮助”之际，很难指望 SEC 会秉公劝告、指导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遵守美国法规而吓跑来美国上市的中国的国家官僚资本。

这件个案再次证明，不能指望任何国家权力会自动保护普通民众的经济政治权益。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只有我们每一个地球公民在自己的所在国度挑战、监督、改变政府的政治权力压迫和经济制度剥削，才是最有效的防止人类文明倒退的方式。

[2009 年 3 月 24 日]

16 从 Juniper Networks (瞻博网络) 股东年会联想到 占领运动和“六·四”人道基金

成立于 1996 年的瞻博网络公司近年发展较快，2010 年市值达 168 亿美元，员工超过 9 千名，运营收入达到 41 亿美元。连网络霸主思科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也被其侵蚀不少，怪不得思科的秘书长给我们开出竞争对手名单，希望我也能帮助改善瞻博等的人权政策。瞻博的网站自我介绍道：“我们相信网络是人类在知识、理解和进步方面最伟大的传播工具。我们致力于以新的理念和创新来满足网络世界的巨大需求。为此，我们正引领行业构建简单、安全、开放而且可扩展的新网络。”“我们的客户包括 130 家全球顶级电信运营商，全球财富 100 强中的 96 家企业，数千家联邦、州和当地政府部门以及全球的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家只专注于高性能网络业务的公司，我们为路由、交换、安全、应用加速、身份策略和控制以及管理推出了广泛的产品线，旨在提供无可比拟的性能、更好的选择和真正的灵活性，同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此外，通过紧密的业内合作，瞻博网络正建设一个广泛的网络创新生态系统。”¹⁷³同样引起我关注的是：与其全球性的市场力量相比，瞻博的社会政策几乎是空白。

瞻博 2011 年下半年来，与思科等一样，业务出现阴影，股票下跌得很厉害（今天股价 \$17.99，几乎是一年前的一半）。这正是公司头头们谦虚的时刻，听得进股东的建议，所以我决定去出席今天的股东年会。

没想到沿途交通拥挤不堪，原计划提前半小时赶到，结果迟到 18 分钟才进入会场。这时，最重要的选举（都是公司提案）仪式（因为实际投票绝大多数已经在网上完成）已经结束，CEO 首席执行官 Kevin Johnson 正在报告。我扫视会场，只有二十来位股东和十几个公司人员（董事就有十名）。

Johnson 报告完后，请股东提问。一位老面孔股东为公司辩护几句后，就没有别人表态了。我接过话筒，就人权（包括 **privacy by design** 在开发设计时就考虑到保护隐私）、企业社会责任等建议瞻博向英特尔那样听取

¹⁷³ <https://www.juniper.net/cn/zh/company/profile/>

外部专家意见，制定公司长远发展所面临的社会政策。Johnson 似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提问，只是泛泛地回答说公司在安全设计上有人权考量。一个公司的官员替他回复说，公司的网站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白皮书（其实没有，网站上的几份 white paper 是技术论文）。接着，那位公司官员提醒 Johnson 宣布闭会。我一看时间，会议总共才花 35 分钟。Johnson 倒很客气，马上过来与我交谈，打消了我在明年的股东会议上提交人权提案的念头。我们讲好用电子邮件交流。

算起来，我今天“占领”了十分之一的议程，即使股票下跌，也值得投资。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我们占领运动的人士每人都买一份选定公司（例如刚上市的 Facebook）的股份，一同去参加股东大会，每人提一个自己关注的社会问题¹⁷⁴，把股东大会变成民主的公共社会论坛。如果每一个人选定一个问题，买下几十个、上百个上市公司的股票，到每一次股东大会上去宣传或抗议，现存的经济制度就瓦解了，就会帮助美国企业乃至全球的民主化，实现美好的安那祺主义社会秩序。当然，要把一个社会政策提案推到股东大会表决，需要一定的资金（维持 2 千美元以上股份价值）、时间（两年）和经验（克服公司律师的刁难）。不过，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会占领从白宫、霞关到中南海、从最高法院到国营、私营企业等所有事关人类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或密室，让它们为 99% 的大众服务。

几年来，我对公司治理的关注从中国的人权问题扩展到全球化的普遍社会政策，但毕竟更关注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六·四”23 周年之际，我不由得再次思考借鉴日本的例子，由社会、企业设立人道基金的方案。1995 年，在日本投降 50 周年之际，社会党首领村山首相承认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介入“慰安妇”的运营，以社会、企业出资、由政府“辅助”（设立事務局）成立“亚洲妇女基金”，资助幸存年迈的“慰安妇”。这是出于人道

¹⁷⁴ 例如，谷歌的 CEO 去年进帐 1 亿美元，简直是犯罪。他一天的工作，怎么可能创造出普通美国人好几年的劳动成果？各处 CEO 们“合法”掠夺全球公共财富，已经成为人类公敌，可惜我没有时间和资源处理这个社会问题。况且我已经三次占领过谷歌股东大会，只好放过一马。

考虑作出的一种政治上的妥协，因为日本政府没有道德上的能力承担责任。对于有强大的本国政府和民间经济支持的韩国慰安妇，拒绝这种否认日本政府责任的虚伪收买，值得佩服；对于不可能得到本国政府和民间经济支持的菲律宾慰安妇，在晚年接受价值 2 万美元的来之不易的安慰，理直气壮。虽然我们相信在中国政府上层也有有良知的官员，但没有必要指望国家权力的道德水准在近期会达到人道的期望。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由社会（个人）、企业设立人道基金，为受难者和家属提供人道关怀，不失为解决“六·四”民族悲剧的现实方案。

为了实现这一方案，比较容易的第一步是帮助在中国做生意的跨国公司（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做生意）提供人权、人道、企业社会责任基金。这也是我在与波音、微软、英特尔、思科、惠普这些大公司打交道时的考量（虽然还没有达到目标）。这本来应该在十几年前着手的，因为那时正好可以以此作为解除“天安门禁令”等一系列贸易谈判的条件，相对容易与欧美日（以及台湾）的企业交涉。当然，亡羊补牢，任何时候都不为迟，需要每一个有心人的参与和支持。现在正是考验我们民族智慧、重建一个比较自由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时机。

[2012 年 5 月 22 日]

17 从 Intel 到 Zynga: 如何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 CSRI?

昨天, 我们终于完成了英特尔人权对话系列的最后一次会议。由于对话历时三、四个月之久(要等待公司各部门的反馈), 有一些外部专家没能自始至终参与, 也有一些人因为所代表组织的性质(如联合国全球协定 UN Global Compact 官员)没有积极谏言, Sklar 律师和我这两个“始作俑者”从“英特尔人权原则”、“员工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遣词造句、privacy by design(开发设计时就考虑到隐私因素)等、到推动中国从列宁主义一党专政向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转型的“社会创新”这样的长期战略, 讲得比较多, 不知道英特尔最终如何修订人权政策。总的来说, 我个人觉得英特尔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已经比别的公司走在前面, 对于是否继续介入新的政策的实施, 不准再施加压力。我更关注如何进一步推广经验, 帮助别的公司。自然地, 我开始建立一个计量加实地调查的社会模型, 给每个公开上市的公司评定其企业社会责任指标 CSRI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英特尔 CSRI 大致会在 A 与 B 之间。

与老牌的英特尔帝国相比, Zynga 是一家去年刚上市的网上“社会游戏”公司, 主要依赖上个月刚上市的 Facebook 脸书公司的用户帐号收款, 但发展迅猛, 2007 年成立以来, 已经有近 3 千员工、十亿美元营业额, 成为这个行业的主角。不过, 与脸书类似, 它的股票一蹶不振(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CEO 的贪婪), 今天召开首次股东大会, 以 6.05 收场(最高时达到 15.91)。

我提前赶到旧金山市中心的 Marriot Marquis 旅店会场, 办理登记后在麦克风边上的位子坐下, 迅速浏览会议规则, 感受到公司的紧张。大约有五十来名股东和二十来名公司人员出席, 主持会议的秘书长一方面强调会议的程序有效, 同时尽快宣布正式会议结束, 才让股东提问。我第一个发言, 指出刚才 CEO 介绍公司的国际发展(28 种语言、18 种货币等), 公司的 2011 年报告也比较客观地列举了“扩展国际市场面临的政治等风险”(13 页)、“数据隐私”担忧(17 页)、“个人信息”管制(18 页)、“中国政府不容许脸书进入中国”(19 页)等人权、社会课题, 却没有一个公

共或社会政策部门来应对这方面的复杂挑战。现有的“任命与企业治理委员会”实际上只管任命、挑选董事会。秘书长简短地回复说公司有人负责政府关系。我表示愿意以自己的经验帮助公司，会后再直接交换意见。后来又有四个股东就脸书和股价下跌提问，基本上被财务长用专业性词汇打发掉了。其实，公司的股份被分为 ABC 三级，而 C 级专为 CEO（创始人）一个人设计拥有，比备受批判的新闻集团、谷歌的 AB 二级股份结构更不合理，可惜我已经没有权利再提问了。

会后，我像以往那样，在大厅里端着饮料慢慢品尝，观察董事会成员们如何表现。他们没有一个人过来与股东交流。看来，他们有点心虚。我走过去，准备去与秘书长交换名片，却被一位女士拦住，把我介绍给另一个男士。他是 VP of Customer Service 顾客服务副总，级别和职能都不合适。他说会转达我的电子邮件提议。在进一步计算之前，我感到 Zynga 的 CSRI 大致在 C 和 D 之间。

自从我 1992 年得到“经验社会学与社会调查法”专业的学位却被日本和中国政府赶出由金钱和权力控制的“学术界”以来，已经对美国、日本、中国的二十几家公司的社会政策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亲身调查，积累了足够的社会数据。我创建中国社会学的理想并没有被 1989 年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完全葬送，现在，通过政策比较，设立企业社会责任指标，把全球化局势下的公司治理纳入普遍的全球性的社会政策框架，是继续对美日同盟的案例分析，把公共政策研究确立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又一个尝试。我也期待与世界上类似的机构（如 UN Global Compact）交流、合作，以“全球社会契约”的方式共同解决全球性的人权、债务、失业、环境、战争等问题。

[2012 年 6 月 8 日]

18 Best Buy 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 CSRI

我在 6 月 8 日的文章“从 Intel 到 Zynga: 如何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 CSRI?”中提到:“Zynga 的 CSRI 大致在 C 和 D 之间”。近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对 Zynga 的负面报道进一步确认了我的初步观察, 它的股票也从首次股东大会时的低潮 6 美元(最高时达到\$15.91)再次下跌一半。6 月 11 日, 我就公司的社会政策致函其 VP of Customer Service (在股东大会时我只能与他交谈), 至今没有得到回复。目前为止,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定, 只能采用定性的直接调查方法, 而比较有效的手段是以股东的身份与公司打交道。以此看来, Zynga 的 CSRI 可以被确定为 D。

与 Zynga 相对照, 总部在明尼苏达州的 Best Buy (中文名称“百思买”)是一家传统(1966 年成立)的连锁店, 在美国(一千多店)、欧洲(两千多店)、加拿大(两百多店)、墨西哥(8 店)和中国(100%控股的“五星电器” 204 家商店)销售电子商品, 并在中国有从事设计、开发、测试和合同生产的“全球采购运营”中心。在电子商务的大趋势下, Best Buy 的业务不断下滑、股票下跌, 4 月 29 日, 其 CEO 又因为行为不当受到调查而被迫辞职, 由一个董事临时代理 CEO 职务。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下, 公司的董事会比较谦虚。例如, 对于一个股东提案要求所有的董事必须每年选举(一般的科技公司都这样), 董事会在发出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声明不采取立场, 后来又专门发出更正, 声明支持这个提案。6 月 21 日, 我第一次通过网上参加股东大会。在最后的股东问答时节, 我问 Best Buy 是否加入 UN Global Compact (联合国全球契约)? 因为联合国全球契约比较广泛, 代表各种产业和国家的企业, 我也想替刚打过交道的联合国全球契约推销, 可惜没有得到回答。这使我意识到网上参加股东大会的局限性, 很担忧以后别的公司都推行网上(虚拟)大会, 让公司容易控制股东的直接参与。

会后当天我立即给公司董事会写信, 建议公司采纳包括人权在内的社会政策。7 月 2 日, 我接到投资者关系主管 Mollie O'Brien 的回复, 确认收到我的电邮和信函。她说公司 Sustainability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持续发展和企业责任）部门高级主管回复到：尽管 **Best Buy** 没有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但参与了世界经济论坛、**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Sustainability Consortium (TSC)**、**Global Social Compliance Program (GSCP)**，采取步骤尊重人权、保护环境等。我 7 月 23 日回复她，指出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富人政客俱乐部，**EICC** 的漂亮宣言对于签署者（如苹果、富士康等公司）没有丝毫约束力，我愿意向帮助英特尔公司那样替公司制定人权原则和企业社会责任准则。我也坦率说明由于公司股票下跌，我的股份价值已经不足以提交提案强迫公司表态了。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得到 **Best Buy** 回复。这一是因为我已经失去提案权（无独有偶，当我签字撤销今年唯一确保的对 **M** 公司的提案后，该公司热情的律师和主管就没有联系了），也是因为 **Best Buy** 本身也在经历激烈的内斗。很有可能，**Best Buy** 会被其创始人（仍持有 20% 股份）找人买下所有股份而退出公开发行的股票市场，逃避股东的公开监督，不可能谈什么企业社会责任了。以此，**Best Buy** 的社会责任指标 **CSRI** 应该是 **C**。

[2012 年 8 月 10 日]

19.1 参加硅谷人权会议后记

2011年9月28日，英特尔的 Jacobson 在回复我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电邮中提及要出席硅谷人权会议 Silicon Valley Human Rights Conference，引起我的关注。我立即联系主办单位 Access (www.accessnow.org)，请求免费出席（入场券 250 美元），得到快诺。

10月25日一早，我驱车到旧金山出席会议，见识了与高科技相关的人权界的各路人马。国务卿克林顿夫人也通过视频讲演，除了赞扬硅谷在阿拉伯之春等运动中的不可替代角色、批判中国政府控制网络等，还恭维非政府组织 NGO，说她长年在 NGO 侍奉，进入政府后更加明白政府的局限¹⁷⁵，使我们与会者觉得她在华盛顿很为我们效劳。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部门的助理国务卿 Michael Posner 本人与会演讲，也介绍自己出身 NGO。我后来与他交换名片，感到他为人随和。我注意到欧洲会议的“媒体与情报首脑”也没有架子，倒是巴西政府的年轻官员很象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后起大国的“海归”，很有自信。可惜没有遇到别的讲中文的出席者。

会议的特别来宾包括埃及的网上活动家 Alaa Abd El-Fatah，他回去后立即被军方逮捕，主办单位发起签名等压力活动才使他获释。另一名来宾泰国的 Chiranuch Jiew Premchaiporn 女士因为



175

<http://www.humanrights.gov/2011/10/25/live-silicon-valley-human-rights-conference/>

在网上发布“冒犯”国王的博克受到迫害。这使会场变成人权实践的现场。在华盛顿负责游说的谷歌公共政策主管 Bob Boostin 也在主会场讲演，说他完全不懂科技。前年为了我的人权提案，他与我联系过几次，一开口就说尊重我的提案，很有专业素养。

我随即参加“在技术领域实施联合国关于人权和商务的指导原则”的分科会，这里的三个发言人都代表世界潮流：哈佛大学“政府与负责任”中心主任（她实际上是原联合国负责企业社会责任专员、现为哈佛大学教授 Ruggie 的助手）、全球网络倡议 GNI 的主任和微软公司环境持续性部门的主任。主持人是“社会责任的商务”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研究与创新部门主任，英特尔负责合并 McAfee 的律师 Miller 也来会场。后来英特尔和思科都告诉我，它们决定聘请 BSR 为公司咨询，我才意识到主持有这些重要公司参加的会议，也是拉生意的好机会，尽管 BSR 并不太在行人权事务的实质。我以亲身经历，赞许哈佛大学和全球网络倡议的领导性思想，但也指出在实践上政府权力和企业钱力（包括全球网络倡议的三个发起公司之一的雅虎）的阻力干扰。与任何社会变革一样，没有牺牲就没有进步。

下午的“是否要规制互联网？”主会场虽然有几个高级政府官员出席，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 craigslist 的创办人 Craig Newmark 上。矮胖憨厚的 Craig 堪称硅谷的“好得不可相信”的奇迹之一，他的网站为大家提供了完全没有广告的高效免费服务（如出租房子），使人们分享互联网的益处，会后还有很多人围住他交谈。而另一场有雅虎官员出席的“（人权）实践场”分科会则加重了我的忧虑，我对脸书 Facebook 官员、推特律师和斯坦福大学“社会数据实验室”教授的讲演内容也没有多大印象。在晚餐时，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女士听说我因为天安门事件逃到美国，与我聊了不少。原来，她是基廷 Keating 的女儿。基廷 1989 年作为澳大利亚首相，推动保护中国留学生法案。在事件早期，澳大利亚也接受了逃自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值得赞许。

我因为第二天有别的事务，无法久留。Jacobson 匆匆告诉我：英特尔认为全球网络倡议以信息服务商务为主，与英特尔业务不太对口，所以不便加入。我多少也体会英特尔作为老牌领袖，不愿被动承诺别人制定的规则。但英特尔接受我们的建议，决定与其他计算、通讯领域的公司，组成类似的全球人权、社会责任协议，同时邀请我和 Sklar 作为人权专家加入。这使我感到一丝欣慰。

这是硅谷人权会议的第一次召开，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互联网人权的文献“硅谷标准”¹⁷⁶。会议得到广泛报道¹⁷⁷，类似的会议不久将在巴西举行，让我们祝愿它在世界各地开花、并早日在中国举行。

[2012 年 2 月 13 日]

¹⁷⁶ https://s3.amazonaws.com/access.3cdn.net/d9369de5fc7d7dc661_k3m6i2tbd.pdf

¹⁷⁷ https://s3.amazonaws.com/access.3cdn.net/bc38933672182440e2_00m6vy46e.pdf

19.2 参与硅谷人权会议

2011年10月25日，我参加第一次硅谷人权会议，“没有遇到别的讲中文的出席者”，“我因为第二天有别的事务，无法久留”，“让我们祝愿它在世界各地开花、并早日在中国举行。”¹⁷⁸这一次，会议在巴西、印尼巡回召开后又回到旧金山举行，我很早交费注册，并提交论文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Corporate Human Rights Policy**，配合会议发布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CPRI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CSRI 第 2.1 版¹⁷⁹。

3月3日我9点之前就到达会场，其实正式会议要下午1点才开始呢！¹⁸⁰这次开场没有第一次隆重，但使我感到更自在，加上有了上次的经验，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参与其中¹⁸¹。我与邻座年轻的女士交流，她很像一个美国的大学生，却是驻扎在土耳其报道阿塞拜疆人权状况的意大利记者。

我全程参加“推动企业尊重人权”的分会，认出其中的面熟的发言人是微软的企业公民性部门高级主管 Bross，算是老相识了¹⁸²。一个巴基斯坦的妇女介绍巴基斯坦政府用中国的防火墙软件审阅互联网，他们致函给思科、华为等通讯公司，没有回复。思科去年断绝了与我的对话，我今年已经向思科再次提交了股东提案。加拿大的 Citizens Lab 的代表介绍他们的工作是大学研究中心，只提供客观事实供公众利用。当然，研究必须得到政府和公司的财务援助，即使是客观数据，有一些也可以被利用压制言论自由。我很想建议他们也发布一套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让公众有更多的比较。有两个伦敦来的律师，一人讲贸易控制，如意大利向以色列出口军

¹⁷⁸ 赵京，“参加硅谷人权会议后记”，2012年2月13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svhrc.pdf>

¹⁷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csri.pdf>

¹⁸⁰ 三天的议程：<https://www.rightscon.org/program.php>

¹⁸¹ 包括欧盟议会、美英等政府、公司和人权机构共有40多个组织，300多人参加。

¹⁸² 赵京，“推动微软公司人权政策的进展”，2013年8月11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microsoft2013.pdf>

火；另一个黑人律师发言批判金融业的罪责，我后来与他交流，介绍我去年在高盛集团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¹⁸³，他立即反应：“我知道你的名字”。我还以为我的工作无人理会/理解，但相关的人士自然会关注的。

第二天，我上午去应用材料公司代理宣读股东提案¹⁸⁴，下午提前赶到会场，准备我的发言。我们分会有5、6个课题，来了30-40听众。第一个是 Human Rights Data Analysis Group 的研究主管 Price 博士¹⁸⁵，介绍她们如何为联合国提供叙利亚内战的数据分析，达到9万3千名死者的结论。我一下子就知道她们工作的意义在于科学、客观而不是价值推广，因为这本来是我的“本行”¹⁸⁶。我一直希望，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组织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科学数据分析，大致确定死伤者的范围。第二次发言的是两个亚特兰大大学的研究生（其中一人来自尼泊尔），用电脑分析人权报道/文献中出现的英语词句分类。

接下来，我发言介绍 CPRI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CSRI 的方法和结果。计时的女大学生好意地多给我几分钟时间，使我可以从容地具体介绍如何达到谷歌(A)、英特尔(A-)、雅虎(F)等公司的等级，让听众充分理解我的要点。后来，大赦国际的西海岸负责人 Butkus 来与我交谈，提到我在谷歌、雅虎、雪佛龙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见到的大赦国际的 Tony Cruz。Butkus 抱歉地解释说，他们都是义务工作，且专注于在学生中推行人权教育，没法参与大量的人权帮助工作。我完全理解他们，也没有对他们抱多少期待。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也有人与会，在他们的2014年2月号专文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上有对雅虎的虚伪吹捧声明，把它作为一份广告，就没有必要较真了。倒

¹⁸³ 赵京，[高盛股东大会人权提案揭开纪念“六四”的序幕]。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gs-proposal-64.pdf>

¹⁸⁴ 赵京，“改善应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战例”，2014年3月4日。

¹⁸⁵ <https://hrdag.org/meganprice/>

¹⁸⁶ 我1992年得到社会调查方法论的博士学位后，因为坚持人权运动，被日本当局配合中国大使馆赶出学术界，进入公司打工，也开始了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地调查。日本公司电通在CPRI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中的等级就来源于此。

是会议的主持者 Access Now 提倡的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Procedures(相互法律援助程序)比较务实诚恳。科罗拉多的非营利组织 Nomogaia¹⁸⁷的主管 Wielga 是个人权律师,介绍说他们也想通过股东提案推动公司的人权政策。我拿出上午刚获得 54% 股东支持的应用材料公司的提案,他马上心领神会,说他们也有证券律师,可以合作。

我的发言之后,一个荷兰人介绍他们如何用 people's intelligence(人的情报)报告和确认人权事件。最后发言的是一个泰国的留学生,介绍东南亚的新兴手机市场的应用软件正在被中国(微信有 3 亿用户)、日本(Line)、韩国取代,已经摆脱了英文世界的统治,但那里的人权意识具有“亚洲价值”特色。下一场会议要在东南亚召开,会有更深入的讨论。

信息通讯产业的人权责任分科会是我熟悉的领域(GNI 等),我怕自己批评太认真激烈,就退出会场,进入伊朗小组的会场。伊朗发生的许多事情好像是几年前我们熟悉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重演,所以他们对我的经验很感兴趣。如果他们真能有效地组织起来,用一点基金购入股份,就可以与公司直接交涉起来。我也答应尽力为他们建立与相关公司沟通的渠道。

“建立网上异议政策联盟”的分科会以“建国之父”麦迪逊关于信息公开的语录和占领运动的图片开场,但三个发言人的讨论却进入狭隘科技的悲观胡同,不得要领。我用安那祺主义的直接行动等传统,说明被科技发展(大公司)控制的天真异议青年应该从历史上学习经验和教训,因为人性不象科技那样变幻无常。

最后一天上午,我先在讨论专利的小组旁听,然后去拉丁美洲小组,没有发言。微软的 Bross 找到我,我先表达了对上周媒体关于微软“必应”搜索软件检阅在中国以外的网站的报道的关注,他表示回到公司后会了解情况,再回复我。他问我如何帮助微软有效地、系统地与公民社会互动,我介绍与好的和恶劣的公司交涉的经历,同意以后写一份正式的建议给微软。接着,在如何就自由表达和隐私领域为公司评级的分科会上,我进一

¹⁸⁷ <http://nomogaia.org/>

步用自己发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过程中遇到的恶劣公司代理威胁的例子，呼吁我们这些人权活动人士要互相保护，共同与凭借金钱和权力的罪恶势力作斗争。

下午，我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分科讨论上，感觉到某些大公司（如谷歌）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回避政府管制的同时也抵制大众的参与民主。其实，各国政府已经搞出 WTO、APEC 等国际经济组织/机制，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们以节省资源呢？例如，把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和中美人权对话联合起来，不就可以讨论许多互联网的人权、贸易、甚至网络战的问题吗？可惜时间不足，主持人把已经给我的话筒收走了。

我在关于控制软件输出的英、法立法的讨论会上，提出软件流通的双向性，也要考虑控制输入软件/信息的特性/难度。另外一个分科会的一个发言人提醒我们，仍然还有许多印度妇女没有条件上网。在讨论人权侵害的赔偿问题小组，我联系到 LinkedIn 最近接受政府的审阅条件进入中国的报道，介绍自己几年来思考的“社会正当性”概念（相对于政府法规的“合法性”），让一个公司在进入商务的同时准备好赔偿的政策。最后，有一个中国活动人士主持的“科技公司与中国人权”的分科会，我听完发言人的自我介绍，因为要赶上回家接应的班车，就离开了会场，结束了这一场有意义的参与型人权会议。

[2014 年 3 月 6 日]

20.1 与 Microsoft 微软的初次交锋

对于微软公司，我比较谨慎。一方面是因为其总部不在硅谷，去谈判和出席股东大会的代价较大；另一方面是它的特殊地位，需要长年的观察。

2012年3月22日，我通过确证邮件(certified mail)向微软提交至2012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¹⁸⁸。这一次，我再向老朋友 Harrington 学习¹⁸⁹，直接提议修改公司章程 bylaws，成立人权委员会，比过去要求董事会成立人权委员会更能制约公司的行为。

一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得到微软的回复。我把这作为良好的征兆：微软没有在14天内挑战我提案的合法性，说明他们正在评估我的提案的重要性，需要时间。果然，过后不久，我接到微软高级律师（Senior Attorney） Peter Kraus 署名4月30日的快件，信中除了介绍微软对人权的重视外，也表示希望有机会与我交流、受益于我在人权方面的专长和建议¹⁹⁰。这是一个满意的开端。

我5月2日立即回复 Kraus，比较详尽地介绍我与那些恶劣公司（雅虎、新闻集团）和规范公司（谷歌、雪佛龙）等打交道的经历¹⁹¹，免得我与微软之间浪费时间陷入不必要的技术细节纠纷、直接进入正题谈判。

与此同时，我面临着另一个选择：微软2012年股东大会的提案期限是6月6日，我已经收到证券公司6月3日开出的以别的名义拥有的微软

¹⁸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ms_proposal_2012.pdf

¹⁸⁹ John Harrington, *The Challenge to Power: Money, Investing, and Democracy*.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¹⁹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MS_Zhao120430.pdf

¹⁹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Zhao_MS120502.pdf

股份证明，我也写好了一个类似的提案，要不要发出呢？我犹豫了好久，想到微软的人应该都很聪明，也希望微软能够成为中国民权运动的同情者，最后决定不为难微软。

6月27日，我赶到旧金山微软的办公室与 Kraus 和其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部门高级主管（Senior Director）Daniel Bross 共进午餐，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除了例行公事外，他们还给了我一份微软全球人权声明 **Microsoft Global Human Rights Statement** 草案，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我保密两、三周，到时会正式发表。我本来事务繁多，但还是抽出几个小时研读这份等待我修订的文件，第二天回复了两页长的4点意见，很坦率地指出如果不大幅修改、压缩，最好不要发布。Bross 后来承认这是委托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BSR)** 起草的，他也不满意。但微软已经花了几万美元，不可能改用我的免费的社会创新声明（借用我对英特尔公司人权原则的修订意见），说最后会在前面加了一个“执行总结” **executive summary**，反映我的意见。

7月1日，我以当天的埃及新民主选举总统就职演说开始，就他们最感兴趣的人权提案，提出两点处理建议：一、象谷歌、雪佛龙公司那样付诸股东大会表决；二、如果微软愿意向英特尔那样成立一个外部专家小组帮助其人权政策，我也可以主动撤回提案，我特别指出他们给我的微软2011年公民报告的不足之处，表达了参与新成立的人权与技术中心（**Human Rights and Technology Center**）的意愿。Kraus7月3日马上回复，建议我们采取第二种方案。

我们三人7月12日举行电话会议。因为微软的年度公民报告比较全

面地介绍了公司的社会政策，我逐条讲述我的意见，主要是政治参与、人道需求和人权状况，特别对比天安门事件和阿拉伯民主运动，指出国际公司在非民主选举国家做生意面临的合法性/正统性考量。我同时也对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的慈善社会活动提出改进意见。我评述了报告中的一半多内容，因时间限制，**Bross** 建议下次再交流。我在 7 月 18 日的电邮中确认了会议的内容和下一步行动计划（包括参与新成立的人权与技术中心，因为我觉得它也可以代替外部人权专家小组的功能），当天签署了 **Kraus** 准备好的撤回提案文件送出。

四个周过去了，我还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联系。我不由得产生疑问：微软的全球人权声明和公民报告会真诚地接受我的建议而修订吗？他们是否因为我的社会创新政策而恐惧我的进一步参与？我撤回了今年唯一打入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又放弃了提交已经准备好的另一个提案，又犯了“政治上天真”的老毛病。不过，微软的这等聪明表现，也不是在预料之外，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公司需要关注、帮助、改善。

来日方长，我准备明年与微软再交锋。

[2012 年 8 月 13 日]

20.2 推动微软公司人权政策的进展

我一年前在“与 Microsoft 微软的初次交锋”¹⁹²中写道：“我犹豫了好久，想到微软的人应该都很聪明，也希望微软能够成为中国民权运动的同情者，最后决定不为难微软。”“来日方长，我准备明年与微软再交锋。”今年3月28日，我再次向微软提交略加修改的至2013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提议修改公司章程，成立人权委员会。

5月初，我接到微软高级律师 Kraus 的电邮，表示希望有机会再次与我交流。我5月9日立即回复 Kraus，介绍我3月20日完成的惠普股东提案¹⁹³和5月23日将举行的高盛股东提案¹⁹⁴，希望能够重复类似惠普的成果。5月22日，我再次与 Kraus 和微软企业公民性高级主管 Bross 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谈。我说明因为去年没有达到目标，今年只好重新开始，并批评他们去年7月接到我的撤回提案信后就中断了交流。他们道歉忘了向我通报，但强调说微软实际上已经采纳了我的基本要求，成立了“法规和公共政策委员会”。

在 Kraus 5月30日的电邮中，他明确地声明：[In 2012 after you submitted this proposal for our 2012 Annual Meeting, we had an open and productive dialog about Microsoft's human rights practices. In addition to our face-to-face discussions, you reviewed and provided comments on Microsoft's Global Human Rights Statement and the human rights section of our Citizenship Report. Following these discussions, in July 2012 Microsoft reviewed its Board committee structure and established the Regulatory and Public Policy Committee.]（2012年你提交至2012年股东大会的提案后，我们就微软的人权实践举行了公开和建设性的对话。除了我们之间的面对面讨

¹⁹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MS_Shareholders.pdf

¹⁹³ 赵京：“推动惠普人权政策改善的阿基米德杠杆”2013年2月13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hp-policy.pdf>

¹⁹⁴ 赵京：高盛股东大会人权提案揭开纪念“六四”的序幕，2013年4月12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gs-proposal-64.pdf>

论，你还检讨和评论了微软的全球人权声明和我们的公民报告的人权部分。根据这些讨论，微软 2012 年 7 月检讨了董事会委员会结构，成立了法规和公共政策委员会。) [More specifically, one of the Committee's duties is to review and provide guidance to the full Board about "the Company'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relate to corporate citizenship, including human right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charitable giving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xpenditures." ¹⁹⁵]

(特别地，委员会的一个职责就是向全体董事会就“公司的事关企业公民性政策和项目，如人权、环境可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供应链管理、慈善奉献和政治活动与花费等”进行检讨和提供指导。) [Microsoft Regulatory and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is precisely the committee that your shareholder proposal has requested we establish.] (微软的法规和公共政策委员会正是你的提案要求我们建立的委员会。)看来，去掉对我去年的提案的夸大成分¹⁹⁶，微软确实在公司结构上实行了重大改进。我 6 月 2 日致函肯定这个进步，但同时指出公众还没有感受到微软的政策变化，例如媒体多次报道了对 Skype 隐私保护不足的担忧。

7 月 30 日，我们三人再次举行电话会议，Bross 为盖茨访问中国没有关注人权一事辩护，说那是以“盖茨基金会”的名义，纯属私人行为，与微软无关。我不认同，指出中国公众读到胡锦涛、习近平接见盖茨的报道，不可能看成是私人行为，而主要联想到微软的中国业务。在讨论由微软、谷歌和雅虎发起的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 实践时，我不由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它已经被雅虎利用和误导，所以我还劝导思科和英特尔不要加入。Bross 感到意外，就离开电话，请来 Vice President and Deputy General Counsel 负责法律的副总裁 Crown 来解释微软在其中的政策和作

195

<http://www.microsoft.com/investor/CorporateGovernance/BoardOfDirectors/committee/regulatory.aspx>

¹⁹⁶ 也可能，我的提案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促使董事会加快了各种压力下的结构改革。

用。Crown 也解释了以前的 anti 事件¹⁹⁷，说微软认为 Bing 留在中国更能促进中国的开放自由，也欢迎我的意见。他们进一步同意再举行一次会议，另外邀请两位公司的中国人律师来解释公司的中国业务政策。我尽管不一定同意微软的解释，但确实感到他们的诚意。

8月5日，我与微软的5位官员再次会谈，我欢迎 Shen 先生和 Ke 女士的加入，简单介绍自己的背景和动机。Ke 女士提到微软主办的中美互联网产业论坛，欢迎我的参与，我不想影响不懂中文的另外几位，就说好会后再与她详谈，包括建议发布微软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中文介绍。Bross 承认盖茨访问中国会见中国领导人，不能因为以“盖茨基金会”的名义就说成纯属私人行为，他表示会把我的意见报告给盖茨。Crown 说微软并没有完全拥有 Skype，不能单方面决定，但将会出台相关的政策，只是现在他还不能讲。他们邀请我随时可以交流，但定好明年1月（12月股东大会后）再举行一次会议。8月7日，我收到 Kraus 寄来的快件，感谢我的 respectful and thoughtful 富有尊严和思想性的讨论，并表示期待我对公司人权政策和实施的对话和关注。

我判断：我的主要人权关心和在中国做生意的正统性担忧基本上传递给微软了；虽然还有许多政策不能认同/接受，有必要改进，但微软的人权政策以及开放的态度值得肯定；对于斯诺登事件引发的微软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等新问题，也需要确立一个交通的渠道，而不能一次到位；作为一个远离公司总部的微小股东，我的基本战略目的已经初步达成，就签字同意再次撤回提案。

下一步，我挥戈指向今年的最后一个战略目标：Oracle 甲骨文公司。

[2013年8月11日]

¹⁹⁷ 事件的当事人正好与我同名，当时有不少朋友以为我回到北京出事了。我那时还没有任何护照，无法回中国。

21.1 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之二: NetApp 的公司治理提案

我在“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¹⁹⁸中指出：“与 1989 年天安门运动和目前的阿拉伯之春一样，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在决定我们生活的公共空间确保我们的发言权，其中之一就是占领决定全球化走向的各大公司的股东大会。”所以，当老朋友 John Chevedden 再请我出席今天 NetApp¹⁹⁹股东大会、代理他宣读第 6 号公司治理提案时，我欣然前往。

吸取 5 月 22 日出席 Juniper Networks 股东大会时被交通拥挤而迟到的教训，我今天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公司。正门的前台小姐有所准备，听说我要找 Butler 女士，请我坐在廊下等待。我迅速翻阅股东会议资料和公司年报（10-K 表），抓紧时间再练习朗读提案。

一位女士把我和两、三个股东迎入会议室。我在第二排中央入座。一位三、四十岁的绅士向我问候，介绍他自己是公司秘书长。他说第 6 号提案已经被多数股东投票通过，没有必要宣读了。我记得几年前参加 Sun Microsystems 股东大会，一个提案因为人在大会上宣读而作废，就谢绝了他。他又建议为了节省我的时间，不必宣读提案的后面部分。我本来想解释说，自己花了 5 个小时来就是为了宣读这 5 分钟时间的提案，但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绝他的讨好上司往上爬的意图，拿出 Chevedden 给我的电邮，上面讲“*It is important to read the proposal into the record during the formal meeting even if any person says otherwise.*”（不管任何人说什么，都要把提案读进正式会议的记录）。他还不肯罢休，说会议不会记录（我们面对的摄像头大概会把我们的对话也录下的），提案后半部对董事的批判不正确等，又掏出电话要找 Chevedden 同意。我制止住他的无理纠缠，说会议开始了。

¹⁹⁸ 2012 年 3 月 21-28 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¹⁹⁹ 公司 1992 年成立、员工 12,000 人、2011 年产值 51 亿美元、全世界有 130 多个办公室，在网络贮存业务占第 2 位。其中文网站 <http://www.netapp.com/cn/> 没有公司的中文译名，大概是因为公司的业务对象是公司或政府，不需要向公众个人宣传。

公司 CEO 宣布会议开始，我巡视会场，除了十来个董事外，有四、五个公司高层主管，加上几个股东，总共二十人左右。几分钟以后，就轮到我了。我照本宣科，读完了要求采纳简单多数投票的提案²⁰⁰。提案指出：要求 2/3 绝对多数投票，实际上成为董事会阻止股东意见的手段，导致公司业绩下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研究 **What Matte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公司治理的要素) 为证，同样的提案在 **Weyerhaeuser, Alcoa, Waste Management, Goldman Sachs, FirstEnergy, McGraw-Hill and Macy's** 等公司股东大会上获得了 74% 到 88% 的赞同。按照独立研究机构 **The Corporate Library** 2012 年的报告，我们公司因为“治理风险高”被评为 D 等级、在高层报酬方面“高度令人担忧”。

我多少习惯了独自面对权贵的场合，没有介意会场的反应，继续宣读后半部分：我们的 CEO **Georgens** 在 2010 年得到 900,000 股、2011 年得到 300,000 股期权，卖掉 675,000 股白赚 1 千 3 百万美元。他还得到类似期权的限制性股票，如果他不干了，还有权得到 4 千 9 百万美元，而我们公司在高层报酬方面没有防治欺诈的财务政策。董事会主席 **Warmenhoven** 和董事 **Wall** 已经呆了 18 年多，让人担忧董事会的独立性。两个董事是内部者，另一个董事也有内部关系，加重了对董事会独立性的担忧。董事 **Warmenhoven** 用私人飞机办事拿走 40 万美元。4 个董事没有一点公司股票。董事 **Shaheen** 在 **Webvan** 公司干了 18 个月后以每年 \$375,000 的（退休金）条件辞职，而他离开时，**Webvan** 的股票只值 12 分钱。可悲的是，**Shaheen** 是我们高层报酬委员会的 1/3。

因为只有三、五个股东，CEO 连股东大会必有的公司业绩也懒得报告了。在问答期间，那个总是为公司辩解的老头又指责 **Chevedden** 是个要搞垮美国资本主义的挑衅分子，怪公司董事会没有积极迎战。整个董事会实际上被 **Chevedden** 告上审判台，再浪费公司资源去游说政府监管机构反对此提案，岂不是不打自招？所以，董事会只得声明对此提案不采取

²⁰⁰ 原文

<http://investors.netapp.com/secfiling.cfm?filingID=1193125-12-308927&CIK=1002047>，但公司的网站竟然没有股东大会信息的链接。

立场。我因为没有公司的股份，没有就别的（人权等）问题发言。整个股东大会，从 3 点 7 分开始，到 3 点 20 分结束，有一半的时间围绕我们的提案进行。

这次对股东大会的占领，除了利用美国法制还存在的民主机会公开揭露资本阶级的贪婪和荒唐，提案本身竟然也得到多于 80% 的股东赞成！**Chevedden** 不愧为股东民主权利运动的高手，值得敬贺、学习。对于我而言，克服阻碍把人权提案打进股东大会表决还不够，如何从策略上同时争取多数股东支持让提案成为制约公司运营的法规(charter 或 bylaws)，是更艰巨的挑战。

[2012 年 8 月 31 日]

21.2 继续占领 NetApp 股东大会

我去年在“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NetApp 的公司治理提案”²⁰¹中介绍道：“Chevedden 再请我出席今天 NetApp 股东大会、代理他宣读公司治理第 6 号提案。”“一位三、四十岁的绅士向我问候，介绍他自己是公司秘书长。”“他又建议‘为了我’节省时间，不必宣读提案的后面部分。”“他还不肯罢休，……我制止住他，说会议开始了。”今天，我又赶去 NetApp 股东大会代理 Chevedden 宣读公司治理第 6 号提案 Limited Accelerated Executive Pay “限制高层加速拿钱”，又遇到同样的待遇。我回答他的刁难说：会议不会讨论别的问题，这个提案也不长，我知道怎样 properly present 适当地宣读²⁰²。

公司 CEO Georgens 宣布会议开始，就把议程交给秘书长。我巡视会场，除了几个董事、几个公司员工，加上几个股东，总共十几个人。几分钟后就轮到我了。我照本宣科，读完了限制高层加速加薪的提案。提案指出：在高层人事变动的事态下，不应该让高层管理人员加速拿钱。独立研究机构 The Corporate Library 把我们公司的董事会资格和高层报酬都评为“令人担忧”——Georgens 薪金是 1 千 2 百万美元，如果他不过了，要拿走 2 千 4 百万美元。

会场鸦雀无声，我继续宣读：我们公司在高层报酬方面没有防治欺诈的财务政策；公司支付 40 万美元给董事会主席 Warmenhoven 用他的私人飞机出席公司会议；三个董事任期长达 10-19 年，腐蚀了独立性；任命委员会三分之二由这些长期董事控制；董事 Wallace 和 Nevens 不相信拥有股份有什么用。提案最后一段谴责董事 Shaheen 在 Webvan 公司干了 18 个月后以每年 \$375,000 的退休金辞职，但 Shaheen 离开时，Webvan 的股票只值 12 分钱，可悲的是，Shaheen 是我们高层报酬委员会的 1/3。但我没有继续读完，因为提案中讲到去年 Chevedden 的提案得到 89% 的赞同，

²⁰¹赵京，2012 年 8 月 31 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2/netapp.pdf>

²⁰²这也是提案成立的条件。见 NetApp, Inc. Notice of Annu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不准确（应该是 73%）。

因为只有三、四个股东，CEO 连一般股东大会必有的公司业绩报告也懒得介绍，只是问股东有什么问题。只有我发言，说自己也有公司的股份，以自己的政治难民经历询问公司有没有人权政策指导在违反人权的国度做生意。Georgens 回复说，我们公司没有在叙利亚做生意，在中国等处的业务要遵守当地的法律，要向美国的股东负责。很象几年前 Yahoo 或 Oracle 的 CEO 对我的同样问题的敷衍。我知道 NetApp 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还没有开头，有必要逐步耐心教育，就没有进一步就斯诺登揭露出来的信息储存问题发问。必须有一份正式的提案才能得到董事会的正式回应，才能迫使董事会思考或妥协、改进相关的政策。这是我明年的计划。

整个股东大会，从 3 点 02 分开始，到 3 点 14 分结束，有一半多的时间围绕我们的公司治理提案和人权提问进行。我们以不到百万分之一的微小股份，坚持着占领运动，控制了股东大会一半多的议程，利用这个美国法制还存在的民主机会，发动广大股东（不管他们支持还是反对，至少都读到了提案的内容），公开谴责贪婪的资本寡头阶级。金融危机过去 5 年了，虽然寡头阶级恢复加强了他们的财富，但 99% 的民众在高失业率、物价上涨的黑暗隧道里还看不到光线，我和 Chevedden 再次确认：坚守股东大会的战场，直到寡头阶级受到基本制约、美国社会变得平等一些为止。

[2013 年 9 月 13 日]

21.3 在 NetApp 股东年会宣读亚太和平政策

我在“全球化格局下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改进”²⁰³一文中提出：“在全球化格局下，如何打破为权力和资本服务的各种‘智库’的垄断，把和平、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推销给主导全球化的国际企业呢？目前的条件下，只有一条途径：通过股东大会提案，夺回话语权，宣传、教育和动员公众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改进过程。”今年1月6日，我向 NetApp 提交设立公共委员会的提案²⁰⁴，7月1日“我收到 SEC 转发的其律师6月27日就我和 NetApp 及其律师行的争议的意见，其中拒绝了 NetApp 的律师行的每一点排斥理由²⁰⁵。...我的提案就会交到成千上万的股东手中，以亚太和平问题为楔机，动员美国公众参与到国际新秩序的改进过程。”

我很早出发赶往公司总部去参加股东年会宣读我的提案²⁰⁶。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等候期间，读完了今天的 *Wall Street Journal* 关于巴西可能赢得总统大选的社会党黑人妇女候选人 Marina Silva 的长篇报道。我最近刚读完 603 页长的历史研究 *Anarchists and Communists in Brazil, 1900-1935*²⁰⁷，了解到现在巴西的三大政党（工人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起源于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很欣慰虽然没有享受直接的政治成果，我们的奋斗牺牲毕竟没有白费，也倍感自己今天肩负的责任。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这里²⁰⁸，除了十名董事、五、六名公司官员/职员，只有我和两、三名股东。一位公司女士过来问候，再次要求我撤销提案。我解释说：“作为一个政治难民，有幸为那些没有发言机会的人行使股东的权利是我的使命。我会继续持有公司的股份，但如果公司听取我的建议，我

²⁰³ 赵京，2014年7月11日。

²⁰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netapp_proposal_2014.pdf

²⁰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EC-NetApp-Zhao.PDF>

²⁰⁶ 唯一的股东提案，第6号：设立公共政策委员会。NetApp, Inc. Notice of Annu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September 5, 2014.

²⁰⁷ John W. F. Dulle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 London, 1973.

²⁰⁸ 赵京：“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NetApp 的公司治理提案”，2012年8月31日；“继续占领 NetApp 股东大会”，2013年9月13日。

会考虑不再提案。”会议 3: 35 开始，几分钟后就轮到我了。我基本上照本宣科，发表了以下演说：

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NetApp establish a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to assis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overseeing the Company's policies and practice that relate to public policy including human righ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vendor chain management, charitable giv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xpenditures, government relations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public issues that may affect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performance or reputation, and shareholders' value.

The Company has four committees, but there is no committee to deal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the dynamic Pacific Asia region where the Company has heavy busines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utilized the Tiananmen Tragedy of China in 1989 to abandon its own peace constitution, which is the cornerstone of Asia's peace after WWII, towards rearmament, militarization and fascism to mislead the U.S. under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ies to crash with the rising power of a nationalistic China. Althoug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igned the G-7 Summit declaration in 1989 to protect Chinese students, I,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Osaka University organizing Chinese democratic and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in Japan, was persecuted because I refus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betray my fellow Chinese stud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blic is concerned of recent media coverage of many U.S. companies bribing Chinese high officials to obtain business deals in China. Furthermore,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expressed grave concerns of our Company's business in Syria. Without a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ompany to legitimately and ethically deal with today's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ffecting our business. For this reason, and partly to respond to my proposal, Microsoft established such a committee in 2012. 在公司具有繁多业务的亚太地区，日本政府利用 1989 年天安门悲

剧，抛弃作为战后亚太和平基石的宪法，一步步向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倒退，在美日安保条约下把美国也误导入与崛起中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冲突。《朝日新闻》1990年2月10日、1992年10月20日和2009年6月8日对我的采访和我2004年发表在西班牙历史协会刊物 *Historia Actual* 的长文“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指出日本政府如何践踏自己的国际诺言和国会答辩，欺骗、出卖和迫害我们在日留学生。微软公司2012年部分因为我的提案就建立了公共政策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列举了一页篇幅的理由反对，最后还心虚地声明：第6号提案只具有 *advisory in nature* 顾问性质、即使通过了也只 *constitute a recommendation* 构成一份推荐；凡是没有明确赞成的投票都会被算成“反对”。当场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我的提案没有通过²⁰⁹，会议 3: 48 结束。

这是美国的公众第一次以股东投票的形式参与对亚太和平事务的政策改进，随着美国与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交往²¹⁰，这样的公众参与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现实意义。

[2014年9月5日]

²⁰⁹ 投票结果：

<http://investors.netapp.com/secfiling.cfm?filingID=1193125-14-336826&CIK=1002047> 赞成 11,447,533 (4.9%)，反对 221,243,101 (95.1%)，弃权 8,691,194，未投票 38,055,304。

²¹⁰ 特别表现在迅速扩张的中国海军与美日同盟在亚太的冲突，至今没有和平解决的展望。

22.1 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之三: Symantec

“与 1989 年天安门运动和目前的阿拉伯之春一样，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在决定我们生活的公共空间确保我们的发言权，其中之一就是占领决定全球化走向的各大公司的股东大会。”²¹¹继今年 H-P、NetApp 的股东大会²¹²后，今天我再度例行公事，占领 Symantec²¹³股东大会、代理老友 John Chevedden 宣读第 4 号公司治理提案。

我提前两个小时出发从旧金山湾区东北开往西南，没想到交通如此拥挤，在会前 3 分钟才赶到公司。一位早已等待的女士把我引入会场第一排入座。我迅速翻阅股东会议资料，注意到 Rules of conduct 会议行为规则针对我们设计，如临大敌：“6. Inappropriate conduct. ... that disrupts the meeting to the extent that it cannot be continued within the bounds of proper decorum, or comments that are derogatory to individuals or otherwise in bad taste, will not be permitted and may be the basis for removal from the meeting.”(6. 非礼行为：会议不容许扰乱得体秩序的行为和贬损人格或低级趣味的言论，这样做会被赶出会场。)

公司 CEO 宣布会议开始，我巡视会场，除了近十个董事外，有五、

²¹¹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2012 年 3 月 21-28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²¹² 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 NetApp 的公司治理提案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netapp.pdf>

²¹³ 公司 <http://www.symantec.com/zh/cn/about/profile/> 我们的历史：几位富有远见卓识的计算机科学家在 1982 年成立了赛门铁克公司。公司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拥有 17,500 多名员工，遍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提供安全、存储和系统管理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的各类客户（范围从个人用户、小型企业到规模最大的跨国企业）保护和管理其信息，我们能够从更多角度出发，比其他任何公司更全面、更有效地防御更多风险。

六个公司主管和员工，加上两、三个股东，总共二十人左右。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要求高级主管长期持有公司相当股份的提案²¹⁴。提案引用独立研究机构 **The Corporate Library**²¹⁵的报告，指出公司在高层报酬方面（例如 CEO 报酬高达 8 百万美元）“高度令人担忧”。

现在的 CEO 今年以董事会主席的身份接替了提案中批判的 CEO，我却没有继续念提案后半部对不在场的原 CEO 和在场的董事们的批判。这倒不是担心因为“贬损人格或低级趣味的言论”会被赶出会场（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也认可了提案的内容），我而是想起 Emma Goldman 评价“钢铁大王”卡内基：卡内基实在有幸，值得被伟大的 Berkman 挑选出来教育，要不然，在安那祺主义的历史上，谁会提起卡内基（实际被刺的是卡内基代理）？今天坐在我面前的这些董事实在不值得因为贪婪而由我提起他们的名字。另外，我也不想成为所有董事阶层（谷歌、思科、微软等公司的董事会还有斯坦福、普林斯顿等大学的校长）的头号敌人。其中一个董事是 Best Buy 公司的常务副总裁，而我正在与 Best Buy 交涉呢！

因为只有两、三个股东到会，CEO 连公司业绩也懒得报告了。只有一个股东就 Symantec 公司对手 McAfee 被 Intel 收购一事提问，想知道 Symantec 是否也在寻求买主。我本来对硬件公司 Intel 收购软件服务业 McAfee 过程中的人权考量有所帮助，但因为自己没有 Symantec 公司的股份，就没有发言。

我们的提案没有通过。可能是因为原 CEO 已经离开，多数股东愿意

²¹⁴ <http://investor.symantec.com/phoenix.zhtml?c=89422&p=irol-proxy> 有提案的链接。

²¹⁵ 又是它！这提示我以后可以引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成果。

给新 CEO 一些时间的缘故。与 H-P（我已经提交了明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NetApp（我在 8 月股东大会后购入了其股票准备再度占领）不同，Symantec 不具有重要的世界战略价值，我决定撤离对 Symantec 的占领。

[2012 年 10 月 23 日]

22.2 世界最大网络安全公司的股东提案

我在“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之三：Symantec”²¹⁶中，介绍自己2012年“代理老战友 John Chevedden 宣读第4号公司治理提案”后，觉得“Symantec 不具有重要的世界战略价值，我决定撤离对 Symantec 的占领。”但是，随着网络威胁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购入了这家世界第一大网络安全公司的股份，于去年11月6日提交了设立国际政策委员会的提案。Resolved: 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Symantec Corporation (the Company)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Policy Committee with outside independent experts to oversee the Company's policies and practice regarding environment, human righ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ssues that may affect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performance, reputation, and shareholders' value.

今天，我汲取上次的教训，提前两个半小时出发从旧金山湾区东北开往西南，在会前十几分钟赶到公司，被引入会场第一排入座。这一次，公司没有像上次那样如临大敌，连 Rules of conduct 会议行为规则也没有准备。

会议开始，我巡视会场，除了九个董事外，有十来个公司主管和员工，加上几个股东，总共不到三十人。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提案。除了去年提交的书面内容（天安门事件、日本的军事化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等与公司业务的关联），我还引用几天前纽约时报对公司“全球政府事务”

²¹⁶ 赵京，2012年10月23日。

副总裁的报道²¹⁷，说明设立国际政策委员会的重要性。一个亚裔女性代表公司反对我的提案。

CEO 做完公司业绩报告后，一个面熟的股东抱怨股价下跌，另一个股东也质疑公司的业绩。第一个提问的股东又发言批判到：网络威胁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公司生意反而越来越少？CEO 回答说一年多前刚上任，还需要时间。那股东又追问：卖掉的 80 亿美元计算机软件复原业务要不要分红给股东？CEO 说要由董事会决定那笔现金的用途。

我刚入会场时，有一位董事女士向我致意，与别的董事不同（几乎所有董事都本能地反感股东提案）。会议结束后，我与她交谈，表扬董事会声明中的积极反应，她也感谢我的提案，解释说董事会并不反对我的提案精神，只是认为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委员会。原来她是退休的空军将军，我们又随意谈到美国的军事、外交现状。很难得遇到这样的场合，幸好我这次翻出好久没穿的西服前往。

我提交提案后，公司的一位律师女士很认真诚恳地与我交流过几次，我也去公司见到她和另外三位高层管理人员讨论公司的国际政策。我感谢她们的诚意，也认为公司的治理没有多大担忧，同意主动放弃提案，只要 CEO 在年度报告中加入对我的提案内容的政策性回复。但我今年 6-7 月回中国期间无法接收 Gmail 电子邮件，没有确定加入 CEO 年度报告中的内容用词，错过了公司必须事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报告的期限。她们尊重我的提案，直接让它付诸广大股东的表决（多数公司都雇用内部或外部律师找出各种理由排除股东提案），我也同意今后不再提交提案。

²¹⁷ James Risen, Battle Heats Up Over Exports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2.15.
http://www.nytimes.com/2015/11/01/world/middleeast/battle-heats-up-over-exports-of-surveillance-technology.html?smid=fb-share&_r=0

会场初步统计表明，我的提案没有通过。这是预料之中的，因为付诸表决的提案的最大成果是推动公共政策教育，而董事会为了获得多数股东的支持，在反对声明中都多多少少作出政策承诺，改善了公司治理²¹⁸。

[2015年11月3日]

²¹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symc2015.pdf>

23.1 改进 Goldman Sachs Group 高盛集团的社会政策的尝试

“高盛成立于 1869 年，总部设在纽约，在世界所有主要金融中心均设有办事处。”“是世界领先的投资银行、证券和投资管理公司。我们为多元化的客户群体提供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客户包括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高净值个人。”²¹⁹ 最新的业绩包括：“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的第三季度净收入为 83.5 亿美元，净盈利 15.1 亿美元。”“高盛的投资银行业务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在今年至今全球已公布和已完成的并购交易中排名第一。在今年至今的全球股票及股票相关的发行和普通股发行中，公司排名第一。”²²⁰

“高盛长期以来视中国为重要市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就把中国作为全球业务发展的重点地区。高盛 1984 年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又于 1994 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代表处，正式进驻中国内地市场。此后，高盛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强大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分支机构，向中国政府 and 国内占据行业领导地位的大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高盛也是第一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B 股交易许可的外资投资银行，及首批获得 QFII 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高盛在我国的股票和债务资本市场中已经建立起非常强大的业务网络，并在我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以及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高盛一直在帮助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中占据领导地位，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包括：中国移动通信于 1997 年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 40 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除日本外)规模最大的民营化项目之一；中国石油于 2000 年 3 月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 29 亿美元；中国银行(香港)于 2002 年 7 月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 26.7 亿美元；平安保险于 2004 年

²¹⁹ <http://www.goldmansachs.com/china/index.html>

²²⁰ <http://www.goldmansachs.com/china/our-firm/press/press-releases/current/q3-2012-earnings-press-release-pdf.pdf>

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 18.4 亿美元²²¹；中兴通讯于同年进行的香港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 4 亿美元，这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 A 股公司；交通银行于 2005 年进行的海外上市项目，筹资 22 亿美元，成为第一个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国有银行；以及中国石油于同年进行的后续股票发售，筹资 27 亿美元。2006 年，高盛还成功完成了中海油价值 19.8 亿美元快速建档发行项目以及中国银行 111.9 亿美元 H 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这是至发售日中国最大以及全球第四大的首次公开上市项目。在债务融资方面，高盛在中国牵头经办了 40 多项大型的债务发售交易。高盛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分别于 1998 年、2001 年、2003 年和 2004 年 10 月完成了 10 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高盛是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与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高盛在中国市场同样担当着首选金融顾问的角色，通过其全球网络向客户提供策略顾问服务和广泛的业务支持。近年来，高盛作为金融顾问多次参与在中国的重大并购案，如...汇丰银行收购交通银行 20% 股权；联想收购 IBM 个人电脑部；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海油收购在尼日利亚的石油资产等等。2004 年 12 月，高盛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公司的成立是高盛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合资公司的成立令高盛从此可以在中国开展本土 A 股上市业务，人民币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和提供国内金融顾问以及其他相关服务。”²²²

以上的引用虽然冗长，却非常重要，说明高盛在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

²²¹ 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温家宝家族巨贪丑闻，就是围绕着平安保险上市展开的。据说中国政府为平安开绿灯的理由就是考虑“外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担忧”，如果属实的话，这实际上很可能提示出高盛这样的国际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惯行：私下收买关键的政府官员（温家宝长期掌管中国的金融大权），同时制造出动听的舆论配合。这其实也是国际通例。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意孤行”跑到中国先于美国与中国建交（抢占中国市场）时，美国通过国会听证，透露出田中接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贿赂的信息，导致田中的下台。

²²² <http://www.goldmansachs.com/china/our-firm/about-us/goldman-china/index.html>

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换中起到了任何别的机构都不能替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中国人对高盛的这一角色关注、交涉并改进其政策。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我意识到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今年5月21日，我致函高盛董事会，说明我因为不能亲自赴会参加5月24日的股东大会，所以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公司的人权等社会政策的关注。我以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近来阿拉伯之春为例，指出公司应该制定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特别就中国而言，公司的两名重要董事（CEO和审计委员会主席）都把在清华大学的头衔作为参选董事的资格之一²²³，却没有任何社会政策考虑间接受害于公司业务的中国普通民众，面临着legitimacy（正当性）的问题。我表示愿意以我帮助谷歌、雅虎、思科、英特尔等公司的人权政策的经验教训，帮助高盛。

6月5日，我接到公司投资者（股东）关系Joffe的电邮，她的职称是Vice President（副总裁），我从网上查到她有律师学历、刚到高盛不久。我以前读过一个高盛副总裁写的书，知道高盛的3万多名员工中，有1万名副总裁！与思科第一次与我交涉的一个投资者关系部门的普通员工一样，她要我读公司网上的企业社会责任链接。

我6月13日回复她，指出公司的“人权声明”和2011年“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中没有如何实施、验证这些抽象空洞声明的内容，正如不能阻止公司内部交易丑闻²²⁴那样，没有意义。我用自己帮助英特尔改进人权原则的例子，再次表明愿意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公司。Joffe回复说将介绍另一个同事与我交流。

²²³ 我没有指出这也是我的母校的学术堕落的反应，因为西方的钱贵在那里可以结交在清华挂有类似头衔的朱镕基、王岐山等中国政府权贵。

²²⁴ 一个董事泄露机密，让他的印度朋友知道巴菲特将投资高盛，从而买下大量高盛股票发财。虽然克林顿、安南等人都在为他求情，此董事在纽约被判定有罪。

7月3日，Joffe与Bilello²²⁵和我在电话上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会议。我从口头上再次介绍了我为什么关注公司的人权等社会政策的经历，以及人道中国的工作。她们希望我不要提交股东提案，答应还会请别的同事来听取我的建议。我同意进一步交流，暂时不提交股东提案。7月19日，我电邮她们，进一步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立场，介绍我正在与微软和思科的交涉，建议成立一个由外部专家和公司相关部门主管构成的工作小组，检讨、改进公司的人权等社会政策。

7月29日，Bilello回复说公司没有相应的部门或人员负责人权政策，同时说公司在慈善事业上有不少支出，包括对中国的全国妇联的赞助。我8月3日回复指出全国妇联是官方组织，如果公司为了与中国政府的生意去拉拉关系，也可以算是业务支出，但对公司在中国做业务的正当性没有任何贡献。正因为公司没有人负责人权政策，才更需要外部专家（不管是否包括我本人）的帮助。我建议道：能否把10%的慈善支出用于人权等社会责任呢？

8月15日，Joffe、Bilello加上另外两位公司的年青律师与我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我没有得到这两个人的姓名和职称的文字介绍，也感到他们对中国事务和我的观点很生疏，所以只好又重复讲过的意见。最后我们同意由我着手修改公司的人权声明。

我9月8日致函，指出现有的人权声明先把人权的责任推给政府，很不严肃，因为对人权的最大侵害担忧就是来自政府，公司的人权政策就是要制定出如何在民主或非民主的国家做生意时不违反人权原则，以及在违犯的情况下如何补救的机制。我再次提议公司把10%的慈善支出于社会责任、把1%的慈善支出于政治受害者。我也建议把用来充数的环境问题声明去掉。正如我对微软的长达3页半的人权声明的建议一样：没有人读超过两页的任何声明。我也正式提出一份外部人权专家五人名单，与公

²²⁵ 她没有告诉我她的职称，但我在网上查到她是一个 trader。我读到一本书中讲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在高盛奋斗几年也没有升到 trader 的地位。

司的五名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共同检讨、制定人权政策、社会责任报告、员工守则等。我特别指出：公司与基辛格、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周小川、清华大学等的关系无法增加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正当性，只有设立人权委员会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我们有意愿和能力帮助公司。

她们没有书面正式回复我的建议，在 10 月 12 日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上，Joffe 解释说公司不可能接受我的建议，而老练的 Bilello 一直没有发言，以至于我在会议结束时问 Bilello 为什么没有出席？她才赶快回答：“我在线上呢！”我不得不遗憾地通告她们：“既然董事会不愿意接受我的建议，我也无法接受你们的拒绝理由，只好在股东大会上由广大股东来投票决定我们的分歧了。”幸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还没有完全被高盛等大公司控制，我这样的极小股东可以挑战它们。这是美国经济制度中从大萧条中接受的教训而制定的民主成果之一，值得大力推广运用。

10 月 29 日，我从证券公司开出高盛股份证明后，立即到邮局用挂号寄出了 2013 年股东大会关于设立人权委员会的提案。除了以上提到的内容，我特意加入高盛原 CEO、也是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美国财政部长 Henry Paulson 在其大著 "On the Brink: 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中的豪言：“从 1992 年到我离开高盛时的 2006 年，我们在中国从无到有 1 千 5 百名员工，其间我去了中国 70 趟。”“我 4 月 20 日被邀请去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进午餐。”“我和胡锦涛会议完后，胡和我私下会见。”这些都印证高盛在人权状况令人担忧的中国做得很好 did well 且有非凡的能力影响中国的社会变化；现在，让高盛也做好事 do good 吧！

我同时致函 Joffe 和 Bilello，谢谢她们在我和高盛董事会之间的交流，并表示我随时愿意撤回提案—如果董事会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制定人权政策的话。至今为止，高盛没有回复我。高盛同时影响美国两大政党并直接出马执掌财务大臣的时代过去了²²⁶，我估计高盛不会像雅虎那样愚蠢地动

²²⁶ 高盛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支持同行罗姆尼，现在不得不尴尬地与得胜的奥巴

用律师行来拒绝我的提案（我提醒过她们：那样的话，我将每年都提交不止一个提案，直到被付诸大会表决为止）。看来，明年在高盛股东大会上的交锋不可避免了。

[2012年12月8日]

马当局打交道。前不久，其 CEO 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向奥巴马示好。

23.2 高盛股东大会人权提案揭开纪念“六四”的序幕

我们通常把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日作为纪念“六四”的开端。不过，今年，这个开端早了3天。今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U.S. Security & Exchange Committee (SEC)和高盛 Goldman Sachs Group 公司同时发布了高盛2013年股东大会的内容，其中的第5号提案（前4个是董事会的提案）就是我的设立人权委员会提案²²⁷，全文如下：

Resolution for the 2013 Shareholders Meeting o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Resolved: 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Goldman Sachs Group establish a Human Rights Committee to review, assess, disclos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the company's corporate policy and practice on human right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recommended, by resolution, in its discretion and consistent with applicable laws to: (1) adopt Goldman Sachs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2) designate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including outside relevant human rights experts, (3) provide the committee with sufficient funds for operating expenses, (4) adopt a charter to specify the powers of the committee, (5) empower the committee to solicit public input and to issue periodic reports to shareholders and the public, on the committee's activitie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and (6) adopt any other measures.

Supporting Statement

From the Chinese Tiananmen tragedy in 1989 to the “Arab Spring” movement today, human rights issue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cerns for every corporation doing business globally. Human

227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886982/000119312513152411/d447333ddef14a.htm#toc447333_42

<http://www.goldmansachs.com/investor-relations/financials/current/proxy-statements/2013-proxy-statement-pdf.pdf> (Item 5).

rights violations also occurred by big corporations in advanced democratic society. For example, News Corp. opposed my human rights proposal at the 2010 shareholders meeting before its scandals were exposed to the public. The human rights concern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repressive countries is from the core issue of legitimacy. Goldman Sachs Statement on Human Rights only applies to countries where "national governments bear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human rights". However, since human rights concerns mainly happen in countries where governments do not "bear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human rights," our company needs to establish a human rights committee for our business in countries where the governments are no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or the authorities are not accountable to or responsible for their people.

In regard to China, our CEO and Audit Committee Chair listed their posi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where I was a Nuclear Physics student against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1980-85) as a qualification for re-election. The book "On the Brink: 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by our former CEO Henry Paulson said, "from having virtually no presence there at all in 1992, we went to having perhaps 1,500 people in the country when I left Goldman in 2006. In that time I made about 70 trips to China." "I had been invited to an upcoming lunch on April 20 at the White House in honor of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I flew to Washington for the Hu Jintao lunch, and I met beforehand with Zhou Xiaochuan,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governor." "In my concluding meeting with President Hu Jintao... Hu and I then adjourned to a private meeting." These strongly demonstrate our business in China, where people's basic human rights are severely violated (for example, I was deprived of my citizenship without any written document, because I organized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in Japan during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我在“改进 Goldman Sachs Group 高盛集团的社会政策的尝试”²²⁸一文中“说明高盛在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换中起到了任何别的机构都不能替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我以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和近来阿拉伯之春为例，指出公司应该制定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特别就中国而言，公司的两名重要董事（CEO 和审计委员会主席）都把在清华大学的头衔作为参选董事的资格之一²²⁹，却没有任何社会政策考虑间接受害于公司业务的中国普通民众，面临着 legitimacy（正当性）的问题。”“指出现有的人权声明先把人权的责任推给政府，很不严肃，因为对人权的最大侵害担忧就是来自政府，公司的人权政策就是要制定出如何在民主或非民主的国家做生意时不违反人权原则，以及在违犯的情况下如何补救的机制。……特别指出：公司与基辛格、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周小川、清华大学等的关系无法增加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正当性，只有设立人权委员会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我们有意愿和能力帮助公司。”“我特意加入高盛原 CEO、也是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美国财政部长 Henry Paulson 在其大著 "On the Brink: 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中的豪言：‘从 1992 年到我离开高盛时的 2006 年，我们在中国从无到有 1 千 5 百名员工，其间我去了中国 70 趟。’‘我 4 月 20 日被邀请去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进午餐。’‘我和胡锦涛会议完后，胡和我私下会见。’”

不过，高盛同时影响美国两大政党，甚至（违背自由资本主义老祖宗亚当·斯密的教诲）直接出马美国执掌财务大臣的时代过去了，我乐观地估计高盛不会拒绝我的提案。没想到，高盛 2012 年 12 月 21 日悍然向 SEC 发出排除我的提案的信件，列举三大理由，其中还包括对我参与人权运动经历的疑问，暗示我没有提案资格²³⁰。我 12 月 28 日立即向 SEC 提出反驳²³¹，同时指出高盛在这样严肃的文件中连基本的 due diligence 尽职调查

²²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gs-policy.pdf> 2012 年 12 月 8 日。

²²⁹ 这也是母校的学术堕落的反应，因为西方的钱贵在那里可以结交在清华挂有类似头衔的朱镕基等中国政府权贵。

²³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gs_sec.pdf

²³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zhao121228.pdf>

也没有履行：如果高盛有诚意，我可以提供我的清华毕业证书、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包括最近《朝日新闻》2009年6月8日为纪念“六四”20周年对我当年受到日本当局迫害的采访）、以及我2009年9月23日致函刚上台的首相鸠山要求他的民主党政府公开当年自民党政府迫害我们中国留学生的档案资料²³²等²³³。

今年3月8日，我接到SEC署名2月7日的回复文件²³⁴。仔细阅读之后，我不禁放声大笑：SEC的律师们毕竟没有白吃我们的税金、美国的民主毕竟还有活力！在这封信里，Attorney-Adviser 律师-顾问 Kate Beukenkamp 驳斥了高盛的两大排除理由，只对其中之一表示“appears to be some basis 好象有点道理”。要是在以往，这就枪毙了我的提案，只好明年再挑战了。但今年，这封信接着说：“It appears that this defect could be cured, however 但是，这个缺欠好像能够被改好”。只要我在7天之内把带有法律必须口气的 require 强求一词改为中性的 request 要求或柔软的 recommend 推荐，就可以改正“缺欠”了！看来，SEC的律师照顾到英文是我的第三语言，容许我在这样关键的地步提高我的英文水平。我立即照办，致函高盛和SEC改正了提案中的这个“缺欠”。

高盛3月13日致函SEC和我，只得接受把我的提案列入今年的股东大会表决，却马上很不严肃地用已经被SEC回绝的理由作为董事会声明反对我的提案²³⁵！董事会这样做，大概是认为或期待高盛的绝大多数股东或者没有头脑、或者对人权意识麻木不仁。而且，董事会把会场从联合国等国际人权机构林立的公司总部所在地曼哈顿变到了宗教保守、人口稀少的犹他州的盐湖地带，难道一个极小股东的人权提案就那么可怕？²³⁶

²³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²³³另外，高盛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没有列出我的地址（别的股东提案者都印出地址），提案中介绍我在清华念书的年份1980-85也被漏掉-成为198085。

²³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SEC130308.pdf>

²³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gs_statement.pdf

²³⁶ 2011年，因人权丑闻缠身的新闻集团为了逃避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把股东大会从总部所在地纽约移到洛杉矶。

几年前我就买下高盛的股票，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战友代理我出席它在纽约的股东大会²³⁷，现在终于实现了利用这些与中国有特殊官商关系（这正是 89 年“六四”民主运动的导火索）的国际大公司的股东大会纪念“六四”等人权运动的战略目的。今天，全世界几百万股东（包括中国的政府投资基金）开始读到这份纪念“六四”最好的公共教育文献，我或我的代表将在“六四”前夕的 5 月 23 日举行的高盛股东大会上，发表纪念“六四”24 周年的声明，宣示 24 年前占领天安门那样的影响我们公共生活的所有空间的社会运动已经在世界各地发芽、开花、结果！²³⁸

将来，总有一天，类似的人权提案也要付诸日本国会、中国人大这样的机构表决，直到人权原则、历史真相和社会正义得到昭明。

[2013 年 4 月 12 日]

4 月 13 日日记：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昨天高盛股东大会通知的报道，主要讲高盛 CEO 去年收入 2 千 1 百万美元达到 2008 年以来最高，同时又提到美国几大工会在华盛顿设立的政治别动队 **Change to Win** 的基金主动撤销了它的提案。我昨天以为他们的提案被排除，给 **Change to Win** 的专职研究员再次发去电邮，表示愿意明年为美国劳工的利益提案，没有收到回复。原来，与上个月关于惠普股东大会的提案一样，这些控制工会的专职干部和律师更愿意用美国劳工的名义私下与资本阶级（董事会）做一些小交易，而没有意愿和能力坚持大义和原则。这不由得是我再次回到美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先驱：当卡内基对工会的请愿、报纸的呼吁充耳不闻时，安那祺主义者伯克曼“替天行道”，只身教训资本家，被判刑 22 年。²³⁹

²³⁷ “谁愿出席高盛曼哈顿 5 月 7 日股东大会？”2010 年 4 月 23 日。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0/04/201004230653.shtml>

²³⁸ 关注的朋友可在当天尤他州上午 9 点半从高盛公司的网址 www.gs.com 上网观看会议实况。

²³⁹ 以下引自柏克曼著巴金译《一个安那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

On behalf of Jing Zhao, Rev. Finn represented Item No. 5 Human Rights Proposal at the annual meeting today May 23, 2013. It received about 4% approval.

<http://www.goldmansachs.com/investor-relations/proxy-materials/meeting-highlights-2013.html>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aca-2.pdf>

“和姆司德的召唤”：那一天的事情还清清楚楚地刻印在我的脑里。那是一八九二年七月六日。我和朋友费加两人静静地坐在我们的小小住家的后房里，爱玛突然走了进来。她平日惯有的急速而有力的脚步这时候听来是异乎寻常地坚决。我掉头去望她，她眼里的奇特的光辉和她脸上的兴奋的颜色使我大吃一惊。“你们读过没有？”她挥舞着一份半打开的报纸，大声叫起来。“什么事情？”“和姆司德。罢工工人挨了枪。品克顿杀死了妇人和小孩。”她带了焦急而断续的调子说话。她的话语就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的号叫，她那音乐般的声音里掺杂了一种严肃的苦涩味，这是由绝望的痛楚而起的。我从她的手里拿过报纸来。我读着关于这次激烈的斗争（和姆司德的罢工潮，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是全体工人的被开除事件）的如火如荼的记载，我的激动不停地增加着。报纸上详细地揭发了卡内基公司破坏钢铁工人联合会的阴谋。为了这个目的，公司就选了素来异常仇视劳工的福利克做总经理。他一面故意和联合会继续着友好的交涉，一面却暗地里作战争的准备：譬如修理和姆司德炼钢厂，筑起一道板墙，上面架着铁丝网，中间留着射击时用的枪洞；又雇了一队品克顿匪徒。他在黑夜里偷偷把这群人运进了和姆司德。最后可怕的屠杀就发生了。我把报纸递给费加。爱玛望着我。我们默默地坐着，每个人都沉溺在自己的思索里。我们只偶尔交谈了一两句话，或者一瞥探寻的、含有深意的眼光。

23.3 以股东大会推动东亚太平洋的新途径

2011年3月14日，我在悼念东日本大地震的受难者之际，发表“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非主权方案”²⁴⁰，除了列举“那些自身被主权观念蒙蔽或者利用主权观念欺骗民众的政党、组织或个人的未开化状态的典型例子”，也“还可以推广到美军密集驻扎的琉球/冲绳问题。更进一步，连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除了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外，也要突破主权观念的制约。”呼吁“让我们抛开主权、开放国界、废除国家（包括常备军、核武器等），创建中日（包括台湾，还有利益相关者美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吧！”

2012年10月12日，我又补充道：“此文发表以来，围绕钓鱼岛/尖阁诸岛又发生了一系列国际事件，导致中国政府取消建交40周年纪念活动、取消出席世界银行东京年会等。中（包括台湾）日之间的官司自然也打到美国来，石原控制下的东京都9月在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整版广告，请求用美日军事同盟保卫日本的‘固有领土’尖阁诸岛。没想到这位二十几年前在日本经济泡沫高潮靠《敢对米国说不！的日本》成名的作家成为政客后，现在豹变为美国战略转移到东亚的马前卒。有趣的是，Wall Street Journal的对手The New York Times登出倾向中国的文章。不久，中国的广告也出现在更多的美国媒体上，突出世界大战中美同盟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政治意义。10月10日，台湾也在美国的媒体上刊登了有更详细史料的广告。”

“又一个20年过去了，我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10月号‘为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基’的文章依然历历在目，印证着我的担忧”：“今天，当我们透过纷乱的喧哗表象，认清各种政治势力的企图和手段之后，不得不深深地忧虑隐藏在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危机。因为迄今为止，中日关系尚没有奠定真正平等、永久和平的基石；也更痛感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期待。”“外交关系只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属于政府之间交易的侧面，只是一种反映和结果。外交活动的展开离不开自身的行为限制，…这就需要我们的外交知识、技能与利益的门外汉，基于中

²⁴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diaoyu.pdf>

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奠定中日关系永远和平、友好的基础。…不论从历史、文化、地理等各种因素来看，中日关系都应该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更符合人权尊严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从韩国的反日情绪的高涨来看，可以完全准确地预测到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发达起来的中国民众同样会对日本作出反应。笔者为了日本的将来，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呼吁日本政府尽快把眼光放在中国民众身上，因为中国的十亿民众才是中日关系的实质主体，日本政府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中国民众！应该说，八九中国之春为日本的对外交政策的转机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考验机会，但日本政府的表现，…使它彻底丧失了中国民众对其现代性、民主性国家体制的一丝期待，告诉了我们在国际化、人权意识高涨的世界里，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国国民性的严酷现实，更激励了我们在日中国人彻底建设民主、人权、统一中国…的意志。”“只有把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定在人权尊重的基石上，才可能获得包括正常政府外交关系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真正平等和永久的和平。”

今年以来，平静的东海上空风云激荡，当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4周年之际再次回访家乡，伫立在中国抗战大本营“陪都”重庆的朝天门码头，注意到江边还有没被拆除的小洋楼。那是法国水兵营旧址。在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连不算强大的法国水兵都在中国内陆设营，更强大的帝国英国、日本、美国的炮舰更“机会均等”地在长江上游戈。而正是在西太平洋舞台上展开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战彻底消灭了日本帝国海军，奠定了战后东亚的太平。更近一点，1996年，西太平洋一个重要岛屿上的首次普选（不管它叫什么名称），也是由穿过台湾海峡的美国航空母舰“担保”的。

但是，今非昔比。美国总统本人连最重要的亚太会议都没法现身，美国外交部长（国务卿）被中东事务（叙利亚、伊朗）缠身没法调节东亚纠纷。在奥巴马把是否仅从海上轰击叙利亚²⁴¹的烫手山芋抛给国会时，我

²⁴¹ 三心二意的奥巴马丝毫不敢提“出动地面部队”的字眼，因为美国公众不会容许。但具有几十年与以色列战斗经历的叙利亚政府，在伊朗和俄国的支持下，不可能被美国单独（这一次，连英国也不敢介入）的海上轰炸打败。

观看自信的阿萨德二世通过著名记者 Rose 对美国听众的直接呼吁和“开导”，联想到金三世在朝鲜“主权”庇护下的专横残忍，知道美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不管是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日本的“国家保密法”和安倍三世²⁴²的靖国神社参拜、朝鲜半岛的悲剧，都是合理的现实延伸，所以空手而归的美国副总统的东亚周游本来就没有必要。谁也不知道如何形成中美两大国“共管”西太平洋的 G2 格局。世界上靠知识吃饭的文人阶层都由物质利益决定意识，没有独立的能力思考国际关系的改善，在大学、“智库”、学会、杂志等都被国家权力和资本势力控制的现实下，有什么新的途径推动东亚的和平呢？

我再次想到了美国自大萧条以来硕果仅存的民主权利：唯一确保小股东独立话语权的股东大会提案，也只有这条途径可以推行外交政策的公共教育、为美国公众提供促进国际和平的投票机会。

2013 年 11 月 15 日，我再次向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唯一残存的独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提交 2014 年股东大会的提案，以我 1989 年在日本组织民主人权运动被日本政府出卖的经历和今天的中日关系危机现实，列举微软公司部分接受我的提案去年成立了“法规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榜样，提议高盛也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²⁴³。不久，我收到高盛投资者关系部门的电邮联系，确定 12 月 16 日举行电话会议。在电话会议上，我解释了为什么自今年的高盛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后继续提案的理由，并希望公司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排除我的提案。当然，高盛与我都“知彼知己”，没有妥协的可能，与我对话的女士并没有得到公司授权与我谈判，只是转告我公司已经决定会再次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致函排除我的提案。

²⁴² 日本的国会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来自议员的家庭、秘书或官僚。继承家族地盘的议员（目前多为第三代）很少有原首先鸠山那样在美国留学、或原自民党干事长加藤那样的香港领事的海外经历，鼠目寸光，远不如带领日本战后复兴的上一、两代议员。1989 年初，我的敦促日本国际贡献的论文得到时任日本外交协会会长安倍二世（晋太郎）授予的优胜奖，感到世界经济大国日本有兴趣担负国际政治责任，但随后而来的天安门事件，证明日本政府对亚洲民众期待的出卖。

²⁴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gs2014.pdf>

12月24日，我收到高盛转来的当天向SEC提交的33页文件，以公司“已经相当程度上实施了提案的要求”和我的提案“contains materially false statements 含有虚假陈述”、“inherently vague and indefinite 本能上含糊和不确定”的荒唐理由，悍然要求SEC对公司排除我的提案的行为不采取行动²⁴⁴。我思考了几天，于12月28日也致函SEC，驳斥了高盛的理 由，指出高盛才故意用“本能上含糊和不确定”的虚假声明，不可能、也不愿意检讨、实施公司的公共政策，而考虑到高盛作为金融行业的领头今年被列入道琼工业指数的事实，其公共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重，更有必要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²⁴⁵。

当然，在政府政策被私营集团利益控制、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化的形势下，通过股东大会改革跨国公司的董事会结构，任重道远，我这样的“愚公”还要感动“上帝”（广大股东、美国公众、世界民众）才能移山。但是，既然东亚和平的前景已经被既有的国家权力和资本利益集团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拉到今天的死胡同，即使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的公司股份），也成为必须开辟的新途径、新战场。

[2013年12月30日]

²⁴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gs-sec.pdf>

²⁴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Zhao-SEC.pdf>

23.4 与高盛集团董事会的首次面对面交锋

我在“改进 Goldman Sachs Group 高盛集团的社会政策的尝试”²⁴⁶一文中“说明高盛在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换中起到了任何别的机构都不能替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我以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和近来阿拉伯之春为例，指出公司应该制定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特别就中国而言，公司的两名重要董事（CEO 和审计委员会主席）都把在清华大学的头衔作为参选董事的资格之一²⁴⁷，却没有任何社会政策考虑间接受害于公司业务的中国普通民众，面临着 legitimacy（正当性）的问题。”“公司的人权政策就是要制定出如何在民主或非民主的国家做生意时不违反人权原则，以及在违犯的情况下如何补救的机制。……特别指出：公司与基辛格、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周小川、清华大学等的关系无法增加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正当性，只有设立人权委员会可以做到这一点”。

第二年，我在“高盛股东大会人权提案揭开纪念六四的序幕”²⁴⁸一文中介绍到：“现在终于实现了利用这些与中国有特殊官商关系（这正是 89 年“六四”民主运动的导火索）的国际大公司的股东大会纪念六四等人权运动的战略目的。今天，全世界几百万股东（包括中国的政府投资基金）开始读到这份纪念六四最好的公共教育文献，我或我的代表将在六四前夕的 5 月 23 日举行的高盛股东大会上，发表纪念六四 24 周年的声明，宣示 24 年前占领天安门那样的影响我们公共生活的所有空间的社会运动已经在世界各地发芽、开花、结果！”²⁴⁹

²⁴⁶赵京，2012 年 12 月 8 日。

²⁴⁷这也是母校的学术堕落的反应，因为西方的钱贵在那里可以结交在清华挂有类似头衔的朱镕基等中国政府权贵。

²⁴⁸赵京，2013 年 4 月 12 日。

²⁴⁹ On behalf of Jing Zhao, Rev. Finn represented Item No.5 Human Rights Proposal at the annual meeting today May 23, 2013. It received about 4% approval.

<http://www.goldmansachs.com/investor-relations/proxy-materials/meeting-highlights-2013.html>

同时，我也把目光转向更迫切的国际局势：“谁也不知道如何形成中美两大国‘共管’西太平洋的G2格局。世界上靠知识吃饭的文人阶层都由物质利益决定意识，没有独立的能力思考国际关系的改善，在大学、‘智库’、学会、杂志等都被国家权力和资本势力控制的现实下，有什么新的途径推动东亚的和平呢？”“2013年11月15日，我再次向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唯一残存的独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提交2014年股东大会的提案，以我1989年在日本组织民主人权运动被日本政府出卖的经历和今天的中日关系危机现实，列举微软公司部分接受我的提案去年成立了‘法规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榜样，提议高盛也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既然东亚和平的前景已经被既有的国家权力和资本利益集团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拉到今天的死胡同，即使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的公司股份），也成为必须开辟的新途径、新战场。”²⁵⁰

今天，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旧金山的高盛股东年会会场，代表西雅图的Equality Network Foundation和加州的McRitchie/Young宣读股东提案。朋友Dr. Yao代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也来支援。与会者大约一百人是公司的董事和员工，约二十人是股东。会议开始后，很快就轮到我宣读第5号要求改善计票方法（去掉“弃权”一项，因为它被董事会算为“反对”股东提案，等），得到约5%的赞成。第6号是劳联-产联AFL-CIO Reserve Fund要求限制高层报酬的提案，得到约19%的赞成。我又宣读第7号要求10%（而不是25%）股东可以书面授权召开会议的权利，得到37%的赞成。

正式议程结束后，在问答期间，没有人站起来提问。于是Dr. Yao自告奋勇，提到今天报道的中美军方在南（中国）海较量的新闻，询问公司的对策。我接着列举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挑战，鉴于CEO在清华大学当顾问，又能见到习近平，能否分享美国金融公司在中国做生意面临的困难。CEO只是泛泛而谈，草草地结束了会议。

我当然还有很多议题（例如五个高管2014年收都过两千万美元），但今天第一次与美国金融集团首领的直接交锋，已经达到当初“占领华尔街”

²⁵⁰赵京，“以股东大会推动东亚太平的新途径”，2013年12月30日。

的目的，下一步还得从新的提案开始。

[2015年5月21日]

24.1 Apple, 难啃的苹果

今天，我一早起来，赶往苹果公司参加年度股东大会，提前二十分钟左右达到公司总部。我在通知指定的 1 号大楼停车，却被告知要走到 4 号大楼去开会，幸好不算远。奇怪的是公司员工在门外提供咖啡、面包，检查证件，进去以后被要求交出手机等，还要解皮带通过安全检查。苹果公司害怕什么呢？

更奇怪的是在会场见不到董事会、主持人等，只有两个大屏幕。我迅速浏览会议议程和规则，发现第 2 号提案被取消了。我从网上知道有基金大股东对公司把四个问题（其中涉及股份分红）绑到一个提案不满，诉诸法庭，结果公司退却了。我注意到股东可以在正式会议期间（而不仅是在投票议程以后的提问期间）发言，这正是我来开会的重要目的。

2月8日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提到：“苹果发布了供应商责任报告，……说，学生工的‘周期性特征’，‘导致发现问题很难’。”“一直以来，富士康(Foxconn)尤其受到劳工权利人士的批评。富士康是一家大型台湾公司，是惠普、苹果和其他公司的合约制造商，为其生产电子设备。”²⁵¹ 惠普 2013 年 3 月 20 日举行的股东大会包括我作为股东要求成立人权委员会的第 6 号提案²⁵²，显示我几年来推动惠普人权政策，结出了初步成果。我要同样帮助苹果，今天是第一步与公司交锋。我默念准备着两分钟时间限制内要发言的要点。

会议主持人介绍第 1 号关于董事会选举的提案后，那个总是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白人老头站起来发言。他反对戈尔当董事。除了指责戈尔“窃取互联网功臣”的名号外，还说戈尔与阿尔及尼亚的恐怖分子袭击有关联。我本来对戈尔也有意见，但这种指责过分离谱，很想站起来为戈尔打抱不平。不过，我知道自己的千万分之一股份换来的发言权利不能被浪费到个

²⁵¹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 (中文)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en/> (English).

²⁵²

http://media.corporate-ir.net/media_files/irol/71/71087/proxy2013/HTML2/default.htm

人情绪上。我耐心等待老朋友 John Harrington 的第 6 号人权提案。

一个年轻人站起来宣读第 6 号提案，提到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的悲剧，其源头就在苹果公司这个供应链的顶端。我在他读完后，举手、站起来要求发言。大家都看见了我的要求，屏幕上的主持人当然也会看到，因为介绍提案之前他看到了我边上的股东等人举手要求投票纸，就让员工来分发投票纸和笔。现在他对我视而不见，宣布没有人要发言，就关闭了股东对提案的发言机会。

我 2009 年在谷歌的股东大会上经历过类似的场合²⁵³，不想强硬行事杜绝与董事会交流的渠道，就收起上衣外套，静静地退场表示抗议。一个女员工过来，递给我一个平板电脑，让我写下意见，还说我可以以后的非正式问答期间发言。我拒绝了。我声明：“我来股东大会的目的，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人权提案投票之时，向股东们分享人权的重要意义，鼓励大家股票支持这个提案。现在，主持人容许一个股东在第 1 号提案后发言，不容许另一个股东在第 6 号提案后发言，是不公平、不民主、侵害股东权利的！这个大会没有意义了！”。

我刚开出停车场，看到十几个年轻人举着 SEIU 工会的标语，抗议苹果在硅谷当地也违反劳工的权利(www.seiu-usww.org)。我又把车停下，返回来向他们讲解了在股东大会会场里面发生的不民主事态，他们更加气愤，向我表达了对中国工人权利的致敬与国际人权斗争团结的决心。

我匆匆赶回来，马上写好并发出了给苹果公司董事会的抗议信²⁵⁴，先看他们如何反应。由此看来，苹果难啃，推动苹果公司社会责任的工作来日方长，任重道远。

[2013 年 2 月 27 日]

²⁵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google-c.html>

²⁵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letter_to_apple2013.pdf

24.2 问责荒诞的苹果高管厚禄问题的提案

2013年2月27日，我第一次赶往 Apple 苹果公司参加年度股东大会，体会到“苹果难啃，推动苹果公司社会责任的工作来日方长，任重道远。”²⁵⁵不得不声明：“我来股东大会的目的，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人权提案投票之时，向股东们分享人权的重要意义，鼓励大家股票支持这个提案。现在，主持人容许一个股东在第1号提案后发言，不容许另一个股东在第6号提案后发言，是不公平、不民主、侵害股东权利的！这个大会没有意义了！”²⁵⁶。但也“不想强行行事杜绝与董事会交流的渠道，就收起上衣外套，静静地退场表示抗议。”我当天写好并发出了给苹果公司董事会的抗议信²⁵⁶。由于没有任何结果，我还单独给 The Honorable Mr. Gore 尊敬的董事戈尔先生去函²⁵⁷，也是石沉大海，最终只好通过股东提案这个唯一的途径把苹果的治理问题诉诸股东大会表决。

2014年4月22日，我正式向苹果提交建立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提案²⁵⁸，遭到公司以各种理由排除。2015年7月24日，考虑到公司高管的离谱高薪已经成为美国经融危机和社会不公的因素²⁵⁹，鉴于苹果高管们给自己滥发天文数字奖金对美国公司的误导影响，我提交提案要求改革公司报酬委员会、包括外部独立专家采纳反映美国总体经济的报酬原则²⁶⁰，又被公司排除，我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反驳苹果律师的几个排除理

²⁵⁵ 赵京“Apple，难啃的苹果”，2013年2月27日。

²⁵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letter_to_apple2013.pdf

²⁵⁷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to_gore.pdf

²⁵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apple_proposal_15.pdf

²⁵⁹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我的提案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

²⁶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apple_proposal_2016.pdf。例如，一个高级副总裁2014年报酬高达73,351,124美元。

由，但 SEC 同意了苹果律师的一个理由（提案有可能涉及普通员工的报酬，越权微观管理公司日常业务），所以没能付诸股东大会表决。

今年 6 月 13 日，我再次提交提案要求改革公司的高管报酬政策²⁶¹。除了指出苹果的高管们 2015 年给 CEO 之外的每一个（完全不同功能部门的）高管自己滥发完全同额的 1,000,000 美元基本工资、20,000,105 美元股票奖金和 4,000,000 美元鼓励报酬的“各取所欲”的荒诞行为，我汲取上次被排除的教训，特意修改上一次的提案，只要求改革 executive 公司高管们的报酬而不涉及普通员工的报酬，而且给予董事会和报酬委员会选择外部专家或资源的灵活自主权。

果然，苹果的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副总律师 10 月 7 日又向美国 SEC 致函排除我的提案，其中列出四点法规理由，引用了不少被排除提案的案例²⁶²。我 10 月 13 日致函 SEC，指出苹果的荒谬。针对苹果律师玩弄词藻的伎俩，特别引用我 2010 年在谷歌股东大会、2013 年在高盛股东大会的提案的类似用语，反驳道：“难道苹果的股东们的英文理解力不如谷歌或高盛的股东们吗？”²⁶³与上次一样，苹果的副总律师 10 月 21 日再次去函 SEC，声称我 10 月 13 日的反驳函没有就苹果 10 月 7 日信函的排除理由中的各个案例进行逐一反驳²⁶⁴。我不是企业律师，也没有兴致被苹果的律师拖入那些无关痛痒的案例的不毛论争中。另一方面，我也期待 SEC 的律师有基本的良知和训练，会作出负责的判断。

在与苹果交涉的同时，我 6 月 9 日向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公司也提交了类似提案²⁶⁵。10 月 21 日当天我正好与应用材料的三个报酬和

²⁶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apple_proposal_2017.pdf

²⁶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apple-sec.pdf>

²⁶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zhao-sec-apple.pdf>

²⁶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apple-sec-2.pdf>

²⁶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amat_proposal_2017.pdf

法务部门的官员就我的提案会谈，他们倒很开放地征求我的意见，没有介意股东会“干涉公司普通业务”。我介绍自己从 2008 年的甲骨文公司股东大会以来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唯一引起争议的是关于高层主管的报酬问题...，要求由股东在大会上批准高层主管的报酬。特别的是，在所有的高科技大公司中，Oracle 的创始人兼 CEO（执行长）Lawrence Ellison 的收入格外突出，一直是争论的话题。他今年的收入为 8 千 3 百万美元”²⁶⁶。但那时还只是个别 CEO 的贪婪问题，现在蔓延到整个高管阶层。我引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2016 年 2 月发表的关于美国公众对 CEO 报酬态度的研究报告，其结论是 CEO 们报酬高得太离谱，应该大幅减低²⁶⁷。我想到是否可以用应用材料公司的正面交流态度再次反驳苹果公司的“干涉公司业务”、“微观管理”的指责，但感到不应该像苹果律师那样疲劳轰炸繁忙的 SEC 律师。

今天，我终于收到 SEC 发给苹果律师和我的电邮，其中转发 SEC 律师的见解：无法认同苹果的所有四点排除理由，没有理由排除我的提案²⁶⁸。美国的经济民主制度毕竟在运行！我马上也转送给应用材料公司，免得他们重复苹果律师的无用功。让我们等待明年 2 月、3 月召开的股东大会的问责投票结果吧！

[2016 年 10 月 26 日]

²⁶⁶ 赵京“出席 Oracle 甲骨文公司股东大会”，2008 年 10 月 10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oracle.html>

²⁶⁷ Americans and CEO Pay: 2016 Public Perception Survey on CEO Compensation
<https://www.gsb.stanford.edu/faculty-research/publications/americans-ceo-pay-2016-public-perception-survey-ceo-compensation>

²⁶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sec-apple.pdf>

25.1 美国公共事业公司的治理问题：

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联合股东大会观感

2010 年 PG&E 公司的天然气管道在加州 San Bruno 市爆炸，8 人遇难，38 栋房屋被毁。当代美国的罗宾汉/梁山好汉 Chevedden 兄弟义愤填膺地买下 PG&E 的股票，要求我去 PG&E 的股东大会发言谴责公司的头头们。我因为资源（时间和资金）有限，只能关注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大公司，没有购入 PG&E 这样的美国公共事业公司的股票，告诉 Chevedden 说，没有付诸股东表决的提案的发言，没有什么意义。Chevedden 同意我的判断，等到去年下半年可以提案的时候²⁶⁹，向 PG&E 发出了战书。

今天，我一早赶去 PG&E 在旧金山的总部出席股东大会，在列车上反复默读唯一的股东第 4 号提案（前三个是公司的提案）²⁷⁰。Chevedden 的这个提案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同时“顺带”谴责包括兼任董事会主席和总裁的首席执行官 CEO 在内的董事们的贪婪（例如，前任 CEO 年薪 1 千 5 百万美元，退休时又拿走 2 千 1 百万美元）和不负责任（爆炸事件）。我同时注意到这是 PG&E Corporation 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的联合股东大会，后者是公共事业公司，受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 CPCU 和联邦能源规制委员会 FERC 的规制（主要是价格调整），也受到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NRC 的规制（因为有原子能发电设施），是业务主体；前者 PG&E 是控股公司。为什么同一个实体要分为两个公司呢？这里面有很多奥妙，但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公共事业已经被私有资本控制，私有资本阶级用控股公司更便于控制公共事业。我在日本时，注意到那些把放纵经营的后果转嫁到公众头上的官商合营“第三形态”七成陷入赤字²⁷¹。实际上，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的总裁是个办事的伙计，PG&E 的

²⁶⁹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必须拥有股票一年以上，提案又必须在股东大会半年之前发出，所以，一般要有两年准备期间。

²⁷⁰

http://www.pgecorp.com/investors/financial_reports/annual_report_proxy_statement/pdf/2013/2013_Proxy_Statement.pdf

²⁷¹ 田口骥一郎《海燕》1998 年 1 月 11 日第 661 号文章，赵京译文首次发表在美国出版的《中国与世界》1998 年 4 月号。

CEO（也兼任董事会主席和总裁）才是大老板，他们的 2012 年的收入分别是 5,117,768 美元 9,949,634 美元，可以与微软、甲骨文等最成功的国际大公司的大老板并驾齐驱了。与此同时，今天的财经新闻报道：San Bruno 说 PG&E 该为 2010 年的天然气管道爆炸赔偿 22.5 亿美元²⁷²。这正是我们要利用股东提案这个唯一有效的民主武器捍卫公共利益、教育资本阶级的原因。

PG&E 总部的入口戒备森严，我身着天安门民主女神像上衣、手提简陋帆布袋，由一个女士带领到堂皇的会议大厅的嘉宾座位上。我注意到会场带有半政府的气氛，下半场是雇员股东的座席。一位女士官员宣布会议开始，首先交待会议安全事项，告诉我们在煤气或电力的事故发生时如何避难。其次由秘书长主持会议。他很快 comment 简评头号公司的提案，然后邀请我也学他那样，comment（简短结束）第 4 号提案。我没有上当，用 5 分钟的时间一字一句地念完了所有提案的内容，完成了作为股东对股东正式大会（半个小时左右）的占领任务，留下了历史记录。会后，我们知道这个提案得到 33% 的股东赞同，是个了不起的成果。我在 2008 年“出席 Oracle 甲骨文公司股东大会”一文中记载到：“唯一引起争议的是关于高层主管的报酬问题（第 2 号和 4 号提案）。…报酬委员会主席 Berg 董事为 Ellison 的报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辩解，说 Ellison 身兼数职，全公司都靠他。这些理由都不错，但为什么他一个人的收入是平均技术员工的一千倍？这当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制度与道德信念问题：难道比普通员工高一百倍还不足以满足 Ellison 的欲望吗？难道比普通员工高十倍 Ellison 就不能工作吗？”²⁷³但那一次专门针对高层报酬的提案远没有得到三分之一的股东赞同，从战术上讲，应该把这些不太容易得到大股东赞同的内容“附带”在比较容易得到股东赞同的“董事会主席独立性”问题的提案议题下，顺带通过。我几次想把人权问题也这样提案，但还没有找

²⁷² “PG&E Should Pay \$2.25 Billion for San Bruno Blast, City Says.”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5-06/pg-e-should-pay-2-25-billion-for-san-bruno-blast-city-says-1-.html>

²⁷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oracle.html>

到合适的突破口。

正式议程结束后，PG&E 的 CEO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的总裁简单介绍公司的业务，可以感觉到他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安全”隐患，这使我们这些 PG&E 的用户感到安全了一些。接下来有 7 个股东问了 9 个问题。第 1 个股东就是那位总是为董事会辩护的白人老头。他说 Chevedden 兄弟总是躲在幕后屈辱董事，目的就是要摧毁美国公司。我没有对他的老一套做出解释：Chevedden 兄弟住在南加州，不来与会只是为了节省有限的资源，董事们贪婪得脸都不要了，又何必脸红呢。第 2 个股东问到电动车的加电站问题，CEO 回答说 PG&E 有能力和计划提供更多的加电站。第 3 个股东代表基督教和犹太教要求 PG&E 维护传统价值，不要支持加州的同性婚姻法案，CEO 回答说 PG&E 要与社区搞好关系等。这个股东后来又抱怨 smartmeter 太昂贵，但 CEO 回答说有助于提高安全性，不得不安装。第 4 个股东问到网络安全问题，第 5 个雇员股东提到业务承包的安全隐患，第 6 个股东要求满足承包工人的最低工资，第 7 个股东问到太阳能板的安装，CEO 回答说有人安装中国制造的廉价太阳能板，但用 PG&E 的线路免费传递，要想办法制止。最后，那个雇员股东又站起来发言，被 CEO 制止说可以在会后公司内反映，但他抱怨说这是唯一的机会与董事会和高层交流，而公司内部交流都过滤掉员工的意见了！看来他已经豁出去了。CEO 感谢他提供这个重要信息，说要研究改进，就结束了会议。

我在回程的电车上，进一步想到中国的国营企业的治理，有什么办法也教育一下中国新起的官商结合的权贵阶级呢？看来，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权运动，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任重道远。

[2013 年 5 月 6 日]

一晃两年过去了。今天，我又一早赶去 PG&E 的股东大会，在列车上又反复默读唯一的股东第 4 号提案（前三个是公司的提案）。Chevedden 的这个提案又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同时顺带谴责包括首席执行官 CEO 在内的董事们的贪婪（例如，CEO 2013 年薪 1 千万美元）。

PG&E 总部的入口还是戒备森严，我经由三、四个女士分别带领，到堂皇的会议大厅的嘉宾专用座位上坐下。我注意到会场有一、两百人出席（公司的官员和员工多于股东）。一位女士官员宣布会议开始，交待会议安全事项。其次由秘书长主持会议。他很快 comment 简评头号公司的提案，然后邀请我也学他那样，comment 第 4 号提案。我用 5 分钟的时间一字一句地念完了所有提案的内容，完成了作为股东对股东正式大会的占领任务。

PG&E 的 CEO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的总裁简单介绍公司的业务，可以感觉到他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安全”隐患。接下来有 4 个股东问了 5 个问题。第 1 个股东问公司是否要分出不盈利的天然气部门，被 CEO 否定。第 2 个股东问是否要建更多的发电站。第 3 个股东是复员军人，希望公司多元化聘用；他也与我打招呼表示支持。第四个股东重复两年前的抱怨，代表基督教和犹太教要求 PG&E 维护传统价值，不要支持加州的同性恋或人权团体，CEO 回答说 PG&E 要与社区搞好关系等。这个股东后来又抱怨 smart meter 太昂贵，但 CEO 回答说有助于提高安全性，也可以选择 not 安装。

会议当场宣布，我们的提案得到 45.58% 的股东赞同，是个了不起的成果。正是我们的不懈努力，迫使公司逐步地改善企业治理，让两万 8 千员工和广大的加州用户工作和生活得更平等、更安全的环境。

[2015 年 5 月 4 日]

25.2 2018 年 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联合股东大会

2013 年 5 月 6 日，我出席 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联合股东大会，代表 Chevedden 宣读他的提案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²⁷⁴。今天，我再次赶到旧金山公司总部，代表他宣读第 5 号提案要求降低股东们提名董事的门槛等权利。

很有气派的公司大会场来了一百多人（一半是公司高管和雇员）。整个股东大会的正式议程，与别的公司的股东会议类似，除了形式上的前 3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第 4、第 5 号股东的提案。第 4 号股东提案要求停止公司的所有捐款，但提案者（Ohio/俄亥俄州的小股东）没有来宣读，就作废了。我知道主持会议的 PG&E 董事会主席不想让我多说，但我还是坚持读完了提案全文内容，包括从去年北加州火灾暴露出来的公司高层的管理危机。当场的初步统计显示第 5 号提案得到 26% 股东的赞成。

正式议程结束后，主要由 PG&E 的女 CEO 报告公司业绩，包括建了 7500 个电动车充电站，等。之后，6 个股东就捐款（回答：少于 1%）、火灾损失责任（回答：尚无法知道损失多大）、股价下跌、股东分红、高层报酬提问后，就结束了整个会议。

PG&E Corporation 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实际上是双位一体，后者是公共事业公司，受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 CPCU 和联邦能源规制委员会 FERC 的规制（主要是价格调整），也受到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NRC 的规制（因为有原子能发电设施），是业务主体，有 23000 雇员；前者 PG&E 是控股公司，占有后者 96.24% 股份²⁷⁵，

²⁷⁴ 赵京“美国公共事业公司的治理问题：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联合股东大会观感”，2013 年 5 月 6 日。

²⁷⁵ PG&E Corporation 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Joint Notice of 2018 Annual Meetings Joint Proxy Statement” p. 81.

却只有 20 名雇员²⁷⁶。为什么同一个实体要分为两个公司呢？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公共事业已经被私有资本控制、私有资本阶级用控股公司更便于控制公共事业。作为公共事业公司，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不能为管理层支付私营公司那样的高薪；但作为私营的控股公司，PG&E “为了留住竞争性人才” 支付给高层相当于硅谷大企业高管同等的待遇。现任女 CEO 的 2017 年报酬为 \$8,597,220²⁷⁷，还不包括她因为火灾损失主动放弃的 60 多万美元 short-term incentive plan awards/短期激励计划奖金²⁷⁸。另外，作为公共事业公司，有一半的员工加入工会（远高于约 10% 的私营企业），今天也有三个工会的代表出席，但没有发言（2013 年股东会议时有一个工会雇员发言，被主席打断，说会后再谈²⁷⁹）。作为对比，德国的工会强大，按法律规定在董事会有一定的席位/发言权，与股东也可以互动（在美国私营公司，股东不能“微观管理”公司的业务而接触普通雇员），可以作为 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这样的双位一体的公司治理参考。我也持有微量公司股份，主要关注高层报酬的政策，准备就此问题明年正式向公司提案。

[2018 年 5 月 22 日]

²⁷⁶ PG&E Corporation 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2017 Joint Annual Report to Shareholders” p.8.

²⁷⁷ PG&E Corporation 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Joint Notice of 2018 Annual Meetings Joint Proxy Statement” p.61.

²⁷⁸ PG&E Corporation 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Joint Notice of 2018 Annual Meetings Joint Proxy Statement” p.41.

²⁷⁹ 赵京“美国公共事业公司的治理问题：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联合股东大会观感”，2013 年 5 月 6 日。

25.3 2019 年 PG&E 联合股东大会：场内提案和场外抗议

2013 年 5 月 6 日，我出席 PG&E Corporation 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联合股东大会，代表 Chevedden 宣读他的提案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²⁸⁰。2018 年 5 月 22 日，我再次出席股东大会，代表他宣读提案要求降低股东们提名董事的门槛等权利²⁸¹。

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实际上是双位一体，后者是公共事业公司，受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 CPCU 和联邦能源规制委员会 FERC 的规制，也受到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NRC 的规制，是业务主体；前者 PG&E 是控股公司，占有后者 96.24% 股份²⁸²，却只有 20 名雇员²⁸³。2018 年 11 月 5 日，我正式向两个公司提案，要求改革公司结构合二为一，提高安全和效率、减少浪费²⁸⁴。几天以后，就发生了 85 人致死的不幸火灾事件，导致公司申请破产。公司随即以“正在申请破产”为理由排除我的改革提案，我反驳，指出现在改革公司结构更迫切、也更自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也同意我的意见，公司不能排除我的提案²⁸⁵，所以我今天又赶到旧金山出席今年的股东会议，宣读我和 Chevedden 的提案。

²⁸⁰ 赵京：“美国公共事业公司的治理问题：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联合股东大会观感”，2013 年 5 月 6 日。

²⁸¹ 赵京：“2018 年 PG&E 和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联合股东大会”，2018 年 5 月 22 日。

²⁸² PG&E Corporation 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Joint Notice of 2018 Annual Meetings Joint Proxy Statement” p.81.

²⁸³ PG&E Corporation 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2017 Joint Annual Report to Shareholders” p.8.

²⁸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pge2019proposal.pdf>

²⁸⁵ 旧金山湾区的媒体报道了我的提案：“PG&E sets meeting amid fury over wildfire woes, hefty executive paydays”

<https://www.mercurynews.com/2019/05/17/pge-sets-meeting-amid-fury-over-wildfire-woes-hefty-executive-paydays/>

我来到熟悉的公司总部，一下子就看到似乎熟悉的抗议人群和悼念火灾死难者的几十双鞋子。他们来抗议州政府救济 PG&E、抗议公司高层天价报酬、要求把 PG&E 公有化、电力与煤气不能涨价。我与他们交流，告诉组织者（少数族裔女性）我今天的提案与他们的诉求相同。



我进入会场，被带到麦克风前为我预备的座位。会场肃静低调，很富丽的大厅共有二百人左右出席。正式议程开始后，马上就轮到宣读两份提案。我指出公司董事会反对我的提案的理由其实已经被 SEC 驳斥，作为一个公共事业实体，PG&E 没有市场竞争、受到政府的保护，高层报酬不应该向高科技公司看齐，更不应该有两个董事会和两队高层。我接着又宣读 Chevedden 的提案要求加强股东参与权利。

监票人当场宣布初步结果，我们的提案没有得到股东的多数赞同²⁸⁶。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提案中点名的高管都辞职了，而新的 14 名董事只有 2 名是留任的。

接下来，新上任的 CEO 讲话并接受股东提问。他从美国最大的公共事业机构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转来，显出比去年的女 CEO 老练沉稳，屡次讲到诚信的价值。第一个股东是 2010 年 San Bruno 瓦斯爆炸的受害者，说 PG&E 还没有处理好当年的事故，应该进监狱；第二个股东是退伍军人，问董事会和高层有没有退伍军人。没有。“那你们不是美国（人）”；第三个股东：如果再发生火灾，你们都要辞职、退还报酬；第四个股东掏出 5、6 封申诉信，要转交给公司；第五个股东是唯一的妇女（所

²⁸⁶ 正式结果为：赞成 49,615,657(13%)，反对 318,221,875(85%)，弃权 1,706,143(1.9%)。

有的提问者都是白人), CEO 点名一个黑人高管会后与她再谈; 第六个股东抱怨高层报酬, CEO 回答说由于火灾, 大家都没有领到奖金 (其实奖金只占收入的很少部分, 如辞职的 CEO 去年收入仍然高达\$9, 289, 842); 第七个股东问破产的程序如何影响高层的报酬; 第八个股东质疑新的董事会有这么多金融专家, 以及企业文化; 第九个股东提醒说 PG&E 在 2001 年就申请过破产, CEO 回答说这一次破产是公共事业公司、甚至是全美历史上最复杂的破产; 第十个股东为 CEO 辩护, 说企业文化难改, 了结了会议。

我走出会场, 听到抗议人群更高声地演说。旧金山见证着美国的各种社会/政治动员运动的历史。我与一个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交谈, 他们属于民主党的最左翼, 在全美各州有两百多支部, 近 6 万成员, 支持 Sanders 和 Ocasio-Cortez 等的竞选。我介绍我的提案工作, 在 2016 年摩根大通公司的股东大会提案就帮助过 Sanders, 告诉他们也可以直接用股东提案的方式推动企业改革。

[2019 年 6 月 21 日]

26 成功改进 MEMC/SunEdison 公司治理的战例

MEMC Electronic Materials (www.memc.com, 代号 WFR) 是总部位于密苏里的一家半导体材料公司。MEMC 的业务从 2008 年以来低迷不振, 去年收购了太阳能公司 SunEdsion 后大为改观, 股价从 1.44 升到今天的 8.35 美元, 干脆要改名为 SunEdsion (今天股东大会的第 6 号提案)。因为董事会成员多居住在旧金山/硅谷, 公司的股东大会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附近的 Hyatt Regency 旅馆举行。

MEMC2011 年在中国有 6 亿美元的销售, 占 22% (份额最大的国度), 但去年剧减到 8 千万美元, 只占 3% 左右。它的业务和规模 (5 千 6 百人) 不符合我的战略目标选择, 所以我没有购入其股票。我今天早早赶到会场, 代理纽约的 Kenneth Steiner 宣读他的第 7 号提案。该提案要求在 10% 以上股东附议的情况下可以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紧急事务。这个要求本身很客观中立, 容易引起多数股东的赞同, 但提案内容的政治信号却非常明确: 在支持提案要求的说明中, 引用独立研究机构的调查, 谴责拿走没有与业绩挂钩的 1 千 4 百万美元股票选择权的 CEO 以及去年遭到 36%-43% 否决票、或把别的公司搞破产了的董事的贪婪和无能。

我向公司秘书长报道, 告诉他我很熟悉股东会议的程序, 打消了他的怀疑。其实, 我感觉到这个公司的官员比我接触过的硅谷大公司的各种官僚幼稚。会议开始时, 董事会主席来向我问候, 我给了他“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名片。我环视会场, 除了我和 3 名股东、一名旅馆门卫, 还有 14 名公司的董事和官员、职员。前 6 个公司提案没有任何讨论, 轮到我时, 我站起来念完几乎所有的提案的内容, 只省掉对 CEO 以外的董事的谴责 (也算是对董事会主席好意的回报吧)。秘书长随后宣布初步统计结果, 前 6 个提案都得以通过, 念到第 7 号提案时, 他宣布这个提案得到 76% 的赞成票。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

十年前, 当美国工会的各种退休基金尚有战斗精神和原则时, 不时读到它们要求限制 CEO 高薪的提案, 但都没有得到足够的股东的支持。我亲

身经历在 eBay、Oracle 等公司股东大会上类似提案的遭遇，很遗憾自己在“一股份（美元）一票”的资本社会无能为力。Chevedden 等人聪明地选择了以个人微小股份佯攻的战术，把谴责董事贪婪和无能的内容加入容易得到许多股东赞同的中性提案的标题下，在 CVS、Sprint、Safeway 等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得到 60% 以上的赞同，达成了拥有比我们多几千倍股份的各种基金股东正面突破无法达到的目的。这对我也是一个学习：至今为止，我的要求建立人权委员会的 7-8 个提案，因为原则性太强，曲高和寡，只得到 2%-7% 的赞同。在今年 6 月的雅虎股东大会上，我的提案只要求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同样列举公司的人权政策失败），可能会得到较多的股东赞同。明年，我将向百度、搜狐这些在美国成立注册、在中国赚钱的公司的股东大会提出类似中性的治理提案，“顺带”加入纪念天安门事件等政治改革信息，利用美国的股东提案的经济民主权利教育在中国新起的资本阶级，看能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结果。

[2013 年 5 月 30 日]

我今天早早赶到会场，再次代理纽约的 Steiner 宣读他的第 7 号提案 Right to act by written consent，要求增大股东权利。我与两年前相识的董事会主席和公司秘书长等官员问候，除了我和 3、4 名股东、还有十几名公司的董事和员工。前 6 个公司提案没有任何讨论，轮到我时，我站起来念完提案的内容。秘书长随后宣布初步统计结果，第 7 号提案得到约 40% 的赞成票。这反映出与两年前相比，公司的治理和业绩都有所改善，多数股东对董事会比较满意。

[2015 年 5 月 28 日]

27.1 “G2 格局”与 facebook 股东大会

大约在中国的总产值超过日本的 2010 年前后，操控美日同盟关系的小圈子里²⁸⁷开始不安地交换“G2 格局”这个概念。相对于冷战结束后在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引领下由 G7（西方七大集团）主导世界、“9/11”和美欧金融危机后 G20（加上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无法达成实质性共识克服危机的局势，由衰退的超级世界帝国和崛起的亚洲强权这两个头号经济大国来“共管”（分摊和瓜分）国际事务的 G2 格局，就浮上台面了。就亚洲而言，我们长期习惯了的“政治中国、经济日本”的双雄局面已不复存在，失却了与中国的“平等”（甚至一时要与美国“对称”、“平衡”中美）地位，G2 这个概念就把日本放到中美交易中的一个棋子角色，日本的统治集团（特别是其民族主义右翼）的焦虑可想而知。在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一系列纠纷后，日本政府的“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立场已经破产，以经济为后盾连续不断出入在岛屿附近的中国各种舰船也打破了日本对岛屿的实效支配的旧有观念。奥巴马这一次更明确告诉习近平说，美国在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主权问题上没有立场，接近我和加美光行提倡的“非主权”/“脱主权”方案。实际上，奥巴马不得不抛弃前任当局的 stupid power 或 soft power 政策，更趋向于我几年前开始提倡的 smart power 政策。

不过，这不是中美之间的大问题。G2 格局的第一个考验是朝鲜北方的非核化。除了普遍的“孤立主义”政治情绪，美国也没有军事力量在朝鲜半岛展开战争²⁸⁸，而中国可能比美国更讨厌、害怕一个把北京也陷入核武

²⁸⁷ 这个小圈子主要以“美日旧金山安全保障会议”为平台，见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所长赵京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 2010-01-06：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35>。

²⁸⁸ 赵京：美国“军事革命”的转换方向。小布什以两场荒谬、不义的战争终结了美国的帝国地位，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美国不得不大幅削减军备，迫使美国不得不进行军事战略转换，主要的目标就是裁减陆军。在利比亚军事行动中，已经看出美国民众和政府对于出动陆军士兵到外国作战的厌恶和恐惧，而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攻击山地，美国不可能推翻朝鲜北方的政权。

装阴影的朝鲜北方。特别是中美的对立就是因为朝鲜战争引起，现在从朝鲜北方的非核化合作入手，就构成了 G2 格局成立的条件。中国除了参与联合国对朝鲜的谴责和经济制裁外，据说，还拒绝了金正恩的访中要求，在国际政治上完全孤立了朝鲜。不过，在这方面，有许多比我有知识的专家，我没有自己的见解。

我主要关注美国政府（军方）和商界特别敏感的网络冲突上。从华尔街日报、美国之音等媒体看来，美国似乎没有从习近平那里得到满意的消息，但我认为：抛开它的“中国也是受害者”诉苦不管，中国对网络攻击的谴责立场基本上为两国之间下一步的具体讨价还价（例如 7 月份的中美工作会议）以及我们这样的独立民间个人和机构的工作提供了正确的起点。无独有偶，前安全部门雇员斯诺登向报界泄密美国政府的监控项目之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尴尬地发现自己也处于被告的地位。正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的罗梅罗谴责的那样：无论多少政府部门支持这一项目，它都侵犯了基本的个人自由权利。“让政府的三大部门见鬼去吧，让立法批准这种权力的国会见鬼去吧，让执行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ISA）的纸老虎、橡皮图章法院见鬼去吧，让不能忠实于它自己价值观的奥巴马政府见鬼去吧。”²⁸⁹

最近几个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Dempsey 也到访硅谷，与包括 facebook、微软、谷歌和英特尔在内的公司高层会面，这样的谈判还在继续。²⁹⁰而我这几年来在与雅虎、谷歌、思科、惠普、英特尔和微软等具有国际战略价值的科技巨头的艰难会谈中，就是围绕以网络监控的人权问题为中心展开的²⁹¹，只有刚上市一年的 facebook，我还没有打过交道。所以，

²⁸⁹ 纽约时报 2013 年 6 月 7 日：“美国政府秘密收集网络用户信息被曝光”<http://cn.nytimes.com/usa/20130607/c07nsa/>

²⁹⁰ 纽约时报 2013 年 6 月 9 日：“科技公司勉为其难地配合了政府情报工作”<http://cn.nytimes.com/technology/20130609/c09tech/>

²⁹¹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首次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以人权为主要考量，列举了与这些大公司交涉的纪录：<http://cpri.tripod.com/cpr2013/csri.pdf>

今天 facebook 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我欣然接受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 Zuckerberg 的邀请赴会。

刚开车到旧金山机场附近的 Westin 旅馆，就看到堵满入口的抗议活动人士、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报道记者。我停车后去与他们交流，介绍我的人权活动，知道他们抗议 Zuckerberg 在游说国会议员把加拿大 Tar 沙地矿田开发的泥氡通过管道输送到德州提炼 (fwd.us)。我表示要把他们的抗议介绍给股东会议，就带着他们的设计得很漂亮、也发布在 facebook 网页上的抗议图片入场。经过安检时，一个彪形保安人员问我那些抗议图片是什么，我就送给他一枚。他厉声质问我谁，我说我也是一个抗议者。他命令我站在角落，被两个人围住。一个 facebook 的女士过来，察看了我的图片和股东登记表，知道我并没有在会场散发宣传抗议的意图，就放我过去了。

因为股东不可能在第一次大会上提案，会议的四项公司提案都顺利通过，马上轮到 Zuckerberg 讲演。他首先提到 facebook 上市一年来的主要成就是实现了从桌面电脑向移动通讯的转移，并达到了 10 亿用户的里程碑，然后对股价下跌进行了辩解。在非正式议程的问答期间，我第二个发言，首先祝贺公司的成就，说 Zuckerberg 以 10 亿用户的世界第二的人口规模，应该取代奥巴马去和习近平举行 G2 会谈！我话题一转，说公司作为全球社会/社交媒体，社会责任重大，应该设立一个公共政策委员会，包括与外面抗议的环境保护人士、我这样的人权关注者沟通，并介绍了微软去年接受我的建议正式成立了“法规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事例。公司董事中，Sandberg 和 Fischer 担任过美国财政部的办公室正、副主任，Ullyot 担任过美国司法部的办公室主任，他们回答说公司有足够的资源和准备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在人权等政策上不会犯错误。总共有十几个股东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正是我的“老搭档”：那位总是为公司辩护的白人老头。但是今天我们有了共同语言：要求公司在保护用户安全/隐私权方面，不要屈服美国政府的压力。有一个老太太重复了我的建议，要求建立

一个股东/用户委员会。看来，在 facebook 这个“网络共和国”，确实需要安那祺式的平等自治组织原则。

这使我不由得回到“G2 格局”的致命伤：中国的执政党合法/正统性忧虑。华尔街日报²⁹²发表了关于替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中国梦”提供政策化妆的“智囊”/“帝师”/御用文人/行走²⁹³的长篇故事，使我对中国的理论、思想、文化、文明的低落悲哀。不管是“邓”、“三”，还是“科”、“梦”，都无法解决中国的执政党合法/正统性这个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社会结症，因为它们不敢正视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历史事件。与此相应，今年“六·四”之际，我再次参加旧金山的纪念活动，却只能默默无言，因为我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没有能力接受历史真实和哲学反思，进一步加剧我对这场历史悲剧的悲哀。²⁹⁴

正如李鹏的戒严令宣告了中共一党专政统制中国的正统性的终止、小布什的战争宣告了最后一个世界帝国的终结的开始，不以人们（包括统治集团）意志为转移的 G2 格局需或许已经降临，但中国和美国都还没有准备好如何迎接它的到来。

[2013 年 6 月 11 日]

²⁹² 我几乎每天阅读英文正版，因为中文版略去了许多敏感的政治内容。

²⁹³ 我接触过几个赵紫阳的真真假假的“智囊”或“智囊的智囊”，很鄙视这类人物的政治道德和能力。

²⁹⁴ 我不想责难那些学生“领袖”们的政治上无知带来的民族灾难，也没有指望他们会成熟、反省，因为我自己就政治上幼稚愚蠢，在日本被出卖迫害，但我却很难容忍有些人 24 年后仍然在无耻地出卖民主运动的精神。

27.2 Facebook 脸书公司的国际公共政策提案

三年前，我参加第一次 facebook 股东大会：“刚开车到旧金山机场附近的 Westin 旅馆，就看到堵满入口的抗议活动人士、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报道记者。…我表示要把他们的抗议介绍给股东会议，就带着他们的设计得很漂亮、也发布在 facebook 网页上的抗议图片入场。”“我第二个发言，…说公司作为全球社会/社交媒体，社会责任重大，应该设立一个公共政策委员会，包括与外面抗议的环境保护人士、我这样的人权关注者沟通，…公司董事中，Sandberg 和 Fischer 担任过美国财政部的办公室正、副主任，Ullyot 担任过美国司法部的办公室主任，他们回答说公司有足够的资源和准备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在人权等政策上不会犯错误。总共有十几个股东发言，…有一个老太太重复了我的建议，要求建立一个股东/用户委员会。看来，在 facebook 这个‘网络共和国’，确实需要安那祺式的平等自治组织原则。”²⁹⁵。

2015 年 10 月 18 日，我向公司提交建立国际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提案，其中特别提到摇摇欲试的公司的中国业务政策，并介绍我 2010 年在谷歌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今年 3 月 28 日，我收到 Fenwick & West LLP 律师行的来函，确认公司决定把我的提案列入今年的股东大会表决。

今天，我驱车赶到更高级的旅馆 Sofitel，这里戒备更严，加上近来公司业绩不错，没有看到抗议的迹象。有两百多人与会，看到不少亚裔面孔和听到中文会话。两个女士把我带到专门为我保存的位子，便于发言。前八个提案都是公司的，第 9 号提案由老朋友 Jim McRitchie 等股东共同提案、由 Northstar Asset Management 的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女士宣读，要求每一股的权利平等，因为现在的不平等股份阶级使创始人兼

²⁹⁵ 赵京，“G2 格局”与 facebook 股东大会，2013 年 6 月 11 日。

CEO Zuckerberg 一个人就拥有 54%的控制权。第 10 号提案要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第 11 号提案要求公布政治游说报告，由纽约公共退休基金等提出，与我的提案有共同之处。

我宣读提案的正文：Resolved: stockholders recommend that facebook Inc. (our Company)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oversee our Company's policies and practice that relate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issue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aritable giv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xpenditures, and foreign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that may affect our Company's operations, performance, and reputations worldwide. 为了节省时间，我略过了支持提案的声明²⁹⁶，指出自从我提交提案的八个月以来，国际上、特别是中美之间发生了许多事情，进一步确认了建立国际公共政策委员会的重要性。与某国领导人讲中文并不难，难的是敢于对他讲有原则的公共政策。

一个妇女接着宣读第 13 号要求增加妇女董事的提案。股东会议正式议程结束后，身着短寸衫的 Zuckerberg 登台作了十来分钟演说，接着有 13 个股东发言提问。有一个西装革履的律师为公司辩护，庆祝第 11 号提案被否决了²⁹⁷，声称提案者有政治动机（我在大型的股东大会经常遇到这样的股东）。一个年轻人问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计划，主席台上显眼的唯一女性 COO 首席运营官 Sandberg 抢着回答说她刚从中国回来，以 Air China 航班上的 facebook 广告为例说明 facebook 已经开始与中国公司合作了。

²⁹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fbproxy2016.pdf> p.88.

²⁹⁷ 初步统计显示所有的公司提案都通过、而所有股东提案都没有得到多数股份支持。这很自然，因为 Zuckerberg 一人就握有 54%的投票权。

她还回答了另外四、五个股东的提问，给人感觉是公司的两个老板之一²⁹⁸。除了广告业务等商业问题，股东也关心最近保守媒体指责的“显示偏见”以及如何应对仇恨语言、恐怖主义宣传等公共政策问题。

很显然，facebook 的董事会、特别是“将长期掌管公司的”Zuckerberg 和 Sandberg 在管理、运营着这个世界的最大、最频繁、最重要的社交平台。鉴于在商务利益（如商人基辛格为美国大公司代理在中国的业务²⁹⁹）和腐败权贵³⁰⁰主导下的中美关系已经基本上走进死胡同，有必要在 facebook 等大公司的中国以及国际运营的政策上注入人权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

[2016 年 6 月 20 日]

²⁹⁸ 最新的一期 Forbes 把她评为世界上第 9 名最有影响力的女性。

²⁹⁹ 例如，“迪士尼聘请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发起集中的游说攻势”。迪士尼的魔法在中国失灵（上）：挫败与妥协
<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60614/c14chinadisney1/>

³⁰⁰ 如所谓“雅虎人权基金”的丑恶行径被暴露的冰山一角：Isaac Stone Fish & Melissa Chan, The Complicated and Contradictory Legacy of Harry Wu, Foreign Policy Report, May 25, 201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05/25/the-complicated-and-contradictory-life-of-harry-wu-china-yahoo/>

28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景展望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CSRI, 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发布 1.2 再版³⁰¹, 把我多年以来对人权政策的关注扩展到普遍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改善上来。从战术/技术层面上看, 一方面, 我以建立人权委员会为诉求的提案经过几年奋战, 突破了各大公司的刁难和阻碍, 成功地在雅虎、谷歌、思科、雪佛龙、新闻集团、惠普、高盛集团等公司的股东大会付诸表决, 加上没有付诸表决的提案或者没有提案的公司 (英特尔、波音等), 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这些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影响人类生活的企业的人权政策的改善。另一方面, 以我的不到百万分之一的股份, 得到 3%左右的股东的赞同, 也达到了极限³⁰², 需要开辟新的战场扩大战果。同时, 在全球化局势下,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 既是时代的要求, 也是建立广泛联盟的时机, 所以我决定把提案的内容扩展到包括人权在内的更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上来。

我对企业人权政策的关注始于 2005 年在雅虎股东大会上的发言, 至今也没有脱离战场, 因为它的人权政策和实践极不道德, 危害深重, 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它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在 33 个被调查的公司中排列最末。为此, 我 2012 年 11 月 12 日向雅虎提交了在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要求雅虎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提案³⁰³。使我感到略微欣慰的是: 雅虎的新董事

³⁰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csri.pdf>

³⁰² 以百万分之一股份, 除非具备安那祺主义者伯克曼那样的牺牲准备, 几乎不可能对公司治理产生直接的影响。但由于股东大量分散, 个别股东在公司危机期间购入大量股份, 就可以在董事会的人选等方面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在 2011 年的股东大会上, 雅虎的董事会除了“如临大敌”地对付我的人权提案外, 我有点意外他们在通常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 Q&A 期间害怕一个叫 Daniel Leob 的基金股东。Leob 的 Third Point 基金以 13 美元的价格购入大约 5% 的股份, 就可以要求 3 个董事的位子 (另外的 7、8 个董事各自独立, 不能作出决策)。后来, Leob 抓住新任 CEO 履历中的一个小错误就赶走了他, 而选定了现任的女 CEO。前天 Leob 又以 29 美元的价格抛售 4 千万雅虎股份后一走了事 (辞去所有 3 个董事的位子), 在这个资本社会中呼风唤雨。

³⁰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Shareholders_proposal_2013.pdf

会没有像往常那样雇佣律师行排斥我的提案，在董事会的反对声明中也没有像往常那样用虚伪的理由误导股东。可惜今年6月25日股东大会召开时，我正好乘飞机离开硅谷/湾区，所以请人道中国的吴倩同事代理我宣读提案。

我在5月30日发表的“成功改进 MEMC/SunEdison 公司治理的战例”中提到：“在今年6月的雅虎股东大会上，我的提案只要求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同样列举公司的人权政策失败），可能会得到较多的股东赞同。”³⁰⁴今天，我查到雅虎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欣喜地发现：有190,160,392股（32%）投票赞成我的提案，只有409,410,413股（68%）附和董事会投了反对票³⁰⁵。按照惯例，董事会的提议得不到80%以上的赞成，就相当于被股东否决了，那些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赞成的董事会自动提出辞呈。当然，雅虎的董事会现在是否遵从这个惯例，不能过分期望。这印证了我的战略和战术转换的成功和进一步扩展的前程。实际上，借用老战友 Chevedden 和 Steiner 在 SunEdison 股东大会上采用佯攻得到77%股东赞成的战术，进一步提炼提案的内容，争取多数股东赞同，帮助/迫使那些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影响人类生活的企业改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胜利前景已经指日可等了。

[2013年7月23日]

³⁰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memc.pdf>

³⁰⁵

<http://investor.yahoo.net/secfiling.cfm?filingID=1193125-13-274985&CIK=1011006>

29.1 由搜狐公司治理的案例尝试驾驭资本阶级

十多年前，当我的同系（工程物理系）同学³⁰⁶发出“我党要驾驭中国的资本阶级”的响亮宣言的时候，“我党”与资本阶级的较量还没有分出胜负。但“三个代表”垃圾论的出笼，标志着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转型，被中国革命推翻的三座大山又压在中国民众的头上，“我党”就是资本阶级、资本阶级就是“我党”了。这位敢于反对“三个代表”论的“红二代”（原中央党校校长的儿子）被赶出北京、被提前退休后，“我党”内再也没有官员敢提“驾驭”论了。

资本阶级对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³⁰⁷，谁来“驾驭”中国的资本阶级呢？

我2008年试图“驾驭”当时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公司，因为没有任何护照，只好委托国内的朋友代理我出席股东大会：“对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头头们在股东大会上将‘人权’提问误导、偷换为‘人员安全’问题，表示极大的遗憾和不满。股票市场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保护众多的小股民利益。既然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跑到美国来上市，就应该遵守相关规则，允许每一个股东在每一次股东大会上起码有一次发言机会。”³⁰⁸同时我在2008-09年挑战中国国内运输飞机最多、航线网络最密集、年客运量最大的航空公司，得出结论：“在目前美国政府需要中国政府‘帮助’之际，很难指望SEC会秉公劝告、指导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遵守美国法规而吓跑来美国上市的中国的国家官僚资本。……不能指望任何国

³⁰⁶ 高我三级。见赵京：“回忆清华1980年学生会选举”，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90年6月号。

³⁰⁷ 最近北京的反腐败斗争之剧烈，说明“我党”不能驾驭“我党”（资本阶级）。能否把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江泽民置于法律之下，是根本的标志。

³⁰⁸ 赵京，“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2008年股东大会误导人权提问”，2008年10月21日。

家权力会自动保护普通民众的经济政治权益。”³⁰⁹作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典型，它们只是抛出很少股份在美国市场上交易，公司治理由“我党”的国家官僚驾驭，股东必须持有 3% 以上股份才有权提案。

当新浪十几年前在硅谷刚开张时，我也去拜访，与其创始人之一、Chief Operation Officer（后来中国的“驸马”）交流，了解他们进军中国的打算。后来，我接到一些国内新浪用户的投诉，也买下了股票准备“驾驭”新浪。但新浪早有警觉，把公司注册在鞭长莫及的避税天堂开曼群岛，那里没有法规可循，无法行使提案权利。它的股东年会也到处变换，去年 11 月 18 日在香港召开时，国内的义愤填膺的微博用户到了关键时刻却不敢代表我出席股东大会直接与董事会对阵。

与上述几家公司不同，实际上完全在中国做生意的 Sohu.com 搜狐在美国注册、上市、集资，必须服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规制。我先按照搜狐网上为股东提供的电邮发出有关公司治理的询问，没有回答。因为搜狐的创始人兼 CEO、总裁、董事会主席又是同系的同学（低我两年），在清华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自身（签证申请被拒）无法回国的我只好委托一个同学去问候搜狐的这位小系友，“不认僧面总得认佛面吧”！没想到中国的新兴资本阶级（洋“土豪”）连交换名片这样的对大学同学的表面友善功夫也还没有学会。去年股东大会之际，我致函搜狐的秘书长（实际上是波士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最后再给搜狐一次非正式交流的机会。还是没有回音，搜狐在躲避什么呢？它总不能连 SEC 也置之不理吧！

2013 年 11 月 11 日，我直接向搜狐的北京总部发出提交 2014 年股东大会的提案信，³¹⁰要求由股东投票决定独立的董事会主席。在提案中，我指出：靠 1989 年天安门悲剧上台的江泽民抛出“三个代表”论以来，中国社会没有任何独立的监督机制，由创始人兼 CEO、总裁、董事会主席，令人担忧，且不符合国际趋势，并引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企业

³⁰⁹ 赵京：“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走向国际化的官僚资本主义”，2009 年 3 月 24 日。

³¹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sohu.pdf>

社会责任调查结果“D: concerned 令人担忧, need improvement 需要改进”, 敦促搜狐改进公司治理。³¹¹

2014年1月, 我收到波士顿律师行署名 Bancroft (他其实就是搜狐秘书长) 1月24日致函 SEC 的复印件, 不出所料, Bancroft 要求 SEC 对搜狐排除我的提案的行为“不作为”。从中我发现搜狐实际上对我“驾驭”贪得无厌的中国资本阶级的尝试如临大敌, 气急败坏、又恨又怕。我想了几天, 于1月30日致函 SEC, 驳斥了搜狐的荒谬的排除理由, 列举谷歌、雪佛龙、英特尔和微软等比较规范的公司对应我的提案的态度和结果, 指出搜狐不能有超越法规的特权。³¹²最后, 除了建议搜狐干脆搬到北朝鲜躲避股东监督外, 我也表示会持续持有搜狐的股份、每年提案直到我的提案得到表决为止。搜狐如果聪明、规范一些的话, 应该明白: 出钱用律师行排除股东提案的荒谬行为本身就会被放到 SEC 的网站上公布于众, 即使这一次侥幸过关, SEC 不可能连续几年都“不作为”³¹³。而只要一次付诸股东大会表决, 我的基本战略目的就达到了。同时, 我也有信心, 多数股东们会赞成独立董事会主席的, 这也意味着对“三个代表”垃圾论的判决。

当然, 要想中国的资本阶级学会聪明、规范、人道一些, 需要民众艰苦的努力。一百多年前, 卡内基钢铁公司肆意解雇、驱赶劳工时, 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伯克曼只有拿起破枪教训资本阶级(被判22年)一途。美国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今天的盖茨、巴菲特等资本阶级才学会“慈善”起来。今天, 人类文明有所进步, 不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可以驾驭资本阶级, 我们应该做得比伯克曼更好。

[2014年2月2日]

³¹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csri.pdf>

³¹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Zhao-SEC-sohu.pdf>

³¹³ 我从2007年开始连年对雅虎提案, 连年被排除。但 SEC 终于在2011年有所作为, 复函反驳雅虎雇用的律师行的排除理由(此事本身得到 CNN Money 的报道), 雅虎被迫让我的提案付诸表决。

29.2 以搜狐公司治理尝试改进中国的社会秩序与规范

我在“由搜狐公司治理的案例尝试驾驭资本阶级”³¹⁴一文中提到：“资本阶级对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谁来驾驭中国的资本阶级呢？”

经过几年准备，2014年6月17日，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搜狐的2014年股东会议上宣读我的提案（第4号）³¹⁵，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我指出：靠1989年天安门悲剧上台的江泽民抛出“三个代表”论以来，中国社会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由创始人兼CEO、President 总裁、Chairman 董事会主席，令人担忧，也不符合国际趋势，并引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结果“D: concerned 令人担忧, need improvement 需要改进”，敦促搜狐改进公司治理。³¹⁶会议除了我和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代表（股东）、只有迟到的唯一董事（CEO 兼 President 兼 Chairman）和公司的几个高管参加。正式会议结束后，我提议按照美国的惯例，由董事会介绍公司的业务现状和展望。CEO 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还能够流利地讲解公司的四个业务方向，多少打消了股东对公司业务方面的担忧。我最后表示会继续持有搜狐股份，保有每年提交提案的权利，同时也指出公司应该改进在交流方面的缺欠，那样的话，我也愿意配合公司，不一定非要正式通过公司的波士顿律师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而直接、建设性地、有效地沟通，改进公司的治理，他们也同意如此。正如中国的“不打不成交”古话，美国的 No fight, no right 经验，我要进一步补充：No fight, no respect。

2013年5月23日的高盛股东人权提案³¹⁷揭开了纪念“六四”24周

³¹⁴ 赵京，2014年2月2日。所有引用都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页 <http://cpri.tripod.com> 为准。

³¹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ohuproxy2014-proposal4.pdf>

³¹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csri.pdf>

³¹⁷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gs-proposal-64.pdf>

年的序幕，得到多于四分之一股东赞成的 2014 年 6 月 20 日搜狐股东提案³¹⁸意味着对 25 年前靠天安门悲剧上台、推行“三个代表”垃圾论的江泽民国家资本主义路线的判决。在中国转型的巨变中，以搜狐公司治理的尝试，提出了改进中国的 social order (社会秩序与规范) 的一条新思路。

[2014 年 6 月 29 日]

³¹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ohu-shreaholders-meeting-result.pdf>。有 5,927,809 股赞同，17,436,522 股反对。

29.3 改进搜狐公司治理的胜利

在“以搜狐公司治理尝试改进中国的社会秩序与规范”³¹⁹中，我提出：“资本阶级对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谁来驾驭中国的资本阶级呢？”

在“由搜狐公司治理的案例尝试驾驭资本阶级”³²⁰中，我介绍到：“得到多于四分之一股东赞成的2014年6月20日搜狐股东提案³²¹意味着对25年前靠天安门悲剧上台、推行三个代表垃圾论的江泽民国家资本主义路线的判决。在中国转型的巨变中，以搜狐公司治理的尝试，提出了改进中国的socialorder(社会秩序与规范)的一条新思路。”

2015年6月19日，我专程从美国赶到北京，在搜狐的2015年股东会议上宣读我的提案（第4号）³²²，要求改善董事会选举规则，从董事任期三年改为每年选举³²³。会议除了我和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代表（股东）、只有迟到的唯一董事（CEO兼President兼董事会主席）和公司的几个人士参加。

这是我十年来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以来第一次获得多数股东支持的提案，结果显示：有17,065,932股赞成，10,031,777股（除了CEO兼President兼董事会主席的7,745,479股，只有2,286,298股）反对，12,882股弃权，5,771,496股没投票（共同基金代表的投资人太分散，一般不参

³¹⁹ 赵京，2014年6月29日。

³²⁰ 赵京，2014年2月2日。

³²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ohu-shreaholders-meeting-result.pdf>。有5,927,809股赞同，17,436,522股反对。

³²²

<http://files.shareholder.com/downloads/ABEA-4Z99DA/103368800x0xS1206774-15-1421/1104188/filing.pdf>

³²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ohu_proposal_2015.pdf

与投票)³²⁴。全体投票的股东中，有 63.0%（除了 CEO 兼 President 兼董事会主席，有 88.2%）的股东支持我的提案。

更有意义的是：因为我的提案对董事会的批判，在今年的三年一度的董事选举中，所有三名面临改选的董事都受到接近半数股东的反对（5,771,496 股没投票）。Charles Huang：15,428,225 赞成，11,682,366 反对；Dave Qi：14,664,030 赞成，12,446,561 反对；Shi Wang（万科公司的王实）：13,760,774 赞成，13,349,817 反对。按照美国的惯例，这些没有得到绝大多数（80%以上）股东支持的董事都应该主动辞职。

现在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搜狐董事会的表现吧！

[2015 年 7 月 6 日]

324

<http://investors.sohu.com/secfiling.cfm?filingID=1193125-15-232448&CIK=1104188>

30 On Shareholder Proposals Rule Change

Pittsburg, CA 94565

April 3, 2014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100 F Street, NE

Washington, DC 20549-2736

Via email to: chairmanoffice@sec.gov

Dear Commissioners:

As a small shareholder having had ten human rights proposals voted in recent years³²⁵, I am writing you to express my grave concerns of the recent reports on shareholder proposals rule change attempts³²⁶, especially of “Remarks at the 26th Annual Corporate Law Institute, Tulane University Law School: Federal Preemption of State Corporate Governance” by Commissioner Daniel M. Gallagher in New Orleans, LA on March 27, 2014³²⁷. As reported by New York Times “S.E.C. Official Criticizes Proxy Proposals on Social Issues” (MARCH 27, 2014), there is a high tide attempting to destroy the only effective democratic element in current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³²⁵ Google, Chevron, Cisco, News Corp. (2010), Yahoo (2011, 2013), HP, Goldman Sachs, Oracle (2013), Sohu.com (2014). I also submitted proposals to Boeing, Intel, Microsoft, NetApp, and presented some proposals on behalf of other shareholders.

³²⁶ For exampl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 “Corporations Take Swats at a Gadfly,” March 12, 2014, and opinion article “The SEC’s Corporate Proxy Rules Need a Rewrite,” March 28, 2014.

³²⁷ http://www.sec.gov/News/Speech/Detail/Speech/1370541315952#_edn10

In his remarks, Commissioner Gallagher starts “II. Shareholder Proposals” with: “One area where the SEC’s incursions into corporate governance have had a particularly negative effect is shareholder proposals.” It is a shock to read: “Activist investors and corporate gadflies have used these loose rules to *hijack* the shareholder proposal system.” If submitting a non-binding proposal, even without the guaranty to be voted at a shareholders meeting, is to hijack the shareholder proposal system, we can say that Gadfly Socrates “hijacked” the Athenian democratic society, and another gadfly Jesus “hijacke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I was accused so when I pushed my human rights proposal to News Corp. shareholders meeting in October 2010³²⁸, just before the company’s human rights scandals became known to the public.

Commissioner Gallagher state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proposals are brought by individuals or institutions with idiosyncratic and often political agendas that are often unrelated to, or in conflict with, the interests of other shareholders.” He certainly has the right to express his view points, as a shareholder, but as a commissioner, he has no right to deprive shareholders of the right to submit and vote on social issues, especially in our time of globalization when most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are exposed to international social issues. We shareholders know better how to defend our long-term interests for ourselves and the society.

Commissioner Gallagher continues: “The low level of hedge fund activism here implies that their concerns with corporate management are being addressed using avenues other than shareholder proposals—as most legitimate concerns can be.” This clearly indicates whom Commissioner Gallagher represents, because hedge fund activism never showed any interest in social

³²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2010proposal4.pdf>

issues. When a hedge fund with 5% shares could demand three board seats and replace the CEO but my proposal with 32% support could not change the company's unethical human rights policy, Commissioner Gallagher concerns that hedge fund money is not powerful enough.

Commissioner Gallagher further says, "of course, where management is breaching its fiduciary duties, investors can have recourse to the courts." This "see you in court" strategy (for corporation³²⁹) effectively excludes any possibility for small shareholders without million dollars, such as me, a political refugee from China and Japan, to participate, assist and help American corporate improving governa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doing business outside of the U.S.

Commissioner Gallagher reveals his stance: "I'm not sure we need shareholder proposals at all." It is very alarming that such a commissioner stays in the SEC for years to destroy social justice when more and more of people's life is affected by corporate policy and practice globally.

Commissioner Gallagher further complains: "It is enormously expensive for companies to manage shareholder proposals." However, from my experience, it is the company management who abused the company resource to hire outside law firms to exclude my human rights proposals with materially false and misleading statement. And Commissioner Gallagher did not say one word about the "enormously expensive" CEO pay in the U.S. and the world.

Commissioner Gallagher raises the point of his remarks, "the holding requirement to submit proxies should be updated. \$2,000 is absurdly low, and

³²⁹ Especially, most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are registered in corporate-friendly Delaware,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have business in Delaware at all.

was not subject to meaningful economic analysis when adopted. The threshold should be substantially more, by orders of magnitude: perhaps \$200,000 or even better, \$2 million.” “I would support banning proposal by proxy.” Again, this absurd nonsense just indicates whom Commissioner Gallagher serves for inside the SEC. As a shareholder,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e threshold should be substantially less, say \$1,000 or even better, \$100, to encourage more shareholders to participate economic democracy so we can prevent more corporate scandals, crimes, and financial crisis. If American people have the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direct democracy in their economic life, there is no need to occupy Wall Street.

By “ensuring that the proposals that make it onto the proxy are brought by shareholders concerned first and foremost about the company—and the value of their investments in that company—not their pet projects”, Commissioner Gallagher treats social issues, such as UN Global Compact, pet projects. We have to ask: what is the purpose to establish the SEC,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ear the end, Commissioner Gallagher proposes that “companies shouldn’t have to go through the time and expense of litigation to vindicate their substantive rights under our rules. The burden to ensure that a submission is clear and factually accurate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proponent, not the company. I believe that the Staff should take a more aggressive posture toward proponents that fail to meet that burden.” If the SEC is hijacked to serve the economic oligarchy only, the only way for ordinary American people to express our social concerns is to protest in front of corporate headquarters.³³⁰

³³⁰ Last year, I was forced to plan hunger-strike in front of Y company for its policy and practice against Chinese human rights movement.

Let's act together to stop the assault on American economic democracy.

Respectfully,

Jing Zhao, Ph. D

President of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zhao.cpri@gmail.com

31.1 推动应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战例

我在“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³³¹中指出：“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在决定我们生活的公共空间确保我们的发言权，其中之一就是占领决定全球化走向的各大公司的股东大会。”今天，我代理 Kenneth Steiner 前往占领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公司³³²股东大会，宣读第 4 号公司治理提案。

我 2003 年出席过应用材料的股东大会³³³，正好今天下午又要在旧金山的硅谷人权会议上发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CPRI 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CSRI³³⁴，其中包括应用材料的指数（C），就把研究报告也送一分给接待我的公司女士。公司原 CEO、现任董事会执行主席 Splinter（说起来还是我的校友）宣布会议开始，我巡视会场，除了十来个董事外，有几个公司员工，加上十来个股东，总共不足三十人。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修改章程让 10% 以上股东有权要求特别大会”的提案³³⁵。与类似的提案³³⁶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动员多数股东站在我们一方（因为这是多数股东不愿被董事会反对声明夺走的权利），同时“顺带”谴责高层报酬贪婪等公司治理上的弊端（我们的股份太微弱，直接这样提案的正面强攻的战术都没有奏效过）。提案的后半部才是要点：独立研究机构 GMI2013 年的报告认定公司财务为 D 等级、高层报酬为 F 等级（CEO Dickerson 拿走 1

³³¹ 2012 年 3 月 21-28 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³³² 其中文网站 <http://www.appliedmaterials.com/zh-hans/about/company> 公司简介：应用材料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应用材料的创新设备、服务和软件被广泛应用于先进半导体芯片、平板显示器和太阳能光伏产品制造产业。2013 财年营收 75 亿美元，在 18 个国家设立了 84 个分支机构，员工人数约 13,700 人。

³³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03/stock.pdf>

³³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csri.pdf>

³³⁵ <http://www.appliedmaterials.com/investor-relations/annual-reports-proxy-materials>

³³⁶ 赵京“占领股东大会的艺术：NetApp 的公司治理提案”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netapp.pdf>，2012 年 8 月 31 日；“成功改进 MEMC 公司治理的战例”，2013 年 5 月 30 日。

千5百万美元)，董事会主席不独立，没有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在健康和安全管理方面没有加入 OHSAS 18001，等。

因为只有十来个股东³³⁷，CEO 连一般股东大会必有的公司业绩也懒得报告了。整个股东大会，从 11 点 0 分开始，到 11 点 11 分结束，有近一半的时间围绕我们的提案进行，达到了占领股东大会教育资本阶级的战略目标。两个股东提问股票的走势后，公司秘书长开始报告 4 个提案（前 3 个是董事会选举等公司提案）的投票结果：我们的提案得到 54% 股东的赞同！公司不得不低头，表示要修改章程。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成功的战例推广到别的公司治理上。

[2014 年 3 月 4 日]

³³⁷ 2003 年在硅谷的 Santa Clara 会议中心举行，有五、六十个股东。我注意到参加股东大会的人数有普遍减少的趋势。

31.2 继续挑战应用材料公司的治理问题

两年前，我代理纽约的 Kenneth Steiner 前往占领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公司股东大会，宣读第 4 号“修改章程让 10%以上股东有权要求召开特别大会”的公司治理提案。提案同时也“顺带”谴责高层报酬贪婪等公司治理上的弊端，得到 54%股东的赞同，公司不得不了修改章程。

今天，我再次代理 Steiner 前往应用材料公司股东大会，宣读第 4 号“修改关于股东提名董事资格的章程”的提案。我很早到达会场，特意要求一份公司的章程，快速翻阅，却没有找到我需要的股东提案信息。一位亚洲面孔的女士很快为我打印出一份来。我巡视会场，除了十来个董事外，有几个公司员工，加上十来个股东，总三十人左右。我注意到有两名亚洲面孔的董事和另外两三个亚洲面孔的股东。这也很自然，特别是在半导体相关产业，亚洲（中国）人越来越多。

宣布开会的董事会主席 Roelandts 已经 71 岁，言语迟钝，连一个公司官员的名字也发音不清。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提案，我按照老战友 Chevedden 的要求，没有重复要求修改章程的提案原文，指出两个股东咨询机构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和 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都推荐减少或取消提名董事资格的人数限制。后者管理着 3 万亿美元资产，指出即使全国最大的 20 个公共退休基金加起来，通常也无法满足多数公司的 3%股份的提名要求。

正式议程过后，CEO 回答股东提问。一个白人问了三次，一个年轻的亚洲人问公司在中国的业务，CEO 回答说公司三十年前就在中国开展业务，去年的销售额增加了一倍。我因为想到自己准备明年的提案，指出公司的股东会议材料没有写明如何提交提案，而只是说在章程上有说明。但章程上也没有关于股东如何提交提案的信息。后来，公司秘书长 Larkins 和一个印度人面孔的员工来核实我的提问，却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只是说会以电邮与我联系。凭我与各种公司打交道的经验，我直觉上感到那些回避与股东交流的公司都有各种问题，更需要改进其公司治理。

整个股东大会，二十来分钟就结束了。公司秘书长报告 4 个提案（前 3 个是董事会选举等公司提案）的初步投票结果，我们的提案得到约 30% 的赞同。

今天，我正好收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电邮，驳斥了摩根大通公司雇用的律师行排除我的限制高层报酬的提案的各种理由，我的提案被摩根大通列为第 9 号将要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付诸表决。这也是我明年向应用材料公司提案的内容，明年再见。

[2016 年 3 月 10 日]

31.3 应用材料公司的 2018 年股东大会

2014 年 3 月 4 日，我第一次出席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公司股东大会、代理 Kenneth Steiner 宣读第 4 号“修改章程让 10%以上股东有权要求召开特别大会”的公司治理提案，得到 54% 股东的赞同！公司不得不服输，表示要修改章程。³³⁸那次股东大会，除了几个董事外，有几个公司员工，加上十来个股东，总共不足三十人，从 11 点整开始，到 11 点 11 分结束，有近一半的时间围绕我们的提案进行。

2016 年 3 月 10 日，我再次代理 Steiner 前往应用材料公司，宣读第 4 号“修改关于股东提名董事资格的章程”的提案，没有获得多数赞同。³³⁹整个股东大会，除了十来个董事外，有几个公司员工，加上十来个股东，总三十人左右，二十来分钟就结束了。

2016 年 6 月 9 日，我向公司提交要求改善高层报酬政策的提案³⁴⁰，被公司排除。2017 年 8 月 18 日，我再次向公司提交要求提高高层报酬透明度的提案³⁴¹，又被公司排除。

今天，我再次代理 Steiner 前往应用材料公司股东大会，宣读第 4 号 Right to Act by Written Consent/书面代理权的提案，没有获得多数赞同。由纽约市雇员退休基金等提出的要求公布种族、性别多元化的第 5 号提案也没有获得多数赞同。公司最近的业绩不错，有三十多名股东出席，CEO 的介绍和回答也很自信。四十多分钟的会议结束后，很多人还留下继续交流。

³³⁸ 赵京，“推动应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战例”，2014 年 3 月 4 日。

³³⁹ 赵京，“继续挑战应用材料公司的治理问题”，2016 年 3 月 10 日。

³⁴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amat_proposal_2017.pdf

³⁴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amat_proposal_2018.pdf

步出会场时，我与宣读第 5 号提案的全美最大公共基金—加州雇员基金 CalPERS—的 Mattley 简短交流。他说知道我。我感谢他们和纽约市雇员基金的社会责任提案，再次表达希望合作的愿望。

在几乎所有大公司都奔向 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的竞争中，应用材料不可避免地也会向英特尔、苹果等（过去的）硬件公司一样参与软件/服务业务，在处理数据时更多地面临人权等社会政策问题。我还有半年时间考虑如何提交明年的股东大会的提案。

[2018 年 3 月 8 日]

32 寡头阶级对美国经济民主的致命袭击

自从我 2006 年底提交雅虎 2007 年股东大会提案被雅虎雇用律师行排除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不作为 no-action 以来,我开始直接与 SEC 打交道,在不少文章中都不断提及 SEC 的功能、性质和现状。例如,在“从挑战 Yahoo 的案例看监督超级大公司的可行性”一文中观察到:“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有足够强大的资源,可以直接游说 SEC 的主席(从加州选出的国会议员)。不过,我们的原则要求我们尽可能回避政治家,而这一次并没有同时也挑战 SEC 的准备。这次了解了整个过程,可以说达到了主要目的,没有必要与 SEC 计较。实际上,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么多大公司的股东年会表决中,除了一、两项公司董事会提案(主要表决新的董事、决定会计公司),大多数的良知提案都来自象我这样的“微小股东”,美国的企业界和其代理利益团体正在设法改变 SEC 的较民主的条款,提高提案所需的股份额(目前只是两千美元),以消除这次 Yahoo 为排除我的提案所付的“麻烦”。对我们而言,趁 SEC 还没有完全被大企业集团控制之前,除了联系更多的“经济公民”(股东)继续挑战 Yahoo 外,还准备对跑到美国股市来上市的中国大公司(如百度等)教育一番。”

342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略微收敛的美国寡头阶级现在终于按耐不住,开始了对美国经济制度中自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硕果仅存的民主权利发起了致命的袭击。首先,华尔街日报 3 月 12 日报道了四家公司对我的老朋友 Chevedden 采取法律手段、企图封杀他的言论自由的消息³⁴³。而报道中对 Chevedden 所用的 gadfly(牛虻)一词,正是柏拉图用于苏格拉底的称号³⁴⁴,因为自 2010 年以来,Chevedden 提交了 157 个强烈谴责董事会阶

³⁴² 赵京, 2007 年 4 月 17 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07/yahoo.pdf>

³⁴³ Wall Street Journal, “Corporations Take Swats at a Gadfly,” March 12, 2014.

³⁴⁴ 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人们很熟悉被译为俄文、中文等文字的美国作家伏尼切契 Voynich 的小说、电影《牛虻》,但美国公众一般并不知道她的作品。

级贪婪的提案，其中 55 个提案获得了多数股东赞成³⁴⁵！接着，华尔街日报 3 月 28 日发表了纳斯达克 Nasdaq OMX Group 执行副总裁/总律师/法规总管 Knight 的意见文章 The SEC's Corporate Proxy Rules Need a Rewrite（SEC 的企业投票规则需要改写），直接对证券交易法中容许“持有 1% 或两千美元股份一年以上”的股东提交提案的民主规定开刀。这实际上是配合 3 月 27 日 SEC 五个总统任命的委员之一 Daniel M. Gallagher 在 Tulane 大学法学院企业法研究所第 26 届年会的演说 Federal Preemption of State Corporate Governance（联邦政府侵犯州政府的企业管理权限）³⁴⁶。

Gallagher 攻击我们这样的关心企业社会责任的小股东活动人士“绑架” hi jack 了股东提案制度，好像他可以以雅典政治秩序和罗马帝国的名义处死 gadfly 苏格拉底和耶稣一样。确实，2010 年 10 月 15 日，在新闻集团的人权犯罪被暴露之前，这个家族帝国的董事会跟班们（包括西班牙前总统）在股东大会上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人权提案的³⁴⁷！

Gallagher 指责我们对公司的利益不感兴趣、甚至与公司的利益作对。如果他也是一个股东，当然有权利这样认为并投票反对我们的社会提案，但作为 SEC 委员，他要剥夺我们提出对董事会没有强制效力的提案（且常常被董事会滥用公司资源雇用律师行编造理由排除）的权利，就不由得令人怀疑他的联邦政府官员资格了。他进而以 hedge fund（对冲套利赌博基金）很少参与提案的事实，说明股东提案不是企业治理的有效方式，这正好说明他代表了套利基金的利益。例如，某套利基金用 5% 的股份呼风唤雨，谋得雅虎公司 3 个董事会的位子、还替换了 CEO，但我的获得 32% 股东支持的企业社会责任提案却被董事会置之不理³⁴⁸。Gallagher 委员还

³⁴⁵ 包括我 3 月 4 日代为宣读的提案。见赵京“推动应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战例”，<http://cpri.tripod.com/cpr2014/applied.pdf>

³⁴⁶ http://www.sec.gov/News/Speech/Detail/Speech/1370541315952#_edn10

³⁴⁷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2010proposal4.pdf>

³⁴⁸ 赵京：“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景展望”，2013 年 7 月 23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csri-yahoo.pdf>

嫌套利基金的权势不够大，妄图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推向套利基金的奴役之下！

Gallagher 声称股东可以到（州）法庭去寻找公正，但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在硅谷的国际大公司都在遥远的偏好公司的德拉瓦州注册，我们这样的小股东根本没钱雇用律师行去买到公正。实际上，2009 年，我在董事会上的人权发言被谷歌秘书长打断，我投诉 SEC，SEC 回复说这是公司注册所在州的法律，而我没有能力为了这点小事去德拉瓦州法庭申诉，哪有什么公正可言³⁴⁹？

Gallagher 干脆明目张胆地承认：“我不知道我们甚至是否需要股东提案，”“我要建议取消股东提案制度”；并说“管理股东提案花费公司太多成本”，却完全不提与公司业绩无关的逐年高涨的 CEO 报酬。Gallagher 露骨地建议把提案资格股份暴涨一百倍到 20 万美元或一千倍到 2 百万美元，一劳永逸地排除他所攻击的“pet projects”。在他的眼中，象联合国全球契约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也成了“宠物项目”！最后，Gallagher 要把证明提案内容清楚、准确的负担责任推给股东，把裁决提案内容的权力不经法庭交给公司，让我们看到：他的最终和唯一目的就是 hijack 绑架 SEC，为寡头阶级利益服务。那样的话，我们只有到公司总部门前抗议一途了。

美国的脆弱的经济民主在危机中！让我们行动起来，给 SEC 主席 chairmanoffice@sec.gov 发电邮表达我们的担忧。请参考我 4 月 3 日的电邮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hareholder_proposals_rule_change.pdf 或

³⁴⁹ 赵京：“专横卑鄙的Google（谷歌）2009年股东大会”，2009年5月12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google-c.html>。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的抗争，谷歌2000年接受我的人权提案，并作出积极政策改变。赵京：“以股东提案推动Google谷歌的人权政策转换”，2010年4月22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gsp.pdf>。

http://blog.creaders.net/us-japan-china/user_blog_diary.php?did=177773 作为样本自行修改，或简短表示对我的致函的支持。

[2014年4月5日]

33 改进博科 Brocade 公司治理的胜利

我在“寡头阶级对美国经济民主的致命袭击”³⁵⁰中介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一个委员攻击我们这样的关心企业社会责任的小股东活动人士“绑架”股东提案制度、纳斯达克股票上市集团总律师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要改写 SEC 的企业投票规则、以及四家公司同时采取法律手段封杀最有战斗力的 gadfly（牛虻）Chevedden 的紧急局势，也表明我们继续坚守股东大会战场、捍卫美国尚存的经济民主制度的意义、代价和决心。

4 年前 4 月 11 日，我曾致函博科公司 Brocade Communications Systems³⁵¹ 关注其人权等社会政策³⁵²，收到其副总裁回复³⁵³，感到公司的一定诚意，加上感到博科的社会影响³⁵⁴不值得优先对应，就没有提交提案，把有限的资源转移到别的战场。今天，我再次受 Chevedden 委托，驱车赶到博科公司宣读标题为“特别股东会议”的提案。

因为没有去过，我提前 45 分钟到达博科公司总部，与正在准备会议的几个员工和官员问候，进入会场。因为要宣读的提案的内容的战斗性很强，我尽量友好致谢接待的员工/官员（他们毕竟不是寡头阶级），同时送给他们 4 年前公司副总裁的回复和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今年 3 月 4 日发布的新版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其中博科的等级是 C: 40-60（一般）³⁵⁵。除了 5、6 个股东，有十来个出

³⁵⁰ 2014 年 4 月 5 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EC_rules_change.pdf

³⁵¹ 中文网站 <http://www.brocadechina.com/>简介：“Brocade 是数据中心联网解决方案及服务领域的行业领导者，能够帮助企业管理他们最重要的信息资产。不足为怪，全球 500 强公司都依赖 Brocade 技术来保持他们业务的全天候运转。Brocade 一直致力于开发领先技术，实现高度可靠和安全的数据中心连接。目前，全世界的大多数数据均流经基于 Brocade 技术的 Brocade 设备和数据中心网络。”

³⁵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brocade_letter.pdf

³⁵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Brocade_Zhao_20110513.pdf

³⁵⁴ 现有 4, 143 员工（Annual Report on Form 10-K, p.12）。

³⁵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csr.pdf>

席会议的董事/主管和十来个服务会议的员工。我迅速浏览会议规则，因为只有一个股东提案，整个规则的头4条规定专门针对我们，另几条规定也是限制股东发言的。公司还专门指定一个（中国人）员工为我拿麦克风（以便控制我的发言时间和内容）。结果，整个股东大会的正式议程，与我宣读过的别的提案的会议类似，除了走过场的前3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修改章程让10%以上股东有权要求特别大会”的提案。与类似的提案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动员多数股东站在我们一方（因为这是多数股东不愿被董事会反对声明夺走的权利），同时顺带谴责高层报酬贪婪等公司治理上的弊端（我们的股份太微弱，直接这样提案的正面强攻的战术都没有奏效过）³⁵⁶。提案的后半部才是要点：独立研究机构GMI2013年的报告认定博科股东权利缺乏、比91%的所有评价过的公司有更高的风险被股东集体诉讼、股票有过度稀释的可能、CEO报酬偏高、没有向高级主管因欺诈、过错讨回报酬的政策、也没有把他们的报酬政策与环境、社会方面的表现联系起来。

值得指出的是：提案的内容并不完全准确，董事会的反对声明逐条列举理由反驳，算是 fair play（公平），比那四个抓住提案内容不确切之处把 Chevedden 告上法庭的公司文明多了。要相信广大股东的辨别能力，更不能容许因为股东提案可能含有不准确内容而剥夺股东提案权利的企图。其实，多数董事会反对声明中的荒谬谎言更离谱。我刚读到雅虎为了排除我的提案雇用的律师行的谎言时，用“肺都气炸了”来形容也不为过，但几年下来，也学会“耳顺”，尊重权贵阶级的言论自由、不去理会无关紧要的骚扰。当然，从根本上讲，我们既没有个人金钱利益企图，也不希罕 CEO 伸出的伪善握手，而只是捍卫能够批判发言的自由权利和多少还存在的民主制度、改善企业治理、减少经济不平等。

³⁵⁶“推动应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战例”，2014年3月4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applied.pdf>

不到十分钟，主持人宣布：“所有提案都通过了”³⁵⁷，结束了正式会议。这实际上承认了董事会阻止我们提案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如果 SEC 真的被寡头阶级绑架（只有他们才有实力绑架美国的制度），在我们只剩下到公司总部门前抗议一途之前，要加紧夺取每一个股东大会的胜利。

[2014年4月8日]

[补充：2014年9月30日，公司发布修改相关章程，采纳我们的提案。]

Effective September 26, 2014,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Brocade Communications Systems, Inc. (the “Company”) amended and restated the Company’s Amended and Restated Bylaws (the “Bylaws”). In addition to certain technical, conforming, and clarifying changes, the amendments and restatemen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changes: Special Meetings of the Stockholders. Section 2.3 (Special Meeting) was amended to require the Company’s corporate secretary to call a special meeting of the stockholders at the request of one or more stockholders holding shares representing in the aggregate not less than twenty-five percent (25%) of the total voting power outstanding and entitled to vote on the matter or matters to be brought before the proposed special meeting. Sections 2.3 and 2.5 (Advance Notice of Stockholder Nominees and Stockholder Business) were also amended to set forth the related ownership, procedural and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such stockholder(s) must satisfy in order to request a speci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Stockholders did not previously have the ability to request a speci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Annual Meetings of

³⁵⁷ 结果为 193,480,908 (60%) 赞成，126,871,007 (40%) 反对。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009626/000100962614000038/brcd-8kx2014x04x09.htm>

the Stockholders. Section 2.5 (Advance Notice of Stockholder Nominees and Stockholder Business) was also amended to add certain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for stockholders intending to nominate directors for election or bring business before an annu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Indemnification. Article VI (Indemnity) was amended to clarify the Company's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indemnification of certain persons and to add new section 6.6 (Limitation on Indemnification) to provide certain limitations on the Company's obligation to indemnify persons for certain proceedings.

【后续】

2015年4月7日，我再次前往博科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宣读Kenneth Steiner提交的第6号提案（另外5个提案都是公司的），要求严格控制高管的报酬。因为去年打过交道，同样的那位中国员工在门前等待我。没想到在惠普公司打过交道的副总裁也来问候，原来他跳槽到这里来了。

结果，我们的提案得到45%赞成（152,476,381，反对185,928,809）³⁵⁸，功亏一篑，但也向公司董事会传达了强烈的信息，不能无节制地给自己加薪。在这个本来属于工会基金的传统领域，现在只有我们几个gadfly（牛虻）/Robin Hood罗宾汉在坚守阵地，为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摇旗呐喊。但我们确信最终会感动上帝，因为我们的旗帜上写着：替天行道！

358

34 改进 Hospira 公司治理的新尝试

我对制药公司比较生疏，主要是因为不懂生物医学。今天，我再次受 Chevedden 委托，乘车赶到旧金山的 Ritz-Carlton 旅馆出席 Hospira 公司³⁵⁹的股东大会，代他宣读标题为“Right to Act by Written Consent”(股东书面同意有效)的提案。

我提前半个多小时到达旅馆的一个不大的会议室，与会务女士交谈，她马上介绍公司的秘书长女士来，我们交谈了 5、6 分钟，打消了她的好奇和疑虑。她告诉我说，因为有一些董事、大股东住在硅谷/旧金山湾区，股东大会就没有在公司总部伊利诺州举行。我去年代理 Chevedden 宣读提案的 SunEdison 股东大会，也是类似情形³⁶⁰。由此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硅谷/旧金山湾区在高科技和金融行业以外也对世界的控制和影响。除了两三个股东（有一个坐轮椅的股东），有十来个出席会议的董事/主管和十来个服务会议的员工。会议开始前，董事会主席来向我问候，我让他安心主持会议。因为只有一个股东提案，整个股东大会的正式议程，与我宣读过的别的提案的会议类似，除了走过场的前 4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我宣读提案。与类似的提案一样，我们提交股东们不愿被董事会夺走的普通权利，动员多数股电站在我们一方，同时顺带谴责高层报酬贪婪等公司治理上的弊端（我们的股份太微弱，直接这样提案的正面强攻的战术都没有奏效过）³⁶¹。提案的后半部才是要点：独立研究机构 GMI 评级 2013 年的报告认定 Hospira 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是 D、CEO 报酬偏高（2013 年总收入 \$9,892,283）、董事会权力过大（可以不经股东同意修改公司规则 bylaws）、股东召开特别会议等权利受限（一般公司要求 10%，Hospira 却要求 25% 以上股东才有权利），等。

³⁵⁹ 公司 2013 年有 1 万 7 千名雇员、41 亿美元销售，在一百个国家有业务，但在亚洲的业务只占 8%（主要在印度）。中文网站 <http://www.hospira.cn/>介绍：“HOSPIRA 是一家全球性的专业公司，专注于专业制药和药物输注领域。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适当的人员和适当的产品以促进健康。”对 2013 年开张的上海儿童医疗中心捐助 1 百万美元。

³⁶⁰ 赵京，“成功改进 MEMC/SunEdison 公司治理的战例”，2013 年 5 月 30 日。

³⁶¹ 赵京，“推动应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战例”，2014 年 3 月 4 日。

董事会的反对声明指出 Chevedden 去年提出同样的提案没有通过，也列举公司治理方面的一些改进。结果，我们的提案今年也没有通过，要找到新的公司治理课题才能进一步突破了。

作为制药公司，Hospira 在产品上市等方面受到美国食品与药物局 FDA 的监管，董事会下也有“治理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风险较小，初步评级为 C：一般。

[2014 年 5 月 7 日]

一年过后，我今天再次受 Chevedden 委托，乘车赶到旧金山的 Ritz-Carlton 旅馆出席 Hospira 公司的股东大会，代表他再次宣读标题为“Right to Act by Written Consent”(股东书面同意有效)的提案。

今天 BART 运输系统出故障，幸好我提前出发，在会议十分钟前到达旅馆的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共有 19 人出席会议，大概只有我一个股东（代表）。因为只有一个股东提案，除了走过场的前 3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我宣读与去年类似的提案。

当场宣布结果，我们的提案今年也没有通过。但是，我们的提案的实质内容（CEO 报酬偏高）得到股东的认同，公司董事会关于高层报酬的第 2 号提案被大多数股东否决了。实际上，许多年来，包括工会基金在内的股东提交的许多直接限制高层报酬的提案都很难通过，我们提案的“佯攻”战术，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迫使董事会不能给自己或同僚滥发报酬。

[2015 年 5 月 6 日]

35 前景渺茫的 Altera 公司

我十几年前刚到硅谷时在一个半导体软件 start-up 公司打杂,但很快就离开了这个行业。今天,我到圣何西,上午开完 eBay 的股东大会后,下午又到 Altera 公司代 Chevedden 宣读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的股东提案。“Altera 公司是可编程逻辑解决方案的倡导者,帮助系统和半导体公司快速高效地实现创新,突出产品优势,赢得市场竞争。Altera 的 FPGA、SoC FPGA、CPLD 和 HardCopy® ASIC 结合软件工具、知识产权、嵌入式处理器和客户支持,为全世界 13,000 多名客户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可编程解决方案。”³⁶² Altera 成立于 1983 年,拥有分布在 20 个国家的 3 千名员工,2013 年年度收益达到 17 亿美元³⁶³。近来,半导体产业的高端设计也向中国转移,Altera 恐怕很难回到 2011 年的 19.5 亿美元收益水准了。

Altera 的几个公司大楼和停车场还显示出过去的气派。我报明身份,一位女士马上出来迎接,领我进入昂贵空旷的会议厅。除了十来个出席会议的董事/主管和十来个服务会议的员工,只有三、五个股东与会。CEO 过来向我问候,还请我到前台就座,我谢谢他的好意,没有离开座位。因为只有一个股东提案,整个股东大会的正式议程,与我宣读过的别的提案的会议类似,除了走过场的前 5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第 6 号提案。与类似的提案一样,我们提交常识性的要求,期望动员多数股股东站在我们一方,谴责高层报酬(CEO 年收 1 千 2 百万美元,2011 年是 2 千 9 百万美元)、环境、社会责任等公司治理上的弊端。

当场宣布的初步统计结果表明我们的提案没有得到多数赞同³⁶⁴。正式议程结束后,CEO 介绍公司业绩,有 56%在亚太。只有一个股东发言,对公司的成长前景表示担忧,CEO 的回答避重就轻,没有提示对这个公司

³⁶² http://www.altera.com.cn/corporate/about_us/abt-index.html

³⁶³ http://www.altera.com/corporate/about_us/abt-index.html

³⁶⁴ 正式结果为 48%赞同。

和产业令人明快的展望。正如我在“eBay 公司治理的问题”³⁶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股东提案本身受制于德拉瓦州州法，对董事会有利（所以绝大多数大公司都在那里注册），即使得到大多数股东支持，也不对董事会具有强制力”，所以受到公司操作（可以把没有投票者算为反对）得出的 48% 或 52% 本身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对董事会的一个强烈不信任结果。

[2014 年 5 月 13 日]

时隔一年，我今天下午再次去 Altera 公司代 Chevedden 宣读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的股东提案。没想到今天有一百多人出席会议，其中许多是中国人面孔。原来，媒体报道 Altera 拒绝了英特尔的高价收买，有些股东不满，串联要选掉领导董事³⁶⁶。整个股东大会的正式议程与去年一样，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与去年类似的第 6 号提案。当场宣布的初步统计结果表明我们的提案还是没有得到多数赞同，部分原因是因为董事会已经作出妥协，例如把 CEO 年收从 1 千 2 百万美元减为 9 百万美元，今天的提案投票结果还会进一步影响董事会的决策。正式议程结束后，CEO 介绍公司业绩，好于 2013 年。有四个股东（包括两个中国人面孔）发言，对公司的成长和是否接受收买的前景表示担忧。CEO 比去年显得自信，拒绝对外界传闻的担忧表达意见，简短结束了会议。

[2015 年 5 月 11 日]

³⁶⁵ 赵京，2014 年 5 月 13 日。

³⁶⁶

<http://blogs.barrons.com/techtraderdaily/2015/05/06/altera-holder-tig-urges-lead-directors-removal-after-refusing-intels-golden-ticket/>

36.1 eBay 公司治理的问题

大约九年前我参加过 eBay 的十周年股东大会，记得一个黑人妇女宣读要求全民保险的提案，对强势的女 CEO³⁶⁷控制会场的能力印象很深，她也不屑一顾地提到中国有个叫什么阿里巴巴的公司在盗版 eBay。相比之下，创始人倒像一个地道的软件技术员。我也参加 eBay 的用户大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场还有画家为我画像。今非昔比，今天，我不到 6 点就开车启程，很早就到达 eBay 圣何西总部，代 Chevedden 战友宣读标题为“Right to Act by Written Consent”（股东书面同意就有权决定公司事务）的股东提案。

这次股东大会的主角本来是超级富豪股东 Carl Icahn。Icahn 集团这一次挟 2.15% 的股份，提案要求把赚钱的 PayPal 从 eBay 分离出去，并自行发出投票卡给股东，要选出两名他们的董事。事情闹到这一步，大有两军对垒之阵，eBay 董事会发出的通知和投票卡特意强调反对 Icahn 集团的提案和投票卡。我本来以为有好戏可看，但他们在会议召开之前终于避免了对决，Icahn 集团撤销了自己的提案和董事提名。与我几年前在雅虎股东大会期间目睹的一模一样³⁶⁸，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

除了十来个出席会议的董事/主管和十几个服务会议的员工，还有更多人数的股东与会，而且有不少黑皮肤的面孔。我快速浏览会议规则，看到特意针对我们的提案中谴责用语的威胁（停止发言或赶出会场）条款。因为只剩我们的一个股东提案，整个股东大会的正式议程，与我宣读过的别的提案的会议类似，除了走过场的前 4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提案。与类似的提案一样，我们提交股东们不愿被董事会夺走的普通权利，动员多数股电站在我们一方，同时谴责会计和高层报酬（eBay 连年业绩下滑的情况下 CEO 年收 2 千 9 百万美元、遭到高达 40% 的股东反

³⁶⁷ 我后来两次与她在惠普的股东大会上正面交锋。赵京：“惠普 2013 年股东大会观感”<http://cpri.tripod.com/cpr2013/hp-shareholders-meeting.pdf>

³⁶⁸ 赵京，“出席 Yahoo 雅虎 2008 年股东大会”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yahoo.pdf>

对)等公司治理上的弊端。我读完后,那个总是为公司辩护的白人老头发言攻击 Chevedden。

公司秘书长当场宣布初步统计结果,我们的提案得到 45%的赞同,会后一个股东来向我表示惋惜。问题在于股东会议通知第 65 页除了董事会反对立场外,还特意说“Abstentions will be counted as present for purposes of this vote and therefore will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a vote against this stockholder proposal.”(没有投票者算为在场,因而作为反对)。我当场看到这一点,但没有表态,会后提醒 Chevedden,他说不去挑战这一点。实际上,股东提案本身受制于德拉瓦州州法,对董事会有利(所以绝大多数大公司都在那里注册),即使得到大多数股东支持,也不对董事会具有强制力³⁶⁹,所以 45%或 51%本身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对董事会的一个强烈不信任表示。

正式议程结束后,CEO 介绍公司业绩,回答 5、6 个股东/用户的提问。一个黑人说他代表非洲-拉丁裔要求 eBay (以及硅谷整体)在董事会构成(现在全是白人男性)、雇用等方面要包容、多元化:照顾非洲-拉丁裔。另一个黑人问到 Bit Coin,CEO 回答说会将来会考虑接受。我本来想问 eBay 现在对阿里巴巴的政策,但没有开口,因为我自己没有 eBay 的股票,也不愿意分散与会者对我们提案中的公司治理的关注。eBay 的董事会把英特尔、福特汽车、联邦住房贷款公司和 Yelp、Adobe Systems、Intuit、facebook、Edison 等大公司的原任或现任董事召集在一堂,总要尽到基本的公司治理职责,不至于只是来分享“最后的晚餐”吧!

[2014 年 5 月 13 日]

³⁶⁹ 这是我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学到的。赵京:“高盛股东大会人权提案揭开纪念六四的序幕”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gs-proposal-64.pdf>

36.2 eBay 公司 2019 股东年会提案

5年前,我代表老友 Chevedden 在 eBay 股东年会宣读他的提案后³⁷⁰,又重新购入股票,向 2018 和 2019 年的股东年会提交了关于高层报酬改革的提案³⁷¹。5年前的股东年会后,eBay 把最有价值的支付业务 Paypal 剥离出去后,本身只有 Paypal 市场价值的 1/3,但仍然按照 Alphabet, Amazon, facebook, Microsoft 等市场价值比它大几十倍的公司为 CEO 发放奖金。可惜,这两次提案都因为遣词造句“不合规范”被公司排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袒护 eBay、无动于衷/no-action。这段期间,公司的律师 Rome 通过电邮、电话与我交流。

今天,我不到 6 点就开车启程,提前到达公司总部,再次代表 Chevedden,宣读他的“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的新提案。我正在报名登记,Rome 就过来问候我。他希望我以后不要提交提案,而是非正式交流。我再次介绍日本大公司社长报酬大概是员工 20 倍的情况³⁷²,说明美国的 CEO 报酬超过员工 1 百倍,不只是个人贪婪的问题,更是导致美国经济制度无法维持的社会问题。而 CEO 报酬超过员工 1 千倍的公司(如接近破产的 JCPenney 是 1294 倍!)简直就是社会的毒瘤。我问起他的家姓(与罗马相同),他开玩笑说罗马帝国就是他们的家族事业。我介绍自己最近的罗马史、犹太教研究,其实他是犹太出身、改信基督教的。他邀请我访问他们的教会(接近东正教),还有拉丁语学习。

除了主持会议的董事会主席,只有 2 个董事出席会议,另外 12 个董事或者通过网络、或者缺席今天的会议,间接证明 eBay 的衰落。加上主管及员工,还有十几个股东,总共只有 30 多人与会。因为只有一个股东提案,整个股东大会的正式议程,与我宣读过的别的提案的会议类似,除

³⁷⁰ 赵京:“eBay 公司治理的问题”,2014 年 5 月 13 日。

³⁷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ebay_proposal_2019.pdf

³⁷² “年収 1 億円超”の上場企業役員 443 人リスト,東洋経済『役員四季報』編集部,2015/03/18。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63485>

了走过场的前 4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我宣读提案。我坚持读完 Chevedden 通过电邮给我的提案内容，我们的提案成为在硅谷唯一独立的企业治理批判声音。

公司秘书长当场宣布初步统计结果，我们的股东提案得到 23% 的赞同，没有通过。部分原因是公司在 Chevedden 提案后任命了独立的董事会主席，虽然公司在反对声明中也保留着由 CEO 兼任董事会主席的“灵活性”权力。

正式议程结束后，CEO 简短介绍公司业绩，比去年有所增长、扩展到日本等，然后让股东提问。我环视会场，见没人发言，就起身提问，关于公司与强势扩张的 Amazon 的业务竞争关系。CEO 说 eBay 更注重人际服务，不是机器人可以代替的。

eBay 有 1 万 4 千员工，今天的市场价值是 317 亿美元，2018 年 CEO 报酬 1 千 8 百万美元高于美国 S&P 500 公司的中间值 1 千 2 百 40 万美元³⁷³，是公司中等收入员工的 152 倍。我计划再提交明年的股东提案，从 eBay 做起，推动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把 CEO 报酬制定在公司员工收入的 1 百倍以内。

[2019 年 5 月 30 日]

³⁷³ The WSJ CEO Pay Ranking -- An analysis of 2018 compensation for S&P 500 leaders. May 19, 2019.

37.1 Netflix 公司成功外表下的治理问题

Netflix 在美国、加拿大、南美、欧洲提供 Video streaming 互联网随选流媒体播放、online 在线 DVD 和 Blu-ray Disc rental 蓝光光盘在线出租业务。2013 年第 3 季度 Netflix 宣布在美国有 3120 万订阅者，而全世界则超过 4040 万（维基百科）。在成功的外表下，产生了许多涉及媒体、娱乐、互联网通讯的新问题，甚至被多次告上法庭，董事会无法应对。更令人担忧的是：每一名成员都任期三年的董事会拒绝采纳去年获得多数股东赞同的股东提案，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帮助。

我今天提前两个小时出发，从旧金山湾区东北角赶到最南部，进入会场时股东大会已经开始了，正好开始宣读股东的提案。第 5 号由 Florida State Board of Administration 佛罗里达行政管理局提案，要求废除董事会的三级制（每个董事任期三年），统一成任期一年。第 6 号由 United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Pension Fund 木工兄弟联合会退休基金提案，要求董事会候选者多于董事席位并设立董事当选的多数投票标准。接着由我宣读 Chevedden 提交的第 7 号要求赎回所谓 Poison Pills 毒丸

（stockholder rights agreement 股东权利协议）提案，Netflix 的毒丸是 10% 股份，防止个别股东以不到 10% 的股份“兴风作浪”（强行收购股价下跌时的公司）。我记得十多年前自己在 Adobe Systems 工作时，有一段时间公司股价急剧下降，一个不出名的小公司扬言要收购 Adobe，搞得员工忧心忡忡，但幸好被 20% 的“毒丸”指标阻止。再接着，由我宣读加州的 Myra K. Young 提交的第 8 号关于投票过程的诚信提案，要求公司不得在投票结束前透露投票数据以影响投票过程。第 9 号是纽约市提交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提案。

会议当场宣布初步结果：第 5 至 7 号提案获得通过（其实我自己对“毒丸”问题不一定同意 Chevedden），第 8、9 号提案没有获得通过。除了十来个出席会议的董事/主管和几个服务会议的员工，还有十几个股东

与会。会后 5、6 个股东围着我，问我为什么经常在股东大会上宣读提案，是不是以此领取费用？我解释说作为从日本逃来的中国难民，我自己也提交了不少人权、企业社会责任提案，因为人在湾区，所以帮助别处的股东宣读提案，完全是为了共同的完善企业治理的使命。这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赞许。

[2014 年 6 月 9 日]

去年股东大会正好一年以后，Netflix 今天下午三点举行股东大会。而 Tesla Motors 特斯拉下午两点举行股东大会，两个会议地点相距不远，所以我提前半小时先赶到计算机博物馆参加特斯拉的年会。

我 2013 年在此参加过惠普的股东大会³⁷⁴，今天刚到门口，发现不少公司的员工在展示车型 Model S 和充电柱子。进入二楼大厅后我发现容量 369 人的会场已经座无虚席，而且有不少年轻人。会议主持人 Maron 很快略过头两个公司提案（提名董事会和会计行，但没有一般公司常有的高层报酬提案），就轮到仅有的 Peters 夫妇的两个股东动物保护提案。虽然大多数股东对提案本身不感兴趣，但在这样的新型科技公司的如此引人注目的股东大会上直接点名 CEO Musk，要求公司开发产品时关注动物权利，令人耳目一新。我起身向他们问候，就离开了会场。



³⁷⁴ 赵京“惠普 2013 年股东大会观感”，2013 年 3 月 20 日。

我提前半小时赶到 Netflix 公司，与负责签到的女士交谈，不一会儿，公司的秘书长过来问候。会议迟到了几分钟开始，除了十来名董事、主管和员工，只有十来名股东与会，与我刚出席的特斯拉年轻气盛的年会形成强烈反差。主持会议的 CEO 很快跳过头四个公司提案，甚至建议三个股东提案也不用宣读了。我转向秘书长，他示意我发言，我就越过第 5 号提案介绍第 6 号由加州 Young 提交的简单多数 simple majority（半数以上）而不是超级多数 supermajority（三分之二以上）可决的提案。接着我继续宣读 Chevedden 提交的要求所有董事会成员每年选举的第 7 号提案。我讲完后，一个男士才站起来发言，宣读第 5 号由纽约市雇员退休基金提交的改善投票的提案。

CEO 随即让负责计票的人当场宣布初步结果：“所有的提案都通过了”！没想到 CEO 失态地追问：“什么？连三个股东提案也通过了？”这是很少见的一幕，因为 CEO 一般在会前已经知道大多数股东通过电话或网络投票的结果。再加上他的迟到，显示他今天对股东会议心不在焉。这对股东、公司意味着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2015 年 6 月 9 日]

37.2 Netflix 公司治理的老问题

去年股东大会正好一年以后，Netflix 今天下午三点半举行股东大会。

我提前半小时赶到 Netflix 公司，向负责签到的女士报到。不一会儿，公司的秘书长过来问候，我们已经第三年打交道了。会议迟到了几分钟开始，除了十来名董事、主管和员工，有三、四十名股东与会（我听到有人用中文交谈），比去年热闹，反映了公司业绩和利润的增长。主持会议的 CEO Hastings 很快跳过头三个公司提案，说四个股东提案也不用宣读了。我们几个股东举手要求发言，他示意我先发言。

我宣读第 6 号由加州 Young 提交的简单多数（半数以上）可决的提案。这个提案与我去年宣读的她的提案以及我 5 月 31 日代表老朋友 McRitchie 在特斯拉公司的股东大会上的提案一样³⁷⁵。接着我继续宣读 Chevedden 提交的要求所有董事会成员每年选举的第 7 号提案。这个提案已经连续四年在股东大会上获得 75-88% 的股东赞成，但公司一直拒绝采纳股东大会的结果。

我讲完后，一个男士才站起来发言，代表华盛顿特区的 Southwest Regional Council of Carpenters Pension Fund 西南地区木匠评议会退休基金宣读第 4 号提案，要求建立选举董事的标准，使得到多数股东股份赞成的才能当选。这个提案特别针对去年 5 个遭到 48% 以上股份反对仍然当选的董事。接着，另一位男士宣读第 5 号由纽约市和康涅狄格州雇员退

³⁷⁵ 赵京，“热闹的特斯拉股东大会”，2016 年 5 月 31 日。我现在才知道 Young 是 McRitchie 的夫人。这一对夫妇是 American Corporate Enemy #2，“美国企业头号敌人”的桂冠由 Chevedden 兄弟获得。

休基金的提案，要求改变投票规章让股东有更大的董事提名权。这个提案去年得到 70.97% 的股份赞同。

CEO 随即让负责计票的人当场宣布初步结果：“所有的提案都通过了。”以后就要看新的董事会是继续抵抗多数股东的意愿呢，还是像多数公司那样，采纳多数股东的意愿改善公司治理。

[2016 年 6 月 9 日]

38.1 以 IBM 的公司治理推动东亚的正义进程

昨天，我刚翻完谷歌董事会执行主席 Schmidt 推销他当 CEO 时谷歌的运作、特别是 2009-10 年谷歌在中国业务的政策变换的书³⁷⁶。其中他提到 Chinese dissidents 的 Gmail 电邮被来自中国的黑客侵入，但没有提及我在 2008、09 年股东大会的发言和退席抗议，以及 2010 年的股东大会提案³⁷⁷。当时谷歌三巨头执政，年轻的两个创始人中，一人坚持“Don't be evil”的原则不惜撤出中国、另一人犹豫未表态，而老练的 Schmidt 反对撤出中国。不管我的人权提案对最终的撤离中国决策产生了多大（或多小）的压力作用，我很庆幸及时经历了这个人权原则与商业利润较量的经典企业政策改变案例。

昨天我又收到一百年前安那祺主义者 Alexander Berkman 编辑发行的 The Blast 的复版³⁷⁸。我把他作为企业治理的榜样和先驱，希望所有商学院的学生都应该知道 Berkman 的贡献³⁷⁹。晚上，听了奥巴马总统的富有热情的国情咨文，想到政府也有不错的政策和充满理想的官员，但需要我们公民帮助，共同努力实施社会的进步，就在微信上留言：“Berkman 为了教育卡内基，替天行道、以身试法，被判刑 22 年，迫使美国的资本阶级开始‘行善’。我在与公司的董事会或官员会见时，常常想到如何比 Berkman 更有效改进企业治理。听到奥巴马的演讲，想到更应该帮助政府的政策改善”。但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能够同时帮助世界头三号经济大国美国日和主导全球化进程的跨国企业改善政策呢？

³⁷⁶ (Google Executive Chairman and ex-CEO) Eric Schmidt & (former SVP of Products) Jonathan Rosenberg, How Google Works.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September 2014.

³⁷⁷ 赵京：“以股东提案推动 Google 谷歌的人权政策转换”，2010 年 4 月 22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gsp.pdf>

³⁷⁸ Introduction by Barry Pateman, AK Press, 2005.

³⁷⁹ 许多美国的工会罢工，俄国的劳工甚至包围美国的大使馆要求释放 Berkman。

早在去年4月30日，我致函IBM公司秘书长，提案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原文不长，援引如下，付加适量汉译。

Shareholder Proposal on Establishing a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Resolved: 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 establish a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to assis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overseeing IBM's policies and practice that relate to public issue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pplier chain management, charitable giv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xpenditures,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may affect IBM's operations, performance, reputation, and shareholders' value.

Supporting Statement 支持陈述

IBM currently has four board committees: Audit Committee, Director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Management Resources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but without a committee to legitimately and ethically deal with public issues,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 affairs, affecting our business 没有一个委员会正当、符合道德地处理特别是国际事务等公共问题。

According to our 2013 annual report, IBM has 32% (\$31,628m/\$97,800m) revenue in Europe/Middle East/Africa, 23% (\$22,923/\$97,800m) revenue in Pacific Asia 23%收入在亚太; “Within the BRIC countries of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 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see good opportunity in all regions over the long term and is continuing to invest in these key markets.” (p.40); “During 2013, performance in China was impacted by the process surroun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broad governmental economic reform plan 公司在中国的业绩受到实施广泛政府经济计划的过程的影响。” (p.41). IBM

is truly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world 不愧是领导性国际商业公司.

The globalization has made the world increasingly connected and complicated 全球化使世界更加联系和复杂起来. For example, the U.S. -Japan Joint Statement on April 25, 2014 includes such dangerous contents as 例如, 2014年4月25日的美日联合声明包括以下的危险内容: "These commitments extend to all the territorie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apan, including the Senkaku Islands 这些条约的义务延展到所有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地域, 包括尖阁诸岛." "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and supports Japan's consideration of the matter of exercising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美国欢迎和支持日本考虑实行集团自卫权."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misled the U.S. under the U.S. -Japan Security Treaties to crash with the rising power of a nationalistic China since Japan utilized China's 1989 Tiananmen Tragedy to abandon Japan's peace constitution (the cornerstone of Asia's peace after WWII) towards rearmament, militarization and fascism 日本政府利用1989年中国的天安门悲剧放弃日本的和平宪法(战后亚洲的和平基础)走向军备、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美日安保条约下误导美国与崛起的民族主义的中国冲突. Althoug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igned the G-7 Summit declaration in 1989 to protect Chinese students, I,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Osaka University organizing Chinese democratic and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in Japan, was persecuted because I refus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betray my fellow Chinese students 日本政府虽然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宣言, 但却迫害我这样的不肯与日本政府作幕后交易的在日中国留学生. Please refer to Japan's second largest newspaper Asahi's interviews with me on February 10, 1990, October 20, 1992 and June 8, 2009, and my article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 Historia Actual Online, 2004, Issue 4 Volume 2.

Partly to respond to my proposals, Microsoft established such a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in 2012.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IBM to establish a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我几乎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一年之前向公司提案，多少也期待公司会采取正确的步骤，与我直接联系，有足够的时间商讨改进公司的政策。但直到去年12月14日，我才接到律师行 Cravath, Swaine & Moore LLP 的快件³⁸⁰，原来 IBM 高层把企业治理的业务也“外包”出去，雇佣这个律师行试图把我的提案排除掉！我12月19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发出电邮，反驳律师行的三大离谱的理由。

• If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posal would cause the Company to violate federal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why Microsoft’s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in 2012 did not cause Microsoft “to violate federal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Even though there is possibility that a new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may have some overlapping functions with existing committees (which exist even among existing committees), the Company ***can choose not*** to violate federal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即使新的公共政策委员会可能与既有的委员会部分功能重叠，公司可以选择不违反联邦法规，as Microsoft does.

• My Supporting Statement does not contain any false and misleading statements 我的支持陈述没有任何虚假和误导陈述。Because the Company refuses to communicate with shareholders, it is natural for shareholders to regard the Company “without a committee to legitimately and ethically deal with public issues,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 affairs, affecting our business” from media coverage and other independent sources. If the Company ever contacted me, there is possibility to improve shareholders’ view.

³⁸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IBM-SEC.pdf>

Again, I urge the Company to positively and constru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shareholders 我再次要求公司与股东展开积极、建设性的交流。At least, there should be an email account to receive shareholders' concerns, suggestions and proposals.

• My Supporting Statement used my personal unique case to inform the Company and shareholders of the public policy situation regarding Japan and China, where the Company has heavy business 我的支持陈述引用我的独特经历向股东们提示公司在那里有大量业务的日本和中国的公共政策情况 (as cited in my Supporting Statement). It is not “a personal griev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不是“个人对日本政府的控诉” and it never “wishes to further a personal interest.” 也从未期望得到个人利益 The letter also doubted my statement of my life in Japan without checking the facts I listed in the Supporting Statement. I am always willing to provide any information, but the Company never contacted me. This is another indication how the Company mistreated shareholders.

今天,我收到SEC署名昨天2015年1月20日至律师行和我的电邮³⁸¹,仔细阅读之后,不由得欣慰美国的民主法规仍然有效。这封由SEC企业财务部门总律师办公室的律师-顾问 Jacqueline Kaufman 回复的意见信全面反驳了 Cravath, Swaine & Moore LLP 律师行排除我的提案的所有理由,三次重申 “we do not believe that IBM may omit the proposal from its proxy materials” SEC 不同意 IBM 可以把我的提案从股东大会资料中排除掉。这个“判决”案例同时也表示,自从我向 NetApp 提交类似的亚太和平政策提案获得 SEC 支持以来³⁸², SEC 开始同意把广泛的公共政策与管理层高薪、人权、气候等议题一样作为股东提案的一个题材付诸表决。

³⁸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SEC-IBM.pdf>

³⁸² 赵京:“在 NetApp 股东年会宣读亚太和平政策”,2014年9月5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netapp.pdf>

费尽周折，终于把公司拉到谈判桌上，下一步要看公司董事会如何发布反对声明、以及为了拉拢多数股东反对我的提案而不得不在实质上采纳一部分我的政策了。在最后的战场—4月召开的IBM 2015年股东大会之后，我还要评估提案内容对1989年当时的历史真相³⁸³及其推动东亚的正义进程的影响。

[2015年1月21日]

³⁸³ 除了我2009年9月23日致函当时刚上台的日本首相鸠山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要求日本政府公布当时出卖、迫害我们的真相外，我也再次敦请、呼吁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公使唐家璇等官员公布、反省并忏悔与日本政府合作迫害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行径。见赵京：“如何翻过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2012年6月4日。没有历史真相和正义，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与繁荣。

38.2 在 IBM 股东大会上对安倍访美发出警告

表面上看来，奥巴马任命的驻日大使或者是克林顿国务卿选举时论功行赏的律师，或者是政治名门的闺女，与过去的退休副总统或退休国会议长一样，完全不懂日本，好像只是一个点缀闲职；实际上，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美日关系是由一小撮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严密操控的。我在《美日同盟及其与中国的互动》第一章“美日关系的基础”开首介绍过：奥巴马刚上台，【2009年3月27-29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和Pacific Forum CSIS在旧金山召开由50名美日“专家和政策执行者”参加的第15次美日旧金山安全保障会议，之后作为Issues & Insights, Vol. 9, No. 14发表了题为“美日安全保障关系：对同盟的试金石”论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虽然注册为民间非赢利机构，但实际上是由25个国家组成的“产业、官方、学术界”三者联合的国际组织“太平洋经济互助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的日本委员会的事务局，隶属日本外务省，其成员多来自退休的外务省官僚。Pacific Forum CSIS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在檀香山的亚太独立部门。由此论集的开首“谢辞”中对日本外务省北美局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课表示感谢，也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可以看成是日本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奥巴马新政权之下借用美国的“智库”机构对美国政府的试探气球。不用讳言，会议的中心围绕着美日同盟的目标和对手——中国——展开。】

现在，奥巴马的任期接近尾声，在美日关系利益集团的操纵下，这次访美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意外得到殊荣。首先，日美两国政府2015年4月27日在纽约举行外长和防长出席的安保协商委员会（2+2）会议，18年来首次修定了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双方决定把自卫队和美军的合作扩大到全球规模，新指针强调了日美同盟将为“亚太及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发挥主导作用”，并在太空及网络空间领域共享信息，反映了安

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容，特别写明将共同防卫钓鱼岛/尖阁诸岛。在会议后的记者会见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以往美军与自卫队的军事合作是以一个地区（所谓“日本周边”）为焦点，现在这种合作范围扩展到了全球。另外，日美双方共同牵制中国在南海有争议岛屿附近填海和建设人工岛的行为。包括在野党日本民主党在内的国内舆论和政局如何抵抗这种违反包括宪法在内的一系列日本法规，值得拭目以待。

其次，4月28日，奥巴马在白宫为安倍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了美日防卫和经贸合作等方面的议题。显然是在安倍的要求下，奥巴马也提到尖阁诸岛/钓鱼岛，批判中国：“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而是炫耀武力。我们曾经对中国表示了对任何国家都表述的立场，即那种做法是不对的。”安倍没有具体指明中国，但他表示，日本和美国“一致反对以任何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他说：“任何争端都应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而不是胁迫和恫吓。”安倍还说，他欢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再平衡政策。

对于国际关注的“慰安妇”问题（有一位韩国的幸存者专程赶来抗议），安倍没有直接道歉，把罪责推给“人口走私”之徒，好像与日本政府无关，又错过了一次历史的和解机会。

然后，作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首相，得意的安倍4月29日今天上午在美国国会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³⁸⁴。安倍用英语从他的外祖父岸信介说起，看来，那些拍手欢迎的国会议员们知道岸作为日本首相压制国内的反抗运动签署了美日安保条约，但谁知道或在乎岸的战犯身份呢？安倍有什么资格跑到国会来大讲民主、自由、人权、希望？进一步看，

³⁸⁴ http://japan.kantei.go.jp/97_abe/statement/201504/uscongress.html 演说的整个语调似乎是利用“外压”向日本国内推销在英美早已过时的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谁知道或在乎安倍为日本国内政治和美日关系乃至亚太安全、全球和平带来的危害呢？问题是：如何提醒、警告、教育美国国会和公众呢？

我在“以 IBM 的公司治理推动东亚的正义进程”³⁸⁵中问到：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能够同时帮助世界头三号经济大国美中日呢？2014 年 4 月 30 日，我致函 IBM 公司秘书长，提案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内容包括：“2014 年 4 月 25 日的美日联合声明包括以下的危险内容：“这些条约的义务延展到所有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地域，包括尖阁诸岛”，“美国欢迎和支持日本考虑实行集团自卫权”。…日本政府利用 1989 年中国的天安门悲剧放弃日本的和平宪法（战后亚洲的和平基础）走向军备、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美日安保条约下误导美国与崛起的民族主义的中国冲突。…日本政府虽然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宣言，但却迫害我这样的不肯与日本政府作幕后交易的在日中国留学生。” 这样的警示文件应该与安倍的国会演说并列存入历史记录。

正如我 2014 年 12 月 19 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发出电邮、反驳 IBM 雇用的律师行的离谱理由那样，我的提案不是“个人对日本政府的控诉”，也从未期望得到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提醒美国公众关于日本政府军事化政策的危害。幸好，如 2015 年 1 月 20 日至律师行和我的电邮所示，SEC 全面反驳了律师行排除我的提案的所有理由，三次重申 SEC 不同意 IBM 可以把我的提案从股东大会资料中排除掉³⁸⁶。

昨天 4 月 28 日，我的朋友代表我在 IBM 股东大会宣读了上述提案，以我的 15 股份，得到 29,669,123 股份 (4.95%) 的赞同³⁸⁷。这是两百万倍的“投资回报”！为了推动东亚的正义进程，首先要追讨我亲历的 1989 年那

³⁸⁵赵京，中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 年 1 月 21 日。

³⁸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SEC-IBM.pdf>

³⁸⁷ <http://www.ibm.com/investor/services/annual-meeting-of-stockholders.html>

Against 569,817,501 95.05%; Abstain 29,174,498; Broker Non-Votes 166,640,169。

段最黑暗的中日当代史的真相³⁸⁸，因为没有历史真相就不可能有正义和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2015年4月29日]

³⁸⁸ 我2009年9月23日致函当时刚上台的日本首相鸠山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要求日本政府公布当时出卖、迫害我们的真相。

39 在阿里巴巴第一次股东大会上的提问

今天很早起来，打开电脑，从网上出席在香港同日晚9点（加州早上6点）召开的阿里巴巴第一次股东大会。近来，已经成为国际公司的各大公司逐步采取 virtual 网上会议的形式，一方面便于公司控制会场，另一方面扩大股东的参加，各有利弊。

今天的正式议程只有股东大会必须的两项：选举（部分）董事和确认会计行，在24分钟内顺利完成。接下来有15分钟的Q&A问答时间。我从会议开始自此已经用英文输入提问了：一、马云说邓小平1989年镇压是对的，为什么连邓的家人都承认这是一场悲剧？二、媒体广泛报道江泽民的孙子、刘云山的儿子通过后门交易持阿里巴巴股份，谁否属实？还有别的政府高官家庭持股吗？

我紧张地计算着问答时间：开始的中英文提示用掉了3分钟，第一个现场的股东用中文问了两个关于高管们对阿里巴巴前途的发言的不同的长问题，接着是英文翻译，等CEO回答完后，再翻译成英文，基本上到问答时间的结尾了。我赶紧输入抗议（英文）：三、15分钟的问答时间太短；四、应该问答关于公司政策的提问；五、第一个问答很像是你们事先预定好的表演。

似乎会议主持者接到别的股东类似的不满，没有按时终止问答时间，开始从网上挑出两个问题：公司股价下跌和长期战略。幸好问答都只用英文，大概是 因为网上的提问都来自美国。接着又从现场接受了一个小股东的中文问题。

我抓住最后的时间，输入三个直接的公司治理问题（英文）：六、公司是否会考虑将来采取“一股分一票”的结构？因为这是目前美国和国际公司治理的主流；七、鉴于阿里巴巴的国际业务扩展，是否有必要向微软2012年那样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八、阿里巴巴将来如何计划在美国（如硅谷）直接开展办公室和业务？

主持者又回到网上挑选出两个英文提问，最后，CEO 终于回答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说公司正在学习开拓国际市场，已经在旧金山和西雅图开设了办事处，将来会在美国开展更多的业务。

问答时间延长了一倍，半个小时后结束。这是我以亿分之一的股份改造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化的初步尝试，任重道远。

[2015 年 10 月 8 日]

40 埃克森美孚的高层报酬政策提案

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 是世界上第一大石油公司，即使以今天的超低油价，还有 3376 亿美元市场资本。我 2015 年 12 月 15 日向公司提交改进高层报酬政策 Executive Compensation Policy 的提案，建议邀请外部专家作为顾问参加公司的报酬委员会提供建言。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improve th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policy with respect to Exxon Mobil's executive officers and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to permit outside experts to attend meetings of the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s non-members or as advisors to the Committee. 我引用公司 2015 年股东大会通知，以主席兼执行长 CEO 2012-14 年的报酬 \$40,266,501、\$28,138,329、\$33,096,312 为例，指出仅雇用一个（为董事会服务的）咨询公司来决定高层报酬不合理、不公平，也不道德。公司在制定高层报酬政策时应该从广泛的社会阶层听取意见、参照美国的总体经济，包括失业率、工作时间和收入差距等状况。我同时引用法国政治经济学教授 Thomas Piketty 的著名研究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证明美国异常的高层报酬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带来了金融秩序的不稳定。

这是我第一次埃克森美孚与打交道³⁸⁹，我首先凭经验从公司的对应判断一个公司的诚意。12 月 22 日，我收到主管投资关系的副总裁兼秘书长 Woodbury 的快件，说我的股东证明中 2014 年 12 月 12 日购入的 30 股没有维持一年以上的 2000 美元市值，因而没有资格提案。我 12 月 27 日回复 Woodbury，指出他的计算方法武断：由于公司股价的下跌，我 2015 年 8 月 19 日在那 30 股的市值仍然高于 2000 美元市值之际又购入 15 股，所以在整个一年期间，我持有的公司股份市值从来没有低于 2000 美元。

³⁸⁹ 我 2010 年在第二大石油公司的提案介绍见赵京：“推动 Chevron 雪佛龙公司改进人权政策的经验”，2010 年 2 月 1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evron100201.pdf>。

同时，我接到股东关系部门的 Gilbert 女士的几次电话和电邮，表示公司愿意听取我的见解。我认真学习了她发给我的几个公司文献（有一些我在提交提案时已经研究过），回复说我很难同意“公司既有的高层报酬政策已经相当程度上实施了你的提案”的说法。我举出英特尔接纳我的建议举行三次外部专家会议讨论公司治理的样板，我们商定 2 月由 Woodbury 等埃克森美孚官员直接与我电话会谈。这相当于埃克森美孚召开的外部专家会议，他们还同意我可以邀请别的专家加入。

2016 年 1 月 21 日，公司负责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联络的 Parsons 向 SEC 提交排除我提案的电邮。我注意到埃克森美孚没有就我的提案资格为难 SEC，只用了一个理由：公司已经相当程度实施了 my 提案，而不是像雅虎、高盛、推特等公司雇用外部律师行编造五、六个理由，引用几十个似是而非的案例对人手严重不足的 SEC 官员律师疲劳轰炸，反正只要 SEC 同意其中一个看起来像的理由就可以排除股东提案了。我决定不向 SEC 反驳埃克森美孚，相信 SEC 的律师官员会独立判断的。

2 月 16 日，我和 Woodbury 以及另一个埃克森美孚官员（应该是股东部门经理 Tinsley）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我介绍了为什么如此提案，除了重申已经在书面上表达的见解，进一步以日本（高层报酬一般不超过普通员工 10 倍，高管们觉得退休时能得到一份天皇的奖状更值钱）、德国（董事会里必须有工会代表反映普通员工利益）、甚至中国（据某银行行长自称工资为八千元）的例子，说明埃克森美孚的高层报酬政策违背世界潮流。Woodbury 让我称他 Jeff，重复以埃克森美孚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的理由，强调公司高层报酬必须有竞争力。我也针锋相对地指出：正是因为埃克森美孚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我才有意愿关注公司的社会责任，促使公司发挥全球性领导力。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会议成功地交换了彼此的见解，同意进一步交流。

我当晚思考了几个小时，意识到以我的不足亿分之一股份得到这样的结果，达到了初步战略目的：一、向公司传达了明确的改善高层报酬政

策的信息，二、我与公司的所有通讯都报告到 SEC 备案，SEC 会把这些通讯都放到它的网站供公众（特别是相关的企业律师）查询，也相当于监督公司是否已经相当程度实施了我提案的政策，三、建立起交流的渠道。所以我回复公司说，感谢今天的坦率交流，虽然我们彼此依然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但我愿意撤销这一次提案，并继续保持公司的股份。

第二天，公司马上把我的决定电邮给 SEC，SEC 也神奇地当天回复我们。第三天 Tinsley 发给我感谢电邮，表示公司随时愿意听取我的包括高层报酬政策在内的公司治理的建议。SEC 随即把我的提案和我与埃克森美孚交锋的信息放到网上：

<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cf-noaction/14a-8/2016/jingzhao021716-14a8.pdf>。

美国日益加剧的高层巨额报酬、收入不平等和经济秩序的不稳定，除了社会上的普遍怨愤（但一直无力阻止）³⁹⁰，也反映到正在激烈展开的民主党初选搏斗。我从格林斯潘（他本人就兼任过好几个大公司的报酬委员会董事）的书里研究出美国大公司主要是按照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规模的比例颁发给高层高薪的逻辑，要挑战这种资本逻辑，除了继续与公司管理层对话甚至对决（法庭上），需要更多的民众参与。

[2016 年 2 月 23 日]

³⁹⁰ 正好有一篇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论文特别提到埃克森美孚的高层报酬问题，可以作为我进一步与公司交流的材料。Are CEOs Overpaid? A new survey shows Americans find flaws with executive compensation. February 17, 2016, Shana Lynch, Insights by Stanford Business. <https://www.gsb.stanford.edu/insights/are-ceos-overpaid>

41 改进摩根大通的高层报酬政策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我2014年9月30日致函JPMorgan Chase & Co. 摩根大通公司秘书长 Horan，提交股东提案要求设立国际政策委员会³⁹¹。提案希望董事会邀请外部专家就公司的环境、人权、社会责任、商业伦理、法规、正统性提供建议，改进公司的运营、业绩、声誉和股东价值。我也提到公司的国际业务，特别是在中国的扩张。虽然公司有一个“摩根大通国际议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那些成员基本上却不称职，如“议会”主席布莱尔2003年和小布什把英国、美国误导入侵犯伊拉克的战争灾难，香港的前特首董建华因为不受民众信任被迫辞职。这个提案目标过大，被公司抓住一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从2015年的股东大会排除掉了。

2015年10月22日，我再次致函摩根大通，提交要求采纳综合平衡的高层报酬哲学 a balance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philosophy、加入社会因素的考量（如经济状况、失业率、收入不平等）以改善公司的道德行为和公共声誉。在支持提案的声明中，我引用公司的2015年股东年会通告，举出CEO一年报酬 \$27,701,709 跳跃了135% 的例子，而华尔街日报2015年5月22-24日引用OECD机构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五分之二的人口最近几十年收入没有增长、收入不平等阻碍了经济成长。我同时引用法国政治经济学教授 Thomas Piketty 的著名研究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证明美国异常的高层报酬（特别在金融行业）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带来了金融秩序的不稳定。这个提案的内容与我向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 的提案类似³⁹²。同时，我考虑到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为了声援在民主党内初选的独立社会主义人士桑德斯参议员，特意加入了他的竞选主张：“华尔街不能继续作为一个孤岛把万亿美元投入

³⁹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jpm_shareholder_proposal_2015.pdf

³⁹² 赵京，“埃克森美孚的高层报酬政策提案”，2016年2月23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exxon2016.pdf>

危险的金融赌博”、“一个银行如果太大不能倒闭的话，它本来就不该存在。他们[六大银行]获取了太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为害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过程” (<https://berniesanders.com/issues/reforming-wall-street/>)。

11月4日，我接到公司副秘书长 Vincent 的邮件，说我的提案有欠缺：超过了 SEC 规定的 500 字。我第二天马上回复：虽然我的文书软件计算出我的提案只有 499 字，为了尊重公司，我精简了提案，现在有 436 字。我同时建议公司按照我与英特尔交流的经验，召开外部专家会议改善公司的高层报酬政策。

2016 年 1 月 5 日，我接到公司秘书长助理 Scott 寄来的长信和三个长文附件，说明公司已经实施了我的提案的精神。11 日，她又来函催促，我就马上回复了较长的电邮，说明通过学习，我确实发现了公司的一些既有的政策反映了我的提案的精神，但仍然不足以满足我的提案的要求。我建议公司参照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刚发布的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企业社会责任评估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view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csrr5.pdf>。鉴于我的提案被苹果公司排除的教训，我预先指出我的提案只专注高级管理层的报酬哲学，而没有“微观管理”普通员工的报酬政策。果然，公司第二天就向 SEC 提交了它雇用的律师行 Morrison Foerster 排除我提案的意向和几个理由。

1 月 19 日，我也致函 SEC，说明 Morrison Foerster 的排除理由没有根据。Morrison Foerster 2 月 18 日又向 SEC 去函，反驳我的说明，但没有新意。我决定不去麻烦已经很繁忙的 SEC 官员律师们，相信他们的职业判断。

3 月 8 日，我接到 Horan 的邮件和快件，说公司还在等待 SEC 的裁决，但同时准备了一份董事会的反对声明，“万一”SEC 不同意公司的做法时

会加入我的提案到 2016 年的股东大会³⁹³。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进展，说明 SEC 很有可能不同意公司的排除行为。果然，3 月 10 日，我们同时收到了 SEC 的电邮，说 SEC 不同意 Morrison Foerster 的任何一个排除理由³⁹⁴。这是美国经济中还存在的民主制度的一个胜利。

因为公司把我的提案排位第九，我知道除了公司的前四、五个提案，还有别的股东提案。果然，SEC 同时也拒绝了 Morrison Foerster 排除 Kenneth Steiner 提案的理由，但我的老友 John Chevedden 的提案被排除了。另外，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 的提案也会被付诸表决³⁹⁵。在今天的金融危机的全球化时代，能够与老牌的美国工会的主体并肩战斗、直接与美国金融的最老牌帝国对决，也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公民责任。

[2016 年 3 月 11 日]

4 月 8 日补充：公司 4 月 7 日发布了 5 月 17 日在 New Orleans 召开股东大会的材料

<https://www.jpmorganchase.com/corporate/investor-relations/document/proxy-statement2016.pdf> 华尔街日报 4 月 8 日在头版报道美国 300 家上市公司的 CEO2015 年平均年薪 2 千 4 百万美元、在财金版报道摩根大通的股东大会，最后（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第 9 号股东提案）专门介绍摩根大通 CEO 的报酬及其“合理性”。

5 月 17 日补充：今天华盛顿的 Public Citizen 的 Bartlett Naylor 代表我出席股东大会宣读我的提案，初步统计表明我的提案得到月 4% 的股份赞同。

³⁹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proposal9.pdf>

³⁹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SEC-JPM.pdf>

³⁹⁵ http://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cf-noaction/2016_14a-8.shtml#j

42.1 新兴的制药公司 Gilead

因为不懂生物学，我对制药公司的治理基本上没有关注³⁹⁶。今天，我再次受 Chevedden 委托，乘车赶到旧金山机场边的旅馆出席 Gilead 公司³⁹⁷的股东大会，代表另一个老朋友 McRitchie 宣读 Right to Act by Written Consent (股东书面同意有效) 的提案。

近来湾区的交通越来越拥挤，我提前两个多小时出发才按时到达旅馆。因为公司总部就在不远，会场来了一百多人（除了白人，有几张黑人和亚裔面孔），反映了旧金山机场一带制药公司的兴起。两个华裔面孔的员工来向我问候，宣布会议开始的也是一个华裔。因为只有一个股东提案，整个股东大会的正式议程，与我宣读过的别的提案的会议类似，除了走过场的前 4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第 5 号提案。与向其他公司的类似提案一样，我们提交股东们不愿被董事会夺走的普通权利，但这一次提案没有动员多数股股东在我们一方谴责高层报酬贪婪等公司治理上的弊端，只是指出股东召开特别会议（许多公司容许 10%，Gilead 却要求 20% 以上股东）等权利受限。

董事会的反对声明指出 2013、14、15 年股东大会上提出的同样提案没有通过，也列举公司治理方面的一些改进。当场的初步统计显示我们的提案遭到 53% 股份反对，而公司的前四个提案都高票（95% 以上）通过。

正式会议很快结束后，CEO 从企业社会责任开始报告，说公司在公共医疗领域贡献 4 亿美元，只少于盖茨基金的贡献。公司在 130 个国家有业务，向一千万患者出售 HIV 药品等。有十个男女/黑白

³⁹⁶ 赵京：“改进 Hospira 公司治理的新尝试”，2014 年 5 月 7 日、2015 年 5 月 6 日。

³⁹⁷ 公司 2015 年有 8 千名雇员，326 亿美元销售、比 2014 年增长 31%。信息来自 Notice of Annu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Form 10-K to the US SEC.

人股东（其中两人发言两次）踊跃提问，包括产品技术、销售、法律官司和财务、股票等广泛问题，使我感到有点像 Tesla 特斯拉股东会议的新兴热闹情景。我也持有微量公司股份，本来想问问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涉及中美政府之间的管制纠纷），但议会已经超时，也就作罢。

综合比较其他公司后，初步评级 Gilead 企业社会责任为 C+。

[2016年5月11日]

42.2 制药公司 Gilead 的 2018 年股东大会

2016年5月11日,我出席 Gilead/《丨为丨丫勿/吉利德 Sciences 科学制药公司的股东大会,代表 McRitchie 宣读他 Right to Act by Written Consent (股东书面同意即有权表决,如在年会之间召开特别会议)的提案,得到 46%的赞成³⁹⁸。去年,他又提出同样的提案,得到 48%的股东赞成,功亏一篑。今天,我再次赶到旧金山机场附近同样的旅馆,代表他宣读同样的提案(第 5 号)和 Chevedden 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提案(第 4 号)。

会场来了近百人(除了白人,有几张黑人和不少亚裔面孔),反映了近年来在硅谷旧金山机场一带制药公司的兴起(公司有上万员工、在 35 个国家有业务)。整个股东大会的正式议程,与别的公司的股东会议类似,除了形式上的前 3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第 4、第 5 号提案。当场的初步统计显示第 4 号提案得到 45%股份赞成(没有通过的部分原因是目前的董事会主席与 CEO 不是同一人),但第 5 号提案得到 51%赞成,终于通过了!

正式议程结束后,CEO 报告公司业绩,两个股东简单提问后,很快就结束了整个会议。我也持有微量公司股份,特别关注高层报酬的政策,但考虑到这个问题主要不在于个人贪婪,而是影响金融公正和社会稳定的政策,就没有发言,避免给人留下抨击公司高管个人的印象、无助于企业治理。2017年7月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丨为丨丫勿 CEO Martin 十年期间拿走近 10 亿美元的报酬,公司的股东材料却只显示他到 2016 年

³⁹⁸ 赵京:“新兴的制药公司 Gilead”,2016年5月11日。

的十年间获得 1.53 亿美元³⁹⁹。不过，报道里提及的 Martin 现在不是 CEO，而只是（内部的非独立）董事会主席了。正如我在 2017 年苹果公司股东大会上的提案⁴⁰⁰、在富国银行公司 2018 年股东大会上的提案⁴⁰¹等一样，我要准备一、两年才可以就此问题正式向公司提案。

[2018 年 5 月 9 日]

³⁹⁹ Better Ways to Measure Your Boss's Pay: Summary compensation tables massively understate what executives earn and don't tell investors what they need to know, by Stephen Wilmot (<https://www.wsj.com/news/author/8319>)

⁴⁰⁰ 赵京，“问责苹果高管厚禄问题的提案”，2016 年 10 月 26 日。

⁴⁰¹ 赵京，“改革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高管报酬的提案”，2017 年 12 月 15 日。

42.3 作为政治舞台的制药公司-Gilead 2019 股东年会

我 2016 年⁴⁰²、2018 年我出席 Gilead/《丨为丨丫勿/吉利德 Sciences 科学制药公司的股东大会,代表朋友 McRitchie 宣读他 Right to Act by Written Consent (股东书面同意即有权表决)的提案,终于获得通过,2018 年会上我也代表老朋友 Chevedden 宣读他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提案⁴⁰³。

今天,我又提前赶到同一会场。人数比去年少了很多,只有二十来名公司的人和三十来名股东。公司的秘书长来到我的座位问候,会议开始后,除了形式上的前 4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我宣读第 5 号 Chevedden 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提案。我特别指出公司的股价从五年前的 88 美元跌到今天的 66 美元,而去年的高层报酬提案只得到 89%赞同、低于普通公司得到的 95%支持率。Trillium 资产管理(社会责任投资公司)的女士接着宣读第 6 号提案,要求公布税务削减后如何分派节省下来的款项。当场的初步统计显示第 5 号提案得到 29%股份赞成(不如去年的 45%),部分原因是提案中批判的 CEO 兼董事会主席已经退任;第 6 号提案得到 2%赞成。我会后与 Trillium 的女士交换名片,希望以后合作。

正式议程结束后,刚上任两个月的 CEO 简短讲话后,由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报告公司业绩,然后是股东提问时间。一个穿着鲜红披风的年轻女子站起来,抨击《丨为丨丫勿公司高额的药价无法承受,连纽约市政府都不让医疗保险公司报销《丨为丨丫勿的药品了。公司的一个主管站起来,回答得无关痛痒,一个年轻的男子粗暴地打断他,痛斥公司的贪婪,会场差点失去了控制。我接着发言,指出两个股东提案和两个股东发言,都涉及到高层报酬的政策,正是因为美国公众对高管高薪的愤怒,美国证券交

⁴⁰² 赵京:“新兴的制药公司 Gilead”, 2016 年 5 月 11 日。

⁴⁰³ 赵京:“制药公司 Gilead 的 2018 年股东大会”, 2018 年 5 月 9 日。

易委员会才开始从去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CEO与中间雇员的收入比。我们公司作为高度专业化的制药公司,中间雇员的收入很高(\$163,963),但收入比竟然高达158倍。公司对此有什么政策?另一个公司主管站起来,回答说去年CEO收入高(\$25,961,831),是因为他要退下来了,为了感谢他28年的工作,给予他不少股份,但并没有全部兑现。我没有进一步指出:兑现后会更高,就像就他之前任CEO,十年期间得到近10亿美元的报酬(但公司的股东材料却只显示他获得1.53亿美元)⁴⁰⁴,因为我已经决定要正式提案到明年的股东会议表决。最后,有一个老人股东提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Sanders的全民医疗保险方案,问公司有什么政策。CEO回答说公司在全世界开展业务,不会因为美国特殊,为全民保险补贴(降价)。

医疗保险危机和越来越荒谬的高管高薪体现出来的贫富差距这两大美国社会问题,现在突出地体现在制药公司。今天在坐落于硅谷/旧金山湾区的《I为I丫勿公司,又身临其境,置身于舞台,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以来的Yahoo、Cisco、Google、HP、Apple等国际瞩目的股东会,以企业治理的视野推进社会改革的事业。

[2019年5月8日]

⁴⁰⁴ Better Ways to Measure Your Boss's Pay: Summary compensation tables massively understate what executives earn and don't tell investors what they need to know, by Stephen Wilmot (<https://www.wsj.com/news/author/8319>)

43 住房贷款软件公司 Ellie Mae

没想到一个贷款软件公司可以达到近千人的规模，而且去年利润增长了一半⁴⁰⁵。实际上，Ellie Mae 处理全美 1/4 的住房贷款申请⁴⁰⁶，创始人之一是华人 Hu（伯克利大学博士）。

今天，我再次受 Chevedden 委托，乘车赶到公司，出席股东会议，代表另一个老朋友 Young 宣读 Shareholder Proxy Access 的提案，要求赋予股东更大的权利，让拥有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提名不多于 1/4 或 2 名董事的权利。

有 25 名左右人士出席会议，除了我、Hu 和一个印度人，别的都是白人，几个董事和官员（包括 Hu）客气地过来与我问候。我介绍说自己很熟悉股东大会的程序，打消了他们的好奇。因为只有一个股东提案，整个会议的议程，与我宣读过的别的提案的会议类似，除了走过场的前 4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第 5 号提案。

当场的初步统计显示我们的提案与公司的前四个提案都通过了。因为只有我是外人，正式议程后就闭会了。我一人步出会场，留下别的人继续开内部会议。

综合比较其他公司后，初步评级企业社会责任为 C。

[2016 年 5 月 25 日]

⁴⁰⁵ 公司 2015 年有近 1 千名雇员、2 千 2 百万美元利润，2014 年 1 千 5 百万利润。来自 Notice of Annu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⁴⁰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lie_Mae

44.1 热闹的特斯拉股东大会

今天，我再次赶到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出席特斯拉公司的股东大会，代表老朋友 McRitchie 宣读 Simple Majority Vote (单纯多数投票) 的提案。

与去年同样，会场门前有不少公司的员工展示车型和充电桩，我被领上二楼会议大厅，容量 369 人的会场座无虚席，男女老少、各种肤色都很齐全，还有手语翻译。这是我参加过的十几年前 eBay 会议以来硅谷最热闹的股东大会。因为只有一个股东提案，整个股东大会的正式议程，与我宣读过的别的提案的会议类似，除了走过场的前两项公司提案（提名董事会和会计行，但没有一般公司常有的高层报酬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我宣读第 3 号提案。

提案内容是取消赋予创始人等特权的 Supermajority voting requirements（超级多数要求），单纯地要求每一股份权利平等。这一提案在 Weyerhaeuser, Alcoa, Waste Management, Goldman Sachs, FirstEnergy, McGraw-Hill 和 Macy's 公司的股东大会得到 74%–88% 的赞同，前年在特斯拉股东大会也得到 42% 的赞同。如果不计算公社的内部股东的超级股份的话，大多数股东是赞同此提案的。

正式会议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接着是 CEO 津津有味地讲演公司的历史，几个年轻的员工也登台助兴，使人感到欣欣向荣的热气。我不知道这是否与《华尔街日报》近来报道的公司财务紧张有关，会议过了一个小时还没有结束，我为了避开近来越来越拥挤的交通，就提前退出会场。在门口与两个手持巨幅标语 TESLA: Show Me the Batteries 的抗议者交流。他们说：“特斯拉以雇用当地人的许诺得到内华达州政府



的补贴，但并没有雇用当地人。”

作为一个创新产业，特斯拉的电动车也同样面临国家/州政府的产业政策传统难题。特斯拉的股东大会还会热闹多久？

[2016年5月31日]

44.2 特斯拉 2018 年股东大会提案

今天，我再次赶到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第三次出席 Tesla/去才么为丫/特斯拉公司的股东大会⁴⁰⁷，第一次见到股东活动人士 McRitchie。今天有我们的两个股东提案⁴⁰⁸。他们夫妇每年提交约 60 个提案，有一半被付诸股东大会表决。因为无法亲自出席所有会议，除了请朋友（我几年前开始）代理宣读，有时候只好放弃了。他妻子（在云南出身）负责投资财务，他负责政策提案，一对理想的社会责任投资组合。

与以往同样，会场门前有不少公司的员工展示车型和充电桩，我被领上二楼会议大厅，容量 369 人的会场座无虚席，男女老少、各种肤色都很可见，还有手语翻译。主持人念完正式议程的前两项公司提案（提名董事会人选和会计行，但没有一般公司常见的高层报酬提案，前不久专门召开过一次股东会议通过了公司的高层报酬提案）后，一个面熟的男士站起来发言。他代表与工会基金相关的 CtW Investment Group，指出公司推荐董事人选 Antonio Gracias 和 Kimbal Musk（CEO Elon Musk 的弟弟）不能算独立董事，21st Century Fox CEO James Murdoch 缺乏相关经验，要求他们应该站出来直接面对股东介绍自己的治理资历，并建议股东反对他们，同时支持我和 McRitchie 的提案。

接着，我站起来宣读第 3 号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的提案。鉴于此提案已经得到包括几乎所有知名媒体（如 Bloomberg, Reuters, CNBC, Los Angeles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和无数社交网站的报道、讨论（包括中国的媒体），我就没有照本宣科，只简略指出 S&P 500 中只有 49% 的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由 CEO 兼任，加上 CtW 男士指出的那样一董事会缺乏独立性，更需要一个独立的董事会主席⁴⁰⁹。McRitchie 的第四号提案 Proxy

⁴⁰⁷第二次见闻：赵京“热闹的特斯拉股东大会”，2016年5月31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tesla.pdf>

⁴⁰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teslaproxy.pdf>

⁴⁰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djv6oHzio> 记录中约一分半 4:50-6:20 是我的发言。只有我的英语比 CEO 差。

Access 要求降低股东提名、提案的股份门槛，特别是 Musk 一人就拥有 22% 的超级股份的情况下，更需要提高普通股东的权利。

正式会议很快结束，我们的提案没有得到通过，但我的提案得到 16% 股份赞同⁴¹⁰，值得继续提案。接着由 Musk 回答网上的十来个提问，如现在可以每周生产 Model 3 型五千辆、一千美金预约 3、4 个月后可以提货、明年推出 Model Y、全球已经有 9969 超级充电站、第 3、4 季度将达到现金周转盈余。同台的一个中国人高管介绍下个月将在上海开张第一个美国以外的制造工厂，等。然后开放给出席会议的股东们提问，起码有三十人排起了队列。为了避开湾区越来越拥挤的交通，McRitchie 和我就提前离开了会场。步出会场时，正好遇到 CtW 的男士在打电话，我递上名片，希望以后进一步合作。

我观察着 Musk 的台上表演：穿着随意、语义冲动（英语倒是比我强）、似乎总是刚从组装车间下来的样子，渲染出非常动态的初创气氛，带动着年轻的股东们一起梦想。这是美国之梦的一个标本，值得继续追踪，也确认了我的判断：日渐成熟的企业需要一个独立的董事会、一个独立的董事会主席。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可以考虑下一个提案的内容（继续同样的董事会主席独立，或根据新的中美关系事态等产生的新的治理事项）。

[2018 年 6 月 5 日]

⁴¹⁰ <http://ir.tesla.com/secfiling.cfm?filingID=1564590-18-15129&CIK=1318605> 赞成 16,671,984 (16%)、反对 86,036,801 (83%)、弃权 522,543 (1%)、未投票 37,253,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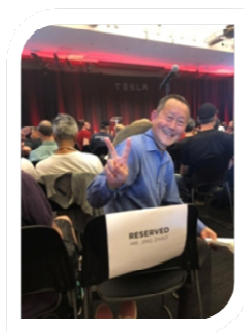
44.3 Tesla2019 年股东大会提案

今天，我再次赶到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第四次出席 Tesla/特斯拉公司 Y/特斯拉公司的股东大会⁴¹¹，再次宣读我和 McRitchie 的两个股东提案⁴¹²。



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在停车场的角落才找到位子，公司还雇人开车把股东送到会场门口。与以往同样，会场门前有不少公司的员工展示车型和充电桩，我被领上二楼会议大厅，容量 369 人的会场

座无虚席，后来者只好站着，以年轻人人居多、各种肤色都可见，还有手语翻译。我被领到专门为我预留的座位，身边的年轻人来自旧金山，作室内设计，说他很早入场，抢到这个座位以便在非正式的 Q&A 时段得到提问的机会。我说我会提前离场，到时他可以坐到我的座位上。他去年会议时也在场，说当时没有理解我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提案（得到 16% 股份赞同⁴¹³）的意义。那次会议后几个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部分根据我的提案结果，命令 CEO Musk 交出了兼任的董事会主席的职位，还惩罚 Musk 个人 2 千万美元。他也问起我的工作和背景，理解了我的提案是符合公众和股东的长远、但董事会不懂、不愿实施的政策、治理。我座位后面的股



⁴¹¹第二次：“热闹的特斯拉股东大会”，2016 年 5 月 31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tesla.pdf>；第三次：“Tesla/特斯拉 2018 年股东大会提案”，2018 年 6 月 5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tesla2018.pdf>。

⁴¹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9/proxy2019.pdf> 第 7、8 号。

⁴¹³ <http://ir.tesla.com/secfiling.cfm?filingID=1564590-18-15129&CIK=1318605>

东也认出我，热情地交流起来。

正式会议前由新上任的董事会女主席发言，她的澳大利亚英语虽然听起来不自然，但比 Musk 流利。会议主持人（公司总律师、华裔）很快念完正式议程的前 6 项公司提案，请我宣读我的第 7 号要求设立公共政策委员会、McRitchie 的要求废除绝大多数（2/3 以上）而采用简单多数（半数以上）就成立的第 8 号提案。我环视会场，感到大家都熟悉，知道来参加会议的年轻人们不在乎、不耐烦正式议程，就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提案，祝大家快乐，快速结束了演讲。

主持人当场宣布初步统计结果，董事会的所有声明立场得到多数赞成，意味着我们的提案没有得到通过⁴¹⁴。我已经熟悉了接下来非正式议程的 Musk 的台上表演，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2019 年 6 月 11 日]

⁴¹⁴ 补充：我的提案结果为赞同 7894084 (9%)，反对 81796932，弃权 638759，没投票 48,955,274。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18605/000156459019022354/tsla-8k_20190611.htm

45 改善沃尔玛公司的董事资格条例

对于世界上最大公司 Wal-Mart Stores 沃尔玛（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拥有超过两百万员工的世界上最大私营雇主、美国《财富》杂志 2015 年评选的全球最大 500 家公司的排行榜中的第 1 名），因其远在阿肯色州，我不太熟悉其业务，再加上一直没有与美国的各工会官僚机构建立起通畅的合作关系以便在员工地位等问题上帮助他们，所以我至今为止没有直接关注其企业治理问题。去年 5 月购入沃尔玛公司的股份后，我在股东大会前致函董事会，以雅虎人权基金的惊人滥用为例，指出 Yahoo 雅虎 CEO Marissa Mayer 企业治理无德、无能，不合格留在沃尔玛的董事会，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今年 5 月 9 日，我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之前再次致函董事会，通过我与雅虎交涉的十几年艰难痛苦历程（包括我的 2011 年和 2013 年两次股东提案以及我被霸占雅虎人权基金者威胁而于 2012 年被迫向德拉瓦州法庭要求雅虎董事会公开雅虎人权基金的运营材料⁴¹⁵）以及 4 月 28 日七名中国人权受害者谴责雅虎人权基金滥用的声明所揭示的新事实⁴¹⁶，重申作为雅虎 CEO 的 Mayer 不合格留在沃尔玛的董事会，但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知道，要想与这个世界最大公司交涉，只有股东提案一途了。

8 月 20 日，我正式向沃尔玛提交 Shareholder Proposal o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Guidelines reform 改善企业治理的提案，建议公

⁴¹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YHOO_2011_Proxy_Statement.pdf,
http://files.shareholder.com/downloads/YHOO/2467717314x0x659131/728b8747-18d9-4de2-987e-b1897eb18227/YHOO_2013_Proxy_Statement.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yahoo_220_complaint.pdf.

⁴¹⁶

<https://chinachange.org/2016/04/28/statement-by-seven-former-chinese-political-prisoners-regarding-the-death-of-harry-wu-and-the-abuses-of-the-yahoo-human-rights-fund/>.

司增加防止、辞退不合格董事的条例⁴¹⁷。我指出：公司的 Bylaws 章程规定被推荐董事都无竞争当选，每人至少可以期待被推荐六年次，然后还可以再被推荐六年次，但却没有条例规定六年之间如何不再向下一年股东大会推荐不合格的董事或在股东大会后辞退被发现不合格的董事，所以造成了雅虎 CEO 这样的不合格董事从 2012 年以来一直占据董事会的现象。除了上述七名人权受害者谴责雅虎人权基金滥用的声明，我又列出更新、更权威的 5 月 25 日出版的《外交政策报告》⁴¹⁸和 8 月 13 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关于雅虎人权基金令人发指的恶用的报道⁴¹⁹，希望通过股东提案让广大股东获得知情权。

我不久收到公司 Senior Associate General Council 高级副总律师 Edwards 于 8 月 31 日署名的快件，声称因为我收到的股份证明签发日期 8 月 20 日（周六）与我发送“certified mail 确认邮件”时邮局盖章的日期 8 月 22 日（下周一）差了两天，所以不符合提案提交条件，看起来公司好像还很较真，可惜没有用在挑选董事这样的大是大非方面，这就是多数企业律师的工作。我一方面指出美国证券市场周末两天关闭，我的股份不可能在周末卖掉；而且我的提案信与股份证明签发在同一天 20 日署名；再加上公司强行规定必须用“确认邮件”而不是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大多数公司所用的电子邮件方式提交提案，使得我只好等周一早上邮局开门才能去邮寄；另一方面又不想在枝节上浪费精力，就从证券行重新出具一份 9 月 3 日的股份证明，重新确认我在 8 月 22 日发出提案后还持有同样股份，于 9 月 3 日同一天再次发出。

⁴¹⁷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walmart_proposal_2017.pdf.

⁴¹⁸ “The Complicated and Contradictory Legacy of Harry Wu”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05/25/the-complicated-and-contradictory-life-of-harry-wu-china-yahoo/>.

⁴¹⁹ “Champ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Leaves a Tarnished Legacy”
<http://www.nytimes.com/2016/08/14/us/champion-of-human-rights-in-china-leaves-a-tarnished-legacy.html>.

不久，我接到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副总律师 Isham 的电话和电邮，确认他和 Edwards 以及投资者关系部门 Director of Investors Relation 主管 Brunner 于 9 月 21 日（今天）与我举行电话会议。

今天下午，我们四人会谈了四十分钟。我首先感谢他们主动与我联系，至少比雅虎十几年来一直雇用律师行来对付股东的作法积极，并介绍了我的背景和目的，强调雅虎这样的企业癌症病毒不能传染到沃尔玛的董事会来。他们解释说公司在挑选推荐董事时参考了一些有名的独立咨询机构的意见，而 2012 年邀请 Mayer 加入董事会时她还在 Google 谷歌上班，后来几年她得到沃尔玛多数股东的投票赞同。我首先指出独立咨询机构很多，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们 8 月刚出版的企业治理论文采访、引用了我的雅虎提案⁴²⁰，说明我的意见也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同；我进一步指出 Mayer 当年就离开了谷歌，她作为雅虎 CEO 在商业、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方面完全失败，特别是雅虎人权基金被恶用、滥用的事实一直被雅虎隐瞒，如果沃尔玛还要推荐她留在下一届董事会，而我的提案也同时得以在股东大会表决的话，沃尔玛股东们得到新的雅虎企业治理失败的信息，肯定不会再投票让她当选的。昨天的国会听证会会上对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渎职 CEO 的谴责就是前车之鉴。他们没有权力讨论是否接受把我的提案列入明年的股东大会表决，只是说今天会谈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我的提案的动机，将把信息完整准确地向董事会报告。我再次感谢他们的沟通交流工作，表示如果公司愿意在我提供的新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改进，不把不合格的人再推荐给明年的股东大会无竞争选举的话，我也会考虑主动撤销提案。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6 年 9 月 21 日]

⁴²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gadflies.pdf>.

46 帮助 Verizon 解决 Yahoo 雅虎的问题

在“改善沃尔玛公司的董事资格条例”⁴²¹，我介绍了如何通过对沃尔玛提交改善企业治理的提案⁴²²，杜绝雅虎 CEO 这样的不合格董事从 2012 年以来一直占据董事会位子这样的问题。9 月 21 日我与沃尔玛的三个官员会谈后的第二天，媒体又广泛报道了雅虎隐瞒两年前 5 亿用户信息被盗的丑闻。我还没有收到沃尔玛的任何联系，说明沃尔玛至少没有采取行动试图排除我的提案，而有可能在严肃地考虑我的提案，不再提名雅虎 CEO 当 2017 年的董事。

在与沃尔玛交涉的同时，我 8 月 25 日向正在收购雅虎的 Verizon Communications 公司提交设立人权委员会的提案，引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2007 年以来对雅虎人权政策和实行的持续研究，特别是 4 月 28 日七名中国人权受害者谴责雅虎人权基金滥用的声明⁴²³、5 月 25 日出版的《外交政策报告》⁴²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们 8 月出版的企业治理论文引用了我的雅虎提案⁴²⁵和 8 月 13 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关于雅虎人权基金令人发指的恶用的报道⁴²⁶，希望通过股东提案，防止雅虎的企业治理病毒传到 Verizon。

⁴²¹赵京，2016 年 9 月 21 日。

⁴²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walmart_proposal_2017.pdf.

⁴²³

<https://chinachange.org/2016/04/28/statement-by-seven-former-chinese-political-prisoners-regarding-the-death-of-harry-wu-and-the-abuses-of-the-yahoo-human-rights-fund/>

⁴²⁴ “The Complicated and Contradictory Legacy of Harry Wu”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05/25/the-complicated-and-contradictory-life-of-harry-wu-china-yahoo/>.

⁴²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gadflies.pdf>.

⁴²⁶ “Champ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Leaves a Tarnished Legacy”

8月31日，我收到 Verizon 的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and Asst. Corporate Secretary 副总律师兼助理秘书长 Kahney 的邮件，声称我提交了两个提案，因为我的提案中要求“采纳人权宣言”的条款与别的条款性质不同。我当日回复，指出我的提案与我2013年在高盛股东大会上的提案几乎一样，包括“采纳人权宣言”的条款；不过，为了表示合作，我主动修订我的提案，去掉这个条款。

Kahney 再次来函，安排我与 Verizon 的 EVP of Public Policy and General Counsel 公共政策执行副总裁兼总律师 Silliman 和 SVP, Deputy General Counsel and Corporate Secretary 高级副总裁、常务总律师兼秘书长 Horton 今天与我会谈。我也邀请人道中国的理事 Cao 女士参加。

今天，我先与 Silliman 两人会谈了近半个小时，Cao 女士随后加入，我们一共谈了一个小时。Silliman 感谢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承诺他本人一定会认真研究、报告这个问题，同时希望我撤回提案。我也表示愿意合作，朝着撤回提案的方向共同努力。他说 Verizon 计划在明年3月完成收购雅虎，5月召开股东大会。我说自己与几十个公司打过交道，有十几个提案付诸股东大会表决，熟悉相关程序，我们有足够时间会谈后达成初步共识，我再撤回提案。我指出：雅虎人权基金被滥用表明雅虎的企业治理之无耻、无法的灾难性，“性侵的是流落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的女儿和妻子，政治异议人士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女儿，他们的妻子也我们的姐妹。”⁴²⁷ 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超越了做人的底线。Silliman 表示同意，但说要在12月之前准备股东大会资料⁴²⁸，Cao 女士提议她11月在华盛顿或去纽约、

<http://www.nytimes.com/2016/08/14/us/champion-of-human-rights-in-china-leaves-a-tarnished-legacy.html>.

⁴²⁷ 程凯：“抢救雅虎人权基金”，2016年8月15日，原载《纵览中国》。

⁴²⁸ 其实，我知道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股东大会资料的日期是大会80天前。

新泽西与 Silliman 会见，直接出示大量雅虎人权基金的滥用证据和事实。在 Verizon 得到这些信息后，我们之间达成初步共识，我就正式撤回提案。

Silliman 态度变得有些急躁，说他不能同时考虑提案和举行实质性会谈，要求我在见面之前先撤回提案，他还可以到加州来见我，不然的话就只能在股东大会之后再谈雅虎的问题，并说我的提案不会得到股东赞成。原来，这才是他参加会谈的目的。以我的经验，Verizon 原来讲好还要出席会谈的另两个官员没有露面，说明 Verizon 在会谈之前已经作出决定，只由一个官员来传达决定，而不是从会谈的新信息再研究决定。我指出：撤回提案和解决雅虎问题是同一件事，我再次举出 2011 年我帮助英特尔改善人权政策后撤回提案的范例；股东大会之后我还会合作再谈雅虎和人权问题（保持继续提案的权利）；股东们及时得到刚加入 Verizon 的雅虎的信息，会支持我的提案。

至少，Verizon 现在初步明白了雅虎的企业治理邪恶问题，不太可能继续雇用雅虎的高层头目们，也知道不太可能排除我的提案，让我们明年 5 月在股东大会上见面吧！不管雅虎是死是活，正义迟早总是会来到的！

[2016 年 10 月 18 日]

47 平凡的 Clorox 股东大会

今天，我乘地铁到奥克兰市中心出席 Clorox 公司的股东大会，代表老朋友 McRitchie 宣读 Special Shareholder Meeting (特别股东大会) 的提案。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引发了各地的抗议活动，民权运动中心之一的奥克兰当仁不让，失控的抗议不免波及市中心华人区的餐馆和店铺。接待我的女士是奥克兰本地白人，她介绍说今天还有人抗议，但集中在一个公园，很平和。公司的秘书长和 CEO 也来问候。

我对公司完全不熟悉，就坐以后赶紧阅读股东大会资料，知道这是一家老牌企业，成立于 1913 年，现有 8 千员工，今年销售额 58 亿美元、今天的市场价值 150 亿美元左右，主要生产家庭清洁用品（洗涤剂）、健康用品（佐料、口红、饮用水装置等），“参透 90% 美国家庭”。大约有三十名公司董事、管理层和三十名股东出席。

除了三个公司提案，只有一个股东提案。我照本宣科，要求董事会修改章程，按照德拉瓦州法规，允许持有 10% 的股东们可以提议召集特别股东大会。主持会议的 CEO 接着讲演董事会的反对声明，特别解释说公司有一个股东 Vanguard 就持有 10.0% 的股份、第二大股东 BlackRock 持有 9.0% 股份、第三大股东 State Street 持有 5.5% 股份，所以在今年 9 月 13 日已经修改章程，允许持有 25% 的股东可以提议召集特别股东大会。这在预料之中。通常，公司为了拉拢多数股东反对股东提案，都会作出部分改进。结果，有 40% 股东赞成这个提案。

公司的股价近几年来表现出色，但现在处于今年低潮。有四个股东提问，平淡如常。全球化程度不高的 Clorox 与这次选举等政治动荡关系不大。我进一步阅读高管报酬的信息（CEO 今年总收入近 9 百万美元）等，决定不对它采取行动。

[2016 年 11 月 16 日]

48 Nuance 的股东投票权利的提案

Nuance Communications 是一家总部在马萨诸塞州的通讯软件公司，有 13200 雇员，这样的规模的软件公司算大公司，在中国等全世界都有办公室，只是在硅谷没有什么名气。今天，我赶往它的硅谷办公室，为老朋友 Steiner 宣读他的 Proxy Access（要求更容易反映股东意愿的投票权利）股东提案。

我很早到达，在公司正门入口等到开会时间才被容许入场。总有只 17 个人出席，基本都是公司的董事和高管们。十几分钟后就轮到宣读唯一的股东提案（第 6 号）。我念出提案的要点：不应该限制提名董事所要求的 3% 股份的人数；2015 年以来 198 家公司对此提案投票的结果，在 123 家公司得到多数股东赞成；纽约市管理的雇员基金在 2016 年提交了 72 个类似提案后，多数公司同意采纳，因而没有必要投票了。

与通常的股东会议不同，董事会没有对此股东提案表示反对（也没有赞同）。会场初步统计结果，有 87% 股份赞同我们的提案，反而有一个公司的提案没有得到多数股份赞同。

正式会议结束后，CEO 简单介绍公司的业绩。然后，一个长期股东发言，抱怨这几年股价太令人失望，问有什么理由继续持有公司的股票？CEO 小心地回复说，公司的长期业绩还不错，短期无法预测，但他本人对公司有信心、会坚持保有公司的股票。

作为从老牌企业 Xerox 全资控股的公司 ScanSoft 演变而来的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领头公司，Nuance 的高层没有让人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它的中国的初期代理科大讯飞已经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从股东们支持投票权利这个微小变动的趋势，坚定了我进一步鼓励股东们争取更大的民主权利--差额选举董事--的提案，任重道远。

[2017 年 1 月 30 日]

49 salesforce 年会的股东提案获得通过

今天，我赶到 salesforce 在旧金山的总部出席股东年会，代表朋友 McRitchie 和 Young 宣读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股东权利提案。

因为会议在下午 2 点开始，我提前赶到公司，有点意外作为云计算的大型科技公司不在南湾硅谷而在旧金山设立总部。不过，正如公司的名字“销售力量”所示，这也有其销售的优势（以 Customer Relations Management 所谓顾客关系管理 CRM 为业务中心）。我很快被介绍给一个专门为我导引的女士。我告诉她，我很熟悉股东会议的程序，不必始终陪伴，但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股东提案，我成了唯一的 VIP 访问者。

与公司原有建筑相邻的新建大楼很气派，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在 Adobe 两座相邻大楼工作的情形。会议开始前，主持会议的公司法务总裁兼秘书长女士过来问候，说她在香港工作过 6 年。除了十来名公司董事，还有二十来名雇员和十来名股东出席。按照惯例，第一项提案是董事会选举，除了（也算是硅谷传奇人物）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Benioff，原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的副总裁 Kroes 女士、原克林顿国务卿手下的驻日大使 Roos、去年在制药公司 Gilead Sciences 的股东年会上见到的财务总监 Washington 女士、Yahoo! 的董事会名誉主席 Webb，还有原国务卿、原联席会议主席 Powell 将军也在选票名单上。前 6 项都是公司的提案，主持人一带而过，马上就轮到第 7 号提案。

我站起来照本宣科，念完所有的提案的内容，要求持有 15% 以上股份的股东拥有召开特殊紧急会议的权利。因为除了公司注册在德拉瓦州容许 10% 以上的股东的这个权利外，美国 S&P 500 名单上 60% 以上的公司都采纳了我们的提案，87% 的股东 2015 年在 Illinois Tool Works 股东年会上也采纳了这个提案。

秘书长随后宣布初步统计结果,所有的7个提案都得以通过, Benioff 表示要尊重第7号股东提案的结果⁴²⁹, 修改公司相应的章程。这是个微小股东改进大公司(2万5千员工)治理的阿基米德杠杆案例, 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按照硅谷的股东会议的习惯, 在正式议程结束后董事会和管理层都愿意和股东们轻松聊天, 我本来很想和 Powell、Roos 董事非正式交流一下, 但因为对此公司的治理和 CRM 业务(来自 Oracle 甲骨文公司的几个创始人和高管似乎分走了本来属于甲骨文的部分业务份额)还没有研究过, 也不想麻烦始终陪伴我的女士, 就立即步出会议和公司, 与她告别了。虽然还不是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公司的股东, 我还有机会与他们交流的。

[2017年6月6日]

⁴²⁹<http://d18m0p25nwr6d.cloudfront.net/CIK-0001108524/31dcc74c-c89d-4bcb-ad2e-252086a5b0b4.pdf> For 赞同 297,624,555, Against 反对 291,930,210, Abstain 弃权 2,655,328, Broker Non-Votes 未投票 53,530,867。

50 改革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高管报酬的提案

2017年7月10日，考虑到公司高管的离谱高薪已经成为美国经融危机和社会不公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担忧⁴³⁰，鉴于富国银行这两年来的一系列导致CEO等高管们被赶下台等丑闻，我提交提案要求改革公司高管报酬政策、包括采纳外部独立专家意见的提案⁴³¹。引用今年刚诉诸表决的我在苹果公社股东大会的类似提案，我指出仅雇用咨询公司提供高管报酬数据的局限，而应该导入诸如CEO与员工报酬比率、美国的最低工资和失业率等社会因素考量。而且，正如华尔街日报2017年7月4日报道的那样，美国公司公布的高管报酬隐瞒了他们的实际收入。

两个月后，我接到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高级律师 Schaffner 女士的电话和电邮，并于10月2日与她 and 法务部门的 Oliphant 女士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我主要介绍了自己从中国和日本逃来美国的民主运动背景和十几年前从雅虎公司开始的人权提案，到近年来关注金融公司和高管报酬等企业治理的经验。她们很感兴趣，保证要向别的部门负责人报告。

经过几番联系，今天我又与她们加上负责报酬的常务副总裁 Branca、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 Rizer 先生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他们介绍了公司在报酬政策上的改进（如最低员工从每小时13美元开始）和社会贡献（如每年3亿美元、全美第3多的捐助），但在高管报酬方面，还停留在一般公司所采用的“市场”和“才能”、业绩的考量。我指出：一、公司雇用的咨询公司都只提供高值数据，因为它们列举的同行都是业绩好的美国公司，更没有与报酬不算太高的日本、欧洲同行公司的高管们比较；二、金融公司的公共服务的业务性质不同于竞争性激烈的高科技行

⁴³⁰例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2016年2月发表的关于美国公众对CEO报酬态度的研究报告，其结论是CEO们报酬高得离奇，应该大幅减低。Americans and CEO Pay: 2016 Public Perception Survey on CEO Compensation
<https://www.gsb.stanford.edu/faculty-research/publications/americans-ceo-pay-2016-public-perception-survey-ceo-compensation>

⁴³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wf_proposal_2018.pdf

业，不能与后者的高管们攀比高薪；三、富国银行在近来的丑闻事态中面临更严厉的国会、公众的关注，减低几个高管的报酬是很简易、有效的方法改善公司的形象和治理；四、从长远来看，作为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公司高管们不断增长的报酬不可能维持下去，富国银行可以带一个好头。为什么美国的公司高管们不可以用金钱以外的报酬（如荣誉、社会贡献、爱国心）来衡量呢？

会议结尾，与别的公司一样，他们希望我撤回提案。我犹豫许久，至今还后悔自己一时心软撤回了 2016 年提交给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高管报酬政策提案⁴³²，失去了与其 CEO（现国务卿）交锋的机会。于是我回复他们，首先感谢富国银行的积极态度，以后也用不着提案了；但是，他们没有明确表明会采纳我的提案的精神和步骤，所以，我希望公司的董事会像谷歌公司的董事会 2010 年在股东大会上对我的人权提案的声明（哪怕是反对声明）一样，公开对股东、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政府部门以及普通公众表达正式明确的政策。

[2017 年 12 月 15 日]

⁴³² 赵京，“埃克森美孚的高层报酬政策提案”，2016 年 2 月 23 日。

51 2018 年 Twitter 股东大会的公共政策委员会提案

2015 年 10 月 29 日，我向 Twitter/推特公司提交成立国际政策委员会的提案在 2016 年股东大会表决⁴³³。推特公司一方面雇用律师行排除我的提案，一方面也与我对话听取我的建议，其中一个官员曾在驻华使馆担任过领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同意律师行提出的几个理由之一：我的股份数量在提交前一整年的时间内不足。我不同意律师行的计算方法，但不想（也无力）与 SEC 力争。我再购入一些股份，等到 2017 年 10 月 14 日再次提交类似的公共政策委员会提案⁴³⁴。推特再次雇用同一个律师行排除我的提案，但 SEC 在 2018 年 4 月 2 日的电邮复函中否决了他们的所有排除理由⁴³⁵，确定了我的提案在 2018 年的股东大会得以付诸表决⁴³⁶。

今天，我第一次通过视频和电话出席推特的股东大会。CEO 先报告公司业绩（近来大为好转），然后开始正式议程，除了形式上的前 3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提案（第 4 号）。我特别指出：自从我去年提交提案以来，世界局势进一步复杂不安，连比推特平台易于管理控制的社交媒体 facebook/脸书的 CEO 都被叫到国会和欧盟议会听证，完全移动的推特账号（如美国总统 @realDonaldTrump）更需要向微软公司那样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来治理。接着，由纽约州退休基金等股东共同提交的第 5 号提案实际上也是关于公共政策报告（我与他们十几年前在 Yahoo/雅虎公司股东会议上就相识，但他们这样的大“官僚”股东一直不肯与我这样的小股东合作）。

⁴³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twitter_proposal_2016.pdf

⁴³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twitter_proposal_2018.pdf

⁴³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SEC-Twitter.pdf>

⁴³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twitterproxy.pdf>

当场的初步统计显示第 4、5 号股东提案都没有通过⁴³⁷，但我提案的目的已经达到。

正式议程结束后，有 8 个股东简单提问。其中一人问为什么用视屏的形式，CEO 回答说这样可以有更多人参加，而没有说出“公司更容易控制”的理由，很快就结束了整个会议。我还有别的企业治理关注，特别是高层报酬的政策，但考虑到已经与 ㄉㄨㄨㄨ 建立了直接联系，会后就回复说以后我以后会继续持有股份但不必提案了。ㄉㄨㄨㄨ 也马上同意，欢迎继续交流。

[2018 年 5 月 30 日]

⁴³⁷ 正式结果：赞成 13,019,762(2.86%)、反对 441,118,016、弃权 1,731,470 股份。
<https://investor.twitterinc.com/secfiling.cfm?filingID=1564590-18-14941&CIK=1418091>

52.1 Equinix2018 年股东会议提案

今天,我第一次出席 Equinix/ㄉㄤㄨㄟˊㄌㄨㄟˊㄌㄨㄟˊ⁴³⁸公司的股东年会。因为担心湾区的交通拥挤,我很早出发,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公司,却没有任何接待标志。我等到会前几分钟,才找到会议入口。与前天出席的 Tesla/ㄊㄜˊㄊㄨㄟˊㄌㄨㄟˊ/特斯拉公司的四百人股东大会⁴³⁹相比,今天只有 12 人与会,除了一个会计行的代表,只有我一个外部人。我快速翻阅会议规则,不由得感到可笑,知道是针对股东提案者 Chevedden 和外部与会者(我)设计的,与我经历过的害怕股东批判的公司类似⁴⁴⁰: “each stockholder will be limited to one question 每个股东只能提一个问题”, “Each speaker will be limited to one (1) minute 一个发言者只能讲一分钟”(第 5 条); “Derogatory references to personalities or comments that are otherwise in bad taste will not be permitted and will be a basis for removal from the meeting. 对个人的贬损或品味不好的评论,将不容许并将被驱逐出会场。”(第 8 条)。

主持人是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原任和现任代理 CEO。他很快念完前三个公司的提案,点到我的名字。我站起来代表老朋友 Chevedden 宣读他的 Proxy Access 股东提案(第 4 号),要求降低股东提名、提案的股份门槛,要求提高普通股股东的权利(3%的股东联名可以提名 25%的董事),但省略了提案中对几个董事资历的批判。我本身不是股东,也没有进一步提问。

会议很快结束,我们的提案没有通过。我独自离开会场时,主持人赶过来与我握手道别,一个女士过来带路并表达歉意。我从 trouble maker

⁴³⁸主要业务是运营四十多个国家/地区的 180 多个 International Exchange Box 数据中心,在中国也有业务,但没有表意汉字翻译的中译名。 <https://www.equinix.cn>

⁴³⁹赵京“Tesla/ㄊㄜˊㄊㄨㄟˊㄌㄨㄟˊ/特斯拉 2018 年股东大会提案”, 2018 年 6 月 5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tesla2018.pdf>

⁴⁴⁰赵京,“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 2012 年 3 月 21-28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变成 VIP 了！当然，他们要是知道我出席了这么多股东会议，就不会害怕、戒备了。

ㄉㄅㄨㄟㄣㄣ有七千多名员工，CEO 报酬与雇员平均工资之比为 100-140。从公司业务、规模、治理等方面不一定具有战略价值值得投资、提案，但值得进一步关注。

[2018 年 6 月 7 日]

52.2 Equinix2018 年股东会议提案

今天，我第二次代表老朋友 Chevedden，出席了 5 月 13 日 5 月 15 日股东年会。这一次，接待的女士和主持人（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都热情地过来问候。主持人很快念完前四个公司的提案，点到我的名字。我站起来宣读第 5 号股东提案，要求公司公布具体的政治捐款的对象和数额，而不是笼统地归入进行游说的组织的会员费。这个提案的背景是 2010 年最高法院在“Citizens United”案件判决中，容许企业作为“人格”无上限地捐款，但附加了“透明性”的要求。

这次提案没有得到多数股份赞同，但董事会的反对声明为了争取股东支持，列举了公司采取的相应政策，包括没有直接向个人或政治团体捐款等，也是一种企业治理的改进。

[2019 年 5 月 30 日]

53 Guidewire Software/导线软件 2018 年股东会议提案

今天，在中美贸易战和世界经济/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气氛中，我第一次出席 Guidewire Software/导线软件⁴⁴¹公司的股东年会。导线软件有两千多名员工（主要在美国），在硅谷算中-大型公司。因为担心旧金山湾区的交通拥挤，我很早出发，赶到公司时，会场还没有准备好。我安慰接待的女士说，自己出席过很多股东会议，对程序很熟悉，放松了她的紧张戒备。今天只有十几个人与会，好像只有我一个外部人。会议规则针对股东提案者 Young 和我设计，与我经历过的害怕股东批判的公司类似⁴⁴²：发言者只能讲三分钟（第 7 条）；会议主席或秘书将停止品味不好的贬损性意见和评论（第 9 条），等。

主持人是公司的总裁和 CEO（日裔）。他很快念完前三个公司的提案，点到我的名字。我代表 Young 宣读她的股东提案第 4 号，要求取消目前的三年选举一次董事的作法，改为每年选举所有的董事。现在 Standard & Poors 500 个大型公司有 89% 每年选举所有的董事，多数中型公司也取消了几十年才选举一次董事的作法，特别是导线软件的治理又没有股东可以召开特殊会议的权利、改变公司章程需要绝大多数赞成，等。

坐在主席台的另一位是公司秘书长，他宣读初步统计结果，我们的股东提案获得通过，赞成高达 92%！而公司的关于高层报酬的提案，只得到 53% 的赞同。

我简略浏览导线软件公司的年度报告，从业务、规模、治理等方面，如 CEO 报酬与雇员平均工资之比为 68: 1。因为我基本上已经与硅谷的所有超级大公司打过交道⁴⁴³，导线软件这样的中-大型公司值得下一步关注。

⁴⁴¹主要业务是为资产和意外事故保险提供软件技术和服 务，在日本有、但在中国没有业务，没有表意汉字翻译的中译名。<https://www.guidewire.com/>

⁴⁴² 例如：赵京，“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2012 年 3 月 21-28 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⁴⁴³ 硅谷实际上仍然是西部荒原，对金钱、权力与名声的追逐依然支配着社会。我

[2018年12月6日]

深感庆幸、也不敢忘记自己从事企业治理的榜样：一个多世纪前，为了劳工利益不惜教育 Andrew Carnegie/ㄚㄨㄥˊㄘㄨㄛˊㄎㄨㄛˊ/卡内基而被判处 22 年的 Alexander Berkman/ㄚㄨㄛˊㄅㄟㄎㄨㄢˊ/伯克曼。

54 Intuitive Surgical/直觉外科公司 2019 年股东会议提案

今天，我第一次出席 Intuitive Surgical/直觉外科⁴⁴⁴公司的股东会。从名字上看，我原以为是初创型公司，其实它 1995 年就成立了（部分技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成果），现有 5,527 名员工，还在扩建大楼，在硅谷也算大型公司。因为担心旧金山湾区的交通拥挤，我很早出发，赶到公司时，会场还没有准备好。几个白人老股东比我先到，一个人说他持有 Apple、Adobe 和 Intuitive 股票，从来没有出售过，可以想象回报巨丰。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公司女士出来接待我，进入会场后，新的 CEO 也专门来问候我。感觉有些类似我十几年前在 Adobe 工作时的乐观气氛。今天有五十人左右与会，股东占一半。

CEO（在美国受教育，看起来像印裔）主持会议。他很快念完前四个公司的提案后，请我代表股东 Young 宣读她的股东提案第 5 号，希望我不要照本宣科。我简要点明要点，要求取消超级多数（2/3 以上）的条款，只要简单多数（50%以上）就可以采纳议案，除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报告，DowDuPont、Alcoa、Goldman Sachs 等大公司都采纳了类似的提案。我进而介绍前不久与 Tesla 的会议，也朝着类似的方向改进。

坐在主席台的公司秘书长宣读初步统计结果，我们的股东提案获得通过！

正式会议结束后，CEO 介绍公司的唯一产品：外科手术机器 da Vinci/ 达芬奇系统。现在，随着 AI/人工智能的普及，人们越来越接受和需求“机器人医生”，中国、意大利也有竞争对手出现了。关心健康的高龄股东们踊跃提问，是我最近出席的长时会议，会后还直接进入展室，观摩 da Vinci 系统。作为这个领域的开创者，相对低调的直觉外科公司在专业务实的董事会带领下，虽然股票已经偏高，前（钱）途看起来不错。

⁴⁴⁴ 没有正式的表意汉字翻译的中译名。<https://www.intuitive.com/>

[2019年4月25日]

55 Electronic Arts/电子艺术 2019 年股东会议提案

今天，我第一次出席 Electronic Arts Inc./电子艺术公司的股东会，代表老朋友 McRitchie 和 Young 宣读他们的股东提案。除了公司的董事、高管加员工二十几人，只有十来个股东与会。

电子艺术是美日欧的第二大电子游戏公司，有近万名员工，公司的股东没有召开特别会议的权利，McRitchie 和 Young 的第 6 号股东提案公司要求 15% 的长期股份拥有者可以动议召开特别会议，而公司注册的德拉瓦州容许的下限是 10%。为了反对股东提案，公司专门加入第 5 号提案，给与 25% 以上的股份拥有者召开特别会议的权利。

公司的秘书长主持会议，他很快念完前 5 个公司的提案，就到第 6 个提案，请我发言。我站起来指出：第 5 号公司的提案定出 25% 的下限，但设置繁琐的限制，使得实际上要有 50% 的股份拥有者才能召开特别会议，而许多上市的公司采用都第 6 号提案的 15% 下限。

秘书长接着公布初步统计结果：所有的提案，包括第 6 号股东提案，都获得多数赞成通过！

正式议程随即结束，公司的年轻的 CEO 简单介绍业务、业绩后，问有没有股东提问？没有。接着放映了几分钟 11 月将发布的新游戏后，全程十几分钟的会议就结束了。

McRitchie 得知结果后，电邮给我电子艺术的股份数据，机构大股东占据绝大多数股份。它们对公司近来的股价下降不满，可能也对公司反对股东提案的做法不以为然，就赞同了 McRitchie 的提案。

虽然我对电子游戏不太感兴趣，但我近年来转向硅谷的大型企业的治理和社会政策⁴⁴⁵。电子艺术 2018 年 CEO 报酬是 35,728,764 美元，Chief

⁴⁴⁵ 我刚提交给 Visa 公司 2020 年的股东提案就是改革高薪报酬：
http://cpri.tripod.com/cpr2019/visa_proposal_2020.pdf。

Design Officer/设计总监是 48,385,837 美元, 2019 年 CEO 报酬与雇员平均工资之比为 200: 1, 这样的趋势无法持续, 令人担忧, 值得保持关注。

[2019 年 8 月 8 日]

56 2020 年 AT&T 股东会议改善高层报酬指导原则的提案

2019 年 10 月 10 日，我同时用可记录的“证明”邮件和电邮向 AT&T 公司提交如下简单提案，建议公司改善高层报酬的指导原则：**Resolved: 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AT&T Inc. improve guiding principle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在附属声明中，我指出 CEO 年收\$29,118,118，而中位员工的年收是\$95,814，悬殊高达 304:1。我引用 CBS NEWS2019 年 8 月 14 日报道：美国的 CEO 们 40 年来收入增加 940%，但工人平均收入只增加 12%，指出美国的高管收入攀升气球既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经济上也无法持续。相比之下，日欧大公司的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比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我进而引用 10 月分处于领先声望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Elizabeth Warren 参议员的激进竞选纲领，指出公司主动改革的必要。

邮局的记录显示我的“证明”邮件 10 月 15 日寄到了 AT&T，但 12 月 10 日，我离奇地从邮局接到被 AT&T 拆封后退回的“证明”邮件。我马上再次去函 AT&T 询问原由，并附上所有邮寄记录。AT&T 不得不用电邮联系我，承认按时收到了我的提案。

AT&T 很快行动，于 12 月 19 日同时电邮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我，以我的提案“impermissibly vague and indefinite/不可救药地含糊与不确定”借口，排除我的提案。我马上回复，反驳 AT&T 的这个荒唐排除理由。我并不乐观，因为 Trump 总统任命的 SEC 主席偏向公司，我提交给 Visa、Apple、Juniper Networks、Amazon 的同样提案都被公司雇用的律师行排除，SEC 都站在公司一边，没有听从我的反驳意见。更有甚者，SEC 正在策动改变提案规则，把能够提案的股份份额提高为现行份额的 12.5 倍、持有时间增长为现行时间的 3 倍，谋图一举取消小股东提案的经济民主权利！

2020 年 1 月 31 日，SEC 的 Acting Deputy Chief Counsel/代理副总理

师电邮给 AT&T 和我，转达 SEC 的 Special Counsel/专门律师的意见，不同意 AT&T 的排除理由！这真是一个难得的胜利，成为一个将会被引用的“经典”案例。

没想到，AT&T 在 2 月 6 日又给 SEC 和我发来电邮，以我的提案“事关公司通常业务”（而不是政策性议题）为由又要排除我的提案。我随即给 SEC 和 AT&T 回复，指出从程序上 SEC 不应该接受这样的无理要求，否则的话，所有的公司都会学 AT&T，没完没了地找出新的理由排除股东的提案。

2 月 25 日，SEC 通知 AT&T 和我，再次否认了 AT&T 的排除要求⁴⁴⁶，确定了我提案将会在 4 月 24 日召开的股东年会上付诸表决⁴⁴⁷。同时，我注意到 AT&T 的股东年会还有一个由 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 工会(7 万成员)提出的股东提案要求由员工推选出一个董事，也是我提交给 eBay 今年股东大会的提案内容，正等待 SEC 的裁决。这是美国企业治理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战场。

[2020 年 3 月 24 日]

后记：4 月 24 日股东大会表决的结果是：赞成 347,352,271 (8.72%)、反对 3,633,837,008 (91.28%)、弃权 55,587,680、未投票 1,746,494,280。

⁴⁴⁶我们三者的所有通讯都已经被发布到 SEC 网站：

<https://www.sec.gov/divisions/corpfin/cf-noaction/14a-8/2020/zhaoatt013120-14a8.pdf>

⁴⁴⁷ <http://cpri.tripod.com/cpr2020/attnotice.pdf> Item No.6.

57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Review

This is the release of CPRI's research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review, with a focus on human rights, executive pay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board directors. Many companies added environmental factor to their CSR reports, but it is not comparable or fair among energy, manufacturing and software companies, and I noticed some companies inserting this factor to dilute social concerns. At this stage, I include these companies (1 in Japan, 6 in China and the rest in the U.S.) based on my personal knowledge and field study since as early as 1992 when I started to work in Japan. The hundreds documents/articl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the foot notes extensively show how I reach to conclusion for each company's CSR. Being a trained Sociologist on social research, I am fully aware of the methodology constrain of this project. Nonetheless, it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among so many reviews on how to gaug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which has greatly been driven by thes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under review. There have been wide media reports of my work regarding shreholder proposals but this review does not include these second resources.

A: 80-100, leader

B: 60-80, good citizen

C: 40-60, average effort

D: 20-40, concerned, need improvement

F: 0-20, failure, unethical, unlawful

Jing Zhao, Ph. D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November 8, 2012 [V.1]

March 21, 2013 [V.2]

March 4, 2014 [V.3]

January 1, 2015 [V.4]

January 1, 2016 [V.5], August 26, 2016

January 1, 2017 [V.6]

January 1, 2018 [V.7]

January 1, 2019 [V.8]

A Google⁴⁴⁸

A- Intel⁴⁴⁹

B+ Chevron⁴⁵⁰

B- HP⁴⁵¹, Microsoft⁴⁵², Cisco⁴⁵³, facebook⁴⁵⁴, Symantec⁴⁵⁵, Wells Fargo⁴⁵⁶

⁴⁴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google.html> . There are three documents on Google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3.html> , seven documents on Google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4.html> including the final review in Chinese at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google2010.html>

⁴⁴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Intel_csr.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ict_freedom.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to_intel110921.pdf

⁴⁵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chevron.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chevron2009.pdf> . There are five documents on Chevron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4.html> including the final review in Chinese at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evron100201.pdf>

⁴⁵¹ <http://cpri.tripod.com/cpr14.html>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hp111010.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hp120912.pdf>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en/>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hp-policy.pdf> ,
http://media.corporate-ir.net/media_files/irol/71/71087/proxy2013/HTML2/default.htm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hp-shareholders-meeting.pdf> , and more files at the link <http://cpri.tripod.com/cpr17.html>

⁴⁵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MS_Shareholders.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microsoft2013.pdf>

⁴⁵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cisco.pdf> . There are fourteen documents on Cisco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4.html> including five documents in Chinese.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proposal_to_Cisco_2014.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cisco_2014.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cisco2015.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cisco2018.pdf>

⁴⁵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g2.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fb_proposal_2016.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fbproxy2016.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facebook2016.pdf>

C+ Dentsu group⁴⁵⁷, Adobe Systems⁴⁵⁸, Best Buy⁴⁵⁹, Boeing⁴⁶⁰,
Gilead⁴⁶¹, Wal-Mart Stores⁴⁶², Twitter⁴⁶³

C Applied Materials⁴⁶⁴, eBay⁴⁶⁵, China Digital TV⁴⁶⁶, JDS Uniphase⁴⁶⁷,
Sun Microsystems⁴⁶⁸, Brocade Communications⁴⁶⁹, Visa⁴⁷⁰, SunEdsion⁴⁷¹,

455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symantec.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ymantec_shareholder_proposal_2015.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symc2015.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symantec2015.pdf>

456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wf2018.pdf>

457 I worked for two Dentsu group companies 1992-95. <http://www.dentsu.com/csr/>

458 I worked in Adobe 2000-2001 as a Quality Engineer.
<http://www.adobe.com/corporate-responsibility/reports.html>

459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bestbuy.pdf> Note: after further communications with
Best Buy, I upgraded its CSRI from C to C+.

460 There are six documents on Boeing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4.html> including
the final review in Chinese at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boeing.pdf>

461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gilead.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gilead2018.pdf>

46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walmart160509.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walmart_proposal_2017.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walmart.pdf>

463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twitter_proposal_2016.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twitter2018.pdf>

464 <http://cpri.tripod.com/cpr2003/stock.pdf> ,
<http://www.appliedmaterials.com/about/cr>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applied.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amat_proposal_2017.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applied2018.pdf>

465 http://www.ebayinc.com/social_innovation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ebay.pdf> . I also attended its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users' event one time each.

466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stv.html>

467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jdsu.html>

468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sun.html> (acquired by Oracle in 2010)

Hoapira⁴⁷², Altera⁴⁷³, Hospira⁴⁷⁴, Ellie Mae⁴⁷⁵, Verizon Communications⁴⁷⁶,
Clorox⁴⁷⁷, Nuance⁴⁷⁸, salesforce⁴⁷⁹, Equinix⁴⁸⁰, Guidewire Software⁴⁸¹
C- Goldman Sachs⁴⁸², China Southern Airlines⁴⁸³, Juniper Networks⁴⁸⁴,
Oracle⁴⁸⁵, NetApp⁴⁸⁶, Sandisk⁴⁸⁷, IBM⁴⁸⁸, JPMorgan Chase⁴⁸⁹, Exxon

-
- 469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Brocade_Zhao_20110513.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brocade.pdf>
- 470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visa.pdf>
- 471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memc.pdf>
- 47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hospira.pdf>
- 473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altera.pdf>
- 474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hospira.pdf>
- 475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elliemae.pdf>
- 476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verizon_proposal_2017.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verizon2017.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proxy-vz.pdf>
- 477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clorox.pdf>
- 478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nuance.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nuance2018.pdf>
- 479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salesforce.pdf>
- 480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equinix.pdf>
- 481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guidewire.pdf>
- 48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Letter_to_GS_20120521.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proposal2013_to_GS.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gs-policy.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gs_sec.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zhao121228.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SEC130308.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gs_statement.pdf , and more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7.html> and <http://cpri.tripod.com/cpr18.html>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gs_shareholder_proposal_2015.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gs_proposal_2016.pdf
- 483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chinasouthernairlines.pdf>
- 484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juniper.pdf>
- 485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oracle.html> ,

Mobil⁴⁹⁰, Sohu⁴⁹¹, Netflix⁴⁹², American Express⁴⁹³, Tesla Motors⁴⁹⁴

D+ News⁴⁹⁵, Apple⁴⁹⁶, PetroChina⁴⁹⁷, RadioShack⁴⁹⁸, Zynga⁴⁹⁹, Sina⁵⁰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racle.pdf>

⁴⁸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netapp.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netapp_proposal_2014.pdf

⁴⁸⁷ Sandisk did not answer my shareholder letter of human rights concern.

⁴⁸⁸ Three documents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8.html>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Zhao-SEC-IBM.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SEC-IBM.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IBM-2015-Proxy-Statement.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ibm-abe.pdf>

⁴⁸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jpm_shareholder_proposal_2015.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jpm_proposal_2016.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SEC-JPM.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proposal9.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jpm2016.pdf>

⁴⁹⁰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exxon_proposal_2016.pdf

⁴⁹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Letter_to_sohu_20120521.pdf and more files at the

link <http://cpri.tripod.com/cpr18.html>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ohu_proposal_2015.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form8k.pdf>

⁴⁹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netflix.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tesla-netflix2015.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netflix2016.pdf>

⁴⁹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axp_proposal_2017.pdf

⁴⁹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tesla-netflix2015.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tesla.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tesla2018.pdf>

⁴⁹⁵ There are five documents on News Corp.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4.html>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News_letter.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News_scandal.pdf

⁴⁹⁶ <http://www.apple.com/supplierresponsibility/>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letter_to_apple2013.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apple-policy.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to_gore.pdf , three documents of 2015 shareholder

proposal: <http://cpri.tripod.com/cpr18.html> ,

Alibaba⁵⁰¹, Altaba⁵⁰², PG&E⁵⁰³

D Baidu⁵⁰⁴

F Yahoo⁵⁰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apple_proposal_2016.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apple_proposal_2017.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zhao-sec-apple.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sec-apple.pdf> ,
http://fortune.com/2016/11/01/sec-says-apple-must-allow-investors-to-vote-on-executive-pay-probe/?xid=for_fb_sh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apple-board.pdf> ,
<https://www.mccarter.com/files/Uploads/Documents/Shareholder%20Challenges%20Apple%20Pay%20Practice.pdf>, five links on 2018 shareholders meeting:
<http://cpri.tripod.com/cpr22.html>

⁴⁹⁷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petro.pdf>

⁴⁹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Zhao_RadioShack120516.pdf

⁴⁹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csri-chinese.pdf>

⁵⁰⁰ I visited Sina when it started in Silicon Valley in 1999, have been its shareholder, and have used its blog and weibo services after it moved to China.

⁵⁰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5/alibaba.pdf>

⁵⁰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yahoofund2017.pdf> Anyuan

⁵⁰³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pge.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pge2018.pdf>

⁵⁰⁴ I have been its shareholder. It never replied my letters.

⁵⁰⁵ 17 documents in 2007 at <http://cpri.tripod.com/yahoo.html> ,
<http://www.epochtimes.com/gb/7/6/11/n1739900.htm> , 8 documents in 2008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2.html> ,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yahoo2009.html> , 5
documents in 2010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4.html> , 9 documents in 2011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5.html>,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yahoo_220_complaint.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yahoo_proposal_2012.pdf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zhao_sec.pdf , 6 documents in 2013 at
<http://cpri.tripod.com/cpr17.html> ,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mak.html> , 7
documents (including proposals to Wal-Mart Stores and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
2016 at <http://cpri.tripod.com/cpr20.html> ,
<https://chinachange.org/2016/04/28/statement-by-seven-former-chinese-political-prisoners-regarding-the-death-of-harry-wu-and-the-abuses-of-the-yahoo-human-rights-fund/> ,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05/25/the-complicated-and-contradictory-life-of-harry->

[wu-china-yahoo/](#),
<http://www.nytimes.com/2016/08/14/us/champion-of-human-rights-in-china-leaves-a-tarnished-legacy.html>,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zhao-yahoo.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gadflies.pdf>,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zhao-yahoo20160817.pdf> .

[Updates]

March 21, 2013: downgraded Apple from C- to D+; downgraded Goldman Sachs from C to C-; upgraded HP from C+ to B-.

March 4, 2014: added B-: facebook, C: PG&E, SunEdison; added more research to HP, Goldman Sachs, Sohu, Microsoft, NetApp, and Yahoo, with more contents on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1, 2015: added C: Hospira, Altera, Hospira, Netflix; C-: IBM; added more research on eBay, Goldman Sachs, Sohu, NetApp, Applied Materials, Brocade Communications, Cisco, Symantec; chang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 to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view”.

January 1, 2016: added C-: JPMorgan Chase, Twitter, Exxon Mobil; added C+: Tesla Motors; added D+: Alibaba; changed Symantec from C- to B-; changed Sohu from D to C-; changed Netflix from C to C-; changed News from F to D; added more research on Goldman Sachs, IBM, Cisco, Apple, facebook.

May 11, 2016: added C+: Gilead; changed Baidu from D+ to D; changed News from D to D+.

January 1, 2017: added C+: Wal-Mart Stores; added C: Verizon Communications, Clorox; added C-: American Express; changed title from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CPRI)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view (CSRR)”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Review”.

January 1, 2018: added B-: Wells Fargo; C: Nuance, salesforce; D+: Albata.

January 1, 2019: upgraded Twitter from C- to C+; downgraded Tesla Motor from C+ to C-, PG&E from C to D+; added C: Equinix, Guidewire Software.

[读者反馈 Readers' Comments]

“本文的特色在于以历史和全球的视野，立足国际政治和社会安全来剖析金融市场中的种种较量 and 交易，发人深省，振聋发聩。”

“博文缜密。探骊得珠，有思想性。读后豁然开朗。真理重要，传播真理更重要。”

“你的文章很好，对民主推广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金融时报》读者：“看完了这篇文章才觉得它写的好。作者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但又没有忽视中国本土的进步因素（请贸然批判作者的读者好好看看第三页的最后一段，再回过头来仔细阅读一下第二页就更好）。的确，冷战时代的真正结束并不在于柏林墙的倒塌，而在于地缘政治关系的长期调整，现代工业经济与民主政治阵营的实质性扩展，大国外交战略的转型，以及人们心中柏林墙的倒塌。”

Gilles Lespade: "I'm a librarian of the Centre Chine (the biggest Asian collection in France). I wish to receive anything from you."

Antia Chan: "I hope more PRC Chinese think like that."

Barry Brooks: "I sent it to about 25 people in the U.S. Congress."

ISBN 978-0-557-05663-7

90000

ID: 6464970
www.lulu.com



9 780557 056637